

人文科学译丛 第四辑 政治与文学研究

政治与文学

POLITICS AND LETTERS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樊 何 王卫芬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POLITICS AND LETTERS

政治与文学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樊 柯 王卫芬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Raymond Williams*, 1979

NLB and Verso Editions,

7 Carlisle Street, London W₁

Verso Edition 1981

Filmset in 10 on 12 pt Ehrhardt by

Servis Filmsetting Ltd, Manchester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BN 0 86091 735 5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 VERSO 出版社授予
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9—1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与文学/[英]雷蒙德·威廉斯著;樊柯,王卫芬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0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ISBN 978-7-5649-0222-3

I. 政… II. ①威…②樊…③王… III. ①威廉斯,L.
(1921~1988)—访谈录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4602 号

© *Raymond Williams*, 1979
NLB and Verso Editions,
7 *Carlisle Street*, London W1

Verso Edition 1981

Filmset in 10 on 12 pt Ehrhardt by
Servis Filmsetting Ltd, Manchester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书 名 政治与文学
著作责任者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樊柯 王卫芬 译
责任编辑 麻保金 张 珊
责任校对 张 珊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雷蒙德·威廉斯是当今英国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题涵盖了从历史哲学到商业电视、从街头政治到戏剧悲剧、从意识形态修辞到阶级结构的广阔范围。然而，尽管威廉斯在英语世界中对“左派”文化有重要贡献，但关于他的思想迄今很少有系统化的批判性论述——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政治与文学》是一本关于威廉斯的访谈，由《新左派评论》进行，访谈的设计是要把他作品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带入清晰的关注焦点之中。访谈分成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威廉斯详细叙述了他一生中的发展，从威尔士与英格兰边界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经历了剑桥学生时期的共产主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考验。第二部分涉及威廉斯据以成名的文化理论，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涵盖的是更为专业的文学与戏剧领域，采取文学批评或小说的形式——《现代悲剧》和《边村》。第五部分，考察了威廉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发展，以及他与英国工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变化的关系。自始至终，威廉斯逐步展开了对自己作品的批判性反思。《政治与文学》是一幅非凡的肖像描绘，呈现了一位在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

前 言

在当今英语世界社会主义作家中，雷蒙德·威廉斯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没有任何一个“左派”人物有如此大量的作品值得赞扬。而且，这些作品的范围在英国或美国可能是没有先例的，包括了政治介入、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戏剧分析、语义学研究、小说、戏剧和纪录片剧本。无论根据何种比较标准，威廉斯的读者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仅是他的英国版本的作品迄今已经售出大约 75 万册。^①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少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如此恒定、经常具有极高智力标准的作品宣称赢得并保持了这么广泛的读者群。

然而一直到最近，对于威廉斯作品的持续讨论还是相对缺少的，尽管这些作品在英语研究领域里（这个领域或许是英国自战争以来对于民族知识分子阶层的构成最为敏感的领域）日益增长的权威和影响，使“右派”一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与其全力紧张交锋的任何尝试。威廉斯作品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跨越了学术疆界，打乱了学科预期，这无疑已经成为敌对方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智力上

^① 例如，《文化与社会》已经售出大约 16 万册，《传播》售出大约 15 万册；《长期革命》、《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奥威尔》和《关键词》自出版后都已经售出 5 万多册，其中距今最近的《关键词》只不过是两年前出版的。——原书注

的困难无疑在“左派”一方也已经被感受到了。不过在这种情形下,更为重大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过去 10 年间,活跃在英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是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种变化应该归功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形成的本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群体的工作、费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辩论和社会辩论资源的枯竭,以及国际观念和国际习语在新一代——这代人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引人注目的斗争期间或者之后——当中的传播。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威廉斯的著作保持了值得关注的距离。当《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分别在 1958 年和 1961 年出版的时候,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就《文化与社会》、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就《长期革命》写了两篇重要的评论。^① 但是自此以后,威廉斯对戏剧、文学和电视的关注更具专业性,与那些专业史学家的分歧似乎已经妨碍了二者之间密切的持续对话。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即便分歧之处更多地在于使用的词汇和理论上的虔诚而非出于不同的兴趣,对其作品的直接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较少。但是,最初的全面评价正是来自这一代人。1976 年,《批评与意识形态》第一章发表了,作者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以前的学生。^② 几乎与此同时,威廉斯本人在 1977 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一次论述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定义和重要问题,在进行论述的时

① Victor Kierna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New Reasoner*, 9, Summer 1959;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and 10, May—June and July—August 1961. ——原书注

② *Criticism and Ideology*, NLB, 1976, pp. 21~42; first published as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in *New Left Review*, 95, January-February 1976. An earlier survey can be found in Michael Green,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6, Spring 1975. ——原书注

候,他披露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某些未曾公开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左派评论》构想出版一部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访谈录,深入详细地探究其作品的内容与形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新左派评论》成型的时候,它就已经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充分估量威廉斯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任何自主的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在英国形成。^① 伴随这一有计划的安排,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包括《英国左派》(NLR 30)、《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希安·戈德曼》(NLR 67)、《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与上层建筑》(NLR 82)、《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笔记》(NLR 100)和《唯物主义诸问题》(NLR 109)。尽管如此,《新左派评论》证实了它在这些年里并不比其他左派刊物更有能力评估威廉斯不断取得的成就。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传统,其主要关注在于别的方面。在这段时期,《新左派评论》系统地介绍评价了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卢卡契、萨特、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这一方针的原则是双重的:清晰而又连贯地陈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每一种潮流的结构概念和主题,然后以一种既独立而又团结的精神、公正但却坚定不移地用批判的眼光评价它们。这种做法使《新左派评论》区别于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英国扩大的两种反应:把外来学说看做异族理论对本民族传统的入侵而强烈谴责;或者以损失所有其他流派为代价对某个流派如导师般地拥护,视为某种具有优先权的知识所在。《新左派评论》对比鲜明的立场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本》收录的文章中得到诊察。^② 现在这本书是那项工作自然而必要的延伸,它是在威廉斯本人的写作

^① See, for example, 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35, January-February 1966, p. 32. ——原书注

^② NLB, 1977. ——原书注

自觉加入到更为广泛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论争的时刻，转向评价当代英国卓越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它直接源于《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成员安东尼·本奈特(Anthony Barnett)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威廉斯全部作品的关注，这篇文章(《雷蒙德·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对特里·伊格尔顿的反驳》)试图探究并鉴别威廉斯社会主义的独特不同之处。^① 为了使这种关注发展成充分和直接的交流，就设想了用访谈构成一本书的方案。

从历史上看，访谈是现代新闻业的一个创造，还不到100年。它最初为报纸而设计，最近才零星地用于图书。作为一种形式，它通常受到人为缄默的限制：引发受访者回应的访谈者自己并不开口表明他们自己的立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访谈——可能尤其关于智识问题的方面——通常也是没有批判力的，因为真正批判性探索的先决条件是对可供选择的观点进行辩论的能力和意愿。在可能做到的地方，《新左派评论》尽力构建访谈的另一种模式，允许双方的陈述和辩论。^② 这本书就是那种做法。但是，这本书的规模是非同一般的。这应归于我们对威廉斯著作性质及其重要性的评价：它与欧洲别处的类似著作完全不相上下，在某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同时也应归于威廉斯自己毫无保留的自愿，他愿意回应向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批评和相反的论点——以往这样的先例是很少的。这些访谈是1977年6月到11月在剑桥进行的，其中关于小说的访谈是在1978年9月进行的。

NLR

① *New Left Review*, 99, September-October 1976. ——原书注

② 对让-保罗·萨特和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的访谈(NLR 58 and 86 respectively)是与此相关的例子。——原书注

雷蒙德·威廉斯年表

- 1921 出生于格温特郡阿伯加文尼镇潘迪村的勒韦德伍,亨利·约瑟夫·威廉斯和以斯帖·格温多琳(伯德)的独子。父亲是大西铁路的铁路信号员,出生于1896年,是农场工人(尔后是筑路工人)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出生于1890年,是农场管家的第三个女儿。
- 1925 就读于朗菲汉吉尔·克鲁考尼(威尔士圣公会)小学。
- 1926 父亲参加大罢工,任工党支部书记。
- 1932 获得郡奖学金,入阿伯加文尼的亨利八世文法学校。
- 1935 拒绝威尔士教会坚信礼。
在大选中为工党候选人迈克尔·富特工作。
- 1936 获威尔士中央管理委员会授予的中学结业证书;大学考试免试。
- 1937 加入阿伯加文尼的“左派图书俱乐部”。
8月:获威尔士国联协会奖学金,赴日内瓦参加青年大会。
- 1938 7月: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英语、法语、拉丁语科目)、政府奖学金。
9月:在阿伯加文尼的公众集会上是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发言人。

- 1939 春季:在补缺选举中为工党候选人弗兰克·汉考克(和平誓言同盟成员)做全职工作。
- 10月: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
- 12月:加入共产党学生支部。
- 1940 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作家小组成员;短篇小说《小教堂里的母亲》和《赤土》;论文《空袭防御》和《文学与感性崇拜》;合写关于苏联入侵芬兰的活页文选。
- 4~6月:《剑桥大学校报》编辑。
- 6月:英语文学荣誉学位预备考试。
- 7月:加入潘迪 LDV(地方志愿军)。
- 1941 《瞭望》编辑。
- 剑桥人民大会艺术与教育部主席。
- 三一学院学生联盟的联合创立者。
- 6月:参加英国文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部分。
- 7月:应征入皇家信号部队;在普瑞斯泰顿作为无线报务员进行训练。
- 写作《解雇工人》(发表于《英国小说》)。
- 1942 1~6月:在丘奇斯特莱顿和拉科希尔成为训练部队的士官学员。
- 6月:被委任到皇家炮兵部队服役;派驻位于萨默塞特的护卫装甲师第21反坦克团。
- 6月:与乔伊·达琳结婚。
- 1943 皇家炮兵部队中尉;学习谢尔曼坦克教导课程。
- 1944 6月:随军团奔赴诺曼底。
- 7月:女儿梅琳出生。
- 9月:参加先头部队解放布鲁塞尔。
- 参加奈梅亨—阿纳姆行动。

- 1945 参加阿登斯行动、汉堡行动和基尔运河行动。
 4~10月：编辑军队报纸《第二十一》(笔名迈克尔·蒲波)。
 10月：B级复员，返回剑桥；列于Z级后备军官名单。
- 1946 6月：参加英国文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获三一学院高级奖学金。
 9月：被牛津大学辅导课程委员会(由远程教育代表团和工人教育协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委任为指导教师，讲授国际关系课程。
 9月：儿子艾德林出生；移居芬塞克斯郡的希福德。
- 1947 写作《布莱恩勒韦》(《边村》的第一个版本)、《美好的疗养场所》(1948年发表于《英国小说》)；开始写《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
 讲授文学课程。
- 1947~1948 与沃尔夫·曼考维兹和克里夫特·考林斯一起编辑《批评家》和《政治与文学》(后者合并了《批评家》)；文章包括《关于演员的对话》、《圣徒，革命者和投机家》、《苏联文学论争》、《圣哈瑞家的第四等级》、《詹姆斯·乔伊斯的流亡》、《广播剧》、《政府与大众文化》……还有《叛国者的讥讽》、《如何在流血的时候优雅》。
- 1948 完成《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出版于1952年)。
 为保罗·罗沙写作关于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纪录片剧本(电影没有拍摄)。
 写作广播剧剧本(被拒)，后来形成小说《莱德伊尔》(未出版)，描写关于育空地区的淘金潮。
 因为资金上的困难和编辑之间的个人争执，《政治与文学》停办。
- 1949 写作第二版《布莱恩勒韦》。

- 写作《阅读与批评》(出版于1950年)。
讲授文化理论课程。
- 1950 开始写《文化的观念》(后来的《文化与社会》)。
写作《阿达姆森》(未发表的小说)。
在大选中为工党工作。
儿子麦道出生。
- 1951 作为乙级后备军官,受到返回军队赴朝鲜战争服役的征召。拒绝征召。富勒姆法庭听证会之后,作为有原则的反对者被正式记录在案。被军队除名。
写作《靠近边境的村庄》(对《布莱恩勒韦》的修订)。
写作《蝗虫》(未发表的小说)。
- 1952 3月:移居哈斯汀。
重写《靠近边境的村庄》。
- 1953 发表《文化的观念》(《批评评论》,第三卷,第一期)。
写作《表演中的戏剧》(出版于1954年)并与麦克·奥洛姆合写《电影序言》(出版于1954年)。
《大路》、《成人教育》和《批评评论》的撰稿人。
- 1954 把《靠近边境的村庄》改写成《边境村庄》。
写作《文化与社会》第一部分,第2~6章。
- 1955 写作《文化与社会》第一部分第1章和第7章,第二部分第1~4章。
在大选中为工党做全职工作。
- 1956 完成《文化与社会》(出版于1958年)。
- 1957 把《边境村庄》改写成《边村》。
写作《麦克白国王》(未出版的戏剧)。
参加奥尔德玛斯顿示威游行。
参加伦敦“高校与左派评论俱乐部”。

- 1958 完成《文化是日常的》(发表于《信念》)。
 重写《边村》(出版于1960年)。
 开始写《尝试与原则》(后来的《长期革命》)。
- 1959 完成《长期革命》(出版于1961年)。
 写作《考巴》。
 加入《新左派评论》编委会。
 《新左派评论》、《论坛报》、《明智》、《批评评论》、《批评季刊》、
 《凯恩评论》、《党派评论》、《守卫者》、《新政治家》和《观点》的撰稿人。
- 1960 开始写《第二代》。
 7月:作为远程教育代表团的常驻指导教师,迁往牛津。
 在全国教师联合大会上以《大众文化》为题发言;《传播》因此得到企鹅出版社的授权写作。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聆讯会的见证人。
- 1961 写作《传播》(出版于1962年)。
 被委任为剑桥英语系讲师;被推举为耶稣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9月份迁往剑桥的哈德维克。
- 1961~1966 核裁军运动成员;工党成员。
- 1962 完成《第二代》(出版于1964年)。
- 1963 开始写《现代悲剧》。
 写作《戴维·休谟:推理与经验》(1964年发表于《英国思想家》)。
- 1964 完成《现代悲剧》(发表于1966年)。
 全职为剑桥郡的工党候选人工作。
- 1965 开始写《为马诺德而战》(小说)。
 开始写《乡村与城市》。
 剑桥“左派”论坛成员;越南团结运动成员。

- 1966 写作《乡下来信》(由 BBC-2 台制作成广播剧)。
把《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修订为《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出版于 1968 年)。
2 月:为剑桥的工党候选人工作。
7 月:辞去工党中的职务。
8 月:筹备会议,导致后来的《五一宣言》。
- 1967 写作《公共调查》(由 BBC-1 台制作成广播剧)。
5 月:第一版《五一宣言》出版。
《五一宣言》工作组的会议召集人。
修订《传播》(新版本出版于 1968 年)。
- 1968 写作《乡村与城市》的前半部分。
5 月:企鹅版《五一宣言》出版。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意大利演讲。
- 1968~1972 《听众》(电视评论)的撰稿人。
- 1969 根据授课笔记写作《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出版于 1970 年)和《塘鹅入门图书 II:英国散文》。
“左派”全国大会主席。大会纪律委员会主席。
写作《为马诺德而战》。
写作《激进或是可敬》(发表于 1970 年《我们应得的媒体》)。
- 1970 写作《奥威尔》(出版于 1971 年)。
写作《志愿者》(小说)
因为对于大选期间采用策略的不同意见,大会纪律委员会在 5 月份终止。
写作《关于自然的观念》(发表于 1971 年的《正在形成的疑问》)。
- 1971 写作《乡村与城市》。
开始写《兄弟》(小说)。

- 发表纪念吕希安·戈德曼的演说(发表于1971年的《新左派评论》)。
- 在意大利演讲。
- 1972 写作《志愿者》、《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 写作《文学与社会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表于1973年的《人类天性的局限》)。
- 1973 在美国和加拿大演讲。
- 写作《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发表于1974年)。
- 1974 2月:在大选中为工党工作。
- 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关键词》、《为马诺德而战》。
- 被委任为剑桥大学戏剧教授。
- 1975 完成《关键词》(出版于1976年)。
- 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为马诺德而战》。
- 修订《传播》(新版本,出版于1976年)。
- 在德国演讲。
- 1976 完成《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出版于1977年)。
- 完成《志愿者》。
- 写作:《1926年的社会意义》(发表于1977年的《拉弗尔》)、《英国自然主义的情况》(《英国戏剧:形式与发展》中的一部分,发表于1977年)、《我的剑桥》中的随笔(发表于1977年)。
- 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德国和法国演讲。
- 1977 写作《改革小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科幻小说与乌托邦》(发表于1978年的《科幻小说研究》)。
- 1978 完成《为马诺德而战》、《唯物主义诸问题》(《新左派评论》第109期)、《威尔士工业小说》(加迪夫出版社,1979)、《作为生产工具的传播手段》。

本书中对雷蒙德·威廉斯的访谈，由《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佩里·安德森、安东尼·本奈特和弗兰西斯·墨亨进行。

目 录

前 言	(I)
雷蒙德·威廉斯年表	(i)
I. 传记	(1)
1. 少年时代	(1)
2. 剑桥	(20)
3. 战争	(37)
4. 重返剑桥	(43)
5. 《政治与文学》	(48)
6. 成人教育	(62)
7. 五十年代	(68)
II. 文化	(79)
1. 《文化与社会》	(79)
2. 《长期革命》	(120)
3. 《关键词》	(166)

III. 戏剧	(178)
1. 《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	(178)
2. 布莱希特和布莱希特之后	(206)
IV. 文学	(230)
1. 《阅读与批评》	(230)
2. 《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	(237)
3. 威尔士三部曲与《志愿者》	(270)
4. 《乡村与城市》	(308)
5.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333)
V. 政治	(372)
1. 英国：1956~1978	(372)
2. 《奥威尔》	(398)
3. 俄国革命	(409)
4. 通向变革的两条道路	(423)
参考书目	(458)

I. 传 记

1. 少年时代

你的家庭和直属社区有什么样的特征？

我出生于潘迪(Pandy)，一个农业主导的村庄，它具有典型的威尔士乡村结构：农场以小规模的家庭为单位。我父亲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作为农场劳动力开始干活了。不过，后来山里通了铁路，他在15岁时找到一份铁路搬运工的工作，一直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军入伍。复原后他成为一名铁路信号工助理，然后成为铁路信号工。因此我的成长环境非常特别，小型农场独特的乡村社会模式与另一种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后一种社会结构属于铁路工人，他们是有组织的工薪族，能够感知到比连接他们的村庄更为广阔的社会体系。但是他们同时也被羁绊在直接归属的地方，与特有的家庭农场绑缚在一起。

来自东部的压力始终存在着，正如我们愿意说的那样——那种压力来自英格兰，因为我们正好居住在与英不同的乡村生活的边缘地带。这里有更为宽敞的庄园豪宅和曾经在印度殖民的退休主人，但是这些已经非常边缘化了，虚有其表。

社区有多大？

它是一个典型的离散型社区，而非一个核型社区——总体而言，这种典型的社区形式不仅适合于威尔士乡下，也适合于不列颠西部的

许多地区。直属教区的范围：一个方向是3英里，另一个方向是4英里，大约有三四百人居住其中。因而，农场之间大约相距1/4英里。当然也有小片聚居的人家，比如我就成长于比邻而居的6个家庭之一。它与典型的围绕教堂核状分布的英格兰东部乡下社区相比，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村里有一所威尔士圣公会管辖的学校、一个教堂、一个浸信会小礼拜堂和一个长老会小礼拜堂，还有四个小酒吧。

据你所言，似乎在许多方面它都不是一个典型的地区，对于英国乡下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不寻常的，因为你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小户农业，没有任何大的开发群体。这当然比不上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农业雇工组合成的三联体，这是英国的主要模式。

是这样。

同时，虽然你的父亲在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行业工作，但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与现代城市无产阶级所处的通常环境不同。

我认为关键就在这里。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的处境不具有代表性。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小农场主，他们的直接活动基本上不涉及剥削（家庭内部除外，这里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剥削：但是仅表现在家庭内部，而在家庭之外没有）。他们不是典型的劳动力雇佣者。农场的平均面积为60~100英亩，其中大约一半是起伏不平的山坡牧场，另一半草场则在山谷里。然而，农场主们显然是这一社区真正稳定的社会阶层，其他人也确实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定居的程度比不上农场主们。其他人的社会构成通常是混杂的。这里有铁路，促生了15~20个家庭、做零工的建筑工人、少许乘火车去城里上班的人，还有普通的乡下手艺人。

这些农场主或许看似非常稳定,但实际上小农场在经济上可能相对没有保障:年景有好有坏。

是的,那是让人沮丧的地方,小型农业直到现在依然长期投资不足,而且,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家庭里的劳动是剥削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存在着推迟婚姻的压力;根据父母死亡年龄的偶然性和对遗产的处置情况,在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公平;还有,孩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干活。他们不认为这是剥削,但是劳动确实很辛苦。奇怪的是,当这样一个家庭为了还债而变卖家产时,忽然间感觉他们好像一直都是物质财产的拥有者。当目睹家产变现的过程时,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奇特的双重印象。在这样的家庭里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剩余资金,钱都投到了建筑物或牲畜上,手头的几英镑现金在任何时候都要少于许多低薪工人。当然,变卖家产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在某些方面意味着这个家完了。

贯穿整个 19 世纪的土地集中进程仍然一直在继续推进。有时难以相信,甚至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小型农场,但是如果回到 100 年前,那时,小型农场的数量是现在的两至三倍。从那时起这类地区就一直在持续向外移民,以至于存留下来的也都是早前两三个小型农场的合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社区整体一直在缩小吗?

人口一直在减少,因为一直有人无法找到任何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土地。举例来说,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个农场雇工,他和雇主发生了争执(这雇主任在 20 英里之外),后来就成为一个养路工。但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所知道的其他一些人就离开这里去了矿上——许多人迁到有矿的山谷里,或者迁到城里工作。20 世纪有一次向伯明翰的大规模移民,我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去了那里。人们在不断地向外迁移。一直有大量的女性在离去,女性的迁移事实上要在

男性之前。女孩们离开这里去从事家庭服务业。威尔士农村人口的最大流失首先是女性的流失。此后,男人们开始离开这里去别处寻找工作。铁路在当地显得重要的原因在于:铁路员工的工作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没有风险。这话现在听起来像是在讽刺,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铁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它是一份高收入的稳定工作。

铁路员工和农场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二者之间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社会障碍。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就是一个农场主,这具有代表性。我父亲终生都在收获的时候帮助他的农场主朋友,也会在这个朋友的田地里种下自己的土豆,为我们全家提供重要的食物。如果你接近少数几个大农场主,就会开始意识到某种社会距离,那种感受你在遇到拥有汽车的某个人时也会发觉。当时只有两三个农场主才刚刚拥有汽车,学校的校长也有一辆。

有趣的是,村子里的政治领袖是铁路员工。我父亲所在的信号岗上有三个人,一个成为教区委员会的书记员,另一个是地方议员,而我的父亲则跻身于教区委员会。他们比村子里的其他任何人都要活跃得多。所有的铁路员工都投票支持工党。与之相反,多数农场主投票支持自由党。在村里内部事务上,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趣味上的局部分歧——其典型表现是关于支出。铁路员工是现代化的,比如说,他们想要引进自来水和其他新事物。他们读的书多,还经常交谈,这是他们在地域性之外的另一社会维度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因为铁路信号工在火车通过的间隙有很长时间无所事事,他们就通过电话一聊几个小时,把电话打到远在斯温顿(Swindon)或者克鲁威(Crewe)的信号岗。当然,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他们总是在这么做,因而他们一直从诸如南威尔士这样的工业化地区直接得到新的消息。他们接触了一个广阔得多的社会网络,努力把现代政治引到村子里。这就意味着提

高税率，农场主们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如果农场主们有组织地反对，他们就会获胜。但是除了这些冲突之外，两个群体之间正常的人际关系是非常亲近的。到信号岗看看，你会发现一两个小农场主坐在小屋里和铁路员工聊天，在雨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所有这一切，我想，都影响了我对社会形态的最初理解。

这个地区的各个宗教派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农场主们一边倒的是非国教派，浸信会教徒多于长老会教徒（加尔文循道派）。以我为例，我父母双方的家庭分别是混合型的国教派和非国教派，而我的父亲则非常敌视宗教。我外婆是个坚定的非国教派教徒，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被送到非国教派的教堂。当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则去了国教派的教堂。非国教派的教堂更加自觉地具有威尔士人的性质。后来，我拒绝行坚信礼，不过这个决定没有引起任何家庭危机。

你会说威尔士语吗？

我们不说威尔士方言。我们那里是一个已经英语化了的地区，英语化发生在 19 世纪 40 年代——这个时期通常被描述为“母亲不再教孩子们说威尔士语”的重要时期。事实上，在各个学校都有刻意清除威尔士语的强大压力，这包括对说威尔士语的孩子们进行惩罚。其结果是只有少数家庭掌握两种语言，多数家庭则只会说英语。但是，有些威尔士习语存续下来并影响了口头英语，这些是日常问候用语和发誓用语。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威尔士语现在是一种陌生的语言。

不过，人们学习并熟记威尔士诗歌和民谣以应对某些特定的场合，因为这里是 19 世纪早期开始威尔士文化复兴的几个地区之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边境地区，自觉的民族意识得以产生。在小学校

里,威尔士民谣和诗歌是孩子们的学习内容之一。

你当时对学习这些民谣持什么态度?一直觉得它们是难学的古语吗?

当我在文法学校学习的时候,这种感受特别强烈。与我当时的反应相伴的是对所见到的东西的总体厌恶,现在我仍然把这些东西看做是威尔士非国教派极端狭隘的表现。比如说,它对待饮酒的态度是青少年难以接受的。有一些东西我当时没有认识到,现在却理解了,在各个威尔士城镇建立文法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英国化**,他们把英格兰文化的取向强加于人,彻底切断每个人与威尔士特性之间的联系。你可以想象,这种影响如何与我对威尔士非国教社区各种规范的厌恶混在了一起。这导致了我对自己身上威尔士特性的排斥。直到30多岁,当我阅读历史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并完成我的这种威尔士特性。

你已经谈了威尔士的语言和宗教。在这种背景下的民族身份是怎样的呢?你们村子里的人,比如说你的父亲和祖父母,如果被问到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说自己是威尔士人吗?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这样分类?

他们对此也非常困惑。我曾经听到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我想他们对身份的地域性要有比我强烈得多的感受。这里有显著的历史原因。威尔士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它过去一直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而非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在形成一种真正独立的民族身份之前,它就被融合到“不列颠”之中,因此人们会一直追问威尔士究竟是什么。我自己最终理解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事实上所有威尔士人都会问自己作为威尔士人意味着什么。这里还存在着特有的地理环境因素。显然,边境地区的情况比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更令人困惑,毕竟北部和西部仍然是说威尔士语的地区,它们距离英格兰要远得

多。我们有一种奇怪的感受,那就是我们不管谈到威尔士人还是英格兰人,都是把他们当做外地人,而不是“我们”。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它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这里是边境地区,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战火争夺的地方。

你是否会把自己看做大不列颠人?

不会。这个词很少用,除非用来指不信任的人。“大不列颠”一般和“帝国”连用在一起,因而根本没有人用于其他场合,包括小农场主们也是这样。

你能谈谈你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吗?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自己的父亲从自由党到工党的政治转变了。转变由一个创伤性的时刻引起。当时祖父被解雇而离开自己的家——标准的长工住的小屋,成为一名铁路工人。作为一个支持自由党的小农场主,当成为牺牲品的时候,就会主张自己的阶级利益,祖父因而转向了工党。这已经预示了我父亲的倾向。后来,父亲极不情愿地被征召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和许多士兵一样,在一个极为激进的时期离开军队,回到铁路上。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恰巧又在矿谷里。这个地方高度政治化,存在着相当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他再次回到自己边境地区的家乡的时候,就自然学到了家乡的观念。

如此看来,你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家庭,很小的时候就了解社会主义了。

绝对如此。1926年大罢工时,村里小范围内展开了非常剧烈的斗争,那时我才5岁。车站站长是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因罢工责任而被降职。在第二信号岗发生了剧烈冲突,两个工人参加了罢工,而

另一个工人拒绝加入。《边村》中有一章对罢工的描述与这些事实非常接近。后来，工党赢得 1929 年大选，我还记得家里那种欢跃的气氛。父亲当时是村里工党支部的领导，我们为工党获胜举行了欢庆活动。

这么说，你对政治的接触主要通过父亲，你的母亲接受政治吗？她是否积极？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工党家庭的主妇，她负责沏茶、在信封上写邮寄地址，使事情圆满进行。她自己并不参与多少政治活动，但是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实际上，对于小农场主，母亲比父亲更有敌意，因为父亲一直在与小农场主们交往。母亲对小农场主阶级给予极不友善的评价，把他们看做是最底层的剥削者。不过，与小农场主的关系是母亲唯一直接体验过的社会关系。外婆曾经在一个较大的农场里做过制奶工，母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也在一个农场里工作过，因而她总是觉得农场主是雇佣者。

你幼时读什么书？智力上的发展如何？

除了课本之外，我读书非常少。进入文法学校之后也是如此。我想这可能与无书可读有关。家里几乎没有任何书，仅有的是《圣经》、《养蜂人手册》（我父亲的最爱）和一些常见的儿童图书，比如《你想知道是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所以哪里有可以找到图书的地方呢？当然，在学校可以到图书室借，可是我的时间都被课程占据了，直到我进入“左派图书俱乐部”之前一直如此。我花了 20 年到 30 年才习惯于应当买书的观念。顺便说一下，我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有买书的习惯。

谈谈你在学校的选课情况好吗？你在文法学校专修文学和语

言——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在青少年时期并没有显示对历史的学术兴趣，这似乎非常引人注目。

原因在于我所接受的文化，而不是我的个性。我们小学的历史课是校长教的，带有不切实际的中世纪威尔士沙文主义的印记。阅读内容无非是关于一个中世纪的威尔士王子如何击败了萨克森人，夺取了大量的牛羊和金银。我觉得令人作呕。它与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不仅缺乏联系，而且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进入文法学校之后开始学习大英帝国史。我们直接从18世纪中期的历史开始，其中有对加拿大的征服，对印度和南非的征服，以及整个帝国的扩张。这样的历史也不能引起我的多大兴趣。古怪的是，我后来不得不为自己重构历史的线索，不仅是关于英国的历史，还包括我自己所在地区的历史。我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但是后来觉得损失巨大，因为我不得不专心阅读英国历史的主要部分，其中当然包括威尔士的历史。我在学历证书上得到最高分数的是英语和各部门语言课程，那是我在六年级所得到的。

从村里的小学到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的文法学校是很大的一步吗？

我坐等奖学金的那一年恰巧是村里的黄金时代——7个学生获得了郡里的奖学金。为此还照了一组照片，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6个女孩再加上我，一共7个人。但是女孩们——其中几个还是农场主的女儿——通常上到五年级就会离开学校。其他来自村子里的男孩们一般也只上到五年级，然后就难以得到大学的入学许可。就这样，升入六年级的时候，来自潘迪的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我那时没有任何对于村里的疏离感。现在来看，文法学校造成了我思想上的游离。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与学校作业无关的其他事情都没有带来分离感。

村里和家里把文法学校看做是你生活领域自然而然的延伸,是这样吧?

哦,确实是这样。我甚至还曾责怪过父亲——虽然现在不责怪了——对我的逼迫太严酷了。我以第一名通过郡里的考试,因而他就认为,到了文法学校我自然应该成为年级里的第一名。第一学年末,我排名第二,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让我极为气愤的是,他认为得了第二名很糟糕。我想我大概感受到了令人羞辱的学校竞争,直到最后一次考试我才最终洗雪这种耻辱。

不过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社区里把接受教育看做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多年以后在谈话的时候,霍加特(Hoggart)谈到自己童年的感受,人们说他“聪明”,带有某种奇怪的含义。我的经验则完全不同。聪明,赢得奖学金或者写书,这些都没有什么错。我想这与文化传统有关。我所在的边境地区虽然英国化了,但还依然处于威尔士文化传统之中。与英格兰相比,威尔士历史上出身贫穷家庭的知识分子数量要多很多,因而这种社会身份的变动并不被视为是奇怪的或异常的。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典型的威尔士知识分子距其寒微的家世不过一代之遥。毕竟在威尔士没有形成可以维持本阶级知识阶层的群体,出身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都迁到了别的地方。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点,这就是威尔士大学的各个学院通过大众捐赠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在同时期的英格兰,这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教育也被当成摆脱令人沮丧的职业的一种途径。我记得有一次抗议父亲对我的学习督促,说:“这有什么用?”他说:“哦,举例来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售票员的职位。”那意味着每周一两英镑的收入。

那也是你当时的看法吗?

不是。但我也没有考虑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对我来说,上大学是一个惊喜。当时我正在等中学毕业文凭,等级A,因为我很快通过了

课程,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取得了这个成绩。校长向我父亲建议让我去剑桥大学。父亲后来说,“我们当时没有告诉你,这样即使剑桥不予录取,你也不会感到失望”。校长写信给三一学院请求接受我,然后没有进行任何考试,他们就录取了我。我在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之前从未去过剑桥,它就那样呈现在我的面前。不过,到那时我对自己将来做什么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上大学不是首要的,但却没什么冲突。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想,可以如实地说,那就是我如今正在做的事情。不是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必须一直提醒自己是大学教授),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当时我16岁,正在和我的密友(一个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一起编写剧本。我们在村礼堂举行公演,村里每个人都来观看这些戏剧。我也写了一部小说,书名是《大山落日》,现在不会有人能看到它了。小说内容是关于发生在英国的革命,其中一场重要的战役发生在边境地区——我恐怕受到了自己厌弃的威尔士史的影响!我把书稿寄给格兰仕(Gollancz)出版社。当时我是通过“左派图书俱乐部”知道它的。当然,它把书稿退回来了,不过还附了一纸客气的短签,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作品。足有6个月之久,当我重读这个短签的时候还是觉得受不了。

你们写的是什么样的戏剧?

我们写了两部标准长度的戏剧。耗力最大的一部还采取了侦探剧的形式,最终用证据揭穿了一个社区恶棍。我现在知道了这完全是情节剧的基本特征。当时我们被视为与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到处参与政治活动。不过,每个人都来了,村礼堂被挤得满满的。

这些戏剧参照了村子里的人和事吗？

是的，有一些。但是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在剑桥的时候，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小教堂里的母亲》，对狭隘的非国教派社区进行了批判。社区极端谴责性过错和性异常的行为，而牧师的女儿自己却未婚先孕了——这就是小说题目的由来。不知何故，我现在依然不知道刊载小说的那份刊物怎么到了家里。接下来的情况极其恶劣，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出去对这部小说进行诽谤……实际上，这个虚构的小插曲相当有代表性。我当时就已经对其中涉及的虚伪非常鄙视。在此之前，我们的戏剧对当地道德约束还是很尊重的。

什么样的政治活动使人们认为你不同于你的父亲？

在 1935 年的选举中，当地的工党候选人是来自牛津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我父亲为他组织了一场集会。我们认为集会非常单调乏味，决定外出到保守党候选人的集会看看。蒙默斯郡东部的稳定选票总是使它成为保守党的地盘。我们准备好了南非黑人劳动者的收入统计数字，到那里进行提问，问保守党候选人如何证明他们的合法性。他说这个问题在当下的郡内竞选中无关紧要，因为他确信选民们认同这一点，大批拥护者支持他。他彻底地羞辱了我们，结果使我们显得像是傻瓜。然而，我们的问题所使用的是另一种政治话语，它与村里熟悉的话语截然不同。

“左派图书俱乐部”在当地的分部是什么样子的？它对你的成长有何大致影响？

阿伯加文尼的俱乐部由工党激进分子管理，有大约 15 到 20 个会员。他们经常组织讨论和聚会，请人演说。我们不是会员，常常从其他会员那里借书看，因而没有看过全部图书。不过正是从俱乐部这里，我通过阅读知道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知道当时在阿比西

尼亚战争正在进行,也知道西班牙内战,还有中国的革命,因为我们读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记得康尼·塞利克斯(Konni Zilliacus)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当时还在为国际联盟工作,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彻底的世界公民。

你父亲的政见直接源于他的工作经验和家庭处境。然而如你说,你十几岁时在政治上的要求和趣味是国际性的,而非地域性或全国性的。是这样吗?

是的,有点过度了——我们所关注的东西过于大异其趣了。我们认为工人运动中传统的地方政治和议会政治是乏味的和狭隘的,对其没有任何共鸣。对于我们来说,更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是国际活动,这才是决定重要问题的地方。“左派图书俱乐部”本身就体现了更开阔的观点与工人运动内部的冲突,年长者与它相处融洽,但我觉得他们的感受是基于友善的联系而不是国际团结。我们跃升到国际团结的高度,却没有求助于地域性和全国性的斗争经验——我过去一直认为,工人运动的最大问题是这两种趣味如何彼此对话。不过在当时,时代正在发生变化,诸多问题事实上更具有国际性。

你当时加入工党并把自己视为工党成员了吗?

没有,我当时没有加入工党。父亲是工党支部的书记,他在1936年想要我加入工党,但我很不喜欢迈克尔·富特。现在说这些就无关紧要了,他当时直接从牛津大学学生会走出来,是一个初到此地的杰出人物。富特在潘迪村礼堂的发言听起来有点儿出乎意料。我对父亲说:“这和工党有什么关系?”父亲说我的态度不对,他认为富特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我当时并不特别想加入工党。实际上,我一度作为工党成员的唯一时期是1961年到1966年,当时我还有一张会员卡——当然,就加入工党而言,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否则,我愿意在选举的时候为工党工作,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但我对工党总是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你和父亲因此发生过争执吗?他是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加入工党?

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写信说,他所在的组织(我猜是“左派图书俱乐部”留下来的人们)想推荐我做当地的候选人,以迎战1945年的选举。我想他一定很伤心,因为我没有任何兴趣。这并不是说如果他们推荐我,我就一定会得到提名,当时,工党是由选区的其他一些人所控制的。

与工党相比,“左派图书俱乐部”的背景与共产党更为接近,其政治文化平台是人民阵线。你在阿伯加文尼的时候,它是否对你象征着某种冲突或选择?你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

现实的情况比较特殊(对该地区而言可能纯属意外),这里没有英国共产党的存在。你得在乡下走出30英里,直到朗达(Rhondda),才能找到某些固定的共产主义团体。另外,关于工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抗,我当时一无所知,不必在两种立场之间做出抉择。你得明白,对于我的父亲来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认为共产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不同的另一支力量。对他而言,在铁路工会的领导层中有共产党员存在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是人民阵线时期,分裂的观念遭到抵制:我们的态度是“左派无敌人”。

你的说法还是令人有点惊讶。毕竟,你的父亲一定知道辛诺夫来

信事件(Zinoviev letter)^①。况且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和共产主义的反英性质是两次大战期间资产阶级宣传的持续主题。这些都是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那是管理层的人说的,人们并不相信。公正地说,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得以表述的话语。我认为,这种情况对于我父亲那一代的许多人都是符合实际的,甚至它可能同样适用于随后一代的工党斗士们,他们入党是在冷战之前,那时意识形态的决裂和对共产主义意识的禁止还没有开始。当然,在大的工业中心存在着有组织的、自觉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过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共产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一个分支,只要媒体和政府攻击它,它就必定是正确的。人们既认同共产主义又与其保持距离。

推想一下大学之前你对这个社会的印象,统治阶级或者剥削阶级的典型形象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形象——乡下的富豪或者地主,这是我们嘲笑的对象。接下来想到的文化形象是保守派的乡绅。

他们真的存在于你的经验范围之内吗?

不可能亲眼看到他们。你可以看到庄园的围墙,仅此而已。我们还想到过银行家。我记得曾经和父亲就银行对工业的所有权进行过

^① 辛诺夫是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据说他和麦克曼努斯(Macmanus,同在常务委员会的一位英国代表)联合写信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加强在英国进行共产主义煽动,特别是在军队内进行煽动。保守党利用辛诺夫来信事件打击工党,赢得了1924年的大选,导致英国首届工党政府执政的结束。后来直到1999年,雷蒙德·威廉斯去世多年以后,官方调查结果才揭示了真相,该事件是莫顿(Morton)和英国情报六处搞的阴谋,借以帮助保守党赢得大选胜利。——译者注

长时间的讨论。当然，还有铁路的所有者和矿主们。然而，相当古老的农业形象仍然是主导性的形象。我并不认为原因在于我生活在农村地区。把明确的阶级敌人——最近 150 年以来的工业主置换为古老对手，这种做法一直令人惊讶地存在于英国“左派”对统治阶级的理解之中。就我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同样有青少年的自然反应，认为统治阶级不仅不道德而且是过时的——典型的年轻人的信念：统治者是老朽的、不相干的，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我教条化地认为所有保守党党员都是愚蠢的。这是 1930 年代非常普遍的说法，它传达了某些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装（包括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妨碍我们了解统治阶级的才智、能力以及统治阶级在当代的灌输形式。

就我的情况而言，与伦敦的距离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从未清晰地看到过主要的城市力量。当然，我知道军队在矿谷里都干了些什么——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那是间接的。我们对雇主们恶劣的道德品质没有任何疑问，但是仍然没有把统治阶级看做是强大可怕对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工人阶级是有能力的阶级，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因而能够管理社会。大罢工后，这样的话说了很多，它最终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记得在看到这些人的时候还有点生气，他们看上去太过自信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自信的人们。

可能有人会说，在你少年时代的经验中，缺乏典型的城乡联系，不存在享有特权的剥削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直接对抗，也不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在你那一代人中，大多数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一系列时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从你早期的经验看来没有经受这些，你个人的经历似乎完全避免了它们。首

先,存在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城乡之间的深度分裂对你而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来主要城市中心,就会不可避免地疏离自然呈现的世界,而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其次,你来自一个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家庭,然而所在的地区却没有任何重要的统治阶级部门。大城镇和主要城市的工厂工人对此有不同的经验。在那里,资本家作为统治者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威力:他们不是小丑,他们让人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畏惧。这种情况在你的环境里看起来确实是不存在的。再次,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似乎没有现实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许多工人阶级地区可能有很大影响。你从未因对知识的追求而遭到别人的怀疑或憎恨,也从未对是否接受教育感到困惑——在其他工人阶级文化地区,相反的情形并不罕见。然后,好像完全不存在宗教问题。你父亲实际上是反宗教的,当你拒绝行坚信礼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家庭危机。宗教没有扰乱你的早期生活——然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地区,信仰转变全然不是这么顺利的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不必为了从事政治而与家庭决裂。甚至在核心的工人阶级地区,成为一个工会会员或者投票给工党都会造成家庭矛盾,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会造成更大变化——如果你这样做了,可能会导致家庭内部的极度紧张。但是你的家庭情况不是这样。另外,在被称作工党“左派”或者共产党的各种立场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类属的一致,感受不到任何难以克服的区分和障碍,因而从其中一种立场转到另一种立场也感受不到任何冲突或危机。人们会逐渐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进入大学的时候,你的个人精力必定非同寻常地充沛,也就是说,没有受到众多人物传记中所描述的早期剧烈冲突的削弱。不管长期结果如何,典型的少年时代的转变有时是一个分裂性的、相当耗人的奋斗过程。而你的成长道路似乎罕见地没有遭到扭曲,就这样一直到剑桥。你觉得这是事实吗?

我认为是这样。谈论自己的个性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

过,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到达剑桥的时候,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具有适度饱满的精力。当然,我的表述无疑有点言过其实,因为随后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当时的感受是成功进入剑桥,不知敬畏,后来对剑桥就比较敬畏了。我现在以它为对照来衡量自己,带有某种冷静对抗的性质,但是在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应付一些深层的阻力。当时只有三四个人真正了解我,与那些现在了解我的人相比,他们对我的个性会给出不同的描述——一个忧郁、平静、紧张的家伙,就像某些漫画中的人那样。无论如何,当时的我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我。

你在文章《文化是日常的》中谈到,在到达剑桥的时候,你十分喜欢都铎式的庭院和教堂:剑桥绝不会令你觉得压抑或沮丧,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文化和过去已经预先填写了到达剑桥的日期。

没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这样一个笑话:某人说,他的家庭是以前搬来和诺曼底人生活在一起的,大伙儿的反应是:“你现在还喜欢它吗?”那只是随口说说。

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城市背景的牛津或者剑桥学生不太可能具有基于个人成长历史的自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威尔士人特性有关的一个问题。在这种自信之中,存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你来自一个学生密集的学校环境。要是你去了文法学校,而生活在你周围的许多工人阶级子女不能升入文法学校,那么这种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后来通过牛津和剑桥得到体现和强化)在少年时期是更加难以应付的,因为你的工人阶级伙伴不再和你一样穿同样的衣服或者做同样的事情。

没错。某种程度上,在文法学校不存在典型的传统矛盾。但是矛盾多多少少累积起来在以后产生了最大化的影响。为什么校长不把我送到威尔士的一所大学呢?那本来是可以成为更加适合我的一个

生活定位的，回顾这些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事情本来可以这样的。然而，这就是校长在那里工作的目的——发现像我这样的孩子，然后送到剑桥。我说这些并不是对他有任何敌意，因为他认为正在为我做出最好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威尔士的英语文化灌输机制，对我而言，障碍不是出现在文法学校，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英国文化之中。

另一方面，一旦确定被保送到剑桥，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在1945年再次短暂地复苏了），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我自己的同胞在身后支持着我。因而像孤独、对环境的排斥这样的典型体验当时并没有出现。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体验不是仅在情感层面就能应付的东西，必须在现实的联系中处理好它，那要艰难得多。不过，我当时的主要感受是同胞们在背后支持着我，甚至我轻率写作的《小教堂里的母亲》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我的学习资助出现问题的时候，尽管我的小说导致了一些争议，支持我的仍然是邻近地方的人，他们马上在当地的小酒吧为我募款。没有人对募款提出质疑：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的父亲后来偿还了这笔钱，整个经过极具地方特色。所以，我没有那种与同胞的联系被切断的感觉。

去剑桥之前，你到日内瓦参加国联组织的青年会议了吗？

是的，那是我第一次去国外。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报告，一个1930年代记者写的国联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在回国途中，我们在巴黎逗留，我悄悄溜出旅馆，径直去了世界博览会苏联厅。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儿还有被冷落了英国厅，里面有用纸板做成的张伯伦手执钓竿的巨大图案。苏联厅内有一个宏伟的雕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上方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我一直在自言自语：“镰刀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用这玩意儿，却把它叫做弯刀。就在那里，我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平生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作品。

2. 剑 桥

剑桥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你的生活到那时才是第一次真正重大的突变。

我对剑桥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对它一无所知。毕竟，进入剑桥的标准程序是至少去学校接受初步的面试或笔试。但是当我走下火车的时候，剑桥大学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除了展现出一个较大规模学校的形象之外，这个大学实际上让我觉得无法理解。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尽管我来到三一学院是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的，那里却没有这方面的授课老师，因而我立刻就被送到外语学院学习。在那么大的学校里，融入其中是不会太费力的。起先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每件事上都申请成为候选人——比如说橄榄球队，因为它是我在中学时的爱好。我第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剑桥学生团体的社会构成问题，那时我去找学生会，我自然想要加入它，结果被告知需要保证人，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我当然不认识任何人。他们说：“难道你没有中学里来的朋友吗？”尽管这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却突然表明了我奇特的个人处境。

不过，我随后发现了社会主义俱乐部（那个学期开始的某个晚上，我在三一学院参加了一个征募新成员的集会），与之相伴的是即刻的选择机会、生机勃勃的社群文化，还有政治活动。俱乐部有举行活动的房间，提供午饭，播放电影，是一个交友的好去处——这和加入一个单纯的政治社团不同。我到那里去吃午饭，或者一有空闲时间就去那里，就像其他人喜欢不喜欢都要居住在大学周围一样。电影是特别重要的。我的朋友奥洛姆（Orrom）是电影播放的主要组织者，我后来与他合作写了《电影序言》。我们在俱乐部里看了大量电影，有时一天看

两三部。那儿还有一面墙报,如果你为它写点儿什么,那就是你参与政治的现实方式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只有在英国进行一场革命我们才可能与希特勒进行战斗。文章的表述方式比较幼稚,而且在打字的时候,打字机中的色带只显示了红色。然而文章立刻引起了回应,我受到邀请与某些人会面,后来我注意到这些人是俱乐部中的重要人物。但是我最初写文章的动机纯粹出于个人的因素。那是关于俱乐部的一件美好往事。我后来了解到,俱乐部所有重要方面都受到相当严密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所有直接活动都是非常公开的。同时,晚上我当然必须在会所用餐,三一学院的徽标当时是很容易就能被识别出来的。三一学院不是我在剑桥唯一确定的活动场所,社会主义俱乐部是我的第二个家园。

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环境之所以宜人,从根本上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同志友谊,还是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混杂的地方?相对较新的社会阶层或者非传统的社会阶层在剑桥大学为数众多吗?特别是在俱乐部里为数众多吗?这是否多少反映了剑桥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构成?

我曾经试着思考过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俱乐部在社交方面的独特之处不是以这种方式体现的。我觉得这么说是不会有错的,我在剑桥结识的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成熟的学生,30多岁,做过体力工人。我不记得还有其他人——虽然必定还有一些,因为工人阶级子女入学在剑桥大学一直占有一个较低的比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保持不变,不过我没有遇到他们。我在社会主义俱乐部遇到的绝大多数人在教育和家庭出身方面都是剑桥通常的混合模式。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一天我们坐在小酒吧里,我注意到每个人都在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英格兰人”——我们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伦敦犹太人和威尔士人。不过那是在俱乐部内部挑出几个

人,俱乐部本身——但愿我还记得它的负责人们——倒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差异。

俱乐部给新成员提供了何种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涉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反杜林论》。这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做规定文本,前者尤其如此。虽然每个人都要求阅读《资本论》,而且我也买了一本,但是对马克思的讨论要少得多。我那一年学习了《资本论》,不过在第一章遇到了常见的困难。直到很久以后,我对马克思的了解才不仅仅局限于对《资本论》作者的理解。我有理由认为,这是相当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入门方式。

马克思的政论作品怎么样?你们要求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吗?

那个作品不是必读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必须读《苏共党史》,作为短训班课程,逐章阅读。

要求你们读列宁的作品了吗?

是的,《国家与革命》。

俱乐部的规模很大,共产党有效地管理着它吗?

是的。我记得自己是在三一学院的集会上被俱乐部招募入会的,当时俱乐部发言人的讲话明显带有共产党的作风,我那时对这种作风比较欣赏。然后有一个细节,我站起来问怎样加入俱乐部。我说,“这是唯一的左派组织吗?我想和最红的红色革命者在一起”。发言人的答复是,“不要那样说”。我当时觉得有点尴尬。当然,他们把我接纳为会员了。当时的情形与“左派”在战后分裂成不同俱乐部的情况不

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你加入哪个俱乐部就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俱乐部当时仍然是所有校园“左派”的大联合，直到当年年底才出现了一次分裂的企图。

你加入社会主义俱乐部是在十月份，然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加入了共产党。是什么导致了你这样做？它是如何发生的？

我不断在学生会发言，倡导某些立场，而且我被列到他们的联系名单上了（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制度），然后有一天，有个人问我是否想加入他们。这个人我知道如今还在剑桥，不过不再参与政治了。面对他的询问，我的回答非常鄙俗：“要交多少钱？”他们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我在学生会辩论中一直独立坚持的立场，因而对我来说这不像是跨入一个新的政治领域。当然，很快就清楚了，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仅仅履行了组织成员在经济上的义务而非进行了有计划的立场转换。共产党对我来说似乎是诸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我十分了解它，相信它可以是我参与政治的地方。不过我并不觉得我当时在“放弃工党政治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已经解释过，在我的阅历经验中，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对立。

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政党，而工党是一个改革者的政党吗？这种对立当时在你的脑海中清晰吗？

噢，是的，当时两个政党关于战争立场出现了非常尖锐的分歧。就其定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被强调为科学的和革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恩格斯。但是在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这不是我关注的主要事情。重点在于，我现在加入了一个有纪律的组织。对我来说纪律是新奇的，我花了很长时间理解纪律执行的方式。如果我在学生会的发言里说了某些话，书记处会要求我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或者他们告

诉我,我被委任了某个职务。纪律限制了某些人,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纪律发挥了作用。对我而言它是两者的混合。我记得父亲过去对我说,一个有纪律的组织是必要的。我从来没有对这样的观念感兴趣,那就是:这种组织可以在没有纪律的条件下运作。与此同时,尽管书记处发挥着指导作用并给人以非常重要的印象,但我从未搞清楚书记处是如何形成的,我甚至不记得当时在那里有过任何选举。

你为党做什么工作?

根据正在阅读的主题会被安排到一个群组里,在那里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知识问题。我们所在的小组叫作家小组,因为我们在英文系。由于写作能力,我们经常被要求赶写宣传材料。这种工作的一个例子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活页文选》,我被指派写苏芬战争,论证这场战争是继1918年曼纳海姆和白军镇压芬兰革命之后芬兰内战的延续。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根据所提供的历史材料进行快速写作。我们经常在那里就一些不太了解的主题进行写作,貌似专家的样子使用专业话语。写出的宣传册由上级部门非公开印发。

考虑到你去剑桥的两个月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由于共产党的反战立场,是否在俱乐部内部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必定有一些,但是在俱乐部非常开放和友好的活动中,这根本就不明显。我后来了解到,这里始终存在着相当传统的权力集中机构和大量的中央指示。在俱乐部内部就共产党的国家领导权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我从未听到在战争问题上立场摇摆的。俱乐部内部的主导观点是,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无论如何,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击败法西斯主义是可能的,任何与统治阶级并肩进行的战斗都不会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反对这个观点的只有持工党立场的人(那是一段很久以前的记忆,我可能忘了其他某些立场),“一起加入反法西斯的

爱国战争,谈论社会革命会制造分裂,将来会出现改革的”。他们是少数派。

令人惊讶的是,在1939~1940年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国际事件之后——包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信文化以某种重要的意义复苏了。如果说“左派”的自信文化曾经衰减过的话,我在1939年夏天之前并没有观察到,我所能说的是,当我面对它的时候,它是非常强大而又自信的——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产生影响,从电影到新诗,一直到各种适当的政治联系。我认识一些人,现在我不认为他们会参与政治,但是他们当时会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文化模式仍然保持着,至少一直保持到了1940年春天。那是一个虚假的战争阶段,人们依然冷嘲热讽地确信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真正与法西斯作战。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威胁。这种氛围几乎难以置信地持续着。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威胁是在1940年5月,原因显而易见。然后人们开始谈论如果他们被征募入伍后将会干什么。

作家小组的其他活动是什么?

讨论英文系的内部机构,以及学生可以向它提出什么样的合理要求,当然从稍后事件的视角来看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不过讨论的结果很少,因为我们的整个学生文化氛围是这样的——“你能从这种教学机制里期待什么呢?”我们基本上没有与其对抗,而是倾向于忽略它。

另一方面,我们定期讨论文学问题。主要讨论的著作是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的《小说与人民》。我们当然也读了埃里克·韦斯特的作品和《左派评论》。

没有读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的作品吗?

没有,就我记忆所及,我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读到考德威尔的作品。

利维斯(Leavis)怎样?

我当时也不知道利维斯。我确实在俱乐部的刊物上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文学与感性崇拜”的。如此看来,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显然已经渗入我的思维。然而,据我的回忆,我们把任何谈论感性的批评流派都纳入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等同的一类,看做是同样的东西(从历史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不准确的)。文章坚持感性崇拜是一种资产阶级崇拜,完全与大众文学的需要无关。然而,关于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混淆表明,这一观点没有建立在任何当前的英文专业知识之上。那就是独立的学生文化在当时的特征。

《细察》已经对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两种文化之间并不因为仿佛各自独立就不存在对抗了。《细察》大肆叫嚣着攻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面对这些攻击,对文学有兴趣的共产党人为何没有做出回应?

那是一个重要的论争,不过没有出现在 1930 年代。原因在于共产党人的回应是把论争转移到不同的领域了。我们主张文学方面的误区在于,文学没有接触人群中的大多数:它不是为他们写的,它也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因而问题不在于如何鉴赏文学和如何对一首诗做出反应,而在于如何写出一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或诗歌。既然文学具有阶级局限性,社会主义者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局限,创作出另一种类型的文学。这样,有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问题就被束之高阁了,我们认为这些是与现实无关的学院派争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才是要紧的。就其对现实的强调而言,我们的立场并不全

错——我现在仍然觉得这种立场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消极地拒绝从事文学学科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有人可能会进行反驳，关键不是如何读诗，而是如何写诗，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后者才更有意义。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然而，我们这种以不应为回应的创作状态在战后衰退了，当我们不得不从事文学批评或者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手中空空如也。然而，英国文学研究已经成熟了，它通过拓展的专业领域和一个接一个领域的细致成果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科。马克思主义者用以与其对抗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水准不一的著作，对文学研究的贡献被毫不费力地当做简化论而予以抹杀了。

作家小组这么关心文学创作的问题，它的审美取向是什么呢？你们认同的新型文学的典范是什么？

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当不满，对现代主义更感兴趣。以我自己为例，到达剑桥之前，我想要像萧伯纳和威尔斯那样写作，因为我在中学读过他们的作品。不过我在各种影响的综合作用下转变非常迅速，到了第二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作家毫无疑问是乔伊斯。1939年刚刚出版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是我们最为欣赏的文本，我们把它们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起来。与劳伦斯相比，乔伊斯对我们有更多的吸引力，而劳伦斯通常被看做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无论如何不是用专门的文学术语来定义的。我们也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吸引，特别是在电影方面。我们认为，维戈(Vigo)对我们的吸引力与普多夫金(Pudovkin)或爱森斯坦(Eisenstein)相当（我们对他们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非正统的），而爵士乐对我们而言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形式。在我的第二学年，1941年，我们自觉地代表了一种文化姿态，与我们当时称之为对于文学的“党的态度”形成对立，我们把它作为狭隘和自以为是的文学态度

进行批判。当然，我们否认了自己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需要更多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技巧，而不是那些由权威建议的技巧。

这些态度在剑桥引起党内的反对了吗？

当然。反对者把我们称作唯美主义者——这个标签，我们自然会否认。现在我可以多少理解他们了。当时在剑桥的共产主义圈子里，流行的是上流社会的社交方式。比如说，当时的聚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学生聚会是不同的，喝的是上好的葡萄酒而非罐装的啤酒，人们安静地交谈而不是跳舞。如果你娶了一个具有那种文化趣味的女人，无疑自然会投身于伦敦上流社会的文雅生活方式。当时，约翰·莱曼(John Lehmann)还在编辑《新写作》，定期来剑桥与“左派”青年作家见面。他在“艺术长廊”里有一个房间，当他前来闲谈时我们就去那里。在那里确实有一种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氛围，他们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自己的活动日程安排与这种审美化的形象似乎并不明显匹配。你是大学学生会的主席、校报和《瞭望》杂志的编辑、共产党组织的人民大会的斗士。你是怎样走上这些位置的呢？

《剑桥大学校报》是一份学生周报，它是《大学》的前身，我曾经为它写过一两篇文章。当党的书记处告诉我，要我担任该报编辑的时候，我感到极为惊讶。当时是我在剑桥的第三学期。我做编辑没有多长时间，法国就沦陷了，学生会对此事的讨论遭到学监禁止。我把讨论的发言印发出去，这自然就招来了麻烦。《瞭望》的情况十分不同，它是党内被称作唯美主义者团体的出版物。它发表短篇小说和诗歌，作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作品的写作没有体现党的倾向性。我的小说《赤土》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它正好是小说本身所描述环境

的讽刺性体现,我的文学趣味当然与这个刊物一样。关于人民大会,我照例被安排掌管人文和教育,我在党内的的工作一直与这个领域联系在一起。

学生会完全是另一种体验。那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会遇到许多保守党党员。他们总是很多人一起出现,数量众多,当然,他们在大学里是压倒性的多数。我记得自己在学生会的演讲一直是在反对这些狂吠的传统右派。当时的学生会与1960年代以“左派”为基础的情况不同,我非常习惯于站在威尔士的立场上进行演讲。在反对派面前展示辩才会带来生理上的很大亢奋,产生一种满足感。有一次我违反了规则,因为侮辱一个老资格的成员而被暂时取消了主席的职务。那时我们都意识到应该参加学生会——所以在1960年代晚期,当学生们告诉我“不要去那里,对它视而不见”的时候,我感到极为惊讶。

我对你的叙述仍然感到困惑。你说大多数剑桥学生都是右派,然而共产党似乎不仅能够组织起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实际上还在总体上控制了传统的各个大学生机构——学生会、校报等等。你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我认为真正的右派没有掌握由提名和选举构成的整个组织形式,而共产党在这方面却非常老练。我们在组织层面给人留下令人吃惊的深刻印象,在关于大学生活的某些关键立场上,共产党的表现足以使人产生兴趣。由于党的战争立场,我们在政治上日益被孤立,但是通过进行组织和努力,通过针对战争时期的考试、文科学位、延缓入伍征召等问题展开活动,党员们仍然被选举到学生代表的职位上,并且让人感觉好像是在代表学生们的观点讲话。不过,保守派在校园里是非常强大的,能够发出有力的声音。保守党在成员数量上总是比社会主义俱乐部要多得多。当然,它也包括了许多去跳舞的成员。他们的斗士给学生会带来了极大的阻力,以人多取胜,把“左派”喝下马来。

举例来说，我在剑桥值得留意的敌人是一个名叫唐纳森(Donaldson)的学生——他后来成为保守党劳资关系法庭的大法官。

与“左派”高度的战斗性、大量的文化活动以及在大学各种机构里的组织优势相比，就图书数量与所争论或讨论的实际问题而言，当时的政治文化似乎相当薄弱。

那正是问题所在。1941年《工人日报》被禁止的时候，作家小组自然就聚集在一起要制作一个地下版——我们对自己的职责毫不含糊。但是当我们第二天晚上着手制作非法版《工人日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印什么内容。原因不仅仅是我们被切断了获取日常新闻的来源通道，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该写些什么。除了战争态度的暧昧之外，就人们进行现实思考和政治讨论的质量而言，那实在不是一个多产的时期。这就是我在回顾的时候主要想说的东西。当时确实存在着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进行讨论。

在你早期赞赏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我注意到你没有提及任何一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书。

我知道里德(Reed)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没想到你会读过这本书，当时它是完全被禁的。不要忘了，书中每隔一页就会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根本就没有提及斯大林。这本书在1953年以后才得到再版。

大概是这样。我们主要的知识来源是苏共党史。

你当时知道托洛茨基的作品吗？

不知道。那是很严重的欠缺。我真正认识到在俄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立场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你们相信短训班课程的内容吗？其中没有任何中间色调。不止是托洛茨基，还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列宁的整个中央委员会成员都被描绘成法西斯的代理人、日本人的合作者或者德国间谍，你们当时相信这些事例的真实性吗？

不相信。我们在深夜谈论这个问题，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我们当时的观点大致是这样的：在充满外部危险的环境中，某些简化是必要的——这就是短训班课程中所说的东西。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怎么怀疑官方对反对派的描述，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没有任何人具体体现了这种现实倾向。使我更为困惑的是 1917 年各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根本不能理解农民阶级的地位问题。S-Rs 是谁？被描述成农民们“不忠实的朋友”的是谁？我不能理解他们代表了哪些人。我不知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同盟是如何呈现的。

我们可以问一个概括性的问题吗？你在剑桥时正是“左派”学生极度活跃的时期，你看到的他们正处于巅峰时刻，另外，你在剑桥可能也近距离地观察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现的学生造反运动。你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首先，20 世纪 30 年代“左派”学生组织起来的基础是一个非常宽容的阵线。它包括的那些人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可能会是影迷或者文学杂志的创办者，即便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不会处于同一个综合性组织之中。也就是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左派”在政治性上更加明显。我认为这有得有失。其收获在于政治讨论的质量非常高，我在有意无意间听到过的讨论都是这样，含有更多的现实政治主题；但是其文化影响较小。其次，我们当时对大学里的当权派漠不关心；我们当然认为他们是压抑性的，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不去理会他们。我们确信自己能够创造一种独立于他们的亚文化。如果一个学生党员想

做一些工作,对他的期待是在现有的学期课程之内进行的,因为对于党来说,拥有一些在学术上成功的党员是很重要的。这与20世纪60年代的对比非常明显。再次,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在与非学生群体的交往和联系层面存在着很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我们当然也是在城区里活动,但是邻近学校周围的区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屏障,我们自己的行为发生在那个屏障之内,活动建立在社会阶层的基础之上,有更多的局限性——我当时一直感到不自在。而从衣着打扮开始的有意识的风格改变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标志。最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不同之处在于,根据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一旦你参与活动的次数大幅增加,你会结交到持各种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包容了当时能够出现的所有观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极端分裂的情况则一直使我惊讶,我过去一直认为这必定是某种错误或者固执个性的结果,没有认识到这与政治运动本身的性质有关。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运动的优势在于其内部讨论的质量非常高,20世纪30年代的运动虽然存在着党员数量的问题,但是由于组织良好,联系广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能够在外表上呈现得更为综合多样。

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成长话题上来。你还没有谈多少关于自己在剑桥的学术活动。谈谈你在1939~1940年间的英国文学研究经验好吗?

这在第一年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我当时主要在做早期英国文学的研究,研究形式也比较正规。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中学学习的延续,因为它涉及的作家比蒲柏晚不了多少,对我来说没有出现多么严重的问题。我的辅导老师是林奈尔·埃尔文(Lionel Elvin),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左派”——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抨击蒲柏诗中贵族式的冷漠,他告诉我不应该这么做。其他方面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写了一些评论,内容是关于莎士比亚和资产阶级出现所带来的

精神解放。但是第二年我被转给另一个老师泰雅德(Tillyard)了。我一给他讲同样的话,气氛就变得非常尴尬。我开始研究小说,我很快就提出了党的倾向性——考察过去的任何一部资产阶级小说,必须从现在的小说创作观点出发。泰雅德告诉我这站不住脚,只是一个幻想。你怎么能判断一个用当时还不存在的观点写成的作品呢?我不仅对简·奥斯汀怀有敌意,对狄更斯或者哈代的解释用的也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方式,说他们是进步的。不过我也谈到过浪漫派诗人,强调他们描绘了一种有待将来完善的人类解放方案。泰雅德则会说,某种进程将来是否会得到完善,这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

我在剑桥的第一年里,中学的学习习惯帮了大忙。天知道我是怎么找到时间做那么多学习以外的事情,但我准备论文或者进行阅读的工作常常十分彻底。第二年,我有更多学习以外的事情要做,整个状态立刻筋疲力尽到几乎崩溃的地步。我的学业完成得草草了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文学系学生的典型问题,我自己就是这样经历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和指导老师所了解的知识在某些地方比较接近的话,那你就太幸运了。但是如果你卷入一场艰难的争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羞辱你。因为他总是可以想到一些你不曾阅读过的例子——“你怎么把对狄更斯的描述等同于……?”——然后就是一个书名或者作家,你可能甚至从未听说过。教师很容易以那种方式表现他的优越性。在我的情况中,我卷入到持续的政治活动和其他类型的写作之中,实践优先,这与我在理论上的原则是一致的。在这种意义上我完全生活在良好的信仰之中。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不能提交经过适当准备、参考一定书目并且条理分明的作业,而我知道自己还必须就作业中的立场进行论辩。我忙于设法使教授某一科目的专业老师确信我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断被证明是无知的、思维混乱的。这对我中学养成的所有习惯都是打击:认识到我所知道的东西不足以赢得这些学术辩论,从而产生了

巨大的挫折感。你一定记得，我的自我形象大都支持这样一个观念——我能够有效地应付学术活动，这更让人受不了，因为当时我很清楚实际上我做不到。在那种情况下，最容易的反应方式是说那些东西都是没用的书本知识，“那些东西，天哪，现在可是在战争时期”（在1960年代可以再次看到这种反应）。然而这并不是明智的措辞，因为泰雅德的回答很简单：“那么你反对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在我生命当中，我第一次开始用彻底怀疑的眼光审视自己，我本该早就这样做的。我对自己感到不满。从我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没有人能够分析我当时的状态。我对泰雅德径直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对他十分无礼，挑衅都是源于我这一方。泰雅德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并没有针对我做什么，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这样做的。我所遭遇的只是完全缺乏理解和一些令我无法做声的反驳。老师们没有人谈过我的问题。如果知道我的小说评价观念，利维斯的反应可能会更加恼火，尽管他可能会用有理有据的专业话语进行反驳。

所以，我的整个学业情况是一团糟。与此同时，这又确实显得无关紧要。因为你知道几个月后就要入伍了，无论如何，学业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对将来的事情发生任何影响。我也不得不说，那是个人情感极度紊乱的一个时期。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某种程度上真是相当讨厌。在1960年代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伤害中，我不断地回想起我自己。在1941年5~6月间，我的状态就像1960年代的学生。我当时的情绪状态与以前明显不同。我没有出现任何可以被描述为崩溃的状态，但是我远远不能应付自己的处境。

1945年重返学业的时候，我的学习态度受到上述个人危机的重大影响。人们现在常常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继续坚持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原因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些观点把我导向了困境。我确信那些观点没有解决各种问题，并已经开始准备应对专业上的反对意见。这次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你在 1941 年脱离共产党的确切原因是什么？

对有些事情现在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不是正式退出的。情况更像是我没有履行党员的权利义务，然后就脱党了。当我入伍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肯定与我在剑桥第二年的紧张状态有关。另外，作为一个没有退党的人，党应该把我作为迁往别处的党员与我保持联系。虽然我从未有意识地决定离开党或者正式退出党组织，但是在 1945 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加入它了。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你与党疏远了，这似乎令人惊讶，因为多数“左派”人士会迫切感到需要重新建立与党的联系。你在 1941 年 6 月参加了学校的考试，然后 7 月应征入伍。而 6 月是德国人侵苏联的月份，整个战争的政治性质真正地改变了，它变成历史上一种性质非常不同的战争。

是这样。不过在德国人侵苏联之后，党的政策明确规定努力从事生产和军事。因而这与我当时正在做的事情（入伍）是一致的。我不清楚军队里存在着哪一级的党组织，即使有的话，我也从未遇到过。在所有重大事情上，我和新的阵营都没有冲突。1940 年冬天，德国人侵法国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将来要入伍了。1941 年夏天，我自然非常清楚战争的政治性质变了，但这不过与我正想要做的事情同时出现罢了。

这似乎还是有点令人困惑。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共产党把这场战争看做是德意志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持反对立场，结果导致党员的数量和士气大幅下滑。然后在德国人侵苏联、苏联加入战争之后，英国共产党的状况又出现了戏剧性的恢复和高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党员发展达到了历史顶峰。你和党的联系在整个党的低潮时期是相当坚定的，然而当苏联进行压倒性的进攻

击败纳粹德国的时候,你却不再是共产党员了。

不不不。我并没有说过我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这是怎么回事。1944年我们进军法国的时候,除了普通作战地图之外,我自觉地携带了一份欧洲地图,我的所有战斗感受都是在与红军共同作战。我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内的缺席并未影响到我的政治立场。我想,我当时真正感受到的是自己已经跳出了剑桥特定的共产主义环境,它不属于我的世界。

是这样。不过剑桥的共产主义环境显然不能作为一个微观世界代表整个英国共产党,后者的工人阶级党员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力量是压倒性的,在大学的飞地之外还有一个远为广泛的组织存在。你在剑桥的同龄人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了战争,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身份。

呵呵,现实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在军队服役的第一个月,我的团长让我为来自训练部队的一个中士组织一个时事会议,他就是霍布斯鲍姆。我们见面后在一起会谈,谈话的方式与在剑桥党内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诺曼底我又偶然遇到了他,我们讨论了当时的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仍然是一样的。就我当时的情形来说,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在军队里保持活跃的党员状态。其他人可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的状态完全不同。不要忘记,我当时是在作战单位——我们一直在从一个营地移动到另一个营地,总是远离城市。任何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从德军入侵苏联到攻陷柏林,我理解战争过程和战争性质的方式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一致的。

3. 战 争

你能谈谈军队对你的影响吗？首先请谈谈环境和职位方面——你很快成为护卫装甲师的一名军官，是吗？

在当时那个战争阶段，所有大学生都被指派到信号部队，接受非常短暂的训练以掌握较有难度的技术。所以我去信号兵训练营，在那里我们当中有一半都是学生。不过，由于在那个位置没有多少仗可打，他们给了我一些其他选择，把我调动到使用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的岗位上。我后来的服役单位一直在炮兵团的一个坦克小组，它隶属于护卫装甲师，该师主要由几个坦克团和高速机动护卫部队组成。我们当时为许多不同的军团提供支援，由护卫部队的高级军官指挥。相应于我们使用的机动坦克武器，我虽然可以指挥三辆坦克，但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可以指挥 30 人的军官，只是一辆坦克中五人小组的一员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术工作要做。所以部队里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那么等级分明的，护卫部队军官之间的关系要困难得多。

英国统治阶级在你心中无能的和过时的形象是怎样在战争中继续发展的？

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感受，人们对它明显的无能都会感到愤怒。当我们于 1944 年进入诺曼底的时候，难以相信我们只有足以击毁两辆德国重型坦克的很少几门重炮，而德国人却拥有可以把我们所有坦克击毁的武器。在那么巨大的一场战役中，你会看到许多非常勇敢并充满斗志的人，然而在战役中没有人知道适当的战术策略。有的指挥官具有沙漠机动作战的经验，对较新的装甲部队作战战术略晓一二，但是博卡什地区(Bocage)的地形对坦克作战而言极其不利。如果距

离足够接近,包括我们在内的几个作战单位拥有可以击毁敌军的大炮,但是我们的装甲钢板厚度不允许那么接近。假如你正在穿过布满树林的小路和战场,你很可能发现敌人在你的后面或者前方拐角的地方。在那个国家,坦克的机动性和远程调动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然而它出现在地图上,作战计划就是那样制订的。在实际情况中,你可能认为友邻单位占领了某个农舍,但是当你穿过它去补给牛奶的时候,你会发现占据它的是德国人。我认为在诺曼底战役中这种难以理解的混乱并没有被记录下来。每个人都被卷入混乱之中,彼此的方位前后倒错,始终伴随着令人震惊的伤亡率。在一次重要的进攻中,尚未开战我们就被自己的飞机误炸了。事实上诺曼底战役期间的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和我们一样的坦克被击毁。蜷曲在坦克内部的狭小空间,周围是数百发易爆弹药和大量柴油燃料,那就是你不断忍受的恐惧,一旦你被击中,瞬间就完了。如果不是盟军进军建立了绝对优势,我不认为那种困难处境会自己得到完全解决,当时美军迂回到了德军后方,德军不得不向后撤退。

在那种战斗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向自己的军队开火还是在向敌人开火。那是一些最糟糕的经历。在另外一些场合,甚至敌人的身份也不一致。有一次发起了大的进攻,我们进入战场并取得了非常具有实质性的进展,环顾四周,我们发现已经捕获了好几百人。但是俘虏是乌克兰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战术:他们把这些军队放在前面,让你前进6英里,然后德国人的部队就可以更好地武装起来等着你。一些俘虏甚至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在哪个国家里,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与谁作战。唯一一次我觉得具有清晰政治意义的指派任务是后来的一场战斗,当时我们发现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从德国赶来参加当地的反攻。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通过这个事件我敏锐地意识到了它的政治后果。至于其他方面,我常常回到我的欧洲

地图前面听广播,听诸如红军已经夺取哈尔科夫或者明斯克之类的消息。苏联前线的战事似乎更易理解,它是一种有效的安慰。

在你自己的指挥下损失过坦克吗?

在抵抗党卫军装甲师的那场战役中我损失了两辆坦克。我实际上是受到了上级的过度支配。上司告诉我必须占领一片树林,里面有一条小铁路线穿过,我说这样做很愚蠢,因为在树林里除了树木你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些该死的坦克里你什么也听不见,因为你必须带着配有无线电话的头盔以保持通讯。发动机的噪音非常高,你得完全依赖视觉。当我们接到命令进入树林的时候,我把作战单位分成两组,每组两辆坦克,我所在的一组进入树林的一端,另一组进入到树林的另一端——这是完成任务的唯一方法。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撤出来被投入到别的地方,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当时一再进行无线呼叫,试图建立联系,但是没有成功。我们特别想出来寻找他们,但是整个树林布满炮火,根本没有机会那样做。在这期间我们可能摧毁了一辆或许两辆党卫军坦克。

战争经历对你的整体影响是什么?

战争令人胆寒,我不认为真的会有人从中恢复。首先存在着内疚感:原因在于关键时刻的怯懦,以及那些纯粹的破坏行为和残酷的暴行。怯懦和暴行真是相反的事物吗?当你被吓坏了的时候很容易感到内疚,但是更糟的内疚感出现在你开始恢复自己完整人性观点的时候——那些人性观点已经被整个战争经验从根本上摧毁了。然后你认识到你曾经做过的某些事情——那不是别人做的事情:如果德国坦克在某些农庄隐蔽起来而没有人过来告诉我们,你会说把这杂种射上天去,几轮炮火之后,你可能毫不费力地烧掉了整个农舍。战争期间那样的反应时常发生,但是一旦你恢复了完整的人性观点,整个事情

看上去就显得难以置信地具有血腥味儿。这是我在读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时候感受到的,他对战斗的认识绝对是正确的,与战争史上的描述多么不同啊。还有可怕的失去战友的痛苦感受。如果你看到一辆坦克满载着你熟悉的战友飞到空中,就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诺曼底战场毕竟相对僵持了几个星期,到处是人和动物的尸体,令人可怕。我们从诺曼底突破之后还遇到过几次糟糕的情况,但是心理上的压抑和混乱从未再呈现出那样强烈的程度。

自始至终,坚持某种观点都是困难的。我会试着回到我的欧洲作战地图前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那是正确的观点,但它与我们的亲身体验是如此遥远。在法国,由于我会讲一点儿还过得去的法语,我就负责与当地人对对话,他们非常热情。那种感觉很好,它使你想起了战争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什么。但是除此之外,军队的运行就像一台真正的机器——即使你可能并未认识到,训练的要点就在于无需直接推动就能够精确地采取某些行动。你在战斗中做那些你在训练中做过的事情,当然,会更加混乱一些。你所失去的是人性中最重要的方面——这是关于战争的老生常谈,但绝对是事实。你的确是在斗兽的层次上发挥着作用。我不认为你以后能够从脑海中消除这些。第一次我能够以极度怀疑和厌恶之外的感情来看待一支军队是我后来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当时我看着南斯拉夫军队,奇怪地有了1944年时的感受,我理解这些人正在做的事情。

你对德国垮台的印象是什么?

当我们进入德国的时候,我们解放了一个比较小的集中营,然后用它来关押党卫军军官。这给我们带来了满足感——我们毕竟在对法西斯的政治胜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满足感很快就被抵消了。党卫军的军官们会来到我面前说:“为什么我们彼此会卷入到这场荒谬的战争中呢?谁是共同的敌人是非常清楚的。”当时苏联

人正在柏林。我把这些话报告给我的上级，上级告诉我：“他们可能是对的，伙计。”许多人已经认为纳粹国防军是一支优良的军队，这场战争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未来的冷战观点早在1945年3月就已经开始了其同化过程。

关于苏军暴行的报道被广泛地用来激发冷战观点，那些报道使你受到震动了吗？

没有。不过我能想象得到某些文化人会因这些报道而受到极大震撼。老实讲，我们当时已经变得残酷无情——在异国战斗9个月之后，你不可能不获得完全不同的对待人类痛苦的态度。前线部队对此不会有任何感受，他们不可能有人性的反应。有人可能怀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前线部队确实没有人性的反应。我的看法并不过分，我们抓获俘虏的时候非常凶暴，经过战斗之后我们并不都是绅士。我们对党卫军军官非常愤怒，许多人相当倾向于射杀他们。当我们去夺取汉堡的时候，我受到了震动，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被轰炸过的港区、一个军事目标，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城市已经被轰炸得面目全非。那使我受到了震撼，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被谎言欺骗了。苏军在东德的行为的确对苏联在整个欧洲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但是就我当时特殊的处境来说，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战争末期你成为团报的编辑，大概必须对世界大事进行评论。那是你政治活动的恢复吗？你觉得当时正在编辑和写作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编辑了一份军队报纸，采用相当标准的《每日镜报》风格，工作地点在汉堡北部，那里有一部完好的印刷机。报纸内容包括文体活动、团部新闻和名人照片以及大量幽默新闻。我用迈克尔·波普（Michael Pope）的笔名写作每周政论。当时有人提议战后由英德联合

在汉堡建立一座战争纪念设施,我对其进行抨击的时候招来了许多麻烦。我说这完全是虚伪的。我也就有关苏军暴行的报道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多数报道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它们显然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性质是背离的。那篇文章招来了许多充满敌意的来信。我后来不能确定那是不是一个有点儿不符合现实的区分,但那是我当时的立场。

那时军队里的氛围怎样?事实上军队在1945年大选中投了丘吉尔的反对票,他可是军队真正的指挥官。这次投票对于军人的意义是什么?

这次投票是为了工作。多数人都是这么谈论这次投票的。他们把保守党人与失业和萧条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1918年军队回国后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们团里有几个自由党人,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保守党人。当然,对面护卫团的军官们可能是保守党人,保守派卡林顿(Carrington)伯爵就是其中一员。我最近听到卡林顿的广播谈话,发现我们肯定在试图突破阿纳姆的军事行动中一起作战过。

你是怎样复员回到英国的?回到剑桥是受到军事指令吗?

那是一种特殊的复员。在复员计划中,军方决定中断学业的学生得到所谓的B级,那意味着你可以提前于自己的序列离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在猜测要被送往缅甸。

4. 重返剑桥

你曾经写过,当你战后回到剑桥的时候,发现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表现在哪些方面?

学生文化变了。身边存在着更多的信仰。当时在利维斯周围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化,它是从我们 1941 年已经知道的诸种文化之一演化而来。真的不再有自觉的“左派”存在。我重返剑桥后遇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我们一致认为置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工党在 1945 年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英国文化和政治中巨大激进浪潮的结果。然而你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则是你居然回到了一个更加右翼的剑桥。你在表明这种情况反映在一个遍及全国的极右文化或者极右氛围里吗?

不是。右倾只是对特定的英国知识分子而言。我个人认为,在全国性的政治层面,尽管工党的地位由于保守党垮台而有了重要的变化,但是工党在大选中的获胜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显著提升。如果你看一看,就会发现在 1945 年大选中,工党得票的数字既不是战后最高的也不是其历史上最高的。在 1950 年和 1951 年,工党获得的选票数字要高得多。但是在 1945 年,保守党的得票非常低。另一方面,知识界远离 1930 年代的“左派”思潮,走到了相反的方向。

从你的作品来看,似乎在回到剑桥的时候你不想再卷入学生政治活动了——毕竟那时你是一个成年人了,时光不再是 1939~1941 年。

你还说过你有强烈动机去弥补自己早年在大学里出现的错误。你当时的主要意图或目标是什么？

我相当狂热地重新拾起学术活动。我回校的时间相当晚，实际上当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是11月了。我优先考虑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确定的文化政治观念。

在你的随笔《我的剑桥》中谈到你最终通过的文学荣誉学位考试具有非同寻常的强度。你在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致力和写作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两个题目。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可以采取一种更为令人满意的通过荣誉学位考试的途径——写一篇15000字的论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论文，另外我还写了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专题论文。我所有的时间差不多都用来做论文了——其他事情都是在最后仓促做的。

关于乔治·艾略特的研究继续了我以前尚未完成的关于小说的论点。事实上我在论文里对艾略特和劳伦斯进行了比较。你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阅读与批评》里，在散文分析那一章，我从艾略特和劳伦斯的作品里各摘了两段文字，用一种与《细察》集团略微对抗的方式进行了对比，我指出不可能通过对选文的分析来推断作家的地位，因为这四段文字被分作两组，通过比较得到的结论相互矛盾：如果你比较这一组，乔治·艾略特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作家，如果你比较另一组，劳伦斯则显得更优秀。然后我尝试着把那些选文与其各自所处的文本位置联系起来。当然现在看来不太有说服力，但是对我来说，与1941年进行论证的状态相比，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在当时荒谬的考试环境下，写下这些东西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它却并不解决现实问题。

关于易卜生的论文花了我更多的精力。那时易卜生被认为是第

一流的悲剧作家。用学术话语来说,我完全非理性地把精力灌注在他的身上了,投入的时间很长。我现在仍然部分地坚持当年形成的对易卜生的阐释。《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中有关易卜生的那一章就是这段时间的成果。对我来说,易卜生具有深刻的意义,原因在于,作为一个作家,他所传达的东西最为接近我当时对身边环境的感受。我突出强调了易卜生的主题是“在一个拒绝退让的紧要时刻,既无法前进也不可能后退”。那恰恰正是我的感受。我对易卜生的分析是:尽管作品中每个人都遭受了挫折,挫折本身却根本没有否定促发行动的冲动的合法性。不过,挫折的出现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定的障碍并不包括对最初冲动的放弃——这就是我对其他阐释的辩驳。我想这就是我当时怎样看待 1930 年代晚期那种冲动的命运的,那种冲动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它是正确的,但它遭到了挫折,然而挫折并没有使它丧失合法性。现在我会对易卜生的分析再增加一个方面,由于他的目标总是关于个人解放的,他就把社会解放的规划排除在外了。

多少有点像你在《现代悲剧》中指出的那样吗?

没错。《现代悲剧》是对我早期立场的修正,也是对我称之为自由主义悲剧的批判。但是易卜生的作品反映了我早期的处境,它们保护我不至于从 1930 年代的立场迅速退却。许多原来的党内同志当时正在那样做,认为我们过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认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原罪。因而我在对易卜生的分析中指出他不是传统解释中所说的谈论原罪的戏剧家,也不是一个丧失希望的戏剧家,这非常重要。在易卜生的戏剧里,挫折的经验并不减损斗争的价值。那恰恰正是我个人在 1945~1951 年体验到的深层“感受结构”。

20 世纪 30 年代,你曾经希望把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行为 and 普遍的政治斗争融合在一起。当时你觉得这种希望受到了挫折——因而

你的处境就像易卜生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吗？

是的。我在1939~1940年给自己设计了未来的规划，并且试图那样生活。那时我对这个规划很自信，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如今它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地值得怀疑。在那种背景下，易卜生的某些主题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使命的主张，对死的关注，以及这样的思想——在沿着某种规划方向创造现实的过程中，你在并非出自自己意愿或选择的环境中所累积的点点滴滴阻挠了你的使命。这些主题与我自己当时关注的东西都产生了共鸣。我认为从那时起另一个我出现了，与早期的我截然不同。我变得更加胜任学术研究，更加焦虑和谨慎，总是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所有这些特征后来都招致了人们的抱怨，它们与我在1940年的表现完全相反。

你在最终的考试之后是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的？你是否考虑过通常的选择，继续做一篇论文？

没有，这有两个原因。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进行学位考试的准备，把大量情感投入学术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它不值得致力到那种程度。另外我也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工作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当她出生的时候我还在诺曼底，1946年9月我又添了一个儿子。你可能会说我不得不为他们提供支撑，但是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之后，还不如说是他们支撑了我。三一学院愿意为我提供一份高级奖学金，每年200英镑，连续提供三年。但是我在牛津看到成人教育工作的广告愿意付300英镑一年。因而是经济上的因素促成了我的决定。

但是主要的原因在于我看不到继续做论文有何意义。当时我非常清楚我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写并且真的想继续写下去。我特别想写一部小说。这或许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当时正在试图坚持1930年代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价值。那时我和我的朋友沃尔夫·曼考维兹

(Wolf Mankowitz)、克里夫特·考林斯(Clifford Collins)正打算办一份刊物——我们确信我们能够创办一份期刊并公开出版。我当时正在做的另一件事是为麦克·奥洛姆(Michael Orrom)写一个纪录片剧本,他那时是罗沙(Rotha)的副导演。所以,我们当时打算拍一部电影并办一份杂志,与写一篇论文相比,这些看上去是更令人兴奋的项目。我对随后几年的计划是接受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以维持自己在此期间的生活。

5. 《政治与文学》

我们现在可以集中谈谈《政治与文学》吗？它的源起是什么？你在剑桥的第二个时期如何产生了创办这份刊物的想法？

回到剑桥后不久，我偶然结识了曼考维兹和考林斯——他们像我一样，正在学习英国文学。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一起进行讨论，那实际上成了为后来期刊所做的准备。我们的目标是创办一份评论性的刊物，能够大致把激进的“左派”政治和利维斯主义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我们打算做工党中的“左派”，但是与共产党又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守卫与《细察》的联系，但倒也不是非常坚定。

你的陈述唤起了我的两组问题。首先，你在战后为什么没有重新加入共产党呢？没有原来的同志——比如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或者爱德华·汤普森——试图说服你那样做吗？你现在的怎样界定自己与党的关系呢？

我在1945年从战场回来的时候，党正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社会团结和社会重建时期。它对罢工的态度是令人质疑的。因而我似乎没有直接的动机再次加入它。爱德华是另一年回来的，实际上我以前根本不认识他。我确实和埃里克进行过多次讨论，但是那时我致力的是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文化政治。我觉得共产党的文学知识分子并不太理解我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与共产党相比，我们对待当时的论战更为开放、更具批判性。不过我们在政治上仍然非常激进。我记得，在汤姆·德利伯格(Tom Driberg)的艾塞克斯选区集会上，我和曼考维兹尖锐地抨击了他，因为他对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工厂立场暧昧。他说这种工厂有其实际的好处，我们则说它在根本上完全是一种对工

人的规训。汤姆·德利伯格愤怒地回击我们：“你们是工党的成员吗？”我们完全使那个借口转变了方向。我知道进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确信自己是“左派”文化中最激进的异议分子。我们很清楚那一点。我们知道自己倾向工党中的“左派”，并且由于英国共产党在认识上的错误，我们认为自己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没有来由的自信，但它的确一直存在。

第二组问题。你的叙述彰显了你与《细察》在本质上的联系。利维斯的哪些地方吸引或者控制了你的想象力？你将如何描述这些年来他对你的影响？

显然，利维斯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他的文化激进主义。现在这样描述他似乎有问题，但当时不是这样。首先影响我的是利维斯广泛的抨击范围，他抨击的对象有学院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都市文学文化、商业出版和广告。你一定会同样体谅他那种带有批判性激愤的纯粹语气，它与我们的状态是同一类的。

其次，我在利维斯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实用批评。它令人陶醉，带来一种我无法描述的强烈感受。尤其是当时我对自己的文学批评水平很不满意。我说到陶醉，那是一种即刻的开心、兴奋和忘乎所以。是的，那就是所有的状态，让我记住了它是多么难以置信地令人兴奋。我现在仍然认为它是令人兴奋的，有时我不得不镇定地抑制兴奋的情绪，因为如今我也能做得很不错，我心里想，“我都已经教别人这样做了”。现在，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实用批评的方法很容易对我产生影响，但是我尽量忍住不去用它。它总是趋向于成为支配性的写作模式，因为它既规避了各种结构问题，又最终规避了关于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过在当时，我们还是认为有可能把实用批评与社会主义文化立场的东西结合起来。那种想法有点愚蠢，利维斯的文化立场清楚地表明了并不是那样。我想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们开创了自己的

评论,而不是列席于《细察》的作者队伍。

最后是利维斯对教育的极度强调。他总是强调有大量的教育工作需要做。当然,他是用自己的话语对教育进行界定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强调本身完全是正确的。当我在牛津听到从事教育的可能性时——为工人教育协会进行文学学科的成人教学,当时牛津大学委员会的秘书长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进行了面试——我觉得那似乎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工作。事实证明教育成果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但感觉它是绝对正确的。我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次在工作上的选择。

当时你对利维斯的哪些方面持保留态度?存在重大的分歧吗?

我应该解释一下,事实上我是从曼考维兹和考林斯那里间接听说利维斯的,他们是利维斯的正式学生。他们很可能曲解了利维斯当时所讲的话,使其显得接近于我们的观点。我记得一件小事,那预示了我最终与利维斯的关键分歧。我和曼考维兹去听奈特(L. C. Knights)的讲演,内容是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邻里”的含义。利维斯当时在教室的后面靠着墙也在听讲。奈特说,现在没有人能够理解莎士比亚“邻里”的含义,因为在堕落的机器文明中不存在邻里。当时我站了起来,说我认为这只具有部分的正确性,接替它的共同体显然是存在的,并且我非常了解在威尔士邻里意味着什么。曼考维兹当时辛辣地批评我的发言是感性的、没有价值的(那体现了我们特有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曼考维兹批评我的时候,利维斯一直在点头表示赞许。

另一个重要的分歧我当时就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了,那就是利维斯对艾略特晚期诗歌的立场。《四个四重奏》在当时剑桥的阅读与讨论中完全占有主导性的地位。我反对当时看待这些作品的流行方式,但未能成功地把自已的看法清晰表达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与朋友而不

是与对手讨论艾略特，他们认为自己是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但也认可艾略特的作品。我当时肯定极其缺乏自信，因为我没有与他们进行充分的辩论。我只是心里想，“这里也出现了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会引起嘲笑的表情，但必定是对艾略特作品韵律的共鸣。我当时只是看看对面的学校教堂，什么也没说。但我直觉感到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围绕着那些诗歌和对诗歌的批评出现了阶级斗争。利维斯对艾略特的批评包含了激进的、积极的因素，如果你不仅进入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之中，而且进入到《四个四重奏》构成的更为宽广的世界，那么你就完成了阅读。于是你就会完全处于战后的通常心境：失败的必然，努力的荒诞，放弃的必要……

当然，利维斯本人从未同意过这一点。

是的，但那使他对艾略特和《四个四重奏》的处理显得奇怪。在某种意义上我欣赏他同时驾驭艾略特和劳伦斯的尝试，但是没有人能做到那一点。你可能两个都驾驭不了，但不可能同时驾驭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利维斯的趣味，他的确试图驾驭这两匹不能并驰的烈马。这阻止了把利维斯简化为程式化的利维斯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比利维斯主义这一字眼复杂得多的人物。

谈谈《政治与文学》，这份刊物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我们在首都的诺埃尔大街找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开编辑会，出版了两份评论刊物（《批评家》是另一份评论刊物）和其他一些东西。当时考林斯仍然在剑桥，曼考维兹毕业了，在艾塞克斯，而我则在苏塞克斯。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我作为退役军人有资格得到特殊的纸张配给，当时纸张还是定量配给的。考虑到战后阅读内容的匮乏，我们确信这次冒险是可行的——比如说，史密斯公司接受了第一期《批评家》并把它摆到铁路书报摊上，他们卖掉了订购数量的一半。在编辑

方面,曼考维兹做的工作最辛苦。曼考维兹和考林斯是老朋友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总是稍有一点儿那么不对称,他们会在周末到办公室做刊物规划并一起写些东西,而我则较少去办公室。

你们的目标定位是哪类读者?你们把刊物投放到市场上的时候在脑海中有明确的发行量吗?

我们想要售出 1500~2000 份。出版之前我们大概有了 500 份的订单。我们希望读者群能够从共产党员扩展到受利维斯影响的那些人。然而我日益认识到,决定性的读者群还是在成人教育方面。事实上,工人教育协会的所有教师都是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是在独自进行成人教育,因而我们把刊物看做是某种非常令人鼓舞的联系网络形式,它把工人阶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政治与文学》属于哪个群体的话,那就是成人教育的教师和学生们的。

《细察》和《政治与文学》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在数量上,前者所占分量是惊人的——四期刊物里,9 个作者来自《细察》团体,算上曼考维兹就是 10 个。有一篇梅森(Mason)为《细察》所做的大致解释,后续以 Q. D. 利维斯的文章。你和这些人有个人联系吗?是你向他们约稿还是他们自己投稿的?

我只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而且不是很熟。稿子是曼考维兹和考林斯向他们约写的。实际上大部分稿件可能都是考林斯组织的,他当时还在剑桥。我与利维斯小圈子的联系差不多完全是通过他们。这种关系是实际存在的,然而被动的。无论如何,我们都渴望知道利维斯对我们的看法。毕竟对于当代现象他从未表达过任何好的意见。曼考维兹请他为《政治与文学》写了一篇文章。他非常机敏地说,如果我们追求的一系列目标与《细察》的描述接近的话,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你们是怎样选择其他作者的？你们是否尽可能地把社论上的统一和一致作为目标？

不是。我们确定要办一份观点开放的评论刊物。比如说，我们的原则是采用持反对意见的评论——我不确信我们一直在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反对采用持赞成意见的评论，我们认为那是伦敦杂志的特征。所以，即使我们认为某个批评是错误的——比如说我认为泰普林(Taplin)关于乔伊斯的文章很荒唐——我们仍然发表它。我们相当自觉地运营着一份观点开放的刊物，因此刊物呈现出对立与矛盾的外貌。我们对政论的想法是每期向一个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约稿。你看，我们请的第一个人是亨利·考林斯(Henry Collins)，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们一般在实践中既反对党刊上的评论也反对《细察》的观点。《细察》当时正变成一份水泼不进的期刊——回想起来，它带有党派刊物的作风，给人的感觉是作者们都属于一条阵线，不同程度地被一个内部小圈子所接纳。

你们可以争取到所需要的所有撰稿人吗？

令人惊喜的是，作者们都很愿意。奥威尔(Orwell)当时正在《动物庄园》的成功之巅，尽管已经病了，还给了我们他的文章《作家与巨灵》。后来考林斯去医院看他时，他交给考林斯一份关于吉辛(Gissing)^①的评论，说：“我很高兴你们能接受这篇文章。”到了这篇文章本该发表的时间，我们的刊物已经倒闭了(那意外地导致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瞬间，奥威尔当然想取回那篇关于吉辛的评论，但是它不见了，过了很久，最终才发现它在一摞旧报纸的下面)。同样，我们毫不费力就发表了萨特的译文。

①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英国小说家。——译者注

这份刊物创办于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战后工党政府执政的前几年。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是“文学”，你对当时的“政治”持什么态度呢？你如何评价艾德礼政府？早些时候，你谈到1945年对工党的投票，非常冷淡地说：“那只是尽责任而已。”你自己从一开始对工党政府的期望就是极其有限和实际的吗？

不是，我的反应非常热情，觉得真正的历史突变发生了。在某些方面，那种感觉持续得比我的政治判断更久，甚至持续到1950年代。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在《政治与文学》存在期间有两个转折点：1945年末接受美国贷款以及其后在1946~1947年冬天的能源危机。我记得当时意识到不管是否接受美国贷款，那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接受美国贷款之后，战后货币秩序得以确立，我觉得伴随着右派在政治上的失败，战后民主的整个前景受到了威胁：我们失去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当我坚称我们本该拒绝美国贷款的时候，我的观点通常被看做狂热的理想主义，包括“左派”阵营也这样认为。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说，拒绝美国贷款会导致极端的物质匮乏，让工人阶级和复员军人承受这样的苦难是行不通的。我至今仍然不认为拒绝贷款是一个比乌托邦还不靠谱的想法。按照我的观点，美国贷款和随后的马歇尔计划必然使工党顺应美国的世界版图。第二个分水岭，我认为是1946~1947年冬天严重的能源危机。政府当时的选择是，要么通过公共配给在能源短缺中艰难度日，要么反对工人阶级并劝说他们“进行生产以挽救国家”。当时政府采取了后一方案，在我看来，自此以后工党政府的其他改革不过是其原初动力的余波。我本该毫无怀疑地确信，它早就变成一个在客观上非常反动的政府了。很快他们就派出军队去镇压了码头罢工。

工党的政策对工人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影响，这两种影响都直接涉及我。铁路被国有化的时候，我和父亲谈论这一行动的后果。父亲过去一直在期待铁路的国有化，但是在国有化的6个月之

内,他激烈地反对新体系的官僚性。在他看来,这似乎只是以某个负责管理的董事会取代另一个董事会。他说,直接的工作规定实际上变严格了。他是这样表达的,“过去一个巡视员检查,现在是两个”。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为保罗·罗沙(Paul Rotha)写电影剧本,拍一系列表现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纪录片。当时我们去中央信息中心参加一个会议,这些影片要由他们提供经费,他们马上开始就影片提出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他们对我们宏伟的影片计划不感兴趣,倒有兴趣拍摄一部电影短片,对战后的重建进行介绍。那真是惊人的一幕。罗沙当时还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觉得自己富有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提出条件之后,罗沙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去挂在办公室门边的夹克里拿东西,实际上他是穿上夹克走了出去,把我们撂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们意识到这意味着谈话结束了。这事实上是电影计划的结束。不久以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①就职贸易部,一个真正不祥的人物。当时的他和后来一样,可能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而是看成机构性和财政性的。如果你看《政治与文学》的话,就会发现我当时已经在抨击他了。

当一些人开始创办一份文学政治评论的时候,就是在有组织地介入社会文化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不管是否明确表达出来,他们必定在脑海中对于面对的各种力量有一个大致的图谱。你已经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你的看法,认为《政治与文学》的读者群首先是和你一样年纪的20出头的成人教育学生。他们是新一代,你感受到了在你身后他们的力量。不过,你面对的是什么呢?特别是,你怎样看待那个已经被接受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公众声誉。你已经回溯了自己对待工党的态度,但是你介入社会的一个批判领域必然

^① 哈罗德·威尔逊后来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与文学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对后者的倾向是什么呢？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界定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地平线》。它是一个令人难以表述的讨厌的目标，主要代表了战前文化的延续。马克思主义者把那种文化作为资产阶级文化反对，而利维斯则把它作为一种都市时尚现象加以反对。对于我们来说，康诺利(Connolly)是自我放纵和颓废的象征，这使他成为一个显眼的抨击目标。源于布鲁姆斯伯里风气的1930年代文化的特殊情调在1940年代的这份期刊中找到了它的最后表达形式：首先是极端的主观主义，把作家个人的困境反映成主要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可能会对工党政府表示忠诚，但其信念却是错的，他们强调的是，在一个极端贫穷和混乱的时代里，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如何艰难。他们是否投票支持工党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事实上他们试图说明，与国家坚持自己的话语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过一种有教养的生活。如果国家打算坚持它自己的话语，坚持它自己最适当的话语，我们会说，道路将会非常艰难，由战争引起的支持国家的普遍纪律和自我约束将会延续。康诺利的反应正好相反——拿出乞讨的饭钵，他向美国朋友发出社论呼吁资助英国的文化事业。这正是当时工党政府接受美国贷款所采取的方向。我在《政治与文学》中猛烈地抨击了康诺利。

他的吁求变成了现实。《地平线》的后继者《邂逅》是由美国间谍资助的。

是的，那是1950年代冷战的结果。康诺利本人可能还是属于“左派”的，因而在他请求美国资金资助作家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连贯性的因素，我们认为它类似于1930年代作家把写作与革命人为地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就经常指出这一点。许多1930年代的“左派”作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感受，他们一直在说：我们必须进行革命，这样我们

才能写出我们的诗歌。你仔细一读，那就是爱德华·阿普沃德(Edward Upward)的三部曲《旋升》真正要讲的东西。更不用说像奥登(Auden)这样的知识分子了，他已经发现做一个诗人的更为舒适的方式——去加利福尼亚。我强烈反对那种关注自我的文学文化。

《政治与文学》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好斗，那种特点在我后来的许多作品中都消失了。我实际上抨击的大概有四个人，那可以很好地说明我们当时的立场。一个是《地平线》的康诺利；另一个是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受到抨击是因为《背叛的意义》，它令人非常生气；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受到抨击则是因为他在《现代季刊》中支持佐申科(Zoschenko)论战的文章。后面的那场论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地平线》这样的右翼杂志一直告诉我们在当下的新环境中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多么困难，而左翼的日丹诺夫主义^①讨论则一直在以具有讽刺性的方式从侧面包围我们。日丹诺夫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关注他们卑微的精神，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做艰苦的工作，这是对苏联作家在现实中遭受的压制表示认可。因而对于我来说，对其进行抨击和批判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的替代性文化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工党政府有选择的机会：要么用资本主义话语重建文化领域，要么资助大众教育机构和大众文化机构，后者可以抵制在资产阶级舆论中已经形成势头的政治运动。事实上，他们迅速选择了通常的资本主义优先的做法——拒绝资助电影纪录片活动就是一个例子。我仍然认为，面对1940年代现成的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渠道，没有的文化上资助工人阶级运动是工党地位在1950年代迅速瓦解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不认为你能理解1950年代晚期新“左派”的方案，除非你

^① 指对艺术的严格控制。——译者注

认识到,像爱德华·汤普森和我这样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大家当时都在设法重新建立那种联盟。联盟在那个时期也许不再可得,但是在我们看来,即使联盟难以实现,我们的观点也是合理的。无论如何,那就是《政治与文学》出现的背景。

你曾经说过这两极之间的矛盾迟早无法维持下去,关于二者联盟的观点预先注定了它的命运。那是《政治与文学》在1948年结束的原因吗?

其实不是。原因在于一些严重的实际困难。我们几乎没有经营资金,而书店又通常延期付款。另外,编辑之间的关系在最后一年也日渐紧张。在30年后谈论这些事情有些难以启齿,我记得我们没有任何关于编辑方针的争吵,导致结束刊物的决定性争执实际上是关于经营事务的。我们都在发生变化,曼考维兹和我的变化尤甚。曼考维兹和我从那时起就多次公开表示,大概是考林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应该说,考林斯当时是我们中间最清楚《政治与文学》需要什么的人。他常常在成人教育课程后留在我的屋子里,我们就经常探讨《政治与文学》的需要。后来他和我计划共同写一本书《英国文学成人读本》,但是很不幸,在一系列的困难与误解之后,这本书没有完成。最后我独自写了一本书,与原来的设想相当不同,这就是《阅读与批评》。这件事的结果与刊物问题是互相影响的,1948年,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我们的正式决裂(后来考林斯与我恢复了友谊,很多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试图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办那份刊物,找了另一位编辑。然而资金困难仍然存在,而且1948年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年头,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背景下,刊物的计划和调整方面必然出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令人关注了,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在办刊方针上表现出明显的分歧。

你已经描述了自己如何抨击《地平线》的文学知识分子不负责任，抨击它脱离英国战后现实的政治社会进程。你还说过，你认为工党政府在严重得多的道路上，正在沿着与它的国际财政方案相同的方向前进。你们是否发表了连续一致的文章，批判工党政府在那个时期所做的事情，以帮助你们的读者在当时非常令人困惑的斗争中确定方向？

没有。我回顾了一下那些评论，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确批评了某些事件，但是并没有持续性的批评领域。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努力帮助强化非常有力的大众文化动员，以参加工人运动内部的交锋。但是我们与正在抨击的立场抱有同样的幻想。我们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学论争和文化对话就能够实现目标。那就是利维斯的影响，这样的观念许多人都有。

在工人运动中，在成人教育的师生当中，你们设想的这种形式是否直接预示了这样一份政治刊物，在其中对政治的强调至少不少于对文学的强调？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批评家们是从《细察》请来的，《政治与文学》的内容比例严重倾向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方向。

我认为那部分反映了我们的作者范围。请来的作者都是那些正在学习和教授文学、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人。我们严重缺乏经济学家，而经济领域本该是我们的主要战场。这与我们的一个错误有关，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错误。我们未经任何确证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们通晓“左派”的经济和政治规划。较易成为借口的是，我们有一个政治规划，因为我们确实反对工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投机活动，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群众政治动员的观念而不是日益疏远的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观念。但是在经济上我们没有任何方案，对美国贷款没有自己的看法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仅仅站在“左派”的反对立场上，主要的反对理由源于苏联对此事的担心和反对。在对英国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遭受了严重持续的挫折，英国的资本主义

经济毕竟被严重削弱了,当时正以一种社会民主的观点尝试进行福利制度改革,但却停留在只能明确规定“国家”生产的基础水平上;事实上英国的自主权已经在战争中丧失了,进而又受到新财政方案的明显削弱。其结果恐怕根本没有任何连贯一致的“左派”计划。

你们以编辑的身份在《政治与文学》中声明它是一份社会主义刊物了吗?

没有。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不是面对面地有效干涉工党政府或者清晰一致地表达对《地平线》批判的先决条件吗?你们本应该声明自己的立场。

是的,我认为你是对的。计划得以确定的方式限制了计划本身并导致了它的失败。刊物是打算用来满足成人教育运动中年青一代的需要的,但是它的形式是批判性的评论(这是《细察》的遗产),这在内容范围上比它的对手更加松散得多,我们认为那比声明某种特定的忠诚更加重要。在口头上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承诺经常是非常矛盾的,我们无论如何对此保持了谨慎。但是假如我们声明了自己的忠诚,我相信“左派”政治和利维斯式批判的结合根本不会脱离它的基础。

人们开始时认为他们与某场运动是关联的,后来却发现他们与这场运动没有什么关联或者没有充分的关联,这种情况确实常常发生。我们最终决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考林斯保持了利维斯和艾略特的多数论点,不过逐渐集中于关注弗洛伊德及其相关观念。另一方面,曼考维兹立刻与少数人文化的立场决裂了,他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我过去就认为他实际上任何东西都能写。曼考维兹运用他的天赋,把自己的素材加工到最流行的形式之中,1950年代末他已经创作了一部电影和一部音乐剧。谁能够说、谁又曾经说过在这三

个人之间始终存在着这些分歧呢？应该有足够多的人具有足够多的共同之处来创办这样一份刊物，但是战后太多的人都在重建他们自己的生活，陷于各种各样的处境之中，谁能料到呢？如果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那时朝着我们计划的方向努力（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他们很多人在1956年都这样做了），他们本可以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形成更多的团结。我们全都是搞文学的人。我刚刚读了爱德华·汤普森关于考德威尔(Caudwell)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描述了1940年代晚期党内关于考德威尔的论争。我最直接的反应是：“为什么你们当时不在《政治与文学》中写这些东西？”肯定还有许多像爱德华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仍然认为争论必须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这种必要的形式差不多在1946~1947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它没有成为现实。

你对刊物的停刊有什么反应？

这份刊物的失败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危机。其他许多刚起步的东西，比如电影，也遇到障碍或者失败了。这种经验强化了我曾经在易卜生作品中发现的感受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处于一种身心俱疲、冷淡退缩的状态，我不再阅读报纸，也不再收听新闻。我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除了继续成人教育的教学以外，觉得只能通过一种不与他人合作的写作方式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我退缩到自己的工作，10年里我几乎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写作的。

6. 成人教育

你在工人教育协会的直接工作环境是什么？

我在牛津远程教育代表团得到了我的工作，它从北到南掌管着从斯塔福德到苏塞克斯的分散地区，我任职到苏塞克斯东部，生活在希福德。课程性质极其混杂。我在哈斯汀主要为商会开的课程是公共表达，内容是公共写作和公共演讲的专门训练。教作文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教学生如何写作报告、备忘录、契约书以及进行委托发言和口头报告，那都是与他们工作有关的技能。另一方面，我在哈沃西斯有一班学生是家庭主妇，她们想读点文学作品。她们的学习兴趣完全是认真的，但是其社会内涵全然不同。后来我有了一些兼具两种因素的学生，其中当然包括了一些能够工作挣钱的人，她们在第三次或第四次课就写出了自己的小说或自传、短篇故事或诗歌——她们不断写出大量文体不明的作品，那是一种文体杂糅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接受。

根据你十多年的实际经验，你怎样回顾评价成人教育的整个性质？

我记得一位大学代表科尔(G. D. H. Cole)在远程教育代表团的会议上说：“我对成人教育没有多少兴趣，我的兴趣在于工人教育。”那就是我们之间的矛盾。他的意见属于少数派并且失败了。当然，有些人会说在此之前这样的斗争就发生过，而且他们已经失败了。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能看出这段历史书写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伴随着著名的罗斯金大罢工，成人教育运动沿着两个方向分裂了。一个是主张对自觉联系社会主义的工人进行教育，最终产生了全

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另一个是工人教育协会，依托各个大学，努力发展对工人阶级的教育，这种教育吸收大学中探索各种立场的主张，而不是从特定立场出发进行教学，我当时认为它比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要成功得多。如今当我理解罗斯金罢工及其民众基础的时候，我认为工人教育协会教育观念的反对者是对的，他们说：“你在承受阶级意识的痛苦吗？来到牛津你就会被治好的。”他们认识到工人教育最终会被大学收编，以学院标准和良好学识的名义进行的教学不会是社会主义教育，另一方面，那种明确与阶级立场相关的教育无疑在某些重要方面造成了风险，使其在特定时期屈从于特定的党的路线，真正失去它的某些教育性质。全国劳动院校理事会在某些地区体现了更为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与工人教育协会的成果相比，它在威尔士南部培养出更多受过教育的斗士。而工人教育协会则试图推荐一种明显属于一个以教育为身份中介的阶级观念，它不会发出任何粗鲁的言行——在托尼(Tawney)的表述中你可以理解这种争论导向了何方。1940年代当我加入成人教育运动的时候，两种教育原则仍然在斗争中相互制衡。哪一方终于胜出是毫无疑问的，最终的原因非常残酷，大学能够在经济上支持它们自己的成人教育，却不愿意支持另一种成人教育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历史所暗示的那样：一切争论都结束于1911年，工人教育协会始终仅仅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改良主义者转向的一个例子。每次当一个阶级讨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种讨论出现过太多次了），他们需要的就是工人教育协会最初的教育形式。他们不想通过任何短期培训班进行权威式的教导——我认为他们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定位。我想我们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因此，工人教育协会的经验总是令我感到好坏参半。

大概工人教育协会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牛津远程教育代表团的性质如何？

斯塔福德北部是一个稳固的工人阶级地区，那里存在着一支重要的激进力量。它与肯特地区合作，使得办一个暑期班成为可能。在牛津的远程教育代表团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处于控制地位，他对发展普及的工人阶级教育有自己坚定的原则性观念。他认为做这种教育工作的人本质上都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他毫不让步地说，在与课程相关的情况下，教师有权利在课堂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要保证课程的开放性，教师的立场是可以挑战的，允许反对和讨论。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受到了非常剧烈的抨击。整个远程教育代表团被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小单位。整个代表团，尤其是霍奇金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尽管如此，教师们很快走了出去，到达西非和苏丹，将这种教育方式付诸实践——霍奇金是非洲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因此，代表团被看成不仅是国内的同谋者，还是永远的颠覆者。在1940年代晚期至1950年代早期，在这个机构内部存在着极度的危机，是冷战在国内的明显表现形式。

这场斗争是如何发展的？你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哦，我当然同意，在讲课中不声明自己的立场是完全不适当的；同样，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假定你与学生并不共享课程科目之外的任何兴趣也是完全不适当的。你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退化成某种宣传实践的教学危险，但是实际上，在整个1950年代，危险越来越存在于相反的方向。因为像所有福利部门一样，工人教育协会开始被中产阶级当做一种休闲和教育形式大量运用。这些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各阶层混杂的社区里，它们促生了极其不同于工人阶级学生的文化氛围。你必须积极游说开设一些特定的课程，它们针对的对象是围绕工会等团体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这些都做到了，但是始终又存在着来

自大学里的压力：你必须提高学术标准，你必须留书面作业，不许跨过学科边界。作为一个成人教育指导教师，你生活在长长的缰绳的牵引之下。然而，生活在远离牛津 100~150 英里的地方，你实际上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我的课程提纲由于这些背景经常受到批评：当然这部分课程内容在英国文学范围之内，但是这另一部分是什么（后者包括我所讲的第一课，其中我开始讨论《文化与社会》的各个主题）？这是什么性质的课程？大学标准的代言人是雷邦德(S. G. Raybould)，他就这个题目写了很多书，给人的影响是趋向于把那些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排除在成人教育之外，因为这些人完成书面作业方面有困难。我们这些教师不得不保证他们完成书面作业，以确保大学和政府批准并资助课程。当然，我们答复说，我们正在尝试对这样一种不同性质的作业建立一种新的标准。如果有人想要查看这些论争的话，它们在这一时期成人教育刊物《大路》上——我是它的投稿者。

经过这些年，工人教育协会最终出现了一个相当成功的转变，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称作再教育：除了在工会教育的某些特定区域之外，任何教育以外的强调都被撇在一边了。我于 1960 年搬到牛津，担任常驻教师，那是一个较高的职位，那个时候我才清楚整个教育形势。紧接着开展了一个计划——在威灵顿广场创建一所寄宿制学院，主要为进入工业管理层的年轻大学生提供进修课程。忽然间，这不再是我生活了 14 年之久的各色人等混杂的环境了。当他们提出把这些为经理们开设的进修课程制度化时，成人教育当然就不再具有足够的意义了。那时我就知道我要离开了，尽管这种情况是以一种相当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我接到一封信，说我被委任为剑桥讲师，虽然我并没有申请这个职位，但我还是准备去了。

根据你对工人教育协会和《政治与文学》的相关描述，引出了一个问题。你说你在工人教育协会接受了一个职位，作为教师你会声明自

己的社会主义观点,但不是将其强加于人或者假定你的学生们也分享这样的观点。无论如何,你不会假装中立或者压制自己确信的东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那正是你在《政治与文学》中所没有做的事情。你本来完全可以声明这是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同时它也发表其他任何正确有力的反对观点。你并没有这样做,你是在1946~1947年做出这一非常重要、自觉的选择的,这是出于怎样的权衡考虑?要知道你后来在工人教育协会的时候改变了这种做法。

如果我能说在《政治与文学》中的做法是自觉的话,那太让人高兴了。我想它可能是“左派”政治与利维斯式批评结合的一个无意识过程。我认为与《细察》的联系对我们产生的有害影响归因于这样的观念——不偏不倚的思想能力。你可以看到某种途径,通过它,一个人可以从这一不太固定的观念——不偏不倚的思想能力——发展到与本质上开放式的智力工作相关的更加可以辩护的立场,然而智力工作却包括了不具主导性的对于一个人自身立场的声明。左派政治和利维斯式批评观念的混杂导致了《政治与文学》特有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出问题所在——明白了不偏不倚的思想能力只是一个幻想,它不同于那些听起来与其极其相似的更为正确可行的立场。但是我不想把自己后来的选择与成人教育的实际发展混淆起来。工人教育协会绝对在某些方面反对任何封闭的、内在的宣传式教育,最终在那种大学供给经费并进行学院管理的情形下,你不可能实现一个工人阶级教育计划。工人教育协会与《政治与文学》相似,面临着政治立场与教育观念暧昧的问题。这一点无可否认。

我们可以就你的日常工作问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吗?那些年你大概必须在白天从事阅读和写作,教学主要在晚上进行。你是否发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与典型的教学环境相比更加有利?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必须白天授课,晚上才能阅读和写作。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它是我唯一能够把握的社会体制。假如我不得不有规律地在上午做其他工作,我的思维很可能会枯竭。成人教育实际上是非常令人感到体力疲惫的一份工作,我后来才感受到这一点。在晚上乘公交或者火车赶路,尤其是在战后的环境下,是非常累人的。不过那确实意味着把大部分的晚上时间留给教学之后,每天我都可以在上午写作,下午阅读。从1948年退出合作事务之后,这就是我极其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它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1948年以后我学到了广泛的英国文学知识。在剑桥选修的三年课程,特别是我完成这些课程的方式,并没有给我这些知识。我记得每年我在教学中把50%到75%的内容比例用于新的文学作品,因此,我最终确信自己已经读了足够多的作品。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对我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那意味着当我回到剑桥的时候,我采取了同样的工作日程,如今仍然这样——我现在无法以其他方式工作了。

7. 五十年代

你说过,在这段很长的时期,你退出了与他人的一切智力合作。然而,你在1950年代却是《批评评论》的撰稿人,甚至可以说是编辑。当贝森(Bateson)创办这份刊物的时候,他公开声明将会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那些来自铁幕另一边的投稿。它不是一份冷战刊物。你在加入这份刊物之后在社论中写道,这样的大学评论杂志可能是很重要的——以反对刚刚贬低过这些杂志的艾略特。你后来与《批评评论》的关系有怎样的意义?

贝森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很重要。他的计划也是办一份开放的评论杂志——你看,同样的组织不断自我重复。出于完全良好的意愿,他在年青一代中四处物色人选加入编委会。编辑的运行方式是由我们从提交的文章当中选出那些我们希望阅读的。我经常返回一些否定性的意见,随后这些意见被转达给作者,最后,作者进行一些修改。更为常见的是这些文章就消失了,因为还有许多其他文章。同时,我会通过邮递得到一份杂志。我告诉贝森,杂志里面大部分文章我都不喜欢。他的答复是:“为什么你不要求预先审阅那些文章呢?”这听起来似乎足够合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很分散,刊物的整个发展方向事实上一直处于贝森的掌握之中。我在《批评评论》的编辑身份只是形式上的,从未变成真正的合作。

对我来说,这份刊物的意义要简单得多。它是我可以发表文学评论的地方,我可以写关于艾略特、奥威尔或者霍加特(Hoggart)的评论。我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文化的观念》,以此作为开端,我后来出版了整部《文化与社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多产时期:我当时写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发表途径。我现在

感到遗憾的是——那是我最大的遗憾之一，1950年代的制度结构使得文学批评的发表比其他任何文章都要容易。我可以在《批评评论》上发表文章，也可以在《大路》上发表一些东西，但是我找不到地方发表政论文章。我在那段时期写了三部或四部小说，其中只有一部在重写后得到了出版。在我手头写作的东西和得到发表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后来觉得甚至当时所写的文学批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我的时代决定了我的方向——在任何意义上我都没有决定时代的方向。这是文学批评主导英国文化的最后一个时期。

回顾一下，《批评评论》所代表的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期间所谓“批评革命”的制度性吸收，以及对以往学院内部一直或多或少是反抗性活动的专业化。那似乎表明你自己与这份刊物的知识分子关系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紧张和暧昧。《批评评论》的形式规划是要把文学的历史方法与批判性的“标准”结合起来。然而当贝森谈到想要发展一种研究“文本”与“语境”的方法论的时候，他实质上考虑的是使传统的文学学问或者文学史与新的“评判”规则联姻。但是，你在批评和历史方面的工作是极其不同的——涉及对整个研究对象的根本性重建。在你处理与《批评评论》的关系的时候，那种对立变成有意识的了吗？

是的，我确实感受到了这样的紧张。当时我已经致力于后来显现在《乡村与城市》中的一些问题。在抨击提交给《批评评论》的一些关于田园诗的文章的过程中，我痛苦而又清晰地认识到，我不知道田园诗的历史传统是什么（许多人会说我从来没有清楚地认识田园诗传统，说我还是把它搞错了）。我错误地把田园诗理解成对乡村生活的感性描述，把它与庄园联系在一起。贝森熟知包括古典时期、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田园诗传统，田园作品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我不能否认他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有许多东西我不知道，未能

完全理解——特别是在古典文学的广阔领域内，我研读了古罗马文学，但是没有研读古希腊文学。因而他的文学学识不断地揭示了我的无知。贝森甚至比泰雅德还不客气，他常常对我说：“你完全错了，你误解了这一部分，你根本没有读过它，这些术语你用错了。”对于任何一个尝试进行知识创新的人来说，我想这都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因为你必须能够很专业地把自己的观点呈献给那些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只有这样做你才能恰如其分地获得那一专业的某些性质。当时我觉得与专业机构的联系对我而言是必要的，我必须能够用专业机构的有效术语来创作作品。最后我读了那些文学文本，知道了大多数权威是怎样谈论这些作品的，并且能够说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学习各种各样的英国文学研究专著并反对它们，这一过程的成果就是《乡村与城市》，特别是关于田园诗的那几章。

你已经解释了你从 1945 年到 1951 年英国工党政府的态度。当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见证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始。你对 1947 年到 1953 年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看法是什么？你对那一时期的严重冲突是如何回应的？

在结束《政治与文学》之后，发生了两件大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的封锁。那是在 1948 年，当时我处于自外界退缩的阶段，不再阅读报纸和收听新闻。因而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后来我自觉地通过阅读来了解它们，对于战后大事来说，我的了解方式是荒诞的。我没怎么把柏林危机挂在心上，而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我抵制西方的正统解释，他们把它描述成突变，简化成一次武装政变——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那种描述。尽管如此，从捷克回来的人们还在传说那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压制性政府。

到了 1949 年，我又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了，做出一系列不同的反应。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它是在 1940 年代明

确做出强烈反应的事件。甚至我还记得，尽管大部分“左派”人士对此感到高兴，他们给予的关注要少于对待欧洲的主要斗争，我对此感到惊讶。我把中国革命看做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它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的形态。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唯一一件好事。

你对朝鲜冲突的爆发如何反应？那是冷战的顶点，在英国国内引起了直接反响。

就我个人态度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截至战争开始为止，我并不相信我在党内的朋友们的说法，他们说南方入侵了北方。但是我同样也不相信美国和西方的干涉代表了联合国对朝鲜侵略者的圣战。我对这次干涉极其愤怒。非常清楚，朝鲜半岛内部冲突的性质是关于社会形态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在那里显然是要完成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此意义上，这场战争是中国革命引起的斗争的延伸。

事情很快变得相当明显，作为一名后备军官，我被征召到朝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的技能和年龄意味着我的名字会很早就被列在征召名单上。因此我必须非常实际地决定怎么办。最初拒绝征召的唯一方式是拒绝命令，然后在监狱里呆上至少一个月。我当时决定那样做，去和霍奇金协商把那作为我的年度假期。另外有一条非常及时的新规定，使得直接进入法庭裁决成为可能。但是所有人都强调我不应该让政见引导自己拒绝服役的行为。我实际上给法庭的理由是我不会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军队机构，在那里我的选择权已经被军队纪律预先剥夺了。这个理由有一个现存的具有说服力的潜在解释，那就是完全自治的观念。然而我传达的意思是：我最近刚刚经历过军伍体验。整个军队机构的性质是这样的，尽管你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军队为何而战的观念，但是在这种等级制指挥结构的运行中，你在开始时相信的东西此后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战争中你不知

道它演化成了什么。我把这些作为反对再次服役到朝鲜去的道德依据。法庭接受了这些理由,我被豁免了服役。对我进行听证的大概是三个公正的市民,他们毕竟不像我在战场上呆过,因此他们不能使用任何常见的策略说为什么你不为自己的国家服役呢,那真是喜剧性的情形! 陪审团主席居然是皮卡德·坎布里奇(Pickard Cambridge),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的古典文学史专家,不过后来我在《戏剧与表演》中引用了他关于希腊戏剧的著作。他们为什么对我所说的话没有感到困扰是相当清楚的:他们觉得,一个战争期间在军中服役了4年的人有权利说他不打算再服役了。他们采取了非常实际的立场。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你走上前去说,“我不想在这场战争中服役,因为我的同情心完全在北方解放军的那一边。这是一场内战,我希望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反应会怎样? 大概他们会很快把你赶出房间吧?

事实上,我恰恰这样在电话里和征召我的军队指挥官进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对话,他收到了通知。效果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说:“我对你一点该死的用处也没有,我会站在另一边的立场上的。”他完全失控了。后来,他们把我从军队里开除了,因为我做出了不得体的行为,拒绝征召。我被剥夺了军衔。

从1953年3月开始,在斯大林死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一系列戏剧性的剧变动摇了,其中,1956年的匈牙利动乱在西方产生了最重大、最广泛的影响。你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斯大林之死对我而言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因为我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了。到那时我已经逐渐认为政治重心不在苏联。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是1953年6月的东德动乱。我现在仍然不清楚发生在民主德国的这场动乱的性质,直到今天对它还有不同的描述。然而苏联军

队的干涉令我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所有厚颜无耻的侵犯都发自帝国主义阵营。甚至到如今,当我责备爱德华·汤普森或者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了彼此的分歧:对他们来说,决定性的事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而对我来说则是1953年的东德事件。人们说,与布达佩斯的动乱相比,柏林动乱在政治性质上较为暧昧。匈牙利动乱被承认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中的反革命因素是次要的、不可避免的。我感到奇怪的是,对匈牙利事件的接受我实际上比那些党内人士还要慢。与你预期的可能不同,跟那些捍卫斯大林主义阵营的人们一样,当时我对匈牙利事件有更多的保留。当然,我最终得出了与爱德华等人同样的结论。

对我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在德国之时起,苏联的军事力量与人民民主的政治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值得强烈怀疑的。我当时的立场是,战争的结束已经变成了军队在欧洲的对峙,两个阵营理论把社会主义属性赋予其中一个阵营,我不可能支持这种理论——因为当时一个防御性的军事推论正在抑制着社会的发展和创造力,后者正是社会主义属性应当指向的。军国主义的极度发展正在使整个欧洲承受着过于沉重的负担,不但西方如此,东方也是这样。那是一个科技战争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短暂的战争阶段,因为它一直在重现。我与战争有过几年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经过再次思考,觉得完全和平主义的反应才是正确的立场。

你在1950年代曾经写过,你在国际关系方面把自己看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大概你的意思是,那并不适用于国内的革命或者内战?

那并不是一个我现在能够认可的界定,我也不认为它完全传达了我当时的期望。但那是表达某种重要分歧的一次尝试。这一时期我始终依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努力使自己从整个战争经验中脱释出来,这一界定在深处也涉及了我的反应。那些处境是非常明确

的,像英国坦克 1944 年在希腊的进攻——战事发生的时候我本来可能会在所在战斗单位参加的,或者紧随其后连续的殖民战争与后殖民战争。然后发生了苏联坦克 1953 年在柏林的干涉和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出现的一直是坦克的形象。与从未到过坦克之内的人们相比,我对它不那么恐惧,并且产生了直接的情感上的关涉。我感到惊讶,人们对坦克如此恐惧,同样他们在现实中接受了严酷的强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可怕之事在于,我能够用我的头脑隐隐看出那种军事行动是如何展开的,从那时起这也改变了我的许多看法,我认识到一支不加阻止的军队可以对一座城市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影响我对城市游击战经验的看法一直到今天。在军队的城市行动中,不但存在着表面上呈现的军事力量的权衡,还存在着政治约束的某种复杂权衡。“左派”很少考虑处境的限制,而那却实际确定了武力的性质和对武力的使用。

你已经非常清晰地大致叙述了你对战后共产主义重大事件的反应。早些时候你强调了你在 1939 年到 1941 年对苏联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从来不曾是剑桥共产主义文化中的重要角色。战后期间你大概对此做了弥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读了哪些书?从哪些新的来源获得了知识?

直到我利用德国人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时才弥补了我的无知。我仔细地阅读了德国人的著作,然后完全接受了。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发展的解释对我极有意义。我从未贯通俄国革命的历史,然而,与战前极其复杂而有争议的时期相比,1945 年以后似乎更具决定性。德国人的很多著作都涉及苏联的早期,我把那一时期看做是必要的重新调整,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当下政治体系中的什么地方留下了影响。

想要了解你和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提问:你当时读什么报纸?

我从1945年开始阅读《工人日报》,直到1948年放弃阅读一切报纸。然后我在1952年到1953年再次阅读《工人日报》,定期阅读直到1968年,那时我作为“左派”的全国大会主席,照片出现在它的头版,也是在那时我确定当时的活动到了结束的时刻。如今我依然怀念它。现在我并不定期买报,但是如果我看到它,我通常还是会买的。

这个时期你阅读的其他报纸和期刊是什么?

1940年代读《新闻纪事》,它似乎是资产阶级新闻界最左的报纸。我订阅了《论坛报》。虽然父亲对这份报纸非常挑剔,我甚至为他也订阅了一份。1950年代我突然接受了《新政治家》,然后又撤销了订阅。

你全然未曾读过《泰晤士报》或者任何其他重要的资产阶级日报吗?

我在1953年到1954年开始阅读《泰晤士报》,实际上还给它写过几封信。但是我不得不放弃它,因为我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这讨厌的报纸会在早上来到,我得写三到四封信对所有的事情进行回应。唯一发表的回信是在1955年铁路罢工的时候,那时我以铁路工人之子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对他们抨击罢工者的行为非常愤怒。那是唯一得到发表的回信。我不久就想,我真是不能再待在家里与这些人一起开始每一天了,从那时起我就这样做了。我现在甚至不读我应该读的东西,例如《泰晤士文学增刊》。

大体上说,你愿意怎样描述这些年你与英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起初的1945年到1947年,根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使我与党远远保持距离的是对党的工作风格的藐视——我想这不是一个

词义非常强烈的字眼,尽管那时我不会使用它。就这种工作风格而言,我不是指我的剑桥经历中那些游离其外的成分,或者它们与某些流行行为的结合,而是指党的控制和中央集权制。比如说,共产党当时声明南斯拉夫事件是东欧唯一明确自发的武装革命,匆匆做出一些指示,随后又撤回了声明。稍后出现了我先前描述过的一些分歧。爱德华·汤普森和我在1958年一直进行对话,但是根本无法确定哪条路是度过1946年到1956年的正确道路,是该留在党内战斗,还是努力发展一种与党脱离的立场?我愿意说他的选择更好,但是我感到与那种工作风格如此疏远,况且我们认为,毕竟我们有可资利用的更为公开坦率的工作风格,它仍然延续了1930年代的共同方案。可能我们是错的,我们做到了公开坦率,但是却没能延续那个方案。

假如利维斯在1945年不是作为一个明确的选项存在,你认为自己会怎样做呢?你的选择提出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问题会相当不同,因为政治路线在历史中得到了清晰得多的描绘。在你那一代,共产党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必定像你一样对党的官方风格感受良多,制度化的说谎在冷战期间变得非常明显,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定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在党内。

是的。共产党在哈斯汀有一所房子,我搬到那里的时候,常常和他们一起聊天喝酒。那时他们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我对此的反应是:“你们怎么能留在这样一个党内呢?”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错的。他们没有为这种说谎行为向我辩白,他们仍然把我当做一个应该回到党内的人。但是在我涉及的任何工作领域之内,党的灌输完全没有任何能够让我尊重的东西。影响我做出选择的不仅仅是利维斯,《细察》实际上比利维斯本人更有意义,像现在人们所做的那样把二者等同是错误的。迪奈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的著作《路线之间》和《文明的声音》是《细察》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来

说其重要性不亚于利维斯——我们特别在课堂上吸收了利维斯对报纸和广告的那种分析。还有奈特的《琼生时代的戏剧与社会》，与利维斯的所有事业完全不同，它是根据资本主义出现的特定时代来理解特定时期文学的一种持续尝试，那段时期我始终在阅读和重读这部著作。我对它不满意，但是与利维斯当时写的东西相比，它似乎更接近我的兴趣焦点。

你对斯大林死后 1950 年代的英国共产党持什么样的观点？

当时我已经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它几乎是英国工人运动的类似再现，不过恰巧在其思想的个别领域与苏联有密切关系。与主要的工人运动相比，绝对没有理由说它对社会、变革或者其他事情有任何不同的想象。当然，我不是在说盖茨克尔^①主义，也不是在说自觉组织起来的工党“左派”，说的是普通的工党激进分子，那些真正维持地方政党运作的人们。如果你定期阅读《工人日报》的话就会非常清楚了。你总是能在《工人日报》上得到你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新闻——对罢工、各种社会保护组织、佃农协会或者社区关注问题的报导，它所采用的是与你直接共享的观点。与所有这些关于生活的详细情况并列的地方，你会找到关于保加利亚女演员或者东德体操运动员的评论。实际上前一个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一个连接外界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只要我重新考虑加入共产党，吸引我的总有它的那个因素。然而对工党“左派”的那种非常忠实的再现不仅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局限。我在 1945 年到 1947 年曾经以为党对英国的社会主义问题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答案，1953 年以后，我不再相信党在任何意义上有这些答案。它的解释太脱离现实了。

^① 盖茨克尔：英国政治家，1955 年以后任工党领袖，后来在他声望极高的时候突然去世。——译者注

我的意思是，不仅在关于苏联这一特定例子的解释中是这种情况，党在这方面受到约束。在关于本国的解释上他们也错了，错误极深。1950年代时，党正在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描述，只是它并不符合英国正在发生的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作为结束：在1947年到1956年的这一时期，你一定被其他“左派”人士问过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怎样描述自己。他们肯定会大惑不解。你是一个工党成员吗？你会说不，你不是。你是一个《论坛报》集团成员吗？你会说不是。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不是。你如何界定自己在那些年的立场？

那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是在回答党内人士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它无法进行任何简略的政治表述，真正的回答意味着把某些难于表达的东西说清楚。其他人这样说，“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党员，但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是或不是都不是正确的回答。他们甚至会说，“我们知道在哪里该与党员们站在一起，但是你就更糟了——一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在那些年的辩论中，那是他们给我指定的角色。

II. 文 化

1. 《文化与社会》

你能跟我们谈谈《文化与社会》的源起吗？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你对它的战略性考虑是什么？

《文化与社会》的整个写作过程几乎是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义和重新表述。最初的动力要回溯到 1948 年，当时艾略特出版的《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支持了我已经关注的做法：围绕以前似乎还不特别重要的这个词，把某种社会思想集中起来。当我于 1945 年到 1946 年返回剑桥的时候，在利维斯和某些人类学家周围，那种做法已经非常明显了。艾略特的著作迅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第一次开始考虑文化这个观念是在一门成人教育课程上，非常有意义的是，当时我讨论的作家是艾略特、利维斯、克莱夫·贝尔 (Clive bell) 和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作家。在 1949 年和 1951 年上那门课程之间的那个时期，作为相当偶然的意外发现，我认识到这个观念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当时我很清楚，由于这个词出现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因而在对那种经验及其伴生的所有社会思想的解释中，工业革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然而可以从《文化的观念》中看出，我对这一观念相关历史的认识远远得不到相关作家作品知识的支撑。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对那些特定作家的研究：直到 1954 年，我感觉好像还在到处调整各个文本之间的位置关系，不断地

添加新的材料。比如说,直到最后我才决定必须包括我称之为过渡期的 1870 年到 1914 年这一时期。

我写这本书的首要动机是什么?那是对抗性的——反击那些明确的反动立场当时对长长一系列关于文化的思想的挪用。对我而言,当时存在着一个问题,是该用完全否定性的方式对那种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我曾经考虑过这样做),还是采用适当的方针,不去试图恢复这一传统已经被挪用的真实复杂性,以便理解挪用的实际情况。最终我决定采取第二种策略。因为这允许我反驳日益增多的关于文化观念的当代用法,即以传统的名义用文化观念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或大众教育。通过那些对文化观念的形成和讨论作出贡献的思想家们的作品,可以对选择的文化观念版本从历史上展开反驳。其次,在我思想的背景而不是前台闪现了一种可能性——这或许同样是把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讨论和文学分析讨论集中在一起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偶然发生的是,这个方案的第二部分更应该属于我当时计划后续的《长期革命》,我一直把它看做次要的,由于它出版的特定时间却呈现了比我最初设想中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起初不是计划用来建立一种新的立场的,它只是一本反对性的著作。

《文化与社会》出版至今已经 20 年了。我们可以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和反对意见吗?这些内容是如今首次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会提出的,要知道知识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你在《文化与社会》中实现的那种极其引人注目的镇静与权威语气可能引起了一个可见的误差:读者往往忘记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著作。当你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 35 岁,然而这本书读起来仿佛不是你当时那个年龄的人写的。此刻,在 20 年后,我们对你自己当时对于此事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把这些集中在一个有秩序的讨论中吗?

好的,那很好。

人们常常首先表达的一个疑问是：在聚焦你书中讨论的那些作家的時候，你的选择原则是什么？你没有特别清楚地展示你的标准——似乎存在着一种隐含的假设，这些人物引人注目地写了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的东西，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然而某些忽略似乎非常奇怪。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简短的人物清单，但是格林(T. H. Green)和赫斯特(Hazlitt)是两个明显被忽略的例子。特别是格林，他是一个影响了其时代的主要人物，他写的东西差不多关涉到你所有的关键词——工业、民主、艺术，文化，他的著作毫无疑问比你在书中留下位置的麦洛克(Mallock)要更有价值得多。这样的欠缺似乎使你的描述面临某些现实的曲解危险，因为你呈现的不是对孤立的思想家的研究，而是对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对某种传统的连续发展的研究。你是怎样达成你在书中决定包括人物的名单的？

今天的许多读者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存在着从作者预先确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过程。现在可以发现，各种文章都不断提到“文化与社会传统”，仿佛它是在我在剑桥学到的东西，然后得到了批判性的评价。实际上，我得到适度良好的教育是在1948年，在我的认识里，使用过文化概念的作家不会回溯到克莱夫·贝尔或者马修·阿诺德之后。事实上我不可能像通常尝试进行这类研究那样，求助于任意一位学术权威——即使你不同意他们，他们至少可以描绘出问题的范围。没有任何范围。我必须自己发现卡莱尔(Carlyle)的文章《时代的印记》，对我而言它是唯一最为令人兴奋的启示，包含了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出现比猜测时间要早了40年。我还根据一条注释非常意外地发现了《教会与国家的建立》。确定与我的研究相关的作家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相当业余式的工作，从一本书读到另一本书，查查这个，查查那个，总是发现不得不修正我原先建立的结构。然而这本书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效果，读起来像是有人把某种业已存在的共同属性进行了选择和重新安排。这本书当时一直在做的就

是使它成为一个整体。现在的所有学生都知道1780年以后这一系列思想家的存在,这个事实讽刺性地体现了这本书的成功,它会让你思考并追问这本书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录。它当然不是。

书中最初的几章后来被删掉了,因为必须压缩这本书以便出版。让我提一下有关的记录。这些被删的内容包括第一部分的戈德温(Godwin)、第三部分的英国弗洛伊德学说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我很遗憾放弃戈德温。我对里德怀有敌意,因而对于放弃他倒不大在意,不过现在多少也感到遗憾,因为这部分内容与1960年代有关,当时对弗洛伊德的质疑在有关艺术的讨论中非常重要。对于你的提问,我有两个回答。忽略赫斯特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我对赫斯特非常了解,曾经是他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爱好者。我当学生时骑自行车到威姆,只是为了看看赫斯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后来我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强烈的改变,那是一种极有偏见的情绪,但是当时我不能控制,其结果是我根本不能胜任对赫斯特的分析。在另一方面,格林真的处于我的无知领域。现在我也会说,我忽略了1840年之前的许多小说或者诗歌作品。对华兹华斯的论述就非常不充分。你谈到简短的人物清单——实际上是非常长的一个清单。《文化与社会》不是我现在非常喜爱的一本书,不过具有反讽性的是,正是这本书的成功产生了对它进行批判的环境。

当代读者对这本书可能提出异议的另一个范围与书中的政治功能有关。我们想在许多层面上探究这一点。首先可以这样说,这本书的书名是《文化与社会》,文化和社会这两个词仿佛是基本的棱镜,通过它们,书中所有人物都作为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实例以及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的典型得到了理解。这本书在结束部分明显地改变了使用的术语,转向政治话语之类的内容。然而你在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讨论了现实传统本身,在那里对于你所讨论的人物所具有的实际政治

维度似乎出现了实质上系统性的忽视。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或许甚至是他们全体)对于当时的政治都有非常清晰、明确而且常常是重要的观点。然而这本书的许多部分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取消了,这种写作方式令人怀疑你对当时有多大程度的理解。这本书潜在的一个主题常常显现为某种对立,一系列思想家关于社会的核心思想,直接对立于可以用某种方式剥离并抛弃的纯粹政治表象。我们可以引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吗?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这本书的第二页,你在那里这样写道,“在政治和历史方面驳斥伯克(Burke)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只需一根小指”^①。那是一个极其轻蔑的措辞,暗示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而对这一问题没有更多的兴趣。但是,实际上,把驳斥伯克的观点看做是只需一根小指的工作,许多受到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还在自信地为伯克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辩护,把它们当做标准的真理。当你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在历史上得到完全的解决。随后,在讨论浪漫主义思想的时候,你这样说:“不过,在所有例子当中,与政治批判相比,现在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更为广阔的社会批判。”^②那是关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拜伦、布莱克和济慈的陈述。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判断。这些是19世纪部分的两个典型例子。20世纪部分的两个例子可以取自你对艾略特和利维斯的讨论。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的一些段落中,艾略特抨击了拉斯基(Laski)和艾德礼(Attlee),你在对这些段落表示遗憾的时候,用这样的措辞表示反对:“书中不足之处所导致的最重要的缺陷是,它们使得我们当中某些具有不同成见的人可以似是而非地拒绝这本书。”^③以貌似礼貌的伤害性语气,政治再一次被简化到最低的程度,简化为产生成见的精神食粮。随后,在你因为精英主义批评利

① CS, p. 24. ——原书注

② CS, p. 49. ——原书注

③ CS, p. 229. ——原书注

维斯的时候,你这样提出你的评价:“与其说它是一个表白政治忠诚的问题,不如说它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经验中声明‘这比那更有价值,要向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行进’。”^①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都似乎假定了,在必然是社会性的现实和从现实中识别出来的短暂易逝的政治属性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对立。在迄今引用的这些语句中,没有一个是你论证的结构重点,但是这种模式却一直持续着。这是你自己自觉的辩论姿态,还是说你在写出这些论断的时候,并不完全清楚它们会选择哪个方向?

并不是所有这些例子都属于同一类型。说驳倒伯克很简单当然是不对的——我当时非常了解伯克政治观念的当代版本。而且我现在不会用那样的句子写艾略特,尽管公正地说,艾略特对他直接抨击的那些人存在着很不严谨的具有成见的修辞。关于浪漫主义的例子则相当不同。我仍然坚定地确信,与他们对社会的思考相比,他们的政治思想极其无趣。我认为他们当中唯一不适用这个评价的是雪莱。这一点需要更多的论据来证明,我没有那样做,一部分原因在于1795年以后政治的矛盾性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通常背景。对它的讨论往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浪漫主义作家从支持到反对法国革命的转变,从年轻激进分子到老年保守派的转变,然而在我看来,时代的重大变化最终决定了所有的政治,浪漫主义作家试图把握他们时代的重大变化,这一尝试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对社会的集中感受比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观点要有趣得多。举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正如简·奥斯汀描述了英国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权领域里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变,与她所没有写出的拿破仑战争相比,前者是真正更为重要的。我的做法是出于同样的判断,并不是对政治普遍不予考虑。

^① CS, p. 255. ——原书注

然而在其他地方你似乎的确只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在结论中，你把属于这本书的传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790 年延伸到 1870 年，在这个时期里“主要的分析得以开始，主要的观点和叙述得以形成”^①。它后面是第二个阶段，你对它是这样说的：“然后，大致从 1870 年到 1914 年，出现了中断，表现较为狭隘，其标志是艺术方面特殊的专业化态度，以及在普遍领域内对直接政治的强烈关注。”^②这一表达把直接政治等同于较小的狭隘眼界，难道不是吗？

关于中间阶段的判断——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断，关注的是某些狭隘的东西——的确是错误的，真正的情况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它与关于莫里斯(Morris)的叙述具有内在的抵触。但是我认为，你现在突出的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准确地显示了这本书写作时那个时期的影响。我开始写作《文化与社会》是在 1948 年，当时我几乎完全不再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合作的可能性了。我所知道的任何集体事业，政治的、文学的或文化的，都中止了。后来在 1950 年代，我确实参与了某些政治活动，但是那时我已经得出一个我现在不再完全否认的结论：存在着这样一种政治，它的局部性战术模式绝对妨碍了人们理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有别于另一种政治（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中各个主要阵线力量的理解并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中进行立场选择的基础之上）。政治通常不是作为通过历史和理论形成的自觉斗争或者自觉策略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你是这样使用“政治”一词的），而是作为一种与论战或者利益争夺相关的常规再生产过程，它与深层的社会基础运动无关。当我写“浸透思想的政治”的时候，我在关于伯克的那一章试图表明这种区别，采取的方式是对比我自己正在经历的那种政治——具有反讽性质的是，当我写关于伯克那一章的时候，我刚刚从 1955 年大选的游说和演说中脱身。就我的看法，那是一

①② CS, p. 286. ——原书注

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它是在书中轻蔑地提及政治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以一种我既对其进行过分析又受其支配的语气进行表达以示优越，同样与我对当时政治的复杂性感到疲惫有关。

然而，还存在着做出同样批评的另一个层面。在你对书中不同人物的特定描述中，不再是对政治的笼统的蔑视，而是无意中的保守偏见。以两列人物为对照：一方是伯克和浪漫派，另一方是卡莱尔和莫里斯。你对伯克的讨论实际上在措辞方面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为伯克的“崇高主张”而感谢伯克。^① 在卡莱尔的例子中，你确实简短地批评了他的晚期作品，但是你仍然做出结论说他的“意图”是“积极的和高贵的”，完全的“敬畏”是“他的本性”^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赞成浪漫派的那一章结尾，你写道，“雪莱《诗辩》的最后数页令人读起来不堪卒读”，几个句子之后你重复了“不堪”这个词，然后评论说：“当我们回忆起这些人中任意一个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因为背叛而激怒地对其进行控诉，但是我们最好也能避免这种源于自我辩护的激怒。”^③ 同样地，当你讨论莫里斯的时候，你两次使用了一个你在别处用于科贝特(Cobbett)的措辞。莫里斯谴责牛津文化是“对知识的嘲讽和蔑视”，你在对其进行评论的时候说，“这是非常典型的莫里斯的方法，常常不过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誓言”；然后又说，“与对待科贝特一样，我们逐渐接受了作为其生命力代价的狂躁和仪式化的誓言，这种生命力自有其崇高之处”^④。

你在对待这些作家时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吗？伯克因为他

① CS, p. 39. ——原书注

② CS, pp. 90, 98. ——原书注

③ CS, pp. 63~64. ——原书注

④ CS, pp. 156, 160. ——原书注

的“崇高主张”而受到赞美，没有一处提及他对平等和民主的否定，正是对平等和民主的否定使他闻名于当时；其持续的主题是在人民中间灌输“自然的从属法则”的需要。他的主要文本的目的是什么呢？阻止英国革命——正如你最近在塘鹅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散文》导言中所说的那样。^①更不必说伯克积极狂热地致力于针对法国革命的军事战争了。在卡莱尔的例子中，似乎不能理解你能如此毫不犹豫地把“敬畏”说成是他的本性。卡莱尔是一个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他在艾尔总督论争中的角色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甚至早在1840年代他就写了一篇关于“黑鬼问题”的评论，关于那些事件，那本书中的任何其他作家都没有写出一篇像卡莱尔那样可怕的文章，你并没有谈到这些。然而，你随后斥责了雪莱“诗人作为立法者”这一过分但却无伤大雅的主张，你发现有必要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背叛而激怒地对其进行控诉”——毫无疑问他们绝不是适当的“控诉”对象。然后我们举一下莫里斯的例子，你用“大而化之的誓言”来指责他，难道不可以说他倾向于直言不讳吗？当然，他可能以强烈的气势做出了公然的抨击，但是除了对其政治目标的欣赏之外，他的语言从来没有达到卡莱尔所运用的那种激烈的程度。

哦，你说的显然是事实。我不想断言这种对比是恰当的。我不认为如此。不过这些段落是有区别的。我把莫里斯作品中的某些内容称为“大而化之的誓言”，对我而言，现在似乎仍然如此。誓言仍然是一种很好的举动，但是把誓言大而化之，变成一种矫饰却是错误的。“如果吁请‘好汉们’的仁慈、放过他们没有时间加以摧毁的几幢古城建筑还不是太晚，我愿意向他们请求”^②——任何一个在牛津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这样夸张的说法阻挠了其目的的实现。在卡莱尔

① PBEP, p. 28. ——原书注

② Citation from Morris; CS, p. 156. ——原书注

的例子中，我确实把他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作品删略了。我很清楚他那时已经出现了转变，我把这种转变称之为《枪击尼亚加拉》的“令人鄙视的专制主义”。如果现在写这本书，我想我不会收回对卡莱尔的评价，当然我会以不同的参照点来做出这一评价。

你真的坚持这样的结论吗——“其缺陷与这个人和他的影响一样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有一个他经常使用的词一直在表现他的本性：敬畏”？

不，我承认，尽管我谴责他的晚期作品，但我并没有用他的晚期作品来验证我的总体判断——这是一个失误。然而，其实更加应该关注的是我在有关卡莱尔的评价中没有把握到的环境。因为在我看来，卡莱尔在《时代的印记》中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敏感点，其他更为进步的思潮当时正在规避它，并且在那个世纪剩下的时间一直在规避着它。那就是，不管反对工业革命的理由是根据它所带来的彻底的无序与混乱，还是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必然形成的政治斗争，对工业革命的反对程度掩盖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各种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影响了人类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随后更为进步和值得接受的传统观点来看，这些关系反而被遮蔽了。在此意义上，卡莱尔失败地陷入那个世纪最坏的某些思想实际上本应该被当做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发展。这种思想出现的环境需要得到解释——像我在自己关于奥威尔的书中所做的那样，包括看看在其早期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因素预示了其思想上的失败。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对足够多的 19 世纪进步思想家和反动思想家进行了编组：作为一个本科生，我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卡莱尔写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关于这本书已经湮灭的部分往事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几乎毫不费力地涌至笔端，然后我又收回了这些看法。我发现了一些主题，它们与我对我的时代

的社会危机和走出这种危机的社会主义途径的理解深深相关，它们不是存在于被认可的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而是存在于这些自相矛盾的人物的思想中。我当时过于强调了这些作家价值观的作用，这些价值观的最终发展把他们引到了一个极其不同的方向。最可靠、最公正的做法是就每一个思想家进行充分和清楚的论证，说出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在某些例子中我这样做了。关于劳伦斯那一章完全是以那种方式处理的。对于劳伦斯，我现在要说的话不会还是那样，然而我当时不可能用与现在同样的方式思考这些人物中的任何一个。

应该说我们的讨论始于这样一个前提，这是一本有必要重写的书，它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思想解放方面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要问的是，20年后，你自己是否认为在这本书里存在着特别明显的不均衡的地方？

你要记住我也读了自己的书，在爱挑剔的读者名单里我至少应该名列其中。在我看来，《文化与社会》是这样一本书，它退出一切直接的合作形式，打上了令人讨厌的消极烙印——且让我使用词义这么强烈的话——兼有一种得不到任何合作的强烈失望，这种失望最终对这本书的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本书的时代创新在于某种更新了的信念，它与上述那种失望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没有进行任何智力合作的方式，我才可能转换成这样一种语气，其效果是一个知识分子退出直接政治并充满希望地考虑深层次力量的自我辩护。我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当时在事实上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注意到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说，通过退出直接政治，我能够再次引入某些主题和议题，在我看来它们是现实中最能产生效果的关键要素，然而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常规政治而言，它们是缺席的。换句话强调一下，作为可观的代价，每一次这种退出换来的是对某种深层次力量的关注。其结果是，我可以用我至今仍在思考的东西为某种不同的政

治作出贡献。现在,当我听到以教条主义者进行诽谤的熟悉语气发表的陈述,说《文化与社会》传统的再次引入仅仅是改良主义的复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会好斗地说,导致了分歧和混淆的这些缺陷之所以令人感到遗憾,主要是因为它们允许某些左派人士(最近一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使我想起193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继续规避这本书试图再次引入的真正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是什么的重新定义以及对所有层面政治力量的重新动员。当然,如果这本书真的能够把所有这些都解释清楚的话,它就会是一本更好的书了。

我们向你提出的疑问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框架之内的,即这本书像任何一部作品一样,本来是可以写得更好的。

喔,我欣赏《文化与社会》,但我不认为这是一本现在我还会写的书。我对写了这本书的那个自己不是很了解。现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在读其他人写的书。它是与我现在的思想差距甚远的一本书。

不过它仍然与英国现在的社会主义论争关系密切。那就是获得一个关于它的当下观点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需要。存在着第三个层面,书中在这个层面上提出了关于政治的问题,那是最为重要的层面。^①与其说这涉及你关于特定人物评价的权衡,不如说它涉及了这部著作的主要结构和总体组织方式——尽管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最大的敬意给予了哪两个人物?无疑是伯克和卡莱尔。伯克和卡莱尔的追随者实际上主要关注的是哪些重要作品?是关于法国革命的作品。在每一个例子中,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些作品的意图都是强烈反对1789年

^① 前两个层面是文化与社会。——译者注

的法国革命,指出它上演的一切都不允许在英国发生。现在应该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政治不能被视为与深层社会思想脱离的对于特定时期的一系列短期评价,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对站在这一传统保守一方的人做出过于慷慨的评价或者对站在这一传统另一方的人做出过分限制性评价的问题。它涉及更重要的东西。在关于卡莱尔的整个一章里,你忽略了他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在写伯克的时候,你遗漏了他对法国革命的抨击。你当时以这种方式所做的事情是在坚持你自己形成的研究领域的独立。你叙述 1780~1950 年的方式显得关于工业革命和文明与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仿佛存在着某种单一的话语。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期,从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一刻起,另一场革命也发生了,那不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而是法国的政治革命。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从来不是存在于两个完全隔离的领域的事件。浪漫派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模式非常广为人知。确定地说,不仅对于 1789 年第一次法国革命来说这是符合现实的,对于 1848 年的第二次革命也是如此,对于米尔(Mill)或者阿诺德来说,后者是决定性的事件。甚至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在英国政治中也是一个重要事件;想想乔治·艾略特对它的反应吧。在你书中开始的地方,你挑出 5 个关键词进行说明。其中两个,民主和阶级,如果不主要参照法国革命和英国在统治阶级、政府与军队、知识分子和大众态度等不同层面对它的反应,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范围内得到实际的讨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就是真正的缺陷,《文化与社会》似乎以这种方式把政治这个中间词给排除在外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想这一失误源于这本书最初的策略,即恢复一种特定的传统。结果在表面上反映为一致性的话语,它妨碍了我把前后相继的思想家与他们的历史重新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我在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的历史知识方面存在着不足。当我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候,如果我读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成》，写出的书就会非常不同。然而当时的部分情形是，在我写《文化与社会》的同时，爱德华正在写关于莫里斯的作品，然后做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早期工作，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却没有联系——因而这些关键的结合从来没有形成。

举例来说，现在我会写 1790~1840 年间各种激进主义的显著转变，而在那本书中我根本没有提及它们。为什么我不应该让自己对赫斯特的反对阻止自己把他写进书中，原因之一在于通过写赫斯特我本来可以探究激进主义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主要体现。对我来说，另一个带来强烈启示和遗憾的时刻是，我发现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写作是为了回应 1866 年选举权运动中的海德公园骚乱，在这场运动中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主要站在另一边。当我看到这就是阿诺德给“无政府状态”和“文化”做出政治定义的背景，我想，上帝啊，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可能以 1867 年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问题作为这本书的开端，这其中会包括你提到的艾尔总督论争——我本来可以从那里开始的。事实上，这本书源于 19 世纪保守派思想家及其对立思想家们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的来源也包括 20 世纪的一些保守派，在突然进入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时刻，他们对它提出许多恰当的问题，但是却给出了显然错误的回答。这些思想的来源还包括那些与我有某些共同倾向但却在 20 世纪走向明显反动立场的人，比如利维斯。所有这些都把文化概念用作展开其思想的一个主要术语。在重新发现这一概念并重建围绕它的话语的过程中，我允许了某种程度的历史抽象，因而没有足够有力地贯彻这本书的一个革新之处：只有回到词语在历史中的各种意义变化，你才能精确地理解词语本身。这正是我现在要说的话，我甚至在《关键词》里把它构造成一种一般性的理论。然而复原关于某一词语的话语是如此困难，它就是我当时大致能够达到的程度。当时，我从来不知道有哪本书从头到尾看起来更接近它。我

觉得这本书已经完成了,这是我曾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感受,我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可以继续前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是我的书中得到最为广泛阅读的一本,每个人都试图把我拉回到这本书来。

但是阅读这本书的人确实把你的名字与社会和政治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对这本书的批判性讨论还是非常值得的,它并不一定把你拉回到这本书来。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时对它的观念或写作是不可预见和预期的。它恰恰出现在飞快的政治变动局势当中,新的问题在这种局势当中被提了出来,随后新的时期阶段则围绕这些问题显示其特色。作为一种结果,这本书被赋予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得的重要性,因为它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留下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阅读和思考。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重要性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个时期,环境是非常不同的。当时新的期刊和俱乐部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变化讨论的观点,随后就出现了看上去非常扎实和名声鹊起的这本书,在它产生的那个阶段,我正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毫不奇怪这种矛盾终于在后来浮现出来了。例如说,最近对《文化与社会》进行了广泛批评的伊格尔顿在继续重构这本书中的讨论,将其一直延续到1968~1969年,与他对这本书的强烈反应相比,他所采取的方式更加激怒了我。如果你看看《从文化到革命》^①中对艾略特、利维斯和我进行比较的那篇文章,你会看到他只是在10年后把这本书再次简单地展开而已,那是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一本完全不同的书。《文化与社

^① “The Idea of a Common Culture”,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 edited by Terry Eagleton and Brian Wicker, London, 1968, pp. 35~37. ——原书注

会》也许充当了从一个时代通往另一个时代的桥梁,但是现在人们忽略了它只是一个桥梁。许多美国读者现在仍然说,哦,是的,我们赞成你的立场,我们读了《文化与社会》和那些东西。我说那不是我的立场。他们会说那仍然是一部非常激进的书,我说好吧,是最初阶段的激进主义。这本书大体上做到的是使阅读文学和研究社会思想史的人改变了正在写作和讨论的内容。它容许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思想传统与文学传统重新联系在一起,后者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已经受到《细察》及其整个群体结构的阻碍。

这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问题。这本书的一个不同常规之处在于,它讨论了对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社会进行思考的一些人物,这种讨论是通过对他们个人所涉及的现实社会历史和他們与各阶级的联系进行非常概括性的抽象而得以完成的。当然不是全部都这样,因为在劳伦斯的例子里你确实引人注目地恢复了那一背景,然而对其他思想家的讨论却是非常脱离社会现实的。当时,维克多·科尔南(Victor Kiernan)注意到了这一点,它在发表于《新智者》的一篇对这本书的友好评论中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杰出的作家是如此众多的苦行者,每个人都孤独地栖居在他的柱子上。有时把他们看做是家族相册照片中不起眼的第二排人物倒是很有助益的。因而可以看到骚塞、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被包围在一大堆亲戚之中,做海军的兄弟们、做律师的堂姊妹们、做牧师的叔伯们,包括那些真正名副其实的家族名人——他们正在走向像法官、主教或者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位”^①。换句话说,科尔南在把注意力引到这样一个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存在着类似职业中产阶级的阶层,这一阶层可能已经产生了大量你

^① Victor Kierna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New Reasoner*, No. 9, Summer 1959, p. 80. ——原书注

当时所写的那种知识分子。他接着说，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受到自己理解的束缚，认为存在着这一阶级专有的现实物质利益。科尔南举例论证说，与商业和其他领域的同胞相比，当时大多数作家对政府的态度显然更加纵容和肯定，这种情况可以与下面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的英国，政府是知识分子的主要雇主。他还指出，尽管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谈了很多关于工业化的问题，他们对佣工问题却谈得很少——然而在整个19世纪，工厂工人的数量与家庭佣工相比要少一些。你是故意把这种批评撇在一边了吗？我们这样问是因为你在《长期革命》中写了有关英国作家社会史的一章，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对那一问题进行了准确无误的考察——家庭的起源，教育经验，英国知识分子在大约四个世纪里的职业。那可是把有关“左派”的传统讨论极大地向前推进了：在这里可不止是通常空洞的笼统表述——它是一段真正实质性的历史。然而在《文化与社会》中这种实质性的历史却是缺席的。这是你的故意选择吗？

不是，那不是事实。我想，当时有两重妨碍阻止了我实践这种观点。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抽出这些作家作为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倒不是这种叙述必然是错的，而是说我知道，如果你从那种抽象的叙述出发，你甚至不必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读一下关于他们的抽象叙述就行了。另一个难题在于这些作家在阅读环境中的社会影响。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在所有这些作家中，雪莱、拜伦，还有骚塞，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都享有非凡的声望——或许对于19世纪晚期的工人运动来说，罗斯金(Ruskin)本应该也是这样极其重要的。我不知道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同时，你一定不要忘记，我受到专业训练而形成的思考方式把这些问题排除在外了。显然，一个人在学术上受到的训练是研究单独的作家——这毕竟是《细察》中的大量评论文章与传统权威人士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不过，你因此当然能够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结束，想象一下所有

这些伟大作家同时出现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伏案工作,你只需注意他们正在写的东西。实际上,我在《文化与社会》中的工作充当了一种刺激因素、一种自我激励,使我完全离开了那种模式。反讽之处在于,当我正在阅读科尔南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刚刚完成了关于英国作家的社会史研究,那就是我继续写作的作品,它最终恰好突破了那个关于文本和从文本出发规定文学研究的观念。我在《文化与社会》中还不是这样写作的。然而当我有能力这样写作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呢?不过是一种恢复文本独立的新的激进运动。它又花了我们10年时间进行反击,但愿我们已经成功了。

回顾一下,在一个极为不同的基调上,这本书或许可以说与共产党在1940年代晚期到1950年代早期某一阶段的文化政策具有可以辨识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它在政治层面上正围绕那个时代描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与此同时,至少党的一份文化机关报《竞坛》,也在开始为党描述本民族的过去——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治的文化谱系。你当时意识到在你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计划与《竞坛》的论述之间存在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或者说,你后来思考过这件事吗?

简短的回答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任何相似之处。然而我认为,把这两者看做是相似与关联的历史回应完全是可能的——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要素。但是你不能走得太远。我非常了解我在写作中反对的那些右派:艾略特、利维斯和围绕他们形成的整个文化保守主义。这些人已经预先把持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那个意义上,这本书弥漫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民族意识。它以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表现为“民族的”,因为我刻意保持它的英国性。当时我与威尔士的疏隔到了最彻底的程度。然而,我的威尔士经验仍然在潜意识中作用于这本书的写作策略。当我用对于协作共同体和团结的讨论来结束这本书

的时候,我真正在写的是威尔士的社会关系——仿佛它们是可以普遍实现的。我非常倚重地利用了自己关于威尔士的经验,正确地把它定位为工人阶级习俗的一个明确特征,但是没有充分展现地域性的背景,没有对于历史差异和历史复杂性的认识。

《文化与社会》的民族阐释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你早期的批评著作《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因其超越国界的视阈和范围而值得关注——你在论述中把资产阶级戏剧兴起的经验当做一种必须如此加以讨论的欧洲现象。把你的研究限定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之内没有问题,但是在《文化与社会》中却根本没有可以对比的国际性维度。那似乎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即使工业化始于英国,工业化的过程毕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欧洲式的。为什么你把自己局限于对一个单一民族传统的说明呢?

我想,原因在于我这个计划的最初构思是对英国特定形势的一个相当简略的回应。后来它扩展得越来越大,以至于要进行巨大的努力把它变成一本书的适当形式。把它构成一本书的目标限定了它作为单一文化内部的一种讨论。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本书中对一切国际性讨论的排除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限制,它影响了你的某些论证内容。毕竟,《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关于文化的观念是英国的重要传统”^①。如果情况不像你设想的那样会怎样?事实上,《文化与社会》的全部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欧洲社会学自创建之时起的主要主题——那是你根本没有提及的思想体系。如果你看看戈兰·余柏(Goran Therborn)的研究《科学,阶级与社会》,它所呈现的是,这一学科从孔德和圣西门直到

^① CS, p. 271. ——原书注

韦伯或杜克海姆的轨迹都决定于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始于法国的政治革命所导致的两个孪生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对于19世纪重要的社会学家来说，两个关键问题在于市场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民主的威胁——这正是从骚塞到阿诺德的英国作家热烈讨论的同样问题。更为惊人的是，二者的反应非常相似：面对工业化和民主的瓦解力量，传统社会学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的矫正手段总是一种更为朴实和自然的有机文化——由某些一致的价值标准所构成的秩序，它可以赋予社会某种新的意义，造成社会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文化的观念绝不是特定属于英国的。实际上，在深层有机“文化”和表层机械“文明”之间的众所周知的对立是德国人提出的。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如果你接受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关于非政治人的反思》，你会发现被看做文明和民主的是英国和法国，而德国才代表了真正的文化传统。这正是第二帝国的官方宣传主题之一。

后来，在你这本书的结尾处转向了关于共同体的观念。尽管这些作家可能使用了共同体这个词语，但它不是一个把你所讨论的英国作家组织起来的中心主题。然而，它恰好是欧洲社会学思想中一种重要理论的直接对象。托尼斯(Tonnies)把“共同体”(社群)和“社会”对立，事实上对“共同体”概念作出了贡献，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余柏实际上综合了托尼斯在研究“思想共同体”范畴中的发现，所谓“思想共同体”是一个与各种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绑定在一起的共同体，余柏指出他的发现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显著成就。这与你对“共同文化”的呼吁在形式上的类似是引人注目的。这段长长的有趣记录与你当时试图重建的传统以及你从那一传统中形成的话语是否存在关联？

国际性参照的欠缺不是某种个人的忽略，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思想方面的普遍状况。在当时甚至都不太清楚柯勒律治与德国唯心主义

和浪漫主义的联系是多么深入和密切——就其与事实相符的意义来说,那并不掉价。对于米尔与法国实证主义的联系也是如此。某些专家肯定知道有这些思想,然而它们不是人们习惯于阅读和思考的那些观点。现在,这些都十分明朗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我现在对欧洲的社会学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审视一下这种传统,我想我会说,与我所关注的英国传统相比,市场和民主是欧洲社会学传统中更为突出的主题,而英国传统则对工业更加明确关注。在英国,大部分直接反映在社会思想中的是迅速无情的工业化经验,比较起来,英国对民主或市场思想的贡献要么是次要的和衍生的,要么在重要性和广度上被别的思想超越了。然而,在布莱克、华兹华斯、骚塞和青年卡莱尔生活的时期,工业化转变过程已经完成,对这一过程的思考尽管还不成熟,比较混乱,在我看来仍然是极其重要的。那一时期人们对工业化的整体性质及其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产生的后果提出很多问题,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相比,科贝特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追问更加执著,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有待回答。《城市与乡村》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现在,除了某些显然反动的方面,一个随后范围更大的传统并不把这种形式的思想当做一个重要因素加以充分考虑。可以进行一下对比,我在1930年代就知道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未能进行生产,因为它对大萧条是有责任的,相反,苏联的形象根据其工业生产力被提升到滑稽的程度。对于这样的说法,等待它的是战后资本主义积蓄力量产生的新的生产能力的迸发。直到那个时候,布莱克或者科贝特提出的那些问题才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认识到了生产的物质性,这种认识此后却不为人知了。我们都知道劳动过程,但是我们对劳动过程的实际步骤或者劳动过程的副产品却所知甚少,而后者当然也是产品。在英国人对工业革命的那些混杂反应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反应,依我看来,在那个世纪的那个时期,任何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做

出这种反应。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抽象地谈论生产,不能像这些人一样,真正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理解工业化转变。非常奇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那个方面应该理解的是历史而不是物质。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的过程是非常鲜明的。

然而,你根据纯粹的民族条件来组织这本书,引起了进一步的后果。这些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空间在哪里?显然只能是在你讨论1930年代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并且他们的观点严格被限制在艺术话题之内。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本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当然恩格斯也是这样——他致力于英国工业革命主题的写作方式与其同一时代和其后时代的任何人都不同。他的写作涵盖了你著作中的全部主题范围,当然在整体生活方式的意义上(借用你的话语)也包括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他同样掌握某些东西,能使他从你所讨论的所有这些人物中进行分辨,这些东西是对辩证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历史互补性的结合,即市场话语和文化话语之间的结合。你大概很清楚在《大纲》^①中马克思实际上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越它自身与浪漫主义观点之间的对立,后者将会作为它世袭的对立与它共存,直到它的灭亡。”

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兴奋。但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马克思是非常清楚的,^②他可能敏锐地认识到了你所讨论的许多人物的重要性,就像认识到了站在对立政治经济立场上的人物的

① 即《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译者注

② Karl Marx, Grundrisse. Pelican/NLR edition, London 1973, p. 162. ——原书注

重要性一样。他不但关注李嘉图,还极为关注卡莱尔。客观上,他以最为直接可能的方式被放入你的研究领域,唯一需要限定说明的是,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们没有一个知道他——当然对于莫里斯来说这不是事实。然而,以严格的民族条件来构建传统,你必然不能把马克思写进去。这一删略是人为的。如果这本书包括一章关于马克思与工业革命的内容,读起来就会极为不同了。你当时肯定考虑了是否这样做吧?

是的,我这样考虑过——特别是当我正在设计关于工业小说那一章的时候,最初本来是要说明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全部反应。下面的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格斯和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在同一时刻的曼彻斯特都很活跃,如果说他们没有通过皇家统计学会进行联系,那似乎是不可能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毫无疑问是对1940年代最为雄辩的社会控诉,因为它的构思是最为广阔的。但是这样组织我的作品存在着困难,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这里完成他们的著作的,但却是用另一种语言写成,他们没有写我所写的那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流亡的孤立状态。当我开始讨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的主要兴趣在于那些已经大大被转变了的讨论。我正式引入说马克思是罗斯金和乔治·艾略特的当代人,但是非常严格地说,在那个时期我谈论的只是艺术理论。如果我把马克思插入进去,我不知道这本书会变成什么样。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完成对马克思作品的全部阅读,至少我像阅读其他任何一个人那样读了他的很多作品。你说的完全正确,如果把马克思写进去,将会从根本上改善这本书。另外我还这么认为,如果我呈现了现在看来值得写的各种不同的倾向,那么这本书现在会仍然处于写作之中……

还有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文化与社会》缺少国际性维度的另一个说法，那就是这本书在民族之类问题和主题上的缺失。有大量的理由说明问你这样的问题不是毫不相干的。可以相当简单地提出一个理由，这本书结尾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共同体的观念。现在共同体这一概念有许多不同的意义，然而可以有把握地说：在 20 世纪，共同体这个词更为频繁指涉的可能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而不是其他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群体——地区、阶级或者任何国际性实体。至少在当今的官方语言中，与其通常联系或相伴的词语非常明显是民族。

当然，《文化与社会》并不包含任何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直接反应，不过如果我们看看你写的这些人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确实谈论过民族——“他们的”民族。伯克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不仅仅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宣言，它还企图激发针对外国威胁的爱国情绪，它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发起的极其成功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在卡莱尔的作品里，你发现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其锋利的刀刃转向了这个殖民帝国中的黑人和臣服的殖民地人民。这些例子还有很多。你所描写的 1790~1920 年之间的社会不仅是第一次重大的工业革命发生的地方，它还是地球上第五个在肉体上进行征服、吞并和剥削的社会，创建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帝国。这一历史进程根本性地呈现在你所讨论的所有那些经历了这一时期的人物的意识当中。民族问题不是某种次要外在的东西——它绝对是构成英国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整体性质的要素。对于一个站在外部考虑英国社会体验的人来说，比如说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或俄国人——更不必说牙买加人、尼日利亚人或者印度人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你问问他们会把什么与 19 世纪的英国联系在一起，他们当然会想到工业革命，但是他们更多地会想到英国强权下的世界秩序。

如今在《文化与社会》中，无论如何只有一个句子间接提到了那种体验。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共同体的理解进行辩护和说明的时候，你在

最后说：“有时这受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局限。”然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许多方面主导、支配着关于共同体的定义。从你所说的你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意识来看，显然自你少年时期以后就一直强烈地意识到英帝国在国外的霸权和压迫以及存在着的反对它的殖民地斗争。然而这些在这本书中都没有得到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我们进入实质性的问题之前，先让我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辩护。在这本书中，实际上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帝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证实了你所概括强调的东西，那两个地方分别讨论了卡莱尔对移民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判，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中离开帝国的神奇功能。但是其他方面就没有任何关于帝国经验的部分了。我没有在帝国经验的背景上讨论迪斯累利，也没有讨论米尔与印度事务部的联系以及费边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核大关系。甚至引起我现在极大兴趣的一些内容也没有在书中出现，例如对小说中的帝国经验进行深入持续的陈述、再现和批判。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我的某种特殊经验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在一边了，它本可以使我能够更加密切、更加批判性地对帝国经验进行思考：那就是威尔士经验。我使用共同体这个词的方式实际上停留在我威尔士记忆的基础上，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然而威尔士经验也正是屈从于英国历史扩张与同化的一种经验。那本应该很好地警示我共同体的游说式定义的危险，那种定义曾经是支配性的、唯一的对共同体的定义。

在历史上，英语中作为一个术语的共同体在意义和使用上其实都是含糊不清的。1830~1840年所有对这个词的早期定义都带有“共同的”这一词根，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共同体这个词是有意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各种理论形成对照。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共产主义者”在英国仍然意指建立各种共同体的信奉者，取其乌托邦意义。所有这些意义在20世纪发生了极大的改变。1930年代和1940年代，

“共同体”这个词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威尔士，在非国教派的客观现实中，这个词还具有一种宗教的意义。然而到了1960年代，我开始不断地听到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一小群人——比如说罢工者——的利益之上，置于其对立面。这引起了我的反思，这个词是不寻常的，它使人能够进行社群区分：一个人从来不确定属于这个观念所指的某个群体的组合。我忽然意识到，没有人曾经在敌对的意义使用“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它是多么危险。

是的，在德国，铸造了这个概念的托尼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党有组织地利用了“民族共同体”这个词，作为他们在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第三帝国内部面向工人阶级宣传的核心思想。很少有观念显示出如此的可塑性。

我认为原因在于这个词允许对其含义进行不断的删略，以与其他概念保持一致——在这些概念中，首先就是民族和国家。就民族这个概念而言，我记得对我来说它的功能发生突变的时刻，当时我正在阅读利维斯的一段文章，文中他再次开始谈到“固有的英国性”。此后，我不再愿意用英国人作为大陆人民的同义词。形容词“固有的”泄露了词语的运作过程。随后我也同样理解了文学的这种现实意识形态功能，它与特定作品的任何可以具体指出的功能都无关。整个有关民族文学兴起的观念，通过文学对一个民族进行界定，把文学视为民族精华或者民族精神的文学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对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持。我所能说的是，当我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候，我还没有理解这些。

国家概念所造成的混淆甚至更加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模糊使用“共同体”或者“公众”这样的词语所导致的混乱影响——就像在“公有制”这个词中所体现的那样，不仅我个人，所有“左

派”普遍都习惯于把社会主义进步等同于国家的进步。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术语，“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建立在“左派”的一个假设基础上，即民族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实体。换句话说，我们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最近10年最受欢迎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个别介绍毫无疑问是对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重新关注。所有这些词语的含义不再那么容易被删略了。我自己不会再像曾经在《文化与社会》中所做的那样使用“共同体”这个词。

让我们转到另一个话题，我们想提一个与这本书的认识论有关的问题。它涉及你对书中那些不同思想家进行评价的方法。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你似乎在把各种观念和论点与你称之为“反应”或者“经验”的东西加以对比或对立。在你对伯克的处理上可以找到第一个例子，你是这样谈到伯克的：“这些观念正确与否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们的真理性最初并不依据它们在历史理解或者政治洞见方面的有用性得以评价。伯克的作品是一种表达清楚的经验，如此就具有了某种合法性，甚至在它的一般性结论被摧毁之后仍然可以幸存下来。”^①我们通常把那种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或政治的观念作为真理来理解，而较为深层的更加持久的经验并不必然与任何通常论证的真理一致，这里在这些观念和和经验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对立。同样的主题再次出现在你对柯尔律治所下的结论中：“像柯尔律治提出那样的整个立场是不能深信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因素。一个像柯尔律治那样的人最多可以提供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不过，如果能够达到可以认清柯尔律治立场的程度，也就能够认识到，一个实际例子事实上是能够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②你对卡莱尔的结

① CS, pp. 24~25. ——原书注

② CS, pp. 81~82. ——原书注

论是非常相似的：“对卡莱尔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其直接反应的性质：措辞、表达、观念的结构形态是次要问题。”^①这些段落似乎贬损了理性判断的通常标准——我们用以确定某些观念正确与否的常识。这些段落的倾向令人非常迷惑：同样的暗示并未出现在你作品中的其他地方。对这些段落的解释是什么？在写米尔的时候，你说：“当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关键之处，在‘它是真实的吗’和‘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人会怀疑是否存在重要的区别。”^②但是通常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极其不同的。我们首先会问一个观念：“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是真实还是虚假的。看到你把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是令人不安的。这里不存在滑入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吗？

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深层次问题。你所引用的这些段落显然归因于我的文学训练——我所被教育的阅读文本的整个方式。因为这些都是阐释诗歌的常用术语——而非用来阐释其他作品的术语。读者的首要责任是对诗歌中清晰呈现出来的经验或事件做出反应，那些经验或事件比能够在诗歌中发现的观念或信念要重要得多——关于这些观念是否真实或者它们有什么其他意义的问题完全是次要的。我艰苦习得的文学判断程序是面对经验时采取某种延缓决定的状态。我在《文化与社会》中所做的就是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各种作品。这些作品呈现了一些极其不同的问题：不仅是相对简单的关于真僞的问题——当然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关于作品中各个观念与论据之间的协调与联系的问题——例如这一部分在与那一部分的联系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你回顾一下我先前说过的某些内容，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有助

① CS, p. 85. ——原书注

② CS, pp. 69~70. ——原书注

于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围绕那些敌对思维模式出现的。我早年对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否定性回应。《文化与社会》的写作是针对那种做法的一个反动。有意思的是,以我的观点来看,你引用的那些判断所涉及的人物全都是反对派的人物。我自觉地努力去理解像伯克或者柯尔律治这样的人的看法是什么。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我在写这些人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正在完全用他们的话语考虑事情,以至于我几乎变成了他们。这被作为该书的一个特点而加以称赞。虽然我现在对此不会评价过高,但是当时我既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这是阅读他们的正确方式”,又觉得“这是荒谬的,我真的做不到”。然而,我当时发现自己正在非常深入地沉浸到材料之中,控制自己的写作不再重返一直重复的写作模式是一种积极的尝试。我认为这能使我比用其他方式更为接近这些作家的某些观念。我确实意识到以这种方式处理艾略特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他,我在写作的开始几乎立刻采取了狂暴得多的语气。可是如果我改变自己的一般性原则的话,我看不出讨论会终结于何处。人们一向被告知,如果一个人偏离那种原则,就会完全脱离与文学的关联。

实际上,如果你抵制那种阅读特定文学类型的模式,你就必须否定许多别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必须抵制它,但是涉及的重新评价的任务比采取第一步行动时所考虑的要大得多。我后来在《文化与社会》中对瑞恰兹的批评实际上开始确认了它的不当之处:感受的被动性质与热情主动的读者之间的悖论。我现在相信,如此根本性地显示了该学科特色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明确关系是不能成立的,是有害的。这种由被动—主动读者(passive-active reader)构成的理论立场必须放弃。当然,任何替代性的方法必须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建构。否则,有人就会分辨出,在一个不太专注且较受限制的解释中,关于真假、善恶问题的解决是多么草率。

在评价一首诗或者一部自传的时候,强调清晰表达的经验不一定是适当的:为什么要完全放弃它呢?在政治或社会论争中持相反的观念才是危险的。

我现在甚至不愿在可以保留的肯定意义上使用同样的词语,比方说在一部自传里。但是,大量作品历经某个特定时期得以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在某种层面上它真的是关于某种生活经验的清晰表达,这种生活经验以其他任何方式都是无法获得的,除非通过一个人自己直接在当下时期的体验,即使这样也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程度。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对特定个人在任何时间点上所进行的写作构建都无法简化为关于他的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无法缩减到他是某种事物的象征的程度,无论他是恶还是善,无论他是对还是错。我当时可能比现在更加重视这种看法。我不认为它是可以用一部作品支撑的某种联系,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来自过去某一时期的无法简化的例子来想象这样一种联系:不是在各个党派分崩离析和所有倾向性观点得到解决的时候,而是当这些观点处在一个人思想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抵触的过程中。除此之外,过去的时期就难以接近。有这样一些说明,它们对全部结果进行概述并说那就是某个人所代表的东西,与这种说明相比,我认为我总是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人的作品中内在实际进程的固有矛盾与混乱。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批评和反对,对整个《文化与社会》传统的重构已经是一个不朽的成绩。对于今天的任何一个读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那一传统的确立都是不可动摇的。那就是事实的真相。与此同时,这本书还有另一层令人关注之处,就是你对这一传统中特定人物的评价。这不是一个次要问题,因为这部作品的许多力量来自你处理一系列思想家时极其微妙精确的理解,离析出了他们每个人特有的难题或困境。当然,你并未对任何人给予完全的认可。也就

是说,对于特定的评价,每个读者将会有他们自己的一系列不同意见。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询问,你现在对伯克的感受是否仍然像过去那样?

一点也不。因为我现在了解了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英国激进分子,伯克当时所回应的不仅是法国革命,更是他们。这使我对伯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即使从一种相当简化的理性主义观点来看,英国激进主义也对这一传统做出了它自己的贡献,提出了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你可以通过环境改变性格,所有错误与不公正都应当以一种社会性的观点来理解,因而也应当在它与更为复杂的经验的遭遇中、当行为准则被打破的时候来理解。与伯克的遭遇相比,那种遭遇更加引人关注。我被迫漏掉的戈德温正是体现这种行为准则的一个原型,通过耐心的解释和理性的研究,你可以揭示造成恶行与不公正的各种原因,从而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变化对其进行改善。戈德温和其他人当时不得不经历的是愚蠢的独裁权力对其立场的否定——独裁者的反应不是他们所设想的理性对话,而是起诉、关押和流放。《克莱伯·威廉斯》^①——我偏爱它的另一个名字《真相》——就是在这种压力中写成的。最大化的政府权力对理性观点的反对强化了对这一行为准则所造成的结果的重新反思。《真相》在开始部分努力阐明最初的论点,然后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被迫挑战并驳斥这一论点。那种受到立场限制而又不放弃其隐含目标的变形不同于对标准教条的运用,正是我当时再现的那种卓越的政治思想,即通过经验改变某种行为准则(这种经验源于事实上正在英国内部出现的情况,既符合个人的感受,也符合最为直接的社会感受)。与伯克相比,它是一个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① 戈德温的一部作品。——译者注

阿诺德怎么样？

当时，我被看做是对阿诺德非常不友好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我隶属的学科里，我对阿诺德进行任何严重的批评都是一种冒犯。但是现在我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对于 1866 年选举权运动期间由于官方的蠢行在海德公园所引起的微不足道的骚乱，看看阿诺德的反应，他建构了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的理论，这种理论后来被视为所谓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一个巅峰——我现在对他的批判不得不更加无情。而可怜的米尔被发现站在论争的另一立场上，试图劝说改革运动不要再去公园里而是去他们不会被卷入纠纷的会所里集会。一种非常适当的反应。不过，正确的行动当然是回到公园里去。

还有一个人物，你似乎非常彻底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那就是劳伦斯。你早前谈到，你在 19 世纪这段时期范围内实际所做的等于是历史研究，意思是说，揭示许多你当时还不了解、你的读者更是完全不了解的人物。因而不可能期待你的研究完全覆盖这一领域。那看来没错：你实际上是在写一种崭新的书，既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标准的观念史。但是你说过，从整体而言，你对 20 世纪人物了解更多，你对他们的政治评价更加自信、更少修正。任何人都会觉得你当时非常了解劳伦斯的作品。可是你当时对他的叙述与你后来所做的评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你引用了劳伦斯的名言“任何人都不应该试图决定他人的存在”，把它描述为一种“民主信仰的宣言”——虽然那种宣言是“可说是源于功利主义民主的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①。你继续断言，就国家问题而论，劳伦斯“非常接近像莫里斯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无疑他和莫里斯会对随后被看做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相似的感受”^②。最

① CS, p. 208. ——原书注

② CS, p. 209. ——原书注

后,你讨论了劳伦斯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人性的接受。你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时期所写的关于平等的最好的文字。”^①然而在《城市与乡村》中你是这样写劳伦斯的:“这是非常显著和重要的,他修正了关于人性独立与复兴的观念,反对民主、教育和工人运动。”^②是什么使你改变了观点?

劳伦斯所犯的这个错误始于一个关于存在的观念,认为人们在发生联系之前还没有体验到某种限制。在理论层面上,从这个前提出发是不可能有意义地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劳伦斯毕竟始终充满激情地在许多虚构的创作层面尝试着这样做。以那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在重复资产阶级传统思想中关于个人的典型概念,以及伴生的对各种社会关系孤立的公式化表达。我当时本应该分辨出这一点,因为它是易卜生首先指出,甚至是悲剧性地指出的: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被决定了的个体。易卜生所说的决定是极端负面的——他笔下的人物是在最强烈的毁灭意义上被决定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疑问,彼此孤立的个人不期而遇,并进入被决定的状态。这种观念是人为的,就像构造一个由小岛上的两个人组成的交易系统一样。事实上,对存在的决定是一个社会过程,劳伦斯在他自己逃避现实的状态中故意不去理解这种过程。这些年来,我对劳伦斯的态度严厉多了,在乔伊和我共同编选一本劳伦斯论教育的作品集时达到了极致。当时我们真的不得不撤掉他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言论,我们几乎放弃了这项任务。当时我对他充满敌意,以致我都不想参与对其作品的传播。那太极端了。然而一旦你拣选出劳伦斯作品中所有那些有趣的东西,它们是另一种文字,他的理论在政治、社会和教育话题上没有任

① CS, p. 210. ——原书注

② CS, p. 271. ——原书注

何妥协,激起了情感上的强烈反应。我仍然不认为它是法西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那个时期最为高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它不能建构它自己的主体,因为这一理论在这一社会过程中的呈现处于一个太晚的阶段。

劳伦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观点与这样的描述没有抵触吗?最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疑是米尔的吧?直到今天,他关于女人的文章仍然是感人的当代文献。不管劳伦斯有什么其他价值,他关于两性的作品几乎没有观点是先进的。

我谈到的是这样一个观念——任何人都 不应该决定他人的存在,而不是劳伦斯的全部立场,他在深处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常常不能理解他个人的直接处境。有一次他严厉谴责离婚行为,当时有人对他说:“劳伦斯,你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你一边谴责离婚,一边却睡在一个离婚女人的屋子里。”他的回答是:“噢,天哪,那不过是作秀!”这话不管多么令人不快,却是一个看似合理的连续的回答。他非常尴尬和吃惊,因为他没有把这两者关联起来——一方面是他自己最为直接的处境,对于他来说这是首要的,另一方面是他确信的观点。有人这样说:“好吧,我们必须排除掉他确信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如果说在战后有一个人人都想成为的漫画式人物的话,那就是劳伦斯。

在劳伦斯的小说当中,《恋爱中的女人》体现了他的人物虚构模式,这种模式符合他关于存在的观念。在开始的时候你看到4个人,他们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和决定,然后你会目睹对于人和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深度探究,积极的和消极的、创造性的和毁灭性的。它是一部非常有力的作品,不过对我而言,它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小说的性质改变。因为在某种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资产阶级小说出现了。与其相比,所谓的19世纪资产阶级小说毕竟依然呈现了多

种混杂的观点,更多地关注生产的社会过程,即包括人和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过程。《恋爱中的女人》偶然获得了惊人的力量,因为它从表面看来是《虹》的续作——《虹》是依据不同类型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历史生产过程而写成的。这两本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书中的人物在名义上是同一群人,但实际上不是。我现在阅读的这个劳伦斯是最晚期的劳伦斯——他在去世前写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一些自传性的文本。在劳伦斯的晚期作品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种有力的不确定性。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序言里,你提到重新评价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必要——爱德华·汤普森最近已经在《社会主义的音域》里这样做了。然后你用巧妙的措辞写道,他的论述“一点儿也不明确,甚至想借此判断他是错的都做不到”^①。你现在对考德威尔的看法是什么?

我在《文化与社会》中以不容分辩的方式对《幻想与现实》进行了驳斥,因为我当时是根据它所呈现的语言来感受它的。《幻想与现实》看上去像是一部“左派”想要的书,充分的见识、理论的立场,还有某种分类。你一定还记得我那时是一个注重实效、非常尖锐的批评家,那本书激起了我的专业反应。我认为,作为一项事业规划它一定会失败,但它必定是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写成的。即使历史可能不会宽容人们做过的事,我还是要说,我本应该意识到他的压力比我要大得多。

当我写作《长期革命》中关于创造性过程的第一部分时,我又开始留意考德威尔了。那个问题也是考德威尔的兴趣之一,它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方案。现在我会说,我认为考德威尔的作品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垂死文化的内部研究》和《再研究》,尽管这两部作品的内容

^① CS, p. 268. ——原书注

有好有坏。考德威尔在这两部作品中所犯的最重要的错误,就是未能在一般性观念上把当下社会中被剥削、被异化的人和预期中简单化了的未来的人区分开来。我认为他没有成功,因为以那种方式谁又能成功呢?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回到像基因型这样的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概念是错误的。不过我现在能够理解他当时在尝试做什么,我能够以赞同的态度解读他,而在《文化与社会》中我完全是在以反对的态度解读他。

还有一个人物莫里斯,人们想知道你是否会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写他。你对莫里斯的描述是非常肯定的。在这本书的组织结构中,你对莫里斯的态度或处理方式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任何人都会对此感受良多。这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效果,重新同化了莫里斯,或者说把他中立化了。他被夹在罗斯金和马洛克中间,仿佛你只是在从具有同等地位的某个作者前进到另一个。然而,莫里斯真正代表的是,这一整体传统第一次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联系。那本应该改变你对他的陈述的,当然,后来出现了重要的争论,他没有对大量的重要问题做出定论。但是他确实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本书并未将其展示给读者。

就其地位而言,我完全同意你刚才的描述。莫里斯代表了重新评估传统的经典时刻。然而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使不被经常排除在外,他也是一个相当孤立的人物。如果沿着他有一条替代性的发展线索,这本书的组织结构将会极为不同。但是那种情况并未出现。他所实现的传统与当下的融汇本应该比实际的呈现更具建设性。研究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爱德华·汤普森在关于莫里斯的新版图书的后记里情绪高昂地为他进行了辩护,读到这些辩护的时候,我不认为我现在接受了那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莫里斯在他的作品中所实现的东西与他所呈现的传统与当下的重要融汇显然不

同,他仍然是进行那种融汇的一个激励。现在我正在做一些工作,介绍小说形式的历史突变和中断。这涉及对乌托邦小说地位的思考。因此我将会用那些关键词语再次思考莫里斯和威尔斯(Wells),以及后来在科幻小说方面的尝试。我希望能够发现可以修正我的判断,即对于历史性中断成为现实之后的事物性质的判断,但是我更期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描绘历史性中断会导致一种简单化了的观念,它是站不住脚的。把社会主义观念与将社会简单化的观念联系到那种程度是与建设性相悖的。在我看来,向社会主义的突变只可能走向无法想象的更大的复杂局面。

然而,除了《乌有乡消息》或者《约翰·鲍尔的梦想》之外,莫里斯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你自己引用了莫里斯的一段话,这段话让爱德华·汤普森也时常回忆。在一次历史想象力的非凡闪现中,莫里斯设想出的某种情况非常相像于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统治下平静的英国——当时工人会得到“更好的待遇,更好地组织起来,促进自治,但是不再要求与富人平等,也不再比现在怀有更多的对平等的期待”。你评论道:“这种对他死后可能发生的事件进程的洞察力衡量了他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品质。”^①在这本书中,你在反对某些人社会思想或文化思想的同时,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性质表示了敬意,此处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几处之一。然而,你随后就立即抑制了莫里斯思想的影响,继续说:“不过,他只是在新的环境下应用了这个世纪思考文化含义时所得到的结论而已。”^②以这些抽象的词语——“世纪”和“文化”——莫里斯被再次同等对待了。它们暗示,任何汲取了传统的人都能发出那些预言。实际上,为了做到这些,莫里斯不得不跨越一条阶级的鸿沟。

①② CS, p. 161. ——原书注

第二句话显然是不对的。莫里斯并不是将已有的评价应用于新的环境。不过我认为他受益于罗斯金对关系改造和环境改造的区分。那种含义是现成的，但是莫里斯对它的运用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突破。你在这方面是对的。

说到罗斯金，《文化与社会》在某些方面又出现了有趣的空白，那就是对宗教信仰问题相对缺乏关注。因为如果浏览一下书中的人物，就会立即注意到宗教信仰对于这一传统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如果你能问问他们自己所在时代的主要观念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伯克、骚塞、柯尔律治、金斯利、阿诺德、罗斯金、休姆(Hulme)、艾略特、托尼——都会用宗教性的解说来回答。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表面现象。无论以国教、非国教、新教还是天主教的形式，在新教和非新教的全部派别范围之内，基督教的主题大体上真正提供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这在大陆传统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社会学方面，你可能也知道，孔德觉得基督教存在着不足，他出于同样的目的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信仰。你当时是否认为谈论宗教信仰会使这本书过于杂乱？

我认为那是一种对于宗教声音的音盲状态。你的批评完全是充分根据的，宗教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想我当时无意识地做出了假设，如果在对话当中出现宗教词汇，它们一定是社会词汇的转换。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典型做法，遭到了克里斯托弗·希尔的有力批评。我当时没有根据这些词汇自身的正确含义看待它们。这附带解释了书中对于像马克·拉瑟福德(Mark Rutherford)这种人物的忽略，他本应该被写进书中的。我没有足够强调的一个晚近现象是，关于文学价值的观念在替代宗教和伦理价值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阿诺德的作品中这种替代倾向是非常自觉的。通过比较《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文学与信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一替代倾向，它在20世纪是极其重要的。不过，关于各种社会思想以及它们与宗

教经验的关系,这个问题足以构成另一本书了。我可能永远不会以巴兹尔·威利(Basil Willey)那种共鸣的方式写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它不够投入。

到目前为止,你对《文化与社会》做出的唯一观点修正出现在1970年重印的时候。你引用了弥尔顿对“文化”一词的预示性的用法,这个用法出现于他在1660年那本令人感动的小册子中,写作于复辟正在逼近的时候。你说,你已经开始把《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的社会思想视为后来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共和国》当然也象征了英国历史上的革命循环,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坚决要将它压抑在民族记忆的深处。格林的影响把他与你在《文化与社会》中讨论的大多数人物区分开来,他的部分影响在于,在他看来,现代英国的历史必须从1640年革命的观点出发加以理解。当你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候,那种观点显然不是你所支持的。在17世纪的讨论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讨论之间,大概你当时感受到了某种深层的中断,早期英国革命的经验似乎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社会。是这样吗?

是的。我认为我当时对历史的理解集中在工业革命的形成上,所采取的理解方式使得我难以理解工业革命与内战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写完《长期革命》中“大众报刊的增长”那一章之后,我意识到我遗漏了内战期间清教徒宣传册和报纸的出现,后来我确实把它添加到了我的叙述之中。我怀疑,从17世纪晚期革命失败期间到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激进主义的再次出现,实际上在纵深处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我希望人们能够逐渐把它展示出来。不过建立其间的联系存在着极大困难。建立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联系难度稍小一些,相比之下,建立文学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联系就更为困难,因为这些联系主要呈现的形式似乎是某些宗教意象或宗教幻想,渗透着非常饱满的社会内容。当然,得到清晰表达的上流社会文化以它对

17 世纪的欺骗性解释强行造成了这种连续性的中断。

当然,有一个显然是否定性的联系。你的整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主张加以反对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社会意象,是《利维坦》——一个内战时期的产物。19 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哲学》就直接从霍布斯的世界演化而来。

是的。我遗憾自己没有写下——或者说尚未写下我来到剑桥不久之后的讲稿。一些讲稿是关于霍布斯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的,虽然对他们的历史定位不同,但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后来还有一些讲稿是关于霍布斯和复辟戏剧的。在我确有把握之前,我不想冒险研究 17 世纪的作品。不过在后记里对观点的修正是正确的,它尤其适用于我们复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对传统进行理解。

《文化与社会》受到的欢迎当时给了你怎样的冲击? 它的成功对你作为一个作家的现实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的《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已经赢得了适当的学术尊重,由于这个原因,出版商接受了《文化与社会》的手稿,他告诉我,这是那种应当致以敬意的书,他愿意把它列到他的出版目录上,但是当然只会有很少的人想要读它。他说:“我已经有了另一本书《识字的用途》,对于它我会说同样的话。”因而,这本书所引起的大量关注是相当出乎意料的。这本书受到广泛的阅读和争论,它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一种趋势,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对某种已经存在的历史趋势的证实,这一历史趋势引起了新的争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较为年轻一代的读者似乎非常好地理解了这本书。另一方面,这本书绝不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现在为促销这本书而引用的话没有说明它所引起的大量负面反应。举一个例子,《守卫者》的文学编辑安东尼·哈特莱(Anthony Hartley)对它进行了非常不利的评论。自由主义右翼观点在这本书

中受到了警告，持右翼观点的人把这本书看做是 1930 年代以后他们已经告别的对文化思想与社会思想进行结合的一种尝试。

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卸掉了某些压力，又添上了另一些压力。我写了那么多未发表的材料，这本书终结了我因此而产生的挫折感。在《文化与社会》之后，我能更加容易地出版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也通过这本书挣了一点儿钱，给我造成了物质上的改善，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家庭。在半数以上作品未能发表的情况下，继续这种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本可以进行其他类型的写作，比如商业写作，那可以缓和经济上的处境。战后，我们第一次不必在极其缺钱的压力下生活了。带来的新压力是，自此以后在一个更为公共的领域工作。人们突然开始说，你为什么不写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呢？我更容易把自己正在写的任何东西付印，然而出现了大量我并不想写的约稿。这种情况很容易处理，但是更为棘手的情况是你不介意去做的某些项目——其本身很有趣，但却不必然是你下一个要做的对象。优先次序的问题变得非常棘手，那要花一些时间。

2. 《长期革命》

我们可以问一下《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之间的联系吗？第二本书是怎样构思的？

我最初的题目是《文化理论中的论题与原理》。这些“原理”是对有关文化生产首要问题的说明，即我在《文化与社会》对其他人物进行写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关于文化生产过程的_{理解}。它后来成为《长期革命》的第一部分。“论题”指的是我在成人教育班上教过的或者打算教的一些主题——读者群、作家社会史、媒体和戏剧形式。这些后来构成了《长期革命》中的第二部分。因而原来的计划是这样一本书，把这些理论章节加上一些讨论特定文化制度和特定文化形式历史的章节。为了回应1957~1959年的新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回应对《文化与社会》本身的讨论，我有了想法写第三部分——“1960年代的英国”。我当时希望能够通过对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进行综合分析，把《文化与社会》结论中略述的立场简要展开，即分析某种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与制度上的发展相交织的感受结构。与《文化与社会》相比，这部作品更是一项逐渐形成的工程，当然现在看来它是一部比较统一的作品。它把某些社会动力集合在一起，试图以某种形式把握它们。最终的形式是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获得的。

关于这个话题，《长期革命》出版后受到了来自媒体的更具敌意的对待，我们的回忆是否正确？

敌对的程度令人非常难以忘怀。某些重要报刊极为辛辣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泰晤士文学增刊》表现得特别激烈、没有理性，但是这种反应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当《长期革命》出现的时候，我并不

觉得有人真的理解它了。《文化与社会》很快就取得了声誉,成为一种值得给予敬意的好书,然而《长期革命》却是一部引起反感的作品。对我存在着公认的不满,说我被社会学腐蚀了,说我钻到理论里去了。恰在那时我返回了剑桥。情绪体验再一次像在1939~1941年那样:真的感受到了艰苦剧烈的斗争。

1958~1961年之间的政治形势当然已经发生了飞快的变化。《长期革命》出现在1961年,当时媒体上针对工党核裁军计划的反对运动达到了极其激烈的状态,盖茨克尔(Gaitskell)发誓要尽全力与其进行斗争。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突然出现了“左派”的恐惧,这是几年前还不曾存在的情况。

那显然影响到了对这本书的接受。有一个具有讽刺性的脚注,在所有人当中,对这本书的一份友好评论出自克罗斯曼(Crossman)之手。他差不多完全误解了这本书——事实上我不知道他对这本书读了多少。不久以后,我在媒体上——媒体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参加了一场与克罗斯曼的公开辩论,在辩论中他基本上站在另一立场上:后来有人告诉他我就是写这本书的人,他居然不相信这一事实。

在当时的《新左派评论》上读到爱德华·汤普森关于这本书的长篇评论,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是你看到来自“左派”的第一个影响广泛的批判性评论吗?

我想大概是,至少就已发表的评论而言。在当时,围绕整个文化的性质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非正式辩论。我曾经对爱德华说,在关注他的批评的时候,我的一个困难在于,当时我处于来自右派的强烈攻击之下:想分辨攻击来自的方向真的极其困难。来自右派的攻击很剧烈,在某些严重的时刻,我觉得“左派”没有能力在保持理论分歧的同

时又呈现一个共同阵线。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爱德华文章中的主要论点,而是离题说一下当时的基调。在那个时期,“左派”总体上难以阻止自身在民意得分上的挫折,这截然不同于理论分歧的表现,理论的分歧可以在相互澄清后继续前进。爱德华说了一些正确而且必要的话。他文章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的社会观念(从而对这样的文化观念?)持反对立场。那指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消失,当然也没有在我的作品里消失。但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原因,当时的评论很容易非常迅速地滑向挑起争论的程度,爱德华的那篇评论也是如此。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将斗争排除在外的整体生活方式——那显然必须要遭到最尖锐的反对和纠正。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左派”实际上几乎是在互换使用两种表达方式——“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混乱。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阶级冲突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绝对不可逾越的利益冲突,整个社会秩序围绕它得以建立,并且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现对它的再生产。“阶级斗争”这个词准确所指的是这样的关键时刻:结构性的冲突成为有意识的相互争夺,一种公然的武力参与。冲突是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前提,任何对文化的社会主义解释必须也必然包括冲突。不蕴含冲突的文化定义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过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回避或者略过冲突以其他形式得到斡旋的所有时期,在那些时期里,冲突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或者只存在临时性的冲突。我毕竟特别清楚这一点,因为英国的1950年代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处于阶级斗争显著减少而阶级冲突仍然存在的状况。当时的全部政治论争都围绕着这个时期展开。一个人如果不能对“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做出区别,就会陷入“整体斗争方式”措辞的危险,这种措辞特别不适于这个时期,对于这个时期一直存在的东

西,表达正确的词语是冲突而不是斗争。在爱德华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一种对历史中英勇斗争时期的强烈情感,那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表达特别不适合我们刚刚度过的并不英勇的10年。尽管有青年“左派”的重要复兴,1950年代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时期,人们呼吁的许多有组织的斗争似乎被压制和收编了。

与此同时,我可以看到我自己这边的危险。因为在任何文化过程中都存在着各种因素,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各种联结纽带,阶级之间并不仅仅是敌对的关系。根据分析,不管阶级之间的积极关系受到了怎样的扭曲,某些文化制度都包含了这些关系。在这些情形中,冲突的显现形式是一些争论,关于发挥各种制度作用的争论,关于各种制度内容或条目性质的争论,等等。在对文化过程中这些因素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个人的斗争意识总是可能会减少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他可能会体验不到社会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冲撞。实际上在我讨论19世纪大众报刊历史的作品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爱德华帮助我看到了,直到1840年代晚期,大众报刊还是一种与斗争相关联的媒体,而我并没有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当然,大众报刊在1840年代以后就不幸不再是这样的媒体了,并且当时在我看来,使用与“生活方式”对立的“斗争方式”措辞可能会妨碍一个人理解后来的发展——现在我会把这种发展定义为收编。

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求《长期革命》最基本的前提,可能应该从你最初对书名的释义开始。在这本书的开端,你展示了三种进程——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对你而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长期革命”。如果看看你后来所说的关于这三种进程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的问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被看出来。在这一部分接近结束的地方,你说:“关于一个社会的真相,看起来要到决策系统、传播与教育系统、维持系统和生育与养育系统之间的各

种实际关系中去发现,这些关系总是异常错综复杂的。寻找某些可以始终决定这些关系之间结构的绝对程式,这不成问题。要紧的是,这种程式首先要建立那些从未真正可分的系统之间的本质联系,其次还要展示这些系统中每一个系统的历史可变性,从而展示它们运作和存在于其中的真实组织形式的历史可变性。”^①在这里关键强调的是不可能把这些系统分隔开来。第二个重要的陈述出现在你对一个标准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即讨论对于通常解释的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标准问题。你写道:“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根据我们的问题,在社会之外就没有我们可以承认的优先于社会存在的实在整体。艺术作为一种活动,与生产、贸易、政治和家庭抚养一起存在。要想充分研究这些关系,我们必须以运动的方式研究它们,把所有这些活动看做人类能量的当代特殊形式……因而这不是一个把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当中,我们可能选择抽取它们当中任意一种活动而不承认它具有任何的优先性。”^②在这里,你把对各种系统进行抽象的观点与把优先性赋予它们当中任意一个系统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对两种方式都表示了拒绝。你在紧接其后所写的《传播》这部作品的最初几页里得出了非常清晰的逻辑结论,你断言:“我们习惯于用政治和经济术语描述我们的整体共同生活。对作为一种实质经验的传播的强调,就是坚持人与各种社会团体并未被禁闭在与权力、财产和生产有关的各种联系之中。他们在描述、学习、说服和交流等经历中的各种联系被同样看做是基础性的。”^③

看来这些段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经济在任何社会整体中的首要性或决定性——发生了正面矛盾。你对拒绝这一原则

① LR, p. 36. ——原书注

② LR, pp. 61~62. ——原书注

③ C, p. 18. ——原书注

的论证似乎是双重的。首先,你坚持认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现实中从来是不可分的;其次,你指出,既然它们在我们的经验中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它们在整个社会的形成方面必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长期革命》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段时期,你的思想已经明显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和发展,这涉及许多方面——文化、政治,还有理论。在你最近的两本书(《关键词》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你说你正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立场写作。我们想问问你,我们刚才引用的你在《长期革命》和《传播》中的表述是否仍然代表了你现在关于社会整体性质的立场?

让我尝试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对那些早期的定义,我现在要限定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相当明显,在某些时期,一个社会的不同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生产和社会进程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是非常不对称的,这必然使各种系统结构具有相等价值的观念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在这些结构的形成与演化中,显然还存在着暂时性的不对称。我一直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你可以从我的许多特定分析中看出来,但是我当时没有能力在理论上应对它。我现在所说的一种既定文化中的主导、残余和新兴三种模式,就是打算准确地说明这种历史差异现象的。所以,我的思想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决定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你所说的关于结构的不可分性的论点——政治、艺术、经济和家庭组织之间解不开的相互关系,是我仍然坚持的。现在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种论点,这些都是一个连续社会进程中不能分解的要素。不过我能注意到,在那些早期的解释里,我求助于经验,认为这种统一是有疑问的。我过去所说的实际上是,我们知道这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是如此的,因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前提来接受。然而,这一论据的困难在于,在某些确定时期,看来正是经验以其最弱的形式妨碍了这一统一过程的实现,遮蔽了不同结构之间的

联系——更不必说各种主导与隶属、不一致与不对称、残余与新兴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其特有的性质赋予了这些联系。事实上，可以说我自己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我用那些书构成的计划就是要反对经验所暗示的结论，施加影响，唤回对整个社会实质进程具有密不可分性质的重新认识。当时在我看来，一个人并不能够根据我先前了解的那些策略重新唤醒这种对于全面联系的认识。在本质上，那些策略反而寻求表明，在特定的情形下，经济的政治实践对其余全部实际生活是多么具有决定性。在对特定结果的证明中，它们显著涉及极其严格的选择性，此外还涉及对其他类型活动的排除，因为这些活动不带有任任何这种直接关系的印记。首先对社会之内某一强调领域的选取，还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同样抽象，倾向于通过重复而导致用与内容相关的术语来替代分析性的术语。如果一个人认真接受了关于社会实质进程不可分的观念，他就不可能承认从社会实质进程中抽取某一领域进行分析的优先性。因为那样做会使你运用某种确定的因果联系，而不允许你运用其他的因果联系；特别是，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都被运用于过去的历史，当你分析当代社会的时候，这些方法会失去正常的作用——它会简单地从一个部分开始，然后同样地处理其他部分。

我认为悖谬的是，在这些早期作品中，我自己倾向于把文化进程——一个极其受到忽略的概念——对立经济或者政治进程，我认为后两者以前已经被强调过并且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结果，我从整个历史进程中把我自己强调的领域抽取出来了。在努力使人们接受文化生产是一种主要基本活动的时候，我想我不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特别考虑到我对“经验”一词的模糊用法——我在完全否定决定论，尽管这些经验主义研究几乎没有提出这一点。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通向唯物主义文化生产概念的关键一步，在我的许多经验主义作品中，这个概念都暗含其中，但是如果把它表达清楚的话，应该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因为一旦文化生产本身被看做是社会的和物质的，

整个社会进程的不可分性就有了一个不同的理论基础。它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个单独生产过程共同性质的基础上。然而,对于恢复被根本忽略了的文化实践领域的地位,当时我的尝试放在其他方面,既对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进程具有首要地位的主张进行了证明(我并不想要这种结果),又对这种主张表示了反对(那是非常容易的)。当然,这本书的组织结构可以据此来看,因为它包含了关于各种文化部门的一段延长的历史,但却没有说明产生了极为不同的社会部门的其他类型实践,而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换句话说,我的作品要受到我对其他方法的同样批评,它用的是一种从局部出发进行解释的方法。

对于你最初的表述所引起的某些问题来说,这个澄清很有帮助。不过还是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反对意见,使人想起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引用一个你特别尊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吕希安·戈德曼的评论,可以向你提出一个这样的反对意见。戈德曼有一次发表意见,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生产首要地位的含意,他说,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你必须考虑到贯穿历史直到当下时代的事实——人类在生活中花在生产他们自己谋生手段上的压倒一切的意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直到现在还在数量上占据绝对支配性的单一经验和实践。^① 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这一领域的活动必定超越所有其他社会活动,具有因果关系上的首要地位。我们不是说这必然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说明,不过,你对这一解释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会温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质问,这样的结论将我们置于何处,尤

^① Lucien Goldmann, *Recherches Dialectiques*, Paris 1959, p. 67. ——原书注

其是在 20 世纪中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结论当然是马克思学术生涯激进转向的根据，实际上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中，甚至还有其他人也在沿着这个方向摸索。然而一旦一个人接受了这样的结论，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首先是——作为一个与历史和人类学记录有关的问题来看——人们在维持生存可能性的限制条件下，通过某些手段或者另一些手段卷入其他活动的显著程度。例如说，在英国随便走走，就可以看到频繁出现的教堂，其中许多精美的教堂以石头砌成，它们从一个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人拥有一所石制房屋的时期存续下来，当思考这些建筑的产生中所包含的纯粹物质成就时，这些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甚至在正常的不可抗拒的强调中，也很难使它们适用于有关首要原因的简单观念——除非像戈德利埃(Godelier)可能会做的那样，坚持说给上帝建造房屋是构成生产方式本身的一个必需部分，它是一个与生产关系有关的支配性因素。

另一个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特性。在《长期革命》中，我是把经济作为一种“维持”系统而非“生产”系统加以谈论的，“左派”对此给予了许多批评。但是我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秩序，因为它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和需要。存在着从时间上向后推论的危险——因而我选择了维持这一更有限制性的词语。这样做可能确实导致了对另一方向的强调不足。不过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一个影响力日增的源自卢卡奇的概念，即经济秩序在社会中的主宰地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我认为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难以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它可以解释，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成熟的时候，一个人对于生产意义性质改变的感受，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已经是主张把经济生产作为首要原因的最坚定的理论家。如果你想听人说我们整个生活都受到经济的支配，去看资产阶级报纸的金融版和商业新闻版——那是他们如何真正看待生活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吗？让我们使用你的举例——谈谈英国在 11 世纪投放在建筑教堂上的令人惊讶的劳动和精力，当时石制房屋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来说还是闻所未闻的。在任何时期，从未有过任何社会只是纯粹在经济生产的各项实践中领先；文化和政治活动总是与其相伴的。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仅仅坚持这一事实不过是回到颇成问题的同时发生论。因为各种结构可以在时间上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它们不一定因此在因果关系上具有同样的位置。在盎格鲁-诺尔曼时期的英国，存在着极多的为上帝建造的房屋和极少的为人建造的房屋，二者以任何方式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社会根本没有任何为人建造的房屋而只有为上帝建造的房屋吗？这个问题是一个反证：显然你不能想象，因为人们将会没有地方居住。另一方面，你能想象一个社会只有为人建造的房屋而没有任何为上帝建造的房屋吗？答案是有。实际上这样的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距离英国不远。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社会过去并未基督教化；11 世纪的瑞典就没有为上帝建造的房屋。因此，作为一个与历史有关的事实，我们知道这种变体是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具有任何理论可以描述出哪怕一个时期的——更不必说跨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秩序之间的确切关系。这样说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严格限制性地停留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搁置或者回避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可以用一种很理性的、可以用经验证实的方式断言，迄今为止，物质生产的各种进程所施加的根本性约束力超越了一切其他进程——它们为一切其他实践构成了支撑的框架，而一切其他实践并未在同样意义上为经济实践构成支撑的框架。你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是的，我肯定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根据历史固有的多样性对它做出解释的话。但是如果把它当做解释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我不会接受它，因为在这个时期，大量正在运行中的其他类型经济

活动与物质上的生存或维持毫无关系。请允许我回到关于教堂的那个例子。非常清楚,这是一种来自社会上层的强制性建筑样式。但是这种建筑样式的成就引起了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即政治权力结构、实际生产关系和文化结合形式之间确切的相互关系——因为主要的生产者实际上濒临饥饿,通常在抗议中(有时则出于自愿)把生产性的劳动付出在这些建筑上,而这些建筑与满足生存的物质紧迫性毫无任何关系。在人们自己还无处蔽身的时候,他们却在为一个权威建造居室,这个权威甚至不是一个人,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时教堂甚至可以被允许用于其他社会功能。换句话说,我认为,用于身体生存和身体再生产的社会能量分配在历史上是非常多样的。如果它在任何时候真能成为人类的首要目的或者一个绝对的优先事项,整个社会将会发生彻底的变革。即使你已经考虑到重要的主从关系、考虑到对政治命令的强迫接受,考虑到为了迫使能量从那些首要目的上转移而使用的军事力量,对于历史分析来说,令人焦虑的是不能完全按照它们本来的情况进行理解。

考虑这个难题的另一种方式或许是非常尖锐地提出历史变化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这可以视为你在这一时期所表达思想的阿喀琉斯脚踵。特别是在《长期革命》中有一段涉及这个问题,你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发现特定的活动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组织结构——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仍然不能说所有其他活动都必定与这一活动相关;我们只能在变化着的组织结构之内,研究各种特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受到影响的各种方式。此外,既然各种特定活动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时这些目的还相互冲突,我们不得不寻找的这种变化极少是很简单的:各种持续性的因素、调整性的因素、无意识的同化过程、积极的抵抗以及其他努力,这些都呈现在各种特定的活动之中,呈现在

整个组织过程之中。”^①就效果而言，你在这里否认了这样的观念——历史的变化可以为重要的因果关系提供证据。总之，你更喜欢强调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持续性的因素与调整性的因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研究各种特定活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很不清楚的是，如果一种活动确实根本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而且你承认了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为什么不能说所有其他活动一定与它相关？当然，其他活动之间也应该是彼此相关的，社会中的所有变化在任何既定时刻都不会被简化为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某种活动。然而仍然可以确定地说，如果某种特定活动根本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它就具有因果关系上的首要地位——那是这一词语正常的意义。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它呢？

还有另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表达这一点：在这一时期，你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工业革命。如果我们着眼于工业革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彻底改变了。你指出了社会得以改变的途径，通过同一途径，工业革命的到来也改变了文学作品写作所依据的现实经验：这是《文化与社会》最为明显的主题之一，在《长期革命》的第二部分它也得到了有力的呈现。现在，如果我们问问自己：除了工业革命之外，是否能够想象还可能有这样一种诗意的革命事件能够以类似的方式、速度和深度改变社会？回答是明白无误的，没有。这种极其常识性的问题只会使我们回到这一点：经济典型地具有一种诗歌所不具备的因果性影响。你在这个时期似乎觉得，承认这一点就是以某种方式贬低了艺术或者其他文化实践的地位。这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必然要得出的推论。你所不得不承认的只是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类型实践在功效上的不对称性。历史的变化是整个问题的症结，因为只有历史的变化中，一个人才能

① LR, p. 62. ——原书注

最为接近、最为明显地洞悉相关秩序或者各种实践的层级。

我不认为我自己对此有不同意见，这包括对我当时所说的话做相反理解的可能性。当然，在这两本书中，工业革命被看做是关键的变化，在此意义上它具有因果关系上的首要地位。然而，我在写你所引述的那一段时所思考的“关系”是这样一种观念：比方说，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所以就一定有工业诗歌。然而实际上存在的是工业小说，就像我曾经说明的那样，并不存在考德威尔所断言的那种实体——“资本主义诗歌”。但是从非常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看，它似乎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推论，既然决定性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到来，就应该有资本主义诗歌。当我写作《长期革命》的时候，我大概过于关注单向的解释和关系了。你现在要求我说的也正是我非常愿意说的，贯穿我的整个研究领域，工业革命在因果关系方面居于首要地位。我甚至愿意指出，对于不能历经工业革命而存续下来的所有其他活动，工业革命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它们自觉地抵制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如此。

然而有人可能随后会继续说，完全不可能把工业革命视为一个对出现于其后的文学作品具有外部影响的过程。因为在其他诸多事件当中，工业革命是读写能力生产中的一场革命，整个争论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完全的循环。蒸汽印刷如同蒸汽纺织机和蒸汽机车一样也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它生产的是读写能力，与其伴生的是一种崭新的报纸和小说。我当时所抨击的那种传统表述会把印刷仅仅看做是极其晚近时期经济秩序的反应，这种经济秩序产生了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然后又产生了文化秩序，文化秩序再产生印刷。然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变革的革命，本身已经包括了许多通常被解释为非经济性的变化——整个难题就始于这些解释。任务不是去理解工业革命如何影响了其他部分，而是要理解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生产的工业革命，正如它是服装生产的工业革命——我认为这是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成就——或者是光、电、建筑材料生产的工业革命一样。一旦开始把经

济生产分解到它的特定过程之中,就不会太过惊讶,在一个处于那种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里,同时被生产出来的还有读写能力、政治秩序、大众舆论或者大众娱乐。这一点很难提出,我也不是说在《长期革命》里全部都被正确地提出了。我能够理解,由于强调新的重点,我很不充分地声明了,历史因果必须主要依据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和变化来理解,我不认为我否认了这一点。然而这一点已经被限定于狭隘的经济解释,它实际上已经低估了本身正确适用的范围。虽然当时我没有形成正确的术语,但那是我的分析方向。与传统的思考相比,唯物主义的根本主张不是更不正确,而是更正确。我要加一句,现在我找到许多证据支持我对社会主义经济人类学著作的强调。

或许看上去有点儿重复,我们想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在你所有作品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你用唯物主义术语讨论文化本身,许多宣讲经济首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方式。他们倾向于把文化和经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把文化视为不那么有形的实体,相对而言不能贴上物质实践的标记,而经济则被用来专指物质生产和机器、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与此相反,从《长期革命》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你的作品总是在研究一切文化系统的物质性因素。然而,强调文化实践的物质性会导致回到对社会整体的循环论证。存在着这样的暗示,既然它们是物质的,就有理由可以把它们等同于通常经济上的物质实践。相对于唯心主义的社会整体描述,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它能充分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在你所举的例子当中,引起了工业革命的不是报纸印刷术,而是纺织品制造,这绝非偶然,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对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实物的巨大潜在需求。你自己对于棉制品工业的措辞——“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成就”,不是实际上承认了结构上的优先地位吗?

还可以用另一个历史问题来使这个论点具体化。把一种由大量

物质实践构成的文化现象与经济过程联系起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极其棘手的有关基督教的历史。一系列复杂的宗教实践涌现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行省,直到它成长为罗马当局的官方教义,它历经中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中世纪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达到至高无上地位,然后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启蒙时期直到工业革命时期,历经多种变化,仍然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效力。就工业革命这一时期本身来说,一个主要的变化当然表现在宗教感受方面。历史学家经常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与经济基础一起出现并消失,基督教历史是对这一观念的一个标准驳斥。你可以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在任何情况下都构成了宏伟复杂的总体物质实践,其中许多实践——修道院、大教堂、学校、税收——直接有规则地覆盖了经济生活。这会是一个适当的回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关基督教历史的基本要点在于,这一巨大有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能够跨越各个时代和文明持续下来,以石头、玻璃、绘画、手稿或印刷物的形式作为它的标志覆盖了整个欧洲——但是我们可以指出由于基督教变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任何历史变化吗?这样做是极其困难的。很明显,在古典世界和中世纪之间,社会结构从头到底被改变了,这种变化显然可以联系到从奴隶经济到封建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变化。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历史对我们非常重要,在基督教的结构中却没有发生相似的变化。基督教存续下来的代价是对它的决定权的限制。只有在这样的对照中,才能最清楚地看到经济影响和文化影响之间的不对称性。

我同意。即使你已经认真地尝试把宗教改革看做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仍然不能让我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解释而在观点上加以接受。另一方面,不应该因为这些信仰系统在外观上持续了极长时间而低估了它们内在的变化程度。每一次重大的整体社会危机都在这个系统内激起了非常大的冲突。对信仰系统的回应是重新阐释、重新排列强

调的重点,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矢口否认。然后这些回应往往形成由残余的、主导的和新兴的宗教感受所构成的新的结构。其结果则是在信奉的信仰系统和实际运行的社会系统之间同时发生了多重的不同关系。

还有另一个我仍然尚未充分理解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引起了类似的理论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纵览整个马克思主义,人类繁殖过程的物质重要性通常被忽略了。对妇女的剥削或者家庭的功能得到了正确和必要的说明,但是对于这一整个领域的说明却找不到。然而几乎不可能怀疑人类繁殖和养育的绝对重要性,也不可能怀疑它的物质性。把它看做一个历史的物质过程,它显然与其他生产形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如果你对我说,家庭性质的变化能够像能源生产的变化或者服装生产的变化那样,引起同样的社会变化吗?回答当然是不,它不能。我们仍然会在这里达成一致。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生产范畴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专门化的一种表达,它正好引起了与那些并非商品化的生产形式有关的问题。在我们抗议商品无处不在的表述中,我们首先的反应是说这些根本不是生产领域^①。但是其推论是要把它们看做次要的领域。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说它们是生产的形式,同时仍然要牢记,某些生产形式从根本上替代和改变了对其他生产形式的影响,而其他生产形式对它们则没有。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坚持食物、居所和衣物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一定是第一位的,坚持认为完成这些生产的方式将要决定其他一切事物的完成方式,我们就做出了更多的承认而非更多的限制。特别困难之处在于把那种事实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已经变得如此更为广泛,人类生活的主要领域已经被完全排除在生产范畴之外。

① 指人类繁殖和养育等领域。——译者注

有趣的是,《长期革命》中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地方正是你已经提到的这个领域。你指出在任何社会里都有四个基本的系统:维持系统(经济的)、决定系统(政治的)、传播系统(文化的)和生殖养育系统(家庭的)。然而与此同时,你在开始时就引人注目地把“长期革命”本身描述为由三个进程组成——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你的结论中,你又用这三个组合分析了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你把工业作为一种维持系统进行了讨论,采取的形式是对消费社会主义和官僚制国有化的非常有力的批判:它代表了新“左派”内部对于生产社会主义做出的第一个扩充例子,集中关注的是工作关系。你对政治决定系统的说明并不那么深入,但是包括了那一时期对英国选票至上主义的早期批判和对议会改革的建议。你对文化系统的研究含有当时还是高度原创性的制度改革规划,后来你在《传播》中对其进行了发展。然而在这个本应是全面考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缄默领域。在你分析一切社会秩序构成的理论里区别出来的第四个系统——生殖和养育系统,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有计划的论述。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欠缺呢?它是否意味着,你觉得家庭问题——首先是妇女在家庭中的位置——不像其他三种系统那样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有意为之的社会变化?考虑到你的作品中常见的对那些领域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这次居然没有形成习惯性的政治讨论,这非常令人惊讶,妇女和家庭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你这一时期的作品。

我想那是绝对可能的。然而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思考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我脑海中形成的观点与《长期革命》最后一部分所形成的分析是密切相关的。假如我写了它们,我的方法将会着眼于在那一领域发生的革命的矛盾特征。在1960年代晚期之后,直率的、具有战斗精神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大受欢迎,它是必要的,早就应该发生了。但是在我看来,它并未充分地建立在分析这些矛盾的基础之上。我这样说的意思如下所述:一方面,在人类的精力和注意力中,生殖与养育

系统显然继续保持着某些独特的优先地位——在这一领域内，人们真的努力保持某种独立以对抗资本主义秩序，无论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即使在极端的经济困难中，都要投身于对其他人的照料。另一方面，与这种经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相伴，同样存在着时常发生的迹象，显示了这些关系在贫穷或失业压力下的破裂，显示了某些家庭在工作处境所导致的压抑、痛苦和挫折中的非常糟糕的生育过程，妇女和儿童是其主要的牺牲品。如今，当代社会变化中的矛盾是，在家庭内部，那种从极度剥夺的传统控制和家庭暴行的增长中解放妇女和儿童的尝试尚未完成，但它本身却变得复杂化了，因为每一次人类解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其依据的规则就是这一体系本身的产物。在我脑海中出现的不仅仅是现在非常普遍的把性归纳为消费的那种意识形态变形，我还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与家庭对立的解放立场在某些时期受到资本主义本身的怂恿——出于招募廉价妇女劳力的需要，资本主义实际上在说：“走出你的家门，为我们做一些轻体力劳动，我们会付给你比男人低一些的工资。”因而现在立刻就有了无法反驳的主张，妇女们要求能够出去在社会中工作；也出现了资本主义通常荒唐的短视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根据某些崭新的方式，整个生殖与养育系统都成了问题，然而实际上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妇女解放运动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理论回答，生殖与养育依其本质应当是一种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可能出现的解放的实践程度很可能由市场的优先次序决定。在此意义上，当下的资本主义秩序甚至比过去某些匮乏贫困的阶段更具有强加于人的性质。因为，生殖与养育问题现在被欺骗性地指派给社区，但是现在却没有提供充分的社区照顾，甚至根本没有提供社区照顾。为了取代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做法，应该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但是我们此刻却没有钱这样做：那就是现在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福音。伴随其传达的是这样的观念，工作——为工资工作，而不是自由选择的

工作——在人类精力的安排上具有种类上的优先权。与此针对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为家务劳动支付报酬,或者为抚养小孩子的母亲支付报酬——我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这样的过渡性要求完全是正当的,她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勤奋工作,现在却真的被忽视了,因为对于社会体制来说,从她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利润,她们也不能吸引任何政党的重要政治关注。这些就是在我本来打算分析的现实解放过程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我多么希望我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这么做了,我也希望现在能够理解是什么阻止了我这样做,因为我当时并不是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成长的家庭和我自己现在的家庭都非常好,我的经验相对而言没有任何问题,以至于我没有像在其他领域那样强烈地意识到家庭中的混乱与危机。但是,没有直面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思维上的缺陷,特别是,我已经识别出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经济至上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范式,你的作品包含了对这一范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与此同时,你总是坚持,任何关于社会的理论必须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把社会总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你对基础/上层建筑范式的一个批评恰恰在于,它把完整的一系列重要实践边缘化了,从而丧失了把握整个社会进程的能力。然而还有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范式,它的轴心是矛盾观念——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积累法则驱动的,这一法则又造成了循环出现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力量引起了阶级之间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最终又导致了在政治上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在关于《长期革命》的一般争论中有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那就是几乎感受不到所有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态势。特别是,在你所谓的“文化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影响的矛盾是什么?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经典理论在我看来仍然是有效的,当然这一理论必须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对于那些接受了1930年代说法的

人们来说,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整在很长的时间内避免衰退。然后这些调整依次产生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其他危机。教训在于,相对于它们最初呈现给我们的形式,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自身在一个更深的结构层面得到了解决。我认为,我们仍然必须在这方面准备迎接某些惊讶。当然,我希望这些让我们惊讶的变化不会发生。

然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在不只与其内在经济规律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存在着一些根本矛盾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把人类永远需要的某些重要产品排除在外。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最初的动荡时期——那时它野蛮地改变了人类的定居模式和直接联系、工作的节奏和时间安排;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更为稳定的秩序确定下来的方式。所有不能通过商品生产组织起来的人类基本需要——健康、生活环境、家庭、教育,还有被资本主义称作闲暇的东西——都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压制或限制了。劳动分工的深化,与劳动分工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种人文观念和社会性观念的迅速减少,这些都引起了深刻的矛盾——与那些市场内部产生的矛盾相比,这些矛盾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更加不可能解决的。这不是要降低传统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地位(我认为这一矛盾永远不会得到解决),而是要说明,面对资本主义对诸多必要的基本产品形式的抑制,在长期抵抗中,文化革命找到了它的源头。因而,文化革命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强加的整个文化和社会形式。

你在这本书中一个地方说:“社会主义在反抗阶级社会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经常把自己局限于使用对手的术语:企图建立一种政治和经济秩序,而不是与人相关的秩序。社会主义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看到权力和财产是这一秩序的障碍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产生建立这种社会所必需的全部能量,就必须使用更为广泛的

术语。”任何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同意这些的。然后你继续说：“实际上，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可能会到来，而与人相关的秩序却很少变化，除非这些联系能够得以建立。”^①你是否在对另一个方向的强调上有夸大的危险？即使认可其中暗含的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参照，这一主张也无疑太过极权主义了。苏联社会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不能说其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仍然没有改变俄国革命前的那种与人相关的秩序。

我认为是有一点儿夸大。我当时实际在思考的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还思考了费边主义——它更加糟糕，甚至不知道与人的相关的秩序是什么。我直接给出的例子是纯粹的工作问题。当时我正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们早前讨论过的莫里斯。就此意义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现存的社会主义身上，那一点仍然必须被指出。

谈到你自己关于《长期革命》的研究时，你写道：“我们有英国工业兴起和民主发展的相当充分和连续的记述。但是我们没有与我们处于扩展中的文化相关的适当历史。”^②第二个句子可说是这本书第二部分的纲要。然而，第一个句子似乎是对你正在写作的1961年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假设。比如说，现在可以马上想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业与帝国》是“充分的记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极大成熟实质上是你这本书之后的一个现象。你当时指的是什么呢？

当爱德华·汤普森卓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世之后，我才认识到我过去读过的文献是多么不足。至少某些书还是存在的。然

① LR, p. 131. ——原书注

② LR, p. 141. ——原书注

而对于我当时涉及的主题,比如出版史或者有关标准英语的历史,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不过,事实上我或许最好还是这样说,我是在伴随着某种正在逼近的恐慌写下那几行文字的。因为我能够看到,我对整个社会过程进行全面说明的主张正在将我引向何处,而且我也知道,在响应这一主张时我将能够在第二部分——与文化史有关的那几章加上计划中重要的定居史,定居史本来可以介绍有关经济秩序的更多内容——展示什么。换句话说,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要逐步展开的东西与我曾经提倡的东西是矛盾的。因此,写出那些句子在部分程度上是我使自己免于那样做的一个方法。不过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得不动手做超出我自己研究领域的事情,那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毕竟,你提出的那些新的知识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研究成果,我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完成这样的研究。当我进入写作的时候,我的文化研究甚至使我背上了学习英国历史的沉重负担,我已经解释过这源于我个人成长的历史原因。

那引起了另一个问题。《长期革命》的悖论之一是,你充满热情地在第一部分为某种整体社会进程意识进行辩护,你在争论中有时甚至极其尖锐地反对出于分析的需要把社会进程的个别领域或者活动彼此分开,然后在第二部分你唯一集中关注的却是文化领域。另一个悖论在于你对文化本身的处理。你提供给读者的内容一共有七章,它们都是开拓性的研究,涉及教育、读写能力、出版、口语、作家、戏剧和小说。但是在这些章节中,根本没有任何整体性的东西。事实上,甚至在所写的前后文化形式之间也只有很少的关联。不同文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被探讨,所以你称之为“我们处于扩展中的文化的历史”的这些变化从来没有被集合在一起。这是更加惹人注目的,因为每一个读者都会记得,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在你对19世纪40年代感受结构的共时性描述中,你做了一个杰出的示范,系统化地分析了

特定历史关头不同领域和不同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结构性章节彼此相对孤立,强化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其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它们在时间上没有共同的起点。涉及口语、教育和读者群的章节回溯到了中世纪,涉及大众出版和小说的章节回溯到了工业革命,关于英国作家的那一章始于英国最早的散文时期;然而关于各种戏剧形式的一章仅仅涉及现代时期。用一种不加整合的方式写第二部分,不做任何努力完成各章之间最终的相互联系,这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决定吗?

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这是有意为之的。我可以理解这些章节之间的横向联系,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我现在依然认为这是困难的。我曾经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尝试着只在工人阶级文化层面上把这一社会进程的一部分整合起来。我采取的方式是把戏剧、出版和教育中正在发生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然而即使那样做,也没有包括工人阶级的各种政治文化组织。我所能说的是,即使那样也呈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在工人阶级和城市通俗文化内部最终所谓的下层中产阶级因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当时,我觉得关于19世纪40年代的论述差不多是我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所有东西。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由一系列对某些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尝试构成,差不多就是这样,各领域没有被统一在一起。我能够做到的至多是有意地把教育放在首位。我也遗憾关于广告的一章被省略了——它被留下用于与这个题目有关的集体著作,后来由于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不一致,它没有得到出版,本来它至少会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与经济进行联系的思路。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大量必要的联系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彰显了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使我经常再次着眼于我自己的材料,我很乐意这样做。

你完全理解文化这个词逐渐累积的语义范围,为什么决定优先采用它来表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呢?在开始分析文化的前边数页里,你

承认社会这个词可能具有同样的含义。你对文化这个词的选用似乎是类似的诸多选择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内部，你通过类似的选择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建构得与众不同。

推想起来，尽管有种种困难，我还是认为，就已被使用的情况而言，文化这个词比社会更适宜说明一种整体的人类秩序。另外，我当时已经习惯于用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思考，这仅仅是一个习惯持续的问题。毕竟，即使在最狭义的理解上，我当时在做的大部分工作也都处于人们称作“文化”的领域，因此使用这个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你知道，我多次表示但愿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该死的词。当我进行写作的时候，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它引起的麻烦。

在“整体生活方式”的意义上，文化作为社会的同义词，无疑具有许多重要的含义。首先，文化以与社会这个词不同的方式显著强调了生动的社会秩序肌理：通过与内在主观经验的联系，它比社会这个词更精密。其次，文化的另一含义是它能表明社会秩序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的同化作用，倾向于接近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这个词具有社会所没有的强烈的规范性成分。你可能百分之百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对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本人就证明了这一点。文化这个概念包含了内在的积极性成分，不管是像民族语言这样的共享媒介还是高雅文化的遗产。

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文化这个词对我而言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文化作为一种过程，在历史上，文化是耕作和培养的意思——它是一种活动；但是社会看上去是非常固定的。我通常喜欢文化这个词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文化的现代词源实际上出自维科（Vico），他使用这个词时强调的正是过程。“长期革命”打算就一个非常长期的运动传达类似的意义。与此同时，文化概念本身已经被古典主义转变成一种由各种价值或观念组成的永恒不变的整体。所以词

汇上的困难是关键。在我们和历史进程之间，语言问题真的是难以克服。这就是我为什么比我那一代大多数人更加理解新词的创造和方言的输入，那是紧随我们之后的年青一代的典型特征。嘲弄这些现象十分轻易，但是引起它们的是这样的事实：现有的词语已经承载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负担。另一方面，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论证：如果你不争夺占有像文化这样的词——这个词在那时一直在被用来反对民主和教育，你就放弃了太多的东西。

你当时看到文化这个词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特别有利之处？你是怎样提出它与阶级的关系的？

对你的问题有两个答复。对于在《文化与社会》中已经确立的自由主义信念，最令人震惊的一个论题是，我没有把工人阶级文化阐释为存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小说——受到震惊的包括在其他方面喜欢这本书的人们，他们十分愿意把这些无产阶级小说看做是地域性的文学类型——而是把它阐释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是把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讨论所得到的收获。相对左派有关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一个进步，左派集中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努力表述出来的一些诗歌、自传和后来的其他类型作品。在我看来，复原这些工人阶级作品并给予其荣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把它们作为替代性的文化则是错误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倾向。举个例子，在工业化的威尔士，无产阶级作家设法表述出他们的特别经验，这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他们努力描绘说那仍然是一种从属文化，但是这不会减少我们的敬意。我认为，与它正在竞争的立场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拒绝“左派”的传统描述，它把英国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思想和作品描述为资产阶级文化。事实上，大量的那种文化是由实际上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人们创造出

来的,即使它们表现欠佳的地方、即使它们深深被资产阶级形式沾染了的地方也是如此。保持对那种斗争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所有那些基本作品都完全被“右派”窃用了。到1950年代时,这一花招变成了:如果你认为乔治·艾略特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你一定得反对社会主义。这里存在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对于过去的直接政治挪用。看来对这种窃用进行挑战是多么重要,挑战对文化进行认可和解释的那种文化观念是多么重要,我不可能强调得比这更激烈了。

我这样做当然有些冒险。我认识到这一点是在1950年代晚期,当时有人对我说:“我知道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你在写关于文化的社会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社会主义术语出现,你就避免使用它,而用另一个词语来表达。”我说:“这可能是给人留下的印象,但不是我的意图。”由于需要与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解释交锋,我的语言十分不同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写作语言。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在接下来的争论阶段,人们觉得应该转向一种彻底不同的术语,因为他们认为使用现有词汇很难容易理解一种不同立场的出现。

“感受结构”这个概念是《长期革命》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创新,从那本书直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你一直在使用和发展这个词。一开始你就在《长期革命》中给感受结构下了定义:“我要提出的这个词是感受结构:它就像‘结构’所表明的那样是牢固的、明确的,但是它是在我们活动当中最微妙、最难以触知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受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全部组织中所有要素的特定现实结果。”^①然后你继续说:“我不是说,与社会特征相比,共同体中的许多个人更多地拥有同样的感受结构。但是我认为,在所有的现存共同体中,拥有感受结构是一种

^① LR, p. 64. ——原书注

非常深入和广泛的现象……一代人可能会在使用社会特征或者流行文化模式培养后代方面获得适当的成功,但是新的一代将会拥有它自己的感受结构,这种感受结构看起来并不来自任何地方。”^①在这里,对于感受结构这一概念来说,根本涉及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倒不如说是一代人。尽管你从未这样明确地说出来,很久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同样的强调再次出现于你对19世纪40年代的处理。刚才引用的那一段接下来继续说:“新的一代以它自己的方式对它正在继承的这个独特的社会做出反应,接受可以回溯到上一代的连续性,对这个可以分开进行描述的组织在许多方面进行复制,但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受它的整个生活,并把它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受结构。”^②当然,整个代际问题在你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你的感受结构定义,我们想要提出的第一个批评性问题是: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总是至少包括了三代成年人,他们都是活跃的,都在一个一致的时间范围内生产意义,那就是说,只要至少存在着活跃的三代人,看来就至少明确呈现有三种感受结构,怎么能像你在说明1840年代时所做的那样,谈论某个时期的“感受结构”呢?这里且不说多个不同阶级的问题。

在我的说明中,大体上的理由在于易于分析的感受结构和外表新颖的文化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不管对错——我认为总体上是正确的,我们通常确实识别出一个特点,根据构成一个群体的人们的实际生活,文化上的一代人似乎常常是伴随10年左右的共同活动形成的。如果把1930年代作为一个例子,可以在一系列青年作家中追溯到一种特定感受结构的出现,在回顾中,那10年是因他们而得以识别的,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继续写作到1960年代,某些人甚至写作到1970年代。我倾向于在分析中应用感受结构这个术语的情形适用于

^{①②} LR, p. 65. ——原书注

正在写作新的文化作品的那一代人，那通常意味着中间年龄大约为 30 岁的一群人，他们正在开始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感受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年或老年作家的感受结构与他们早期的感受结构视为一体。我是在此意义上谈论 19 世纪 40 年代的感受结构的。不过我没有在那里充分阐明我的处理模式。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这个概念怎么能够用来统一表达多个不同的阶级？让我们继续举例说明，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至少有三个重要的阶级——拥有土地的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农业工人、小佃农以及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悖谬的是，当你讨论“社会特征”概念时，你确实直接提到这些阶级，但是当你分析“感受结构”的时候，你没有提到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旦某种感受结构指的是一代人的感受结构，对于一个社会中的所有阶级来说它都可以是共同的。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在我可以读到的实际文本和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根据，感受结构这个概念最初是因为它们形成的。结果是，在不同阶级对那类作品的贡献存在极大差别的社会中，太有可能忽略其他感受结构的存在了。在《长期革命》中，的确没有充分强调这些，感受结构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用时间性和一般性的术语提出的。我现在会在不同阶级之间极为区别地使用这一概念。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感受结构的差异本身在历时性上也是变化无常的。举例来说，在 17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当时两个差异十分显著的感受结构甚至存在于同一个积极贡献出文化作品的社会阶级当中。但是还有其他的时期，一种感受结构似乎被更加广泛地接受了。19 世纪 40 年代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因为，我当时正在分析的这些小说主要出自中产阶级或者下层中产阶级作家之手，尽管这些小说中的感受结构是一种本阶级共同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进一步进行分析，

这一感受结构的许多阶级要素是相当清晰的——在一个惊人的程度上，它得到了那些当时正在开始为其作出贡献的工人阶级作家的共享。当然，像这样的情形，问题在于，这一观点的证据只能在得到充分表达的作品里才是清晰的、可以获得的。然而这一观点是从这一证据范围内不适当地推断出来的，它可能拒绝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未曾表达出来的感受结构的存在。我感受到了这种批评的力量。

确切地说，你是怎样逐渐形成这个概念的？

我第一次使用它实际上是在《电影序言》中。那一段是这样说的：“在对一个时期的研究中，我们或许能够多多少少地正确重建它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组织，并在极大程度上重建它的支配性观念。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一复杂整体中的哪一个方面是决定性的；一个像戏剧这样重要的习俗，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会在各种程度上呈现它们整体的性质……在各种程度上，把一部艺术作品与所观察到的社会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联系起来都是有用的。但是，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经验，在分析中会认识到，当一个人对照社会整体可以分离的局部衡量这部作品的时候，仍然还有一些因素在外部找不到对应。我相信，这种因素就是一个时期的感受结构，它只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艺术作品本身的经验才是可以认识的。”^①换句话说，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分析现有书面作品的程序而形成的，强烈地强调书面作品的形式和常规手法。当它被如此限定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然而，论证其普遍性的压力不断地导致我说，这样的作品是对某种更为普遍拥有的东西的清晰记录，我认为这么说是恰当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以某个时代的教条与法规编码的法定意识与实际经历其逻辑结果的整个生活过程相互作用。我可

^① PF, pp. 21~22. ——原书注

以看出,这里可能通常是艺术的社会源泉之一。然后我继续举出的例子是,维多利亚早期资产阶级正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作家创作的小说之间的反差。我从未热衷于这种故意的对立表达,但是关键在于,你可以察觉它在一部又一部并无其他联系的作品中连续发挥作用,在此意义上它是一个结构——人们不是从彼此那里认识到它的存在的;然而与思考的结构相比,它更是一种感受的结构——一种由冲动、克制和语气构成的模式,其最好的证据常常是文学或戏剧作品中实际存在着的常规手法。直到今天,我发现我一直是从文学分析的实际经验而非从任何理论上的确信回归到这一概念的。

如果遵循对重要时期的文学记录,那么,在你对这一术语的历时性应用中,似乎仍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你已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任何既定时期的感受结构主要涉及的是活跃的青年一代所完成的创造性作品。你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里是这样写的,“当前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数艺术形式是与已经清楚显示的社会形式相关联的,这些社会形式要么是主导性的,要么是残余性的”,而“感受结构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主要关联的是一种新兴的形式”。换句话说,其他艺术形式呈现的感受结构是作为社会过程的结果而非解决方案。那看上去相当一致。但是在同一页里你也这样说:“在最佳的状态下,有时一种新的感受结构的出现与一个阶级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英国 1700~1760 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①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从 1700 年到 1760 年。它是一个世纪的一多半。在那个时期,30 岁左右的人大概有三代人是活跃的。在你关于戏剧的作品中,你再次非常明显地使用了感受结构这个概念来描绘自由主义者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僵局;然而这一结构跨越了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或者更远的整个时期,再一次在不止一代

^① ML, p. 134. ——原书注

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你是否要传达这样的意思：存在着前后相继的感受结构，它们在代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是同类的，每一个都代表了对上一个的变化？

我对此没有任何简明的答复，但是或许有一些澄清性的说法。从1700年到1760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因为它包括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感受结构，都与同一阶级的兴起相关联——二者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主义和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我一直试图致力于此，因为在理论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学教育这一意义重大的变量范围之内，通过识别这个阶级的某些部分来阐明这个时期。此外，它是一个有意识地在文化上构成新的阶级的时期，我是想在这个意义上写琼森的。毫无疑问，在一代人之内，存在着主导性的古典主义和新兴的现实主义，但是从1760年起，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在一代人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种非常有力的现实主义最终被遏制和取代了。追踪这一情况的一个途径是考察每一种感受结构在初期所受到的限制。方法论的问题在其他领域里是相似的。你通过分析分离出一种特定的结构，但是当它真是主导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时期的时候，你几乎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从对某个时刻的结构分析转向了一种当然始终是历时性的运动与发展。然后，虽然也承认存在着其他的运动，但是正如你所提出的，追溯某种感受结构中后继性的变化也有重大价值，直到你触及一个性质突变的关键时刻，例如英国的18世纪90年代，然后你假定这是一个新的时期并开始尝试分析一种新的正在形成的感受结构。

你的分析单位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任意给定的社会里界定特定的一代人？这是一个棘手的方法论问题，你实际上在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划了分界线。按照你的标准，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人们，但是那些平均年龄在25岁或者40岁左右的

人们呢？他们适合放在哪里？这是一个在日常谈话中频繁出现的问题，你会为它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存在着像 19 世纪 40 年代这样的时期，它展现了一代作家——在这个例子里是小说家——这些作家不仅年龄相同，而且在理解社会、关注事物和作品风格方面都有共同的地方，在此意义上，他们彼此完全是同时代的。还存在着其他的时期，一些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家似乎根本并不构成那种意义上的一代人：不同的人在那里写着性质不同的作品。如果生命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写出或者出版他们的作品存在着时间上的显著距离，但是作品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就可能发生更为复杂的情况。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霍布斯在年龄上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韦伯斯特（Webster）或特纳（Tourneur）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都是年轻人，他们在 20 多岁时就刊印了他们的剧本。而霍布斯则由于人生的各种际遇变迁以及他的作品性质，直到中老年时期才发表他的作品。所以，有人可能会问，像《白种恶魔》或《无神论者的悲剧》这样的戏剧怎么能被描述为与《利维坦》是同一时代的呢？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读读《利维坦》，与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二者是相互阐明的。它们共同拥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受结构，这包括与当时的官方意识极其抵触的基本预设命题，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初始战争环境。作为一组形式上的常规手法，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们非常突然地提出了这种结构，戏剧中的情节成为相互损害的个人之间的一系列真正无休无止的斗争，从斗争中得不到任何豁免。这与仅仅写于 10 年前的戏剧形成了非常尖锐的对比，在以前的戏剧中，可能会放任最大限度的混乱，但是无论有什么程度的损失，总是存在着一个权威的观念最终将会解决它。霍布斯把韦伯斯特或特纳的假设作为他的起点，但是他超越他们，通过对权威的新的释义产生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后来的历史影响。

所以，“世代”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也许我们需要另一个截然不同于生物学范畴的术语。我自己对此一直都特别留心，因为从1945年起，我就没有与我自己那一代人同时代地工作过，而且我认为这种不对称的现象总是会出现。应该以这种文化分析的方式来谈论根据作品形成的一代人而不是根据出生时间形成的一代人吗？我现在正在试图用某些关于文化形成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长期革命》中，你对感受结构的讨论常常使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比如说，你这样写道：“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处境中，我们才能期待以实质性的方式了解全面的组织状态。我们可以认识其他时代和处境下的大量生活方式，但是在我看来，某些因素始终是无法改变的。甚至那些可以复原的东西也只是以抽象的方式被复原了，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把每一个因素都当做结果来认识，但是在当时的生动经验中，所有因素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是一个复杂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是，对某个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生活性质的理解；理解特定行动被结合成一种思考与生活的方式的手段。”^①你继续说道，一旦我们接近过去，生动的证据就“缄默”了。这大体表明了，把握或解释过去的感受结构要困难得多，而关于当下感受结构的体验则是现成的。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主张的话，确实应该在相反的方向上发挥作用。目前，我们面对巨量的未经选择的文化行动，这会使得从内部把握当代感受结构的性质非常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许多行动方向的不确定性。反之，对于以过去为中心的作品和文献，存在着一些明确具体的历史判断，这些判断典型地体现了过去的性质：过去的材料比较固定不变。现在的变移性和不确定性至少使得解释现在像解释过去一样困难——如果说不

^① LR, p. 63. ——原书注

是更困难的话。有时你似乎近于承认了这一点——有一次你说,对于任一时期的感受结构,不是所有那些体验到它或者对它产生了影响的人都会对它有完全的意识。这必定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识别感受结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你关于戏剧形式的一章里,有一段你这么说:“在一个人自己的一代里,绝不容易理解当下处境的是1630年或1735年的那种情况——充斥着大量行动但却没有持久的基础,还是1530年或1890年的那种情况——一场重要的运动正在开始。”^①这似乎是一个更可接受的立场。但是你怎样才能使它符合你早期的主张呢?

我想,我只是混淆了在场和历史呈现的性质,前者从直接表达或者系统化了的规则中识别出感受结构,而后者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说的是,从语法上说,虽然感受结构总是以现在时态存在,但是从时间角度出发,我并不认为感受结构在当下比在过去更容易复原和理解。当我在10年或者15年之后重读《长期革命》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站得住脚的部分是对感受结构的结论性分析,因为它把握住了广泛的不同意见并把它们置于感受结构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看做是反向的反应,没有这种反应,一个结构崭新的时期就不太可能到来。当然,在这一时期的现实习俗和生活方式中,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一个人或许会非常幸运地偶然确定了当下的感受结构,但是在理论上我会说这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个人对结构的理解只能通过超越与其同一时代的经验变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我认为发生这种混淆的原因在于,我当时不愿意非常强烈地坚持某种感受结构的确切存在,因为它截然不同于一个时代的官方思想或者普遍接受的思想,后者总是在它之后出现。

① LR, p. 297. ——原书注

你刚才使用的措词带有《细察》的回响。在什么程度上感受结构这个概念体现了既保持利维斯强调经验的方式,但又给了它一种客观和历史的形式?

是的,“经验”这个词是我取自《细察》的。但是你一定记得,我始终在致力于文学技巧和文学形式中的历史变化。利维斯的力量在于重现并解释“一部作品中的生动内容”。相比起来,《细察》传统在一切对形式问题的思考方面都是非常弱的,特别对于经历了历史变化的深层形式结构更是如此。在写作与戏剧有关的内容时,我对此是非常清醒的。另一方面,我知道一些普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分析,它们中的大多数过于迅速地从文学作品转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以至于在寻找作品之间社会联系的时候跳过了这些作品本身。感受结构这一概念是计划用来聚焦于某种社会历史关系模式,这种社会历史关系模式完全内在于作品之中,而非可以从作品中加以推导或者通过某种外部的鉴别分类来补充。

你已经强调了“感受结构”这一概念的文学起源——它对于你的文本批评工作的帮助。然而,在《长期革命》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危险,从把一个时期的文本作为感受结构的特有证据,悄无声息地过渡到把感受结构作为这个社会结构或者历史时期的特有证据?这一概念从而趋向于变成一种理解整个社会的认识论。这种从文本到感受结构、再到历史的倾向似乎不易辩解。

我现在非常强烈地感受到限定这一术语的必要。在一些例子当中,一系列特定作品中可以触知的感受结构毫无疑问清楚地表达了某个超乎其外的经验领域。在那些可以确定的特殊历史时刻这是尤其明显的,在那些时刻,非常新颖的作品引起了由于经验的确认所造成的突然震撼。在这些时刻正在发生的情形必定是:某种真正非常广泛的经验突然找到了一个对它表达清晰的语义符号。对这种经验,我现

在会称之为前经验。另一方面,一系列主导性的形式或表现手法——在此意义上的感受结构——可能代表了对于社会从属群体,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某种深刻的障碍。在这些情形下,如果假定一种表达清晰的感受结构必然等同于尚未得到清晰表达的经验,那是非常危险的。例如,在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似乎正在努力表达某种经验,由于这个阶级的从属地位,由于他们缺乏接触文化生产手段的途径,但也由于某些表达方式、表达手法的主导,他们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从未得到完全清晰的表述。但愿你能看看实际的联系,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强烈地攫取其他作品。劳动人民利用了雪莱,他们在所有人中偏偏利用拜伦,他们对盖斯凯尔夫人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回应。他们该不该这样做呢?这些作品可能只是他们自己感受结构的近似物或者替代物。另外,还有一些历史经验根本从未找到过它们的语义符号,我在写《乡村与城市》的时候对此感受颇多。即使存在着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多的文学表达,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缄默区域。不可能用其他人的感受结构来填满那片缄默。

那从得到清晰表达的感受结构出发,界定了社会经验的概念。但是依然还存在着经验本身在你的作品中具有认识论特权的问题。在《长期革命》中,你说过多次,任何描述的关键都是作为其起点的特定经验。经验在认识论上是决定性的,这一观念主要在你的绪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你在绪论中写道:“我将自己限定于英国社会,并不是因为对发生在别处的事情缺乏兴趣,而是因为我只有在生活的地方才能真正获得感兴趣的事实。”^①这一假设导致了完全未经历史证实的推论。例如,当你论述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你列出了对于这一时期感受结构的七种决定性影响,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影响与国外的发展有

^① LR, p. 14. ——原书注

关。然而如果你看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你所讨论的那部小说，你就会发现她直接警告读者，在英国存在着重现1848年巴黎起义的危险。实际上，同一时代的英国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震撼世界的1848年欧洲剧变——仅在数年之前，皮尔(Peel)实际上就在他的乡下庄园修筑防御工事，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攻击的危险。但是由于1848年不是一个直接意义上的国内经验，在你的叙述中甚至没有提到它。

我列出19世纪40年代的主要特征，其实际用意是要根据传统的设想，划分出这一时期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应的方式。文学分析的目的因而是努力展示所有被文学作品忽视了的压力。因而《玛丽·巴顿》的写作处于这样一个感受结构之内，它特别适合推测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生——那就是她的开场白的要义。因为在1840年代晚期，许多英国作品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就是在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其暴力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那种张力是《玛丽·巴顿》写作中的深层进展之一。你也可以在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中发现这一点，他写了一封信，对1848年的法国革命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希望在这里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是他随后就具有代表性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的穷人缺乏必要的思想和才智。对于我当时正在描述的那种感受结构来说，那种同情的倾向和对于暴力的恐惧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肯定会更加强调它。

但是，你的回答仍然停留在你当时正在重建的那些与亲历经验相关的术语。问题的重点在于，你的作品写作通过呼吁国内经验的优先权，似乎加入了这些限制。在你最初的方法陈述和你刚才做出解释的缺少对国外经验的强调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应该解释一下，你从我的绪论中引用的这些句子实际上更多指的是《长期革命》的第三部分，我在这一部分实际

上所做的是考察英国的当代情况,甚至还尝试勾勒出整体分析的方案,你已经指出了这是第二部分缺乏的东西。关于在所生活的地方获取事实的主张,涉及的并不是19世纪40年代。无论如何,我并不是通过这样做来规避我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要点。如果这种分析模式是可行的,它必定在任何地方都能适用。当然,对感受结构某些要素的探索只能通过对语言进行非常精密的分析,这种语言永远都是国内的民族语言。不过,这种结构最通常的证据是文学作品中的传统表现手法,它常常是超越国界的。事实上我自己的观点是,与关于19世纪40年代的评论相比,我更加引人注目地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我对易卜生和布莱希特的说明——我对他们的经验背景所知甚少。

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澄清。但是与经验范畴有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仍然令人感到困惑。它必定是你反复使用并且没有在《关键词》中给出条目的仅有的一个词。在利维斯的作品中,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主观性价值概念。尽管你已经改造了《细察》集团对这个词的使用法,它却继续传达了其知识传统上的某种含义。你最近在讨论某种感受结构时,把它解释为自觉保持的意识形态与新兴经验之间相互抵触的领域。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兴经验,这一观念似乎预设了主体和主体陷入其中的现实之间的一种质朴联系。那不是留下了一扇微开的门,迎接利维斯式的概念——“生活”或者“经验”——回归吗?

不是。那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毕竟《长期革命》第一章的基本论点正是在说,不存在任何自然的观察,所以也不可能存在与现实的直接无中介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许多语言学理论和某种符号学理论中,我们处于移向相反立场的危险,认识论的东西完全同化了本体论的东西,认为我们只有以认知的方式才能根本存在。面对形式主义者朋友们——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影响到对“外部”所指之物可能性的怀疑——有必要恢复唯物主义的一个绝对有根据的推论:无论

是否有人用符号表示它,自然界都存在着。事实上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们一直在经历“左派”狂热的理想主义阶段。阅读蒂姆巴纳罗(Timpanaro)的提醒是一种积极的调剂:无论物理有机体是否得到符号表达,它们都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物质世界里存在着。

那就是说我认为,在一个人自己的处境中,一个词的含义与所指之物之间的关系与任何别的处境都不相同。这很难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在与他人处境有关的情形中,一个人只能通过以往记录下来的表述加以理解,一个人全部拥有的必然只是文本或文献。毫无疑问,在一个人自己的时代里,仅仅从这些无尽的文献版本中:就可以搜集到比多数人认识到的要多得多的东西。与整个意识过程形成对比——在这里我要强调,对于某些现象来说,不存在毫不费力的认知,因为它们有一个毫不费力的名字,这个毫不费力的名字就是“潜意识”——在一个词的含义和所指之物之间已经确立或者已经提供的那些联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交叉。形式主义的立场是没有能指就没有所指,那等于在说,我们只有在表达行为中才根本存在。现在,这或许只是源自我自己历史的一个概括,但是我已经发现了那些我称之为感受结构的领域,这些感受结构最初的形成常常不是因为某种确定的骚动或者不安,而是因为某种特定类型的张力,对于它们,当你退后一步或者回忆的时候,有时能够发现它们所指的某种东西。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在得到清晰表达的东西和被经历的东西之间有一个意识的过程,感受结构的特殊定位是不断对得到清晰表达的东西和被经历的东西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一定出现在这一意识过程之中。如果你喜欢的话,被经历的东西只是经验的另一个措词,但是我们必须为那个位置找到一个词。因为,所有那些没有被完全清晰表达的东西,所有那些被经历为骚动、紧张、障碍和情感麻烦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正好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源头,不管在文学语言还是在文学表现方法中都是如此。我们至少必须假设在这一意识过程中进行对比

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它是一种对比,那么是和什么东西的对比?如果直接用像经验这样非常普及的词汇补上这个缺口,就可能会对论证的其他部分有不利的影晌。因为它可能会暗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广泛适用的例子,或者会追求某种未经检验的主体性。我相信这一对比过程虽然常常以表达不太清晰的方式出现,但在我们最终的清晰表达中它却是许多变化的源头,因而必须寻求一个词,来表达在各种缄默中没有得到充分清晰表达或者不是完全令人轻松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通常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出声音的。我只是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是什么。

萨特在他晚期关于福楼拜的作品中描述了他称之为实际经验的东西,在你刚才的表达和萨特的描述之间有着某种显著的相似。尝试澄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或许是扩大考察范围。结合另一个法国思想家的例子,迄今为止,可以把阿尔都塞作为直接相反的例子与你对经验的使用进行对比。在阿尔都塞的作品里,经验只是幻觉的一个同义词。在其纯粹的状态下,它是意识形态——是科学或事实的对立面。那是他从斯宾诺莎那里接受的一个多多少少未经修正的立场:它代表了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一种极端形式。在你的作品中关于这一点所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经验是与直接事实有关的领域。有时,如同我们在《文化与社会》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你甚至把概念性或推论性的观念与直接的经验对立起来,把它看做是肤浅的和不可靠的——一个由虚假的固定性和清晰性构成的领域,一个“教条”的世界。这样的强调显然有着漫长的历史: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洛克(Locke)。在哲学上,它代表了欧洲经验主义的经典立场。现在,明显应该对两种态度都表示反对。比如说,在阿尔都塞的作品中,科学/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立实际上等同于以科学作为真理的观念。既然直接的经验是意识形态幻觉的媒介,阿尔都塞实际上在主张,只有通过

概念的生产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实。然而,这明显不适用于如下的事实:我们可以向窗外眺望,说出太阳是否在闪耀,而不必有气象学的知识。我们的报告是一种直接的经验,记录了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基本的要点。但是这种经验完全从阿尔都塞的体系里漏掉了。另一方面,你趋向于把经验当做最深层的真理领域,这导致了相反的倾向。因为非常明显的是,人们或许有非常有效的经验,完全确信他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但是从一个不同的社会观点或历史观点来看,我们可能把这种联系理解为浸透了幻觉,是在别的某个地方构成的。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某些心理上的紊乱或疾病,一个人彻底被某个对他来说非常生动的经验控制了,但是人们完全不知道他的经验来源,可能会在根本上错误地解释这个经验。类似地,用前面那个例子来说,某种辨识天气的能力并不足以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知识:直接经验与作为一种科学的天文学是直接相抵触的。

在《长期革命》中,你建议,一个人应该依据实际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经典作品来尝试解释整体的社会结构,如果认真对待这一建议的话,它在根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即使在国内社会里,有许多明显的进程是我们的直接经验本质上无法接近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期待从我们个人的日常经验中推断出资本积累的规律或者追逐利润率的倾向。但是这些经验可能是与整个社会运转方式有关的一种绝对基本的决定性因素。那不是要谈论这一原则在国内表现出来的局限,它会在实际上取消国际性的研究或者对比。然而,这个世界当然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这样,以至于没有对结合成这个世界的整个国际环境的认识,一个人可能就几乎不理解自己的社会。那的确是社会主义最初的教训。

在你最近的定义里,你把感受结构看做意识形态或者某种清晰表达与原始经验之间的紧张区域,这里留下了某种危险,你曾经批评过的那些早期的局限性可能仍然没有被完全克服。因为存在着一种暗

示,清晰的表述或者意识形态遮蔽了某种经验,或者通常以扭曲的方式为这种经验赋予了形式,这种经验本身总是更加广阔的。在你所使用的二元对立中,经验必然胜过清晰的表述,它所展示的意义可能是被记录下来的,也可能是没有被记录的——由于缄默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经验总是包含了比意识形态能够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在你最近对霸权概念的政治论述中,你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统治阶级的霸权从来不能延伸到一个社会的整个经验范围之外,因为依据定义它是通过排斥和限制来运作的。^①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你用来阐明感受结构的是意识形态和直接经验这两个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要历史进程,它们不能被包括在这两个词中的任意一个之内。任何关于历史或社会的系统论述一定把目标定位于科学的认识,那是无法从任何文学文本中推导出来的。回到你对19世纪40年代的分析:在那10年间,在地理上相距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事件,比英国发生过的任何事件都更加引人注目,它的影响被英国政府已经确立的秩序立即控制了。那当然就是爱尔兰大饥荒——一场在欧洲无与伦比的灾难。然而如果我们查看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小说中记录的个人经验,它们都没有包括恰好发生在家门前的这场与英国社会政治进程存在因果关系的大灾难。那的确是一个提醒,像你在《长期革命》中似乎偶尔在做的那样,把不同类型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是行不通的。不可能从文本到感受结构、到经验,再到社会结构进行回溯。在能够用以重建某种经验的文学文本和当时的整体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分裂,根本不存在连续性。

我差不多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可以辨别出它的历史应用。非常惊人的是,作为对不可能从经验来理解当代社会的回应而设计的典型方法——统计学分析模式,正好起源于你正在谈论的

^① ML, p. 125. ——原书注

那个时期。统计学理论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数学化的存在，对收集统计数据的安排象征着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建立，如果不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从工业革命中正在形成的这个社会就是不可认知的。在《乡村与城市》中，我试图在可认知共同体与对模糊不可认知的东西的新的感受之间形成对比——可认知共同体是一个反讽性地加以使用的词，因为已经知道的东西被表明是不完全的。对此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反应。在工业革命之后，根据可资利用的由各种概念和语言构成的明确表述来理解某种经验的可能性被根本改变了。对此有许多反应。新的形式不得不被设计出来用以洞察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被感知为模糊不清的东西。狄更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的例子，因为他在不断尝试发现新的小说形式来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在《董贝父子》的一些段落里，他设想屋子的屋顶被拿掉了，或者一片乌云呈现了所有那些以其他方式根本不能被表现出来的鲜活生命的物理形状。他用这些形象来表现基本的社会现实，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现实不是完全根据经验就可以观察得到的。有人可能会把这种方法与发展中的社会调查统计方法交互运用。梅休(Mayhew)和布斯(Booth)之间的对比是非常引人关注的。梅休的作品是由假设、观察和询问之间持续的互动构成。他假设人们为什么回到贫民区居住，然后与人们进行谈话以查明这些假设是否正确；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们没有卖豆瓣菜的挣钱多，那就修正了他对这个社会的观点。有人认为这种社会观测不断地根据经验进行调整，这并不奇怪。布斯的方法相当不同。在他与伦敦东区的任何人交谈之前，他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中完全根据街道绘出了它的结构，然后他用他对伦敦东区的分类结果来证明关于这一地区的基本宣传材料是错误的。至于其公信力，当实际观测与模型的合理性相矛盾的时候，就会存在某些对调查的干扰。我认为这也适用于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

自工业革命之后，在持续存在的问题发生质变的同时，已经形成

了一个从经验出发越来越无法解释的社会类型——这里用经验表示与可资利用的明确表述的生动联系，其中包括对这些表述的比较。其结果是，我们日益意识到分析技术的绝对力量，它们在其最大限度上能够解释一个完整世界的经济运动；我们也意识到自然观察的消极性质，它永远不能获得这些对现实的认识。但是与此同时，这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于，这一必然的认识也导致了理性洞察方法特殊的支配地位，并且相应地低估了某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存在着可资利用的明确表述与被称作“经验”的一般过程之间的日常交流。“经验”变成了一个被严禁使用的词，然而我们应该说的是，它是一个受到限制的词，因为在它的任何一种日常意义上，都有许多信息将永远不会传递给我们。这是一个必要的纠正。不过我发现，正当我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超乎我的承受能力之外，我看到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可接受的例子——即这样的主张：一切经验都是意识形态，主体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这是形式主义的最后舞台，我甚至开始有点儿退缩。但是我认为这个纠正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应该是始终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长期革命》的第二部分，为了发现那些我不可能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我仍然相当依赖统计学的方式。

对这种调和似乎完全可以接受。你可能提到过的领域之一是阶级斗争实践，在这一领域，经验概念显然保持着它的可信性。以社会主义政治语言说工人阶级斗士是“有经验的”，这是一种常态，列宁上百次地使用了这个词，它意味着某种非常准确的表述，一个人即使具有同样或者更多关于社会的传统知识，如果没有那种经验，他就没有能力同样有效地组织行动。当然，这样说也是正确的，一个组织内部对经验的盲目迷恋可能变成某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经验在今天的胜出并不必然规定了未来的策略或战术——部分原因在于敌人自己也从经验中进行了学习。但是作为斗争中的实践，正确地强调经验对于任

何形式的革命政治而言都是必需的。从《长期革命》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你觉得社会主义理论当时正在要求认识的当代社会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反对它的实际斗争经验。是这样的吗?

第三部分的许多内容是一种有意识的比较,比较了当时普遍接受的英国社会模式和我感觉好像正在出现的社会模式。我利用了各种各样可以选择的证据,它们都取自我自己对1950年代斗争和争论的反应——当时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斗争和激烈的争论。但是我对它们的基本感受是,尽管我更接近两者当中的一方,但是两者之中没有任何一方真正符合它们正在试图证明的社会经验。那解释了为什么存在一个无疑言过其实的判断——社会主义几乎完全失去了一切当代意义。我当时想说,首先必须要做的是,不要伪称: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立场是要改变社会,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加入它。与此相反,它是这样一个时期,真正需要做的是把正在非常迅速改变的社会关系与在它们面前没有任何帮助的流行表述进行对比。我认为从这种对比中会呈现出进行相关文化实践的某些方向,我现在会更加坚定地提出这些方向。

或许我们可以就《长期革命》最后这一部分问一个问题,以结束这次访谈。你早前说过,你构思关于“1960年代的英国”的评论时,是把它作为捕获这一时期感受结构的尝试。这使我们想起我们的访谈开始时的一个问题。如果那是事实的话,你怎么把你的分析与社会中的阶级划分联系起来呢?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至少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更不必说还存在着许多拥有自己的感受、历史和记忆的中间阶层。你以单数形式默认提及的感受结构不会趋向于模糊实际的情况吗?

我是在早前提出的意义上使用感受结构这个词的,指的是具有建设性的新兴阶级的感受结构。我当时试图在做的事情是在它出现时

立即记录下它所具有的力量,从而呈现某些先前残余下来的意义,但是也描述出这样的事实——它的生成被包含在支配性的资产阶级结构里面,在这一资产阶级结构中收编了很大一部分有用的工人阶级思想。例如,我认为有必要解释所谓的“无阶级差别”现象:说明在新兴的感受结构中什么是重要的,正在妨碍这种结构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什么。非常明显,某些延宕的特性被丧失了。另一方面,不仅在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中,而且在许多劳动人民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描述中,必然具有向心性的阶级关系被取代为毫无疑问实质松散的阶级关系和特定消费类型的奇怪混合,但是消费本身仅仅是一种市场中的变化,与阶级之间的根本关系没有任何关联。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区分公开的“阶级外观”差别和根本性的不能变更的资本所有权方面的差别。我的说明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感受结构上,而不是当时的政治学说或者政治论争。

3. 《关键词》

至少在英语世界内,《关键词》代表的这种历史语义学似乎完全是一种原创性的探险。你在序言里解释说,《关键词》是从你在《文化与社会》中无法容纳的材料发展而来,但是在写作这两本书之间的20年当中,你的观念显然变化和发展了。与《文化与社会》相比,《关键词》更为深入系统地采用了着眼于历史意义变化的原则。在中间这段时间,你是否受到了与《关键词》有直接关联的其他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或者对它们产生了兴趣?

《关键词》的写作始于我在1950年代的发现:在研究像“文化”这样的词背后的历史语义学时,我发现自己不能更清晰地理解它们的当代意义,我对此感到极为惊讶。当然,它不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理论,因为剑桥的英文课程就包括对某些像“自然”这样的词的讨论,其目的是确定它们的历史用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学鉴赏的辅助。当我认识到这一方法更为广泛的可能用途时,我在《文化与社会》中写了个附录,选出了一些与书中的问题范围有关的词。由于长度的原因,出版商不想把附录放进去。在这两本书出版之间的那些年里,我继续记录了更多经历过重要词义变化的词例。同样我一直在阅读更多的语言理论。尽管现在我知道有一两个可能与我相关的学派,例如致力于某些中世纪词语的德国学者们,但是在当时,我不能找到在实践或者理论上沿着同样方向前进的任何其他研究。所以在此意义上让人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仿佛一直是在独自地工作。实际上,我当时在读的多数语言学作品(特别是1960年代的作品)在倾向上是结构主义的,偏离了意义中的历史发展这一观念。我认为我有某些对其作出反应的冲动,我强烈地感到不但需要结构分析,还需要一种历史语义

学。《关键词》一书出版的时候，我在前言结束的地方邀请读者邮寄他们感兴趣的其他词语的材料。此后我收到了大约 200 个词的详细记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是在其他工作之余这样做而已。有些读者也写信说，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里存在着有意识地追踪一个特定学科或者主题的可能性。我现在认为这就是应该出现的情况——我愿意看到这一研究更加系统化地得到扩展。有些人可能以前在作品中放入了一些关于某个词义历史变化的附带段落或者片段，他们现在正在从这些词义的变化事实出发开始他们的研究，这令我感到高兴。理论上的偏离则是另一种情形。

如果对《关键词》与《文化与社会》进行比较，在《关键词》中，一个绝对根本性的要点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理解，其原因在于所讨论的这些词语的范围更为宽广，不仅包括可能具有的词义，甚至还常常出现的词义的 180 度逆转——以这种方式词语代表了与它们的最初意义确切相反的意义。“个人”就是一个醒目的相关例子，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许多例子。对这些词语含义的展示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你将如何总结这种极其不定的性质的意义呢？你从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

在理论的层面，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其动态意义而言，语言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会产物。换句话说，不是在与结构主义相符的意义上——一个核心的意义体被创造和传播开来；在与任何一种社会产物同样的意义上，它是各种各样的变化、利益和关系争夺支配地位的竞技场。围绕某些经验将会发生某些危机，这些危机通常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被记录在语言之中。其结果导致了一种语言观念，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后来在人群中得到复制的任意符号的创造（这是结构主义的模式），语言作为符号的创造呈现了一个既定社会中可变的和经常被颠覆的各种社会关系，因而，进入它们之中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之

间相互对立、充满冲突的社会历史,包括了符号之间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各种变化。这也涉及对把语言当成一种共同财产的理想主义描述的拒绝——在其最好的情况下,那种描述就是利维斯的语言观念,认为语言是一种从各个时代传承下来的一系列遗产,传达了关于共同体的最好领悟。尽管利维斯强调语言文化的重要性是正确的,但是其语言连续性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它建立的基础是对在历史上被特别变形和颠倒了的事实的抽象,然后提出一种单一的意义传统,坚持用这种意义来支持特定的当代价值。所以,我在《关键词》中开始的工作对这两种有关语言本质的说明都是一种矫正,那就是它在理论上的价值。与此同时,它也允许我考虑迄今从未被充分研究过的大量社会迹象,这些社会迹象可以被非常精确地加以研究并与社会史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那些本来可能倾向于这样做的人通常以为语言仅仅是在别处发生的变化的工具或记录;然而在我看来,某些意义的转变揭示了在结局上混乱、矛盾的非常令人关注的时期,揭示了历史决定中的潜在因素和真实社会历史的其他进程,以这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相当精确地对它们定位,而且可以提出更为常见的证据。真正有趣的是随后继续跨语言进行这种研究,看看在某些类型的社会秩序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语义学变化,这种情况必定是存在的。

由《关键词》开始的这类作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看做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影响——它证实了被认为普遍永恒的观念和范畴实际上是显著可变的,受到时间的限制。然而与经济实践相比,语言上的习惯具有甚至更为自然的外观。与人类生活的其他任何领域相比,语言或许更加倾向附着于有关它的长期性和本质性的神话——因此在20世纪,许多哲学上的神秘主义都集中在语言上。你在《关键词》中的策略实际上是非常敏锐地记录大量词汇的词义变化,而不是追踪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中介。如果从相反的方向检查相同

的哲学基础,仔细考虑词语的最初用法或者词义上的试验性转变,然后考虑那些词语用法和词义转变的扩散,追溯承载它们的社会力量——换句话说,写作一种社会解释史,这样的做法行得通吗?

是的。一旦标示出一个词的显著变化,比如说,像“趣味”这样的词,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看看是在哪一个社会领域开始它的特定用法的,然后看看是在哪一个社会领域这些用法被颠覆了,诸如此类。同样的步骤对于“科学”一词来说也是有效的。这对于“家庭”一词可能也是适用的,这个单词用法的变化可能会被定位到较早的时期。在某些场合,非常忠实且适应个别差异的记录是必要的,以便展示出语群中开始出现的意义变化,这种变化怎样被普及了或者是否被普及了(要么通过普通教育系统或者其他某些途径被扩散了,要么仍然是一个特定阶级内部的词语)。所有这些可能性必须得到探索。

与你在《关键词》中选择处理的这些词汇相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你在这本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未提及,那就是它的语源学构成。有 110 个词条,在这些词条中,不少于 106 个词具有拉丁词源;仅有 4 个词是盎格鲁-萨克森形式。当然,这种比例与英语词库大体均衡的状况极不一致,后者的比例大约是 55% 的拉丁语对应 45% 的盎格鲁-萨克森语。《关键词》的形式实际上与《长期革命》中极有说服力的一段有直接关系,在那一段中,你论述了诺曼底人军事征服英格兰之后法语和古代英语分裂的影响,它早于你此外论述的 14 世纪时一种共同语言的出现。你写道:“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分时期,英语被转到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权力的人的口中。因而词汇中与知识和权力有关的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和成批的与一种更为丰富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词汇,共同来自诺曼底人的源头……在英语中可能仍然具有重要

意义的是,如此多的与知识有关的语言将要具有这种特殊的阶级印记。”^①实际上,似乎存在着一个合理的推测,对于特定的读者群来说(这一读者群应当不是来自这样的阶级背景:教育使他们熟悉了当代英语受到的拉丁文影响),相比在德国或者法国这样具有更为同质的语库的国家里将会出现的这种情形,他们与形成了《关键词》主题内容的那种词汇也许存在着更大的距离。在英国,由于其分裂的语言遗产,民主地理解和占有全部语言资源的问题可能特别尖锐。

当我听一个法国斗士或者工会领袖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的确有这样的印象,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他们掌握了更大的词汇量,这可能最终影响到了他们的表达质量。我也怀疑你用德语是否能够提出一个相似的词汇列表。我认为你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在英国感受得特别深刻。在从事成人教育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感到忧虑,人们在街区里辩论时,使用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概念,但是他们使用这些概念的方式可能会毫不费力地滑向反知性主义;或者会出现更为不幸的例子,某人偶然见到一个词,并未完全理解它,却开始使用它,这在工人运动中经常发生。在我不能把附录放到《文化与社会》中之后,我想在《论坛报》就那些导致了异议的词汇写一个系列文章,那就是原因。充分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工人阶级需要掌握所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手段。我现在注意到对我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没有兴趣的人们在使用《关键词》一书,他们遇到这些词中的一个,想在书中查找它。我有意在书中纳入了某些词,因为我觉得,人们不了解它们更加引人注目、更为复杂的社会史,因而常常要么没有把握使用它们,要么因为统治阶级的报纸或者政论作家有力地提出它们的一个词义而退缩不前。我想给他们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使用这些词语。

① LR, p. 240. ——原书注

这本书最受欢迎的一个特色是，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媒体中其目的在于保存我们语言的当前运动的生硬和无知状态。当然，在这种监察人态度和保守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美国的门肯(Mencken)和奥地利的克劳斯(Kraus)是这种保守主义相当著名的例证，保守主义的英国拥护者是对他们的滑稽模仿——对于致力于保护我们语言能力的泰晤士报定期新闻专栏，克劳斯会想到什么呢？词语只有一个永远固定的意义，任何对这种意义的偏离都是无知的——传播这种观念的努力在最近几年已经持续增强。当你写作《关键词》的时候，必定想到了这些，是吗？

当时没有。但是从那以后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当然，有必要抨击这些机构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把语言的变化误认作退化，还有人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试图指定像“民主”或“代表”这样的词。英国最晚在1880年的一部词典对民主的定义是“内阁的共和政体形式”。对于他们声称捍卫的语言遗产，这些传道者确然是无知的。

我们可以问一些你没有放进书中的词吗？一个相当重要的词是“经验”，我们早前提及过它。那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吗？

在我讨论18世纪“经验”和“试验”之间的英语分歧的时候，附带提到了它，不过是在“科学”这一标题之内。《关键词》修订的时候，它会被包括进去的。

在当代词汇中，另一个词是非常显眼的，毫无疑问会有一段引人关注的历史，那就是“族群”(race)。它当前的用法一定是最近出现的吧？

关于这个词，我进行了大量阅读，我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它还是被遗漏了。它从地域性的家族和人种扩展到更具一般性和政治性的标志。另一个也被排除在外的非常重要的相关词语是“性”。我认为，

“性”作为男女之间区别的一个普通概念，以及此后附属于它的专有肉体意义完全是最近出现的。我猜测，在那个词里存在着许多社会史。

在《关键词》中，你关于“无意识”这个词的条目特别有趣，因为它似乎是你第一次针对心理分析的这个主要范畴暗示你的态度。你在这个词条中说，常常搞不明白，在通常处于从无意识到意识转变的各种经验范围之内，无意识的假设是表明了转变失败的情形，还是指明了意识和无意识作为具体的抽象概念是指两个固定的状态。然后你不提名地提到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这个学派“抵制‘常态’转变（从无意识到意识）的推论，相反形成对照的是，它坚持一个完全无意识的领域，除非通过特殊的方法，从这个领域进行转变是不可能的”^①。因此，我们是否应该理解为，你相信存在着常态连续的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某些转变失败的例外——你认为那就是当前最可靠的、可以接受的科学假设吗？

让我这样来表述吧。在我最终确信一切其他方向都是徒劳之前，我当然不会期待一个只有通过某些专门的技术才可以理解的优先的无意识范畴。然而，说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变是常态的，就主张得太过分了。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许多价值可以被完全认可，但是研究要沿着实用的路线继续下去，在这里，两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这里开始活动。一方面，在清楚表示出来的言语和沃洛辛诺夫（Volosinov）所谓的深层言语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区域，这一区域非常引人关注，在这里存在着一些我们肯定都知道是发生在表达之前的过程，在那种十分严格的字面意义上它们不是完全有意识的。这些过程非常难以识别，但是我认为，它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与日常经验有关的内容。这些例子包括，作家们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发现他们想说的话

^① K, p. 273. ——原书注

的过程。这意味着谈及可以被清晰表述的并变成意识得到的无意识过程,它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假设。但是我不认为这必然能被称作是常态的——它常常被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另一方面,真正作为一种完全常态过程的是语言的社会文化发展,它等同于从无意识到意识转变的历史可能性,甚至是这种转变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

但你不是已经建立了对常态这一观念的偏见吗? 因为,毕竟所有清楚表示出来的言语都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言语,所以如果在它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层的言语,必定存在着一个持续进行的转变过程。

那是第二点形成之处,它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尤其应该进入的领域。在那里存在着某些形式的完全没有夸大的压抑——那种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实际上经常在)军事术语中得到了更为一般性描述的压抑——它在语言中真正被制度化了。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领域,因为在其内部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纷争),存在着某些时期的语言,它们施加影响于缄默的区域,因此,在理论上是一种常态过程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特别引人关注的,因为总是存在着深层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支持那种缄默。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区域,原因在于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就像根据它们的语言所证实的那样,某些文化没有能力思考某些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确信洛希-兰迪(Rossi-Landi)的论点,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题。然而,我不主张在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压抑性的语言处境。人们谈到语言是作为一种表达手段,但它明显也是一种选择的手段。在某些社会历史环境下,存在着不可被言说的东西,并且因此不能以任何衔接的方式对其加以思考。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即与话语有关的格外令人震惊的创新(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创新也产生了获得承认的基本要

素。在我的术语中,一种前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种新兴的感受结构,就相应于这种现象。

你讨论无意识的方式总是根据某种内在的缄默区域,根据抽象的压抑。然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无意识在言语中始终是活跃的;与其说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的空白区域,彻底被压抑到经验之外,不如说它像是所有清楚显示的事物被隐藏的一面。对于他而言,真正压抑的情形是,从无意识到意识沟通的常态过程被阻塞了,结果导致一种可以在意识中追溯的确定的紊乱症候——在意识中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移植。当你谈到无意识的时候,仿佛它是一个保留的部分、一个特殊的飞地,可以由某些社会禁律造成,然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与意识有着相同的边界或范围。你对无意识过程说明的结果是极大地减少了它们在量上的意义,这可以对比一下弗洛伊德的说明,对于他来说,无意识是一个积极的结构,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发挥着作用。把无意识作为一种主要心理结构的观念可以与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的图绘分开,他的图绘常常是非常粗糙的。你会同意这一点吗?

当然,那是一种更可接受的表达无意识的方式。但是假如我们是要把无意识理解为永久活跃在意识之中,那么我想在被过度同化了的不同情形之间做出区分。显然,在意识的表达中存在着大量未觉察的内容——我们所说的多于我们所知的,我们揭示的多于我们认识的。侥幸的是,可以使用那个附加的限定词“未觉察的”,因为,在绝对的意义上,关于这些过程没有什么必然是无意识的,对于那些并没有这些特定的注意失误或者联系疏忽的人,对于那些可以修正说话者未觉察内容的人,通常理解这些过程是可能的——这毕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心理分析主张。在非常简单的日常层面,那是我们永远在彼此面前展现的高度理性过程,我们说,“如果你那样说你就正确地理解了”,或者说:“为什么你不那样表达……?”这在情感联系方面和知性联系方面

都是非常普通的谈话。考虑到无意识捕获的那些心理联系,我想对那些未觉察的内容进行类别区分(但愿对那些能够被真正称为无意识的内容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要性,它们是对意识交流和清楚的讲话的真正活跃的干扰,造成干扰的力量不易受到本质上是常态的解释、推导和随后的说明过程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一区域是如此巨大的一个挑战,我确实希望能够确定沿着哪个方向寻找与它有关的信息。虽然它以前已经在文学作品中被多次描述,一旦它的价值按照科学的方法得到承认,就立即会达到对它的分类说明,实际上就排除了悬而未决的更深的探究(根据定义,它是人类曾经做过的最困难的研究,正是因为它要研究那些妨碍了这样一种研究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对于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尝试,你的观点是什么?

虽然从来没有任何尝试说无意识所显示的生活领域是不重要的,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点从来没有以每一种社会和经济关系都被看做是值得怀疑的那种方式,被视为是值得怀疑的。那已经导致了再三的努力,通过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诸心理分析,以补偿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缄默。我不想对马克思主义保留我认为是一种对它的重要挑战的东西——人类基本动力的重要性,这些动力不是理想主义的人类天性,而是朴素的生理、物质条件。不过,我不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或者考德威尔通过它得以被暂时接受的基因型(*geno-types*)概念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以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已经无法探究的这一区域。我从未觉得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可以被用那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一方把基础的实体描述为没有历史记载的和普遍性的,另一方把它们描述为被一直变化中的人类社会多方面地创造和改变的,在二者之间可能没有任何有益的折中。虽然生理上的数据可能实际上是普遍性的,我们相应的行为却是生理的和文化的,两者都不能被归纳为

另一方。

大概你对心理分析理论和它的实际治疗效果也都是怀疑的？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会说，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别人，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治愈别人，我就不会批判它们。与当代文明有关的情绪或者心理上的紊乱达到了如此显著的比例和强度——难以了解是否它们比早些时期更为强烈，因为大多数男女的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以至于没有任何合理的治疗形式可以被取消。无论我们可能如何怀疑与心理分析中的治疗功能相关的思想体系，重要的是以某种伊里奇(Illich)式的对医药治疗的拒绝划定界线，医药治疗虽然出于良好的目的，最终却残酷地成为冷漠面对苦难的当代文明中的一切暴力的同盟。然而的确真实的是，心理分析没有任何显著的或者独特的治疗记录，可以用以反对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没有片刻会值得尊重地讨论的其他治疗模式。还必须说的是，只能通过专业人员将你从一场艰难的情绪危机中解救出来的这一原则是一个显著具有资产阶级科层制特征的观念。我认为，许多人从完全的紊乱状态中被解救出来是通过日常关系的实际改良——我认为大多数医疗工作者不会否认这一点。某些类型的社会变化也可能对人们的心理状态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存在着一个事实，在某些情形下，行为是有疗效的，某些类型的关系也是有疗效的。但愿某些类型的专业人员也是有疗效的——只要他们不主张在等级上的绝对优先特权就好。

我现在对心理分析特别感到不安，原因在于它在妇女运动某些方面的强烈程度，在我看来，妇女运动已经根本性地明确转向了它。我完全不愿意反对她们，但是她们的某些表达不言而喻是草率的。奔向目前的权威以对实际发生在她们内部的情况提供“科学的说明”，这是一种无助的信赖状态，是一个关于文化的事实。另一方面，从一个权威到另一个权威的非常迅速的转变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

非常积极的求索过程正在进行。无论如何，这一运动最终不得不清查它的存货，回到一些显然是更加枯燥的程序中，问一些是什么、在何处和怎么样的问题。

III. 戏 剧

1. 《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

你特别关注戏剧的起因是什么，你目前在大学里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对戏剧特别感兴趣。在我的学业中，吸引我投入最多精力的是关于易卜生的研究成果。在我离开剑桥之后，我继续从事这一题目，相当自觉地把它作为一个学术计划——关于易卜生的想法被拿过来直接变成我关于戏剧的第一本书。因此始终存在着一种学术上的连续性。在大学环境里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大体上被要求讲授的课程是戏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的另一部作品从一开始就形成于大学的结构之外，最初是在成人教育中，然后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个人的研究计划，即使在它们与我的学术工作交叠的地方也是如此。

戏剧形式的使用是公开的和集体的，但是文学形式的使用则由许多个人在私人环境里进行，你认为这个事实有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吗？

是的，在我来看那是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不久就认识到，在现在的组织方式下，剧场的功能之一是要以切断其所有集体功能的方式重新合并作为一种模式的戏剧。所以，在这样的文本里——例如《政治

与文学》“关于演员的一场对话”中，或者甚至《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导言中——它强调了戏剧和剧场之间的某种对立，你可以发现某种常见的对剧场的敌意。当时我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经过80年以上的历史，为了取得任何戏剧方面的进步，戏剧必须在每一个重要的时机与剧场决裂。在戏剧作为一种崭新模式或集体模式的潜能与妨碍或者控制了它的剧场特定结构之间，似乎始终存在着某种冲突。

《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实际上是你写的第一部书吗？

我想是的。原文写于1947年到1948年，然后在我能够为它找到出版商之前，又有两年时间的间隔。当它最终被接受的时候，我加上了论述《鸡尾酒会》的部分，那一部分当时刚刚写好。

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与利维斯及其影响保持实质距离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戏剧的关注——那是利维斯根本忽视了的一个领域。因此，在《阅读与批评》中可以发现的明显的利维斯主义因素或许不应该被过高估计，因为《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它在《阅读与批评》之前——以某种方式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看这本书的时候，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你似乎有计划地构思了这本书，把它作为实用批评的一种直接扩展。你在绪论中写道：“我的批评是，或者意欲是文学批评。它也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其主要部分建立的基础是源于文本的经过论证的判断，而非历史调查或者一般印象，就是说，它是在英语中作为实用批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实用批评始于艾略特、瑞恰兹、利维斯、燕卜苏和穆雷(Murry)的作品，主要涉及诗歌。自此以后，它被一群重要的批评家加以发展，涉及了小说。在戏剧中，除了艾略特论述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家的作品和其他批评家论述莎士比亚的作品，实用批评的有效性还有待检验。所以，这本书除了其主要目标之外，在把实用批评方法运用于当代戏剧文学

方面,还打算作为一种应用试验。”^①

没错。但是在这里有必要在实用批评和利维斯之间作出区别。利维斯的确是实用批评最有力的代表,因此在回顾中他常常被当做实用批评的创始者或者导师。但是如果你看看实际的历史,实用批评模式是由瑞恰兹 1920 年代在剑桥英文系确立的。毕竟是他铸造了这个词。从此以后,它在全体教师中就是一种确定的程序模式。例如,在利维斯很大程度上被英文系排斥的期间,实用批评仍然是课程每一阶段的必修论文,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因而,这样一种观念——采用实用批评程序模式完全是对利维斯的忠诚——只有几分是正确的。当时利维斯和剑桥英文系其他教师之间存在着争论,在一个低于他们的争论标准的层面,任何人都在遵循一种与被适当扩大了范围的文学文本相关的分析模式。无论是否对利维斯感兴趣,无论是否赞同他,我们都在实践这种模式。把实用批评的程序模式等同于利维斯的文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后者是对它的一种非常专业化的应用。

《电影序言》写于大致同一时期,在题目为“主要戏剧”的一章中,你写道:“这样一个事实正在逐渐被接受,或许在英国尤其如此,人们期待对某种艺术的定义是通过参照实际作品,而非对作为整体的这一艺术的任何抽象概括。”^②有人或许会坚持说,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关于定义建构的观点。但是,“或许在英国尤其如此”——与其相伴的是对“抽象概括”、“实际作品”的相反立场,考虑到无疑任何适当的定义都会包括这两种因素,这一暗示性的声音不是在发出某种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反理论声调吗?这一强调似乎非常明确地源于利维斯,因为毕竟瑞恰兹确实冒险对艺术进行了一些令人非常不能满意的概括——

① DIE, p. 14. ——原书注

② PF, p. 3. ——原书注

但是这些概括依然是那种不可能与你的通常陈述相一致的命题。

瑞恰兹理论化了的是与阅读和意义有关的问题。那是一种一流的理论,我认为它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排斥在实用批评随后的发展之外。因为正如把它描述为实用的一样,这种特殊的阅读变得没有任何疑问了,它实际上回避了所有的问题,丧失了瑞恰兹试图赋予它的那种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在剑桥除了布拉德布鲁克(Bradbrook)之外,瑞恰兹或者别的任何人都未曾做过一般性的分析。当你致力于戏剧的时候,你必然会以最直接的方式遭遇与形式有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看论述小说或者诗歌的剑桥作品,我现在作为基本问题加以解释的立场(stance)和模式(mode)根本没有被提出过。这是利维斯仅为其代表之一的那一整个时期的要害:理论化出现的时候总是一种对阅读的理论化——它不是对写作的理论化。就《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而言,我的绪论可以被视为三种意向的结合。首先,就严格的技巧而言,采用实用批评的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最初源自瑞恰兹;其次,对共同体和感性的强调确实可以追溯到利维斯——这与第一点不同;再次,尝试形成一种戏剧类型理论,把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形式。实际上我后来认识到,任何对自然主义的定义都威胁到利维斯式的典型判断模式,它没有任何疑问地参考“生活”作为对文本的评判标准。当时,这三种意向导致了混乱。

你在这一阶段受到剑桥英文学派中不同思想部分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性质有必要进行探究。实用批评从来不完全是一种“技巧”。在瑞恰兹的例子中,它是一种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工具,这种传播理论假定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被消除的误解。在利维斯的例子中,它所关联的是确保细读正确性的某种具体思想意识。现在依然不清楚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并接受了关于细读的指导。因为一方面《文化与社会》包含了对瑞恰兹个人提出的假设的非常简洁

直率的批评,同时另一方面你早期对理论的兴趣显然与《细察》的立场步调不一。然而,在《戏剧与表演》的前言中,你一般性地谈到艺术:“它的研究……也许依赖学识的添加,但是它的内容是直接的个人反应,它的方法是且必须是对这种反应的理解与阐述,那就是说,对批评的实践。”^①这样一种陈述表明,来自瑞恰兹和利维斯的实质性遗产超越了对细读程序模式的重要性和复原力的认识,在你这一阶段的作品中仍然是起作用的。

的确是。一个原因在于瑞恰兹的《实用批评》所完成的示范,他向人们提供了一些文本,这些文本没有任何像作者名字这样的文化信号,也没有其他任何对“正确反应”的暗示,通过这样做,围绕某些早期社会观念——教养或者品味——的文化共识被十分无情地驳倒了。如果你问人们关于写了这些作品的作者的情况,他们知道根据文化共识说什么。当他们事实上不得不阅读并描述这些作者的作品时,结果就极其不同了——在一些事例中几乎颠倒了过来。所以在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瑞恰兹实用批评的作用是反意识形态的,它揭露了一个阶级的文化自负与其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那自然是细读技巧中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因素。然而,按照它对立于理论的恰当界定——实用,这一技巧也遭到了意识形态的俘获。当然在瑞恰兹的例子中,《实用批评》的写作直接是与《文学批评原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批评实践因此基本上被与阅读活动而非写作过程联系在一起。结果是随后把作品作为文本解释,文本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战利品,从英国实用批评到美国新批评,一直到现在文学上的结构主义,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受到相关的触动。

就我当时而言,我一直尝试在一个新的领域里运用实用批评。这一技巧已经被发展用来分析短诗,在这里,细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

① DP, p. 9. ——原书注

可能的。随后,这一技巧被非常轻率地扩展到小说,采取的方法是摘取一些段落进行分析,这些段落被视作整部作品的代表,但却从未得到论证。在戏剧中,除了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比喻或格律进行了某些局部分析之外,真的几乎根本没有使用这种技巧。我广泛地阅读了一遍论述现代戏剧的文献,在我看来,与细致的语言分析相关的成分是极其缺乏的。现在我不会把这种补救的办法称作“实用批评”,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对语言的组织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真的是一种必须保持的特殊技巧。它要服务的目的也十分不同于实用批评的目的。当时在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在论述戏剧的那本书中以一种背离正统的方式使用了这种技巧。在主要的实用批评传统之内,为什么人们进行细致的分析?为了详细阐明他们的反应,以此作为对作品的评价。我对易卜生和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戏剧所采取的语言分析几乎根本没有涉及我的反应。它的目标在于说明他们作品中主题的构成和主题的连贯性。这是为了根本不同的目的利用可能看似相同的技巧。

转向你在《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绪论中所称的第二条线索,也就是取自利维斯的文化主题,现在看来,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对利维斯那些元历史概念的绝对忠实。你写道:“由于许多原因——或许主要在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综合力量的压力之下——当代英语口语很少能够在任何复杂的程度上对事物进行准确的表达。”^①然后你继续说,“艺术家的感性——他的经验能力,他的思考、感受和联系的方式——与他的读者的平均值相比常常更加敏锐、更加发达。但是如果他的感性至少是同一类型的,交流就是可能的。在他的感性是同一类型的地方,他的语言和他的读者的语言将会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① DIE, p. 30. ——原书注

共同的语言将会成为有关共同感性的表达。现在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共同感性了。机械环境的压力已经规定了思考、感受和联系的机械方式,艺术家和少数相似的性情只能通过自觉的抵抗和极大的努力才能抵制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时代的所有严肃文学都趋向于成为少数人的文学”——随后你确实附加了一个保留性的从句——“不管如何,少数人是有能力扩展其范围的,并且在我看来,它没有任何确定的社会相关群体”^①。但是你做出结论说:“限制了[艺术家]交流的不是社会中共同信念的匮乏,而是某些生活特性、某些经验能力的匮乏。因而在完全传统的意义上,如果当代戏剧是严肃的,它就必然是少数人戏剧。”^②这里的一系列陈述相当不同于你作品中其他地方的陈述。它看起来像是纯粹提炼过的利维斯观点。关于这些主题在你作品中的作用,你现在的观点是什么?

我对你的描述没有任何意见。那一段确实是对利维斯的实质再现。我说是再现的理由在于,这本书中其余的分析在某种显著的程度与它没有任何关联,没有任何结论是根据它得出的。当然,存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1890年代开始,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重要的戏剧总是退出多数商业剧场的少数人戏剧。我认为,这些话实际上对分析造成侵害的唯一讨论,可能是对辛格(Synge)和欧·凯西(O'Casey)之间的对比,即使这一部分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从乡村语言到城市语言的特殊社会转变——我现在也会对其进行重写。所以,虽然我承认利维斯对我绪论部分的直接影响,但是我拒绝“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说法,这是一些人在那个时期对我的作品给予的一般性标签。有关“左派利维斯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使人想起某种已经形成的立场,认为这种立场是与利维斯相关的全部复杂观念的一个变体。就

① DIE, p. 31. ——原书注

② DIE, p. 32. ——原书注

我的观点来看,实际情况是,《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体现了对于一系列性质相反的影响的吸收和再现。在那个层面上,这部作品完全没有形成一致的整体,然而,“左派利维斯主义”这个词暗示的是已经在政治范围内稍微推进了的某种连贯一致的立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它导致了这样的印象,整个作品都是与利维斯相关的全部复杂观念的投映。事实上,被证明为决定性的是那些不连贯的因素,例如对各种形式的兴趣——它被充满焦虑地断定为对兴趣和精力的误导,更不用说对戏剧本身的关注——它直接涉及了与利维斯就叶芝剧本进行的直接争论。相互矛盾方向的结合使得这本书的立场在内在方面是不稳定的。我认为它的全部不稳定性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到解决。

《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间接表明了你的方法与剑桥英文学派之间的从属关系,这使人感到不安。那种方法的意图是把戏剧作品抽象化。你讨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从他们那一时期实际的文化史、民族史或者其他任何社会史出发的,但是你相当明确地抨击和抵制任何一种把他们的作品置于适当背景中的做法。你用某些修辞技巧引用了关于易卜生的评论,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笔。你写道:“这种不幸的情形当然不是没有它的好处的。它至少适合保护一个艺术家免受他的传记作者的干扰。”^①在斯特林堡的例子里,你告诉你的读者:“传记可以容易地被用于曲解而不是解释或者评价文学作品。在 15 个狂热的年头之后,是时候说批评需要一种不同的规范了。现在的评论关注的完全是作为剧作家的斯特林堡,空间上的局限性并未被作为一种解释进行辩护。”^②然而,为什么完全把斯特林堡作为一个艺术家关注就应当排除尝试理解他的观念、他的生活和

①② DIE, p. 111; DIB, p. 75. ——原书注

他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当时你似乎确实强烈地感受到，所有这一切对于戏剧都完全是外部的因素，可以不加理睬。在同一章里，你实际上拒绝了对斯特林堡的政治态度或社会态度的任何关注。但是斯特林堡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才智的人，在戏剧作品之外充满激情地就政治、阶级、性、社会和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写作，而且这些因素在他的戏剧中绝不缺乏。有时你自己也略微谈到这些。然而通过符合分别原则的故意抽象，你关于戏剧本身内容所说的东西要少于有必要说的东西，你的确这样结束了对他的评论。是这样吗？

是的。你引用的句子可以被称作剑桥式的雄辩，直达文本，从不在意别的东西。同样的雄辩当然也鼓励你着眼于生活并根据生活评价文本。但是基本的要点在于：钉住文本不放，而且其语气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信。另一方面，换以其他方式来考虑，整个这一强调是对什么事物的反应？激起我对斯特林堡评论的是，我读到真是可怕的“艺术家传记”，它告诉你艺术家妻子或者女友们中的哪一个是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艺术家的哪一段经历被改编成哪一幕，它把每一部作品都还原为作者的臆想。即使某种社会性传记在普遍的意义上被包括在内，这些研究也仅仅讨论某种可以用来解释这部作品的经验成分，但是可能从未展示作品的真正构成。我认为，我对那种模式特别激烈的拒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有益的，因为它廓清了场地，以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一应该解决的问题，并考察戏剧实践的真实情形。在这方面，我现在会自始至终地定位于剧场、定位于可以接触得到的戏剧形式、定位于特定戏剧形式和戏剧制度形成于其中的整个思想体系——但是绝不会定位于我当时明确抨击的这种文学传记。当我在《现代悲剧》中再次写到斯特林堡的时候，我把他的作品与一个确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时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任何狂热的年头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一种剑桥批评正在被抛弃的垃圾说法妨碍了我看到它对文本的傲慢抽象——一旦你真正进入对一部作

品的任何严肃分析,这种抽象当然被证实是不能忍受的。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我确实拒绝考察《边疆之旅》的开放结局。理由在于,这可以根据奥登(Auden)和伊舍伍德(Isherwood)的政治发展来解释,我当时对此并无兴趣。这种疏远符合我的立场,但是必须记住它的背景。

可是,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节制:它影响了你的某些主要判断。一个例子是你对易卜生戏剧中特定社会维度的怠慢处理。例如,你轻蔑地就《玩偶之家》写道:“如同它过去的情况一样,《玩偶之家》现在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文学现象。它的活力在于它与女权运动的联系,尽管易卜生拒绝把它归于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实际上这看上去无关紧要。”^①你对戏剧结尾的评价是,“易卜生对传统道德结局的拒绝仅仅是对这一缺陷的一个有限补救”——这里的缺陷指的是他对浪漫主义戏剧传统的接受——“在基本接受范围之内”的一个局部否定。任何完整的补救都将会包括对全部戏剧内容的修补”^②。现在不会有人想要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相比易卜生的其他戏剧,包括你所讨论的他的某些晚期作品,在某些方面《玩偶之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作品。但是你谈论这部作品的语气似乎带有完全不必要的轻视。你实际上说的是,易卜生对戏剧传统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比他对道德和社会传统的拒绝更加重要。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待做出公断——当然不是过于政治化或者以时代错误为标题的判断。不过,在易卜生自己的时代,这一戏剧对观众的影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幻觉或者对他们自身角色的满足吗?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玩偶之家》用戏剧陈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处境,这一社会并非没有它的力量,妇女在当时,甚至后来对它的感受都是这样的。在非常长的对易卜生进行评论的上

① DIE, pp. 75~76; DIB, pp. 47~48. ——原书注

② DIE, p. 78; DIB, p. 49. ——原书注

下文里,你对这一成就赋予的重要性似乎少得令人惊讶。你在书中对易卜生的最终评价不是从而存在着某种不均衡吗?这很可能是一种隐蔽的保守主义。

关键点在于,在《玩偶之家》中或者可能在《人民公敌》中可以得到暂时的逃避,而易卜生戏剧中压倒性多数的作品并不包括这种逃避。此外你必须理解我当时的写作在反对什么——肖(Shaw)的《易卜生主义精粹》。肖已经达到了把易卜生在意识形态上同化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个人主义的解放版本。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正是突出了《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而当然不是《幽灵》,而且他真的是非常故意地根本曲解了易卜生的其余作品,以规避他将不得不规避的东西——易卜生关于壁垒的观念(这是你们不可能忽略的)。易卜生的戏剧本质上根本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解放,它是我稍后所称的自由主义悲剧——一种重要得多的形式。现在,由于女权运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运动,每一种对它的贡献(易卜生对它的否定仅仅是策略上的),无论多么独特、无论多么不具代表性,都是有影响力的。现在我将会说并且在此意义上加以纠正。然而公平地说,娜拉从她的处境中获得了个人解脱,这被作为成功解放的不确定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有必要看到,在娜拉砰的一声关上大门之后,发生了什么?易卜生探索了各种可能的版本,包括重写这部戏剧把娜拉带回家门——必须提出这一点,以对照在易卜生作品中占据更大分量的东西。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存在着对自由主义解放方案的根本性的信心缺乏。这里根本不存在对解放冲动的打消,但是却独特有效地理解了妨碍解放的因素:物质性遗产、社会性遗产、所有的情况。对于易卜生来说,是社会的全部意义上阻碍了任何一种这样的解放。我仍然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强调易卜生极其有力地创造了一些阻碍这种解放方案的形式(他从未放弃这种解放),而不是考虑这样一两个例子——由于更容易被吸收到进步思想之中,他在这些例子中延缓了那些阻碍形式并允许一种

不确定的逃脱。

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与你当时提出的东西有轻微的不同,例如,你提到《幽灵》。你在评论《玩偶之家》后就立即继续说了下面的话:“《幽灵》在本质上与《玩偶之家》是同一类戏剧,但是它有着非常不同的特征。它的那些问题更加严肃。”^①必定有人问你,在什么意义上它的那些问题更加严肃?因为,《幽灵》毕竟作为例子体现了受到最大限度简化和损害的自然主义形式,而自然主义是一种生物宿命论的观念,是生理学被用于社会的范例。任何处于易卜生时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区别:一种遗传的疾病不等于作为某种社会约束的同样的东西。混淆二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错误:那可以从这个戏剧本身得到显示,戏剧本身有着有力的修辞片段,但却有许多结构上的缺点。《幽灵》的那些问题比《玩偶之家》中的问题更严肃,这一观念确实像是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的让步。你可以说这部戏剧是更加严肃的,但是为什么说它的那些问题是更加严肃的?

它们明显不是如此。我本来应该说的不是这些问题更加严肃,而是这些问题的整个构成方式更加严肃。它容纳了更多的东西。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依赖先前的文学表现方法——借助于好运的奇迹性解决,这在根本上限定了他处理经验的水平,与《玩偶之家》相比,《幽灵》有更为复杂的一系列联系。我愿意说的是,我明确进行的陈述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判断的方向仍然是对的。易卜生是就那些阻碍了解放的因素进行写作的剧作家,他仍然坚持把解放作为一项事业,但他不是一个就那些他所呈现的解放进行写作的剧作家。拿与妇女处境有关的问题来说,如果你从《玩偶之家》来到《来自海上的女士》或者《海达·加布勒》,你可以看到,娜拉的出走是在某种特定形式之

^① DIE, p. 78; DIB, p. 50. ——原书注

内的一种完全暂时性的解决,易卜生并不主张那种可能性;他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解放冲动,后来这种解放冲动变成了一种必然的自我毁灭形式。不过我不想争论你最初指出的那一点,它是足够公正的。

在这本书的修订版中,你调整了第二部分,题名为“爱尔兰剧作家”——在包含了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契诃夫的“一代大师”之后。你在序言中对其发表了意见:“……然后,在第二部分,我转向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民族传统:爱尔兰剧作家传统,从19世纪90年代的叶芝开始,经过辛格和乔伊斯,直到1940年代的欧·凯西。正如它的出现,这一传统包含了大部分重要的现代戏剧形式,不过是在一个需要强调的特殊的民族和历史处境之中。”^①实际上,读者在那些关于爱尔兰的章节里并未发现对历史或民族处境的许多强调。因为其作品中可以识别的与爱尔兰人民和爱尔兰历史的潜在联系,你确实严厉、有力地批评了欧·凯西,但是大体而言,甚至在修订版中也存在着一种对真实民族历史的执意抽象——顺便提及,这种民族的历史并非与易卜生的作品无关。当你把这本书改写成《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时候,你是否发现改造这本书的形式是不可行的?

是的。这本书必须基本保持对戏剧形式的分析。在对爱尔兰剧作家进行分组的时候,我想在不用实际写出历史的前提下给予某种有关历史的强调,我认为这段历史已经在别的地方被写过了,反之,还没有做过的是展示爱尔兰戏剧传统极其复杂易变的形式——这一传统通常仅被作为一种个别传统简单地提了出来。我现在才有能力看出,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文章,根据戏剧形式的演化精确分析这一民族运动的各个阶段。叶芝的早期戏剧为这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形象,这种形象在一个民族复兴的开端是非常典型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传说中的

^① DIB, p. 21. ——原书注

过去。传奇和当代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成了严厉抨击的目标，被看做是反爱尔兰和反人民的。欧·凯西的内战版本提供了一个反对传奇的现实主义转折，但是与此同时过于强调了内战的无序与混乱，以至于消除了民族解放事业本身至关重要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后来在一个持续关注过程中，在乔伊斯所描述的整个轨迹里，出现了非常自觉地对爱尔兰的完全排斥。当然，同样运动的某些因素也可以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发现，他的早期作品是由挪威人反对瑞典的民族情感激发的——典型地涉及了作为民族主义早期文化政治重点的全部语言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尝试致力于威尔士的例子，那里正好存在着从威尔士文化复兴开始的同样演化。一开始，威尔士文化在叙述中被追溯到自罗马时期连续不断的凯尔特人的过去，比英国的任何历史传统都要古老，因而免于受到现代主义运动的堕落影响；然后，在一种崭新的民族主义作品中出现了新的发展，对这种与传奇的联系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些作品承受了工业制度构成的严重危机，工业制度彻底摧毁了对威尔士语言的大量使用。

那就是本应该写出的关于爱尔兰戏剧的那种文章，但是我当时写的书是作为对戏剧形式的一种说明。到我修订它的时候，我已经在《现代悲剧》中形成了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分析而非历史分析，当时在我看来，有必要用这种分析方式来理解这些形式之间的冲突。我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修改这本书都非常困难，因为我不得不放入大量我写作原书时还不知道的新的戏剧。我不得不改变某些内容并排除另一些内容，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必须是同一本书，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构思。

你关于小说的作品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持续辩护和解释。你坚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统一；它们在小说中的成功表现有

赖于在复杂微妙的平衡中把握这两者的能力,在这样的平衡中,一方的性质在另一方的行动中被明显地表现出来。你立刻批评了社会和心理小说,在小说中,本应该存在的两极之间的辩证张力以相反的形式在现代主义的典型抽象中被打破成碎片。马上有人可能会说,你论述戏剧的作品的主要悖论在于,它采取的方向似乎相反于你在写作论述小说的作品时的整个走向。因为,《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在理论上是对作为一种形式的自然主义的持续批判。有人最初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关联,接受自然主义就意味着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曲解或者卢卡契意指的物化。但是如果更加忠实原著地看看你的书,这一特称反题在书中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用。如果拿出你所引用的斯特林堡关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著名定义,非常清楚的是,斯特林堡理解的自然主义显然相似于卢卡契所称的现实主义,而斯特林堡所称的现实主义等价于卢卡契的自然主义。^①在这一联系中有趣的是,在特定戏剧接近小说形式的地方,你基本上是在批评它们。例如,在你对《罗斯莫庄园》的讨论中,你指责易卜生试图做一些剧作家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在舞台上再现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你坚持说那是小说的程序方式,不适用于戏剧。这意味着,你认为现实主义特有的综合在戏剧中是内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戏剧形式不可能呈现社会和个人之间彼此的相互关系和牵连,你坚持认为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成就。是这样吗?

与此同时,你针对自然主义的辩论有一个换质命题——对诗剧(verse-drama)的敏锐关注,有时甚至是对诗剧的一种提升,把它作为自然主义的矫正手段。这一有计划的强调采取了一种特别奇怪的形式,即你对艾略特戏剧价值的高度评价——它在这本书最初的书名中得到了暗示。你保留了你对《教堂里的谋杀》的绝对赞美;虽然你日益

^① DIE, pp. 116~117; DIB, pp. 79~80. ——原书注

对艾略特后来的作品感到失望或者省悟,但是对于某些戏剧你仍然恢复了一些溢美之辞。面对这些戏剧,多数人现在认为是华而不实的,比如《鸡尾酒会》。无论如何,不管是艾略特戏剧中的哪一部,不管以任何方式,它们都紧密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内容的统一。然而在论述艾略特的那一章你是这样结束的:“人物剧(The Theatre of Character)和观念剧(the Theatre of Ideas)毕竟以自发密切结合的方式存在了七八十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措词来表达艾略特正在尝试创作的这种戏剧,我们可以说是经验剧(the Theatre of Experience)。传奇剧的衰落和取代它的自然主义戏剧的局限导致了许多问题,不能说艾略特已经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或许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能够设想出某种解决方案的位置。无论戏剧在不远的将来是什么样的,这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成就;就其性质而言,这个成就超越了我的赞美方式。”^①即使我们把这一评价的可疑之处抛在一边,你在这一早期著作中关于自然主义和诗剧的结论能与你后来论述现实主义的作品相一致吗?

我至多这样说,直到我完全理解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运动的历史性质之前,我不可能就戏剧形式进行充分的写作,当时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在最近七八年里,我已经退回去为某些类型的自然主义戏剧进行辩护,这些戏剧更为接近我在论述小说的作品中的立场——你对这些立场的描述是正确的。然而,在戏剧模式和小说模式之间还保留着一个有待做出的重要区别。对于在技巧意义上意图在舞台上再现真实生活的自然主义戏剧,一个人在戏剧中一再发现的是,某些在小说中可以相对容易达到的东西,在戏剧中可能只能得到笨拙或无力的容纳。恰巧有一个对这种情况的极好实证,在劳伦斯现存的作品中有一部短篇小说和一部自然主义戏剧,二者共享了如此多

^① DIE, p. 270. ——原书注

的素材,你完全可以认为一个是小说版本而另一个是戏剧版本,我早在1945~1946年间就对这两者做了比较。劳伦斯在小说模式和戏剧模式中能够达到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在前一模式中他能够放入更为普遍的社会经验,那对于理解他所关注的特定家庭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情形下,难题在于把历史运动整合到这两种形式之中。我逐步展开分析了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的转变,整个分析的根据在于,多数印象主义本身是一种对戏剧进行革新的尝试,与自然主义局限于被容许的单一行动空间相比,它试图捕捉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经验。社会印象主义至少可以嵌入——它典型地是一种嵌入——特定行动呈现于其中的社会运动与历史运动的更为广泛的意义,然而,即使在社会印象主义实现了戏剧形式解放之后,在戏剧形式之内完全包括历史经验或者社会经验仍然存在着深层的困难。

恰巧这些技巧上的难题对于小说家不是那么严重。在小说中,通常在人物开始说话之前,他的出现就可以伴随一段直接呈现的社会史。实际上,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方法就是用一段冗长的描写来介绍人物——包括对身体外貌和言谈方式的较为详尽的解说,这可以与戏剧脚本达到的情况进行比较,戏剧脚本的舞台指导不过是一系列的提示而已。在小说中,甚至在人物出现之前,整个背景都会得到描述,典型性地再现出情节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在舞台上这些绝不是轻松可能的事情。所以,尽管我现在非常赞同自然主义的戏剧设计——关于这一点我将会谈到更多——与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设计相比,它仍然是更成问题的。事实上,某些同样的难题现在已经在小说当中再现了,原因在于小说内容比例在特殊的出版经济压力下出现了剧烈缩减,作为一个事实,虽然出版的经济压力不是唯一原因,但是它已经消除了小说形式的许多传统优势。

现在回到你的更为宽泛的问题,当我写作《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时候,像任何别的人一样,我接受了当时对自然主义的定义,给

出这一定义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敌人,还有某些重要的作家,这些作家当时要么正在努力应对自然主义造成的困难,要么受到它的某些限制的阻挠:那就是说,基本上在技巧方面把自然主义定义为在舞台上对当代真实生活的再现。像任何别的人一样,我是根据自然主义随后遭遇的难题来理解它的。首先,正如许多人所说,不可能在这种模式中表现那些不可能成为谈话话题的经验。叶芝注意到,当现代人具有强烈情感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凝视着炉火。与表现思想或者主观方面有关的各种问题只能以某种非常笨拙的方式得到处理,并且通常被规避了。其次,正如我所强调的,自然主义完全没有能力向外转向社会和历史:它不能扩展它的关注焦点。因此,我探索了在实践中替代了它的两种形式——一种运动趋向于主观表现主义,再次把戏剧情节定位于思想意识而不是行动或者行为;另一种运动趋向于社会表现主义,以某种非常一般化的方式重新定位于社会。对这种转变的分析绝对是正确的。错误之处在于我对最初的自然主义方案的误解。自然主义是一个必要的、进步的世俗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的全部要点在于它与神秘主义(super-naturalism)的对立。它对神秘主义的攻击有三重:首先是对世俗的强调,其次是对当代的强调,再次是对自然历史的科学进程的强调。换句话说,自然主义者提倡的作品明确属于一个解放性的规划,在这个意义上,在自然主义有限的成功范围之内,我觉得好像相似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作品。

目前存在着一种正在建立的自然主义命题,认为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产生了非常有力的两代文学成果。在其弱化版本中,人物与环境是不可分的;在其强化版本中,人物为环境所决定。戏剧中的自然主义极大地强调了对准确背景的创造和对生活化房屋空间的无止境的再现,这种强调后来被认为是尝试逼真地在观众中引起错觉,使他们以为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真实的房间。它的实际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背后的真实动力在于,环境必须得到有形的呈现,因为它

是情节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不是一个背景。不存在像自然主义布景这样的东西,这在易卜生的自然主义戏剧中非常清楚。在他的戏剧中,人物通过生活在这些房间之中展示环境,这些房间始终是注意力有形的中心。环境在某种意义上物质性地反映了人物的生活,人物就沉浸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然而与此同时,环境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空间真实的物质性约束,对某种特定类型的确定地貌的意识。目前在教科书中仍然可以发现一种绝对性的老生常谈——现实主义布景得以建造的唯一原因在于舞台木工和灯光方面的技术进步,这使得房间的精确复制品能够被放在舞台上。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有人想要这么做的话,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剧场也可以建造这么一个房间。其真实的目的在于作为一个中介而不是作为一个背景创造有形的环境。与此同时,这是一个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运动,所以,它所创造的环境把社会的中心规定为家庭和私人生活。因此,与以前的戏剧形成对照,它不仅拒绝超自然的宗教维度,还从宫廷、广场或街道转到家中的一个房间,限制了公共活动的整个领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几个人之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结果是,关于人物和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决定关系的主张容许一个特殊的限制条件——那不是自然主义最初方案中固有的东西——环境受到社会方面的限制,并且在其极端的情况下它的发展静止了。在这一时期重要的自然主义戏剧中,所创造的最有力的有形意象是作为一个障碍的客厅。人们透过窗户看外边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外边的世界却不能得到展示。各种消息通过大门从外面的世界传来,然而戏剧的关注中心却在客厅里面。最终在这一固定的、障碍性的形式中,一种对于环境的被动意识得到了体现,这种被动意识不仅仅把环境看做是构成性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进步的观念),还把它看做是决定性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进步的观念)。

与其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开始讨论社会

或历史,而不是讨论资产阶级的“环境”概念。这本身是一个进步,因为它引进了必要的人的流动。这正是在自然主义内部得到极为广阔发展的那种戏剧形式所不能处理的东西:历史运动。自然主义戏剧形式至多可以寻找一个代表性的危机瞬间,在这个瞬间里,社会历史迸发到戏剧的封闭空间之中——契诃夫的《樱桃园》的结尾是一个经典例子,但是作为一个情节,这一瞬间本质上是远离舞台上演的。因此,自然主义方案作为一种有关个人角色和社会关系的崭新世俗观点,要想实现其全部的可能性就必须继续前进到其他形式。这种必要性强调了戏剧形式之内可能存在的东西和小说形式之内出于同一刺激的产物之间的差异。因为,一种对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深刻详细的描述、一种充分呈现的对人物的说明,可以相对没有问题地被运用到小说之中。但是它们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全部范围里被排除在外了,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是重大层面上的一个衰退——当然,这种排除容许了其他类型的细微进步。在戏剧中,由于遭受资产阶级限制的非常特殊的形式,自然主义在技巧的意义上必须得到抵制。继其之后的形式多半想要尝试更为充分地实现它的最初方案,但是叶芝和艾略特的戏剧却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因此,未能理解艾略特和叶芝对自然主义的批评的性质,这真是一个错误。虽然艾略特和叶芝可以充分具有说服力地讨论自然主义在技巧上的各种限制,但是他们当时反对的不是这些。叶芝和艾略特试图达到的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复原——在自然主义之后恢复一个与人物和人物关系有关的前世俗的(pre-secular)超自然观念。他们的目标是戏剧上的相反革命。他们非常准确地从他们当时正在提出的意识形态主题中确认了一些技巧方面的问题,我本来应该能够区别这些我后来才有能力加以解释的问题的。

你的回答非常清楚。可是这留下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在你1963年修订的《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结论里,你提示了艾略特

戏剧的失败,并表达了自己对它的觉醒。你的主要批评责任是,这一批评误入歧途的地方基本上在于它与自然主义妥协了。“在诗剧中实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种新的原则与一种重要的[自然主义戏剧]习惯冲突了,而且现在撤回的是这种原则”^①。然后你接着说:“1930年代左翼剧场的消失只不过导致了把诗剧认同为一种教义,一个异乎寻常地令人沮丧的基督教世界。这种教义上的孤立达到诗剧技巧上的困难顶点,使其无法承受。诗剧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了毫不费力的抨击。”这一认同的极端标志是,“当人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虑英国诗剧的时候,他们想起了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主题、古典教育的片段,所有这些都沦落为夸张的矫揉造作”^②。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在第一个例子中,教义上的孤立和诗剧的真正方案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吗?二者在任何时候实际上都是可分的吗?你对诗剧的呈现基本上是把作为对于当代语言强度不高的一种技巧上的解决方案。你的论点是,诗剧能够刺激和提升对话交流中的日常表达范围,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一种非常崭新的深层经验可以在舞台上被具体地表达出来。然而,是否可能是这样——20世纪中期,在舞台上使用韵文作为言语媒介的这一想法有一种不可避免的神圣化和仪式化倾向,这种倾向必然走向教权主义或者保守派的观点?换句话说,技巧上的解决方案和意识形态倾向性之间的关联不像你刚才暗示的那么偶然。即使富有天分的“左派”诗人本来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采取这种戏剧方案吗?

我最终确实理解了这一难题,我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韵文或者散文,而是什么类型的韵文、什么类型的散文。艾略特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是他试图找到一种通用的戏剧韵文,来替代对话发挥作用。比

① DIE, p. 302. ——原书注

② DIE, pp. 302~303. ——原书注

如说,问问是否有人已经买了晚报是一个完全日常的对话交流,当人物不得不用统一的诗歌模式对这样的问题发问的时候,韵文能够更为准确、更为强烈地传达意义的理由就瓦解了。现在,如果你看看1930年代的韵文尝试或者其他的战后戏剧形式,就会发现整个重点在于,韵文或者歌曲虽然被用于强化对比,但是它们并不试图强加一种必然是虚假的统一。不同层面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不可能被容纳在单一的格律之中。

我们的重点仍然与你所说的稍有不同。我们正在提出的是,即使一部诗剧的情节从来没有下降到平庸或者平凡的水准,它可能仍然会因为过时和落伍而不受欢迎。在你的书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可疑的空白。这是一本很全面的关于欧洲戏剧的著作,但是有一个名字在书中不能找到,那就是克劳代尔(Claudiel)——出于任何主要的衡量,他实际上都是诗剧的倡导者。克劳代尔的戏剧完全是宗教性和神圣性的,对于在戏剧中安排闲聊和对话,它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情节自始至终被维持在一个高昂、豪壮的调子之上。任何针对当前情况再次全面引入韵文的尝试可能都会采取这一方向,对此,克劳代尔的实践结果应该是一个警告。

是的,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分析——你可以公正地这样说,因为我最初的论点是用形式主义的术语表达的。然而,问题在于,任何关于诗剧的定义依赖于此前对散文体戏剧(prose drama)的定义。但是正如艾略特自己指出的,当莫里哀《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被告知他一生中一直在用散文谈话的时候,他有权感到惊讶,这当然是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做过。事实上,极少有戏剧语言作品是那种意义上的散文。自然主义特别新颖的地方在于,它是第一次对对话的再现,这与使用韵文还是散文的问题是完全有区分的。对话的书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娴熟,正如你在易卜生作品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易卜生对对话的运用在欧洲戏剧中是一个重大的革新。那一技巧后来成为自然主义的一个惯例。到了接触 1960 年代电视剧的时候,再现对话的技术能力是令人吃惊的,甚至达到了就对话不充分的地方进行强调的程度——强调人物的拙于言辞,强调不成功的开场白,强调未完成的句子。有一个时期,《Z 型车》的每一段情节都让警察像最近自然主义戏剧中的人物那样说话,在这儿得到传达的信息是人物的拙于言辞,而不是不连贯的对话。

现在,假讨论的问题是口语的书面形式,显然,如果你把某种统一的韵文形式强加到整个一部戏剧之上,你就表明了对于被表现的现实的某种立场,其结果是远离了现实。然而通过在戏剧内部把多个口语层次结合成一个整体,其他类型的尝试能够成功地使用韵文。某些类型的作品根据一般理论把韵文排除到口语的书面形式之外,这将是非常错误的。变得无法容忍的要么是采用全面的韵文形式,把一切都定位于神话的层面,要么是以统一的韵文手段从形而上的世界下降到平凡琐碎的世界,正如你在艾略特后来的戏剧中所发现的那样。另一方面,相反的进程悖谬地产生了类似的统一标准,不是关于使用散文的统一标准,而是关于可被呈现的口语的统一标准。结果是一种非常相似的封闭效果。因为,一旦某种层面的对话口语被固定下来,你再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当需要更为强烈的措辞的时候,人们被禁闭在它的限制之内,结果导致相应的表达失败。我曾对英国早期自然主义戏剧中出现的一些例子进行了评论,在戏剧中,人物换用了更为强烈的措辞,然后不得不尴尬地加以收回,他们像这样说话:“我们用散文完成这个谈话好吗?”与此形成对比,但愿你看看被呈现的口语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书写方式,它非常显著的是多变的、从简单层面的交流——当人们问路或者谈论某些当前小事时采用的语言,一直到最为精炼的文字——当某些极其重要的经验面临危险时采用的语言。这种文学表现方法很容易容纳语言的变化范围,因为这些变化在小说中

通过全面的叙事得到了统一。现在我绝不信服这种语言层次的变化必须被排除在戏剧之外。戏剧的手段当然会是不同的,但它不是在形式主义的意义上接受韵文,而是把韵文作为对某些韵律方法的利用,以强化某些类型的口语书写形式。看看《马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它之所以是这种尝试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恰恰由于其内部语言层次的多样性。

那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阿登(Arden)如此有效地利用了歌曲。歌曲在一定的意义上比诗歌更接近日常口语,因为人们事实上在日常现实中的确会唱歌,但是他们从来不用诗歌说话。与朗诵相比,歌唱可能更少打破戏剧的内部结构。确实给人以启发的是,尽管布莱希特本人是一个诗人,他在戏剧中通常采用的是歌曲而不是诗歌。你刚才说过的大多数提升口语的方法被证实更接近日常的歌曲,而不是有着固定的古典格律界限的传统诗歌。

我不希望对诗歌形式做出理论上的排斥。在可能发生的日常活动本身中断的地方,日常的呈现只应该是不完整的,如果有人采取这样的看法,认为现实主义根据这种崭新的与歌曲有关的共享体验,包括了对可能的日常呈现的承诺,那他就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因为,对某些缄默领域或者主导性规范的突破,只能在口语的书面形式中通过某些毫无疑问的替代性手法实现。那种替代性手法是否是诗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确实,演员们没有接受用诗歌形式说话的训练,即使在演出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也倾向于把诗歌拉向其他节奏,因此使得任何突破都非常艰难。我认为,无论如何,伴随摄像机的出现,这种情况大致上已经被戏剧形式的灵活性改变了。剧场现在完全不是重大激进实验的唯一场所。视觉影像现在正在以诗歌曾经使用过的某些方式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不只是相应于自然主义背景的远景,还有某种有意识地延伸的影像。

我自己的观点是,以最开阔的社会—文化观点来看,保留最初的自然主义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极其重要的——虽然现在把它称作现实主义可能更为合适,但我并不为使用这个术语辩白。我用这个术语表示的是这样一种戏剧方案,它与历史、社会和世俗现实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样一种戏剧必须始终抵制用它自己明显的语言再现日常现实的诱惑——这种做法甚至对于小说中某些最为强烈、最为必要的书面形式也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此意义上,自然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方案的履行需要面向许多传统表现手法开放,而不是依赖任何单一的表现手法。

那种立场与许多经典的自然主义戏剧并不矛盾,自然主义戏剧从未局限于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单一语言。正如你所非常充分地展示的那样,已故的易卜生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可以在他晚期的戏剧里改变谈话的基调。

从人们在对话交流中对时间的谈论,到对以前完全不可能被表达过的事物的极为强烈的清晰表达,易卜生可能实现了突破。这些突破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但是他可以把握它们。

根据你对自然主义这个词给出的严格定义,在想象得到的最严格的自然主义戏剧方案里,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毕希纳(Buchner)的语言,它拥有某种强度惊人的诗歌力量。

是的。他的作品的主要引人关注之处是对多种传统表现手法的使用,这源于他如此明显地把社会看做是一个阶级秩序。毕希纳不仅在不同层面的个人之间——这是形式主义通常关注的语境——还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之间试图表现可供选择的谈话模式。

在出版《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和对《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

特》进行重大修订之间，你写了《现代悲剧》。这显然是在你全部作品的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本书。尽管它的题目是《现代悲剧》，实际上这本书只有一部分专用于戏剧——它也讨论小说、哲学和政治史。我们不得不在那些背景下回到这本书来。目前，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下，介于两书之间的《现代悲剧》的源起是什么？

它绝不是一部我预知要写的书。我写过的多数作品都是预先几年计划好了的——它们当中许多作品的完成情况极其不同，但是它们有预先的设想。这本书完全是我回到剑桥面对悲剧课程时所受震惊的回应，与我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相比，当时的悲剧课程呈现的是一种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形式。这种震惊对我来说非常强烈，原因在于，我毕竟已经从早期对悲剧的研究中减少了许多冲动，这些冲动已经消失到我自己关于戏剧的作品里面，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次在那个领域里从事工作了。我最初的反应形式是简短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的《关于悲剧的对话》。^①起初我没有想要走得比这一步更远，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维度。我当时仍然认为这不会是一本书，只是几篇文章而已。此后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当时正在讲授一门关于现代悲剧的课程，我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必真正特别为这门课程做准备，因为我已经有了《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我将从书中得到我的讲课内容。但是在讲课的过程中，由于意识到当时有关悲剧本质的更为一般性的争论，讲课内容被改变了。情况仿佛是这样的，我走进讲堂，《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中的一章原文摆在我的面前，讲出来的却是《现代悲剧》中某一章的文本。同样的作家在这两本书中都得到了讨论，同样的主题被发展了，同样的引文被使用了——这是保持连贯性的关键地方。但是当时的讨论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模式。早期作品的许多内容是相当技巧性的，关注的是戏剧的表现方法、与

^① *New Left Review*, 13~14, 1962. ——原书注

剧场演出的关系以及剧作家个人,在这些地方,新的作品更加接近意识形态批判。

《现代悲剧》有一种强烈的致力于政治和文化的基调。事实上,题为“悲剧与革命”的那一章可能是你在剑桥学生时期之后发表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文本。当时对《现代悲剧》的反应是什么?这本书是在什么样的节骨眼儿上出版的?

在《长期革命》遭到了充满敌意的接受之后,这是针对某种对立立场更为自觉的写作时期。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围绕着教学情况和文化与政治情况,一种非常特别的结构进入到我的视阈。“悲剧与革命”这一章写得很晚,与1960年代中期的危机有直接关系。因为在大学里存在着充足的活动,即使在那时没有1960年代晚期的影响,革命观念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回响。我受到邀请做一次演讲,听众主要是左翼学生,我特别选了“悲剧与革命”这个题目向他们演讲。《现代悲剧》作为一本书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与我以往写作手法的决裂。在《文化与社会》之后,对我作品的接纳情况完全改变了。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在我进入学术界之前,我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学术界人士。一旦我处于学术界之中……我认为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

你写道,当前悲剧观念的一个主要基本原则是“假定一种永久、普遍和基本不变的人性”^①。你令人信服地批评了这一观念并澄清了它的构成因素:持续的不幸,英雄的缺陷,等等。但是,如果有人完全拒绝这样一种对悲剧的一般性解释,还有什么理由这样谈论“现代悲剧”(这个词暗示它是悲剧这一更大范畴内的一个特殊种类)?对于你来说,使用这个词除了词汇和方式上的方便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吗?

① MT, p. 45. ——原书注

可以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层面是,我讨论其作品的这些作家中有许多把它看做是悲剧——他们意识到,在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他们的前辈的目标之间不仅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也存在着某种连贯性。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更为实质性的回答是,悲剧概念仍然代表了根据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算合理的分类原则所确定的一组作品,这些作品以某种确定的模式紧紧围绕与死亡、极度的苦难和裂变有关的问题。我说“以某种确定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其他写作方式,不适合以悲剧分类。如果死亡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具体的常态,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各种形式的极度苦难和混乱(它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因),如果这些经验既在连续的意义形式里得到了解释,又在思想意识层面被捕捉到了,那么在此程度上,把悲剧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范畴谈论是行得通的。我当时关注的是,在具体处境里,甚至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形下,指出影响事物永存的非常真实的相对性。自然不变的事实就在那里,但它们永远在艺术作品中经历着非常易变的文化、哲学或社会学解释,被作为悲剧加以建构。

2. 布莱希特和布莱希特之后

我们尚未讨论到在你关于现代戏剧的整个观点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其象征标志是你的书名更改为《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显然,你与布莱希特戏剧的邂逅导致了对你早期立场的重估。有两个我们想要问的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布莱希特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根本没有出现——是否因为你没有机会阅读或者观看布莱希特的作品?如果是这样,你第一次了解布莱希特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使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核心部分。它是这样的,你对布莱希特戏剧的描述现在无疑是这本书中最为辉煌的分析。你的论点实质上是,布莱希特通过在某些地方引入历史和产生某种行动,与自然主义戏剧决裂了,在这些地方,自然主义典型关注的是某种激情,从技术的意义上说,关注的是人们在承受决定于舞台空间之外的某些过程。然而与此同时你表明,布莱希特保留了自然主义感受结构的主要纽带,因为他的戏剧中的两个要项仍然是未加更改的那一对:孤单的个人以及与个人并列形成对比的压倒性的社会。就这样,虽然像《伽利略》和《母亲的勇气》这样的晚期戏剧直接批判了有关独立个体的神话,展示了他或者她受制于所有社会变化和社会决定的程度,但是它们从未展示后者的实际构成,因为布莱希特“在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全部复杂经验里,对于孤立的个人和作为整体被认知的社会这两极之间的中间关系几乎根本没有兴趣”^①。你公平地指出,虽然布莱希特致力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能够在他的戏剧里表现任何明确的社会解放。作为替代,这些戏剧的真实力量来自直接感

^① DIB, p. 289. ——原书注

官经验的满足与抽象组织起来的紧急事件和政治牺牲之间的不能解决的对立。布莱希特不能认同沉浸在直接经验的具体愉悦之中,但又明白斯大林时期共产主义政治的指导原则涉及什么,他从来没有能够把他的重要情节放在当下,而是把它们放置在遥远的历史过去。你得出结论说:“因为这两极的关系仍然存在并且是决定性的,这种戏剧在深层意义上是回顾性的;无法忍受的孤立是一个事实,当我们看到人们展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处境的时候,本质上他们展示的是这种孤立的事实;那一事实被看做是必然但却要加以拒绝的。这种戏剧形式的定位方向不是发展,关系转换和社会变迁的经验没有被包括在内;而且其基调和表现手法依据的是:人们被展示出为什么他们是孤立的,为什么他们毁灭了他们自己……它是一个重要的创意,不是因为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是因为它不同地评价了一个旧的世界:这是一个在戏剧中被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契诃夫直接创造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失败、挫折和孤立的世界;一个被皮兰德娄(Pirandello)和荒诞派阐释为一种总体性的状况、本来就是无意义和无价值的世界;一个被布莱希特充满同情和认同地加以批判和解释、从而净化了的世界。”然后你说:“这位非同寻常的大师的力量是决定性的。伴随这一最后的转变,一个由反抗社会的个人构成的独特的戏剧世界现在被彻底理解了。没有其他人创作的内容,布莱希特批判性的结语——他的戏剧性的否定——就不可能被写出来。然而,在两三部伟大的戏剧中,在一种有力的、令人难忘的戏剧意识的更为广泛的成就中,现在它被写出来了,就像布莱希特自己坚持的那样,我们必须努力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①

那似乎是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结尾。其效果是,你暗示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之后存在着未来的某种戏剧,它将立即越过个人与社会两极

^① DIB, pp. 289~290. ——原书注

分化的看法,触及具体阶级结构的中间关系,它会表现某些历史行动,这些行动不再因享乐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反对而受到制止,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世界。那是你的意图吗?如果是这样,在那之前或者之后是否存在过任何戏剧,使你认为接近你所描绘出的这一视阈?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布莱希特没有在最初的那本书中出现。这完全是因为不知道。实际上,布莱希特在《左派评论》中出现是在1930年代,如果你留心回顾的话,当时存在着了解其作品的途径,尽管这些途径较为偏远和专业化。不过我认为对他的缺乏了解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直到1950年代中晚期我们多数人才开始熟悉布莱希特的戏剧,而且,即使在那时,对它的介绍采取的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把它作为政治剧(这是正确的),不过也把它作为对自然主义的一种不成问题的取代,作为有判断力的观众的推崇。对于许多人来说,一直很难退出这种立场,他们当时就立即支持,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从体现了它的实际戏剧行动中想要实行的立场。但是从《巴尔》开始,经过《三便士歌剧》,直到在《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中的非常重要的转变,我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越多,就越觉得这种戏剧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批判性否定,其效果实际上依赖于它正在否定的东西的存在。这与下面的事实存在着关联,布莱希特的许多作品是对其他作家作品的卓越的改写,比如莎士比亚或者马洛(Marlowe),布莱希特对他们可能是反对的。然后我逐渐关心的是他在流亡期间的戏剧,因为布莱希特移居他乡确实成为他晚期作品整个转向的基础,回归到了孤立的个人和总体性的社会。在我看来,它们根本不像人人都在提出的那样是革命戏剧。这种戏剧真的不是革命戏剧。虽然有人可能饶有兴趣地读出了布莱希特在1930年代对付法西斯德国的努力,但是显然,他的创造力进入了像《母亲的勇气》、《四川良家妇女》或者《高加索灰阑记》这样的作品之中。与变得如此重要的“复杂的看”(complex seeing)的观念相联系的不是革命性地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之中,因为反复提到的

这个世界在戏剧中并未出现,不存在任何转变——存在的是针对一个难以忍受的社会为你提供必要保护的各种逃避模式。如果假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这么做,那就是有待深入考虑的当务之急。然而,把布莱希特的许多重要作品放回到创作它们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在多大程度上甚至必须偏离这一主题。当这些戏剧开始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柏林市民剧团访问了伦敦等一些城市,我开始了解布莱希特的戏剧,即便在那时,我还未能看到足够的作品,没有能力对它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把布莱希特介绍到英国的那种特定模式也倾向于把它表现和简化为一种新的舞台演出方式。当时对舞台效果的关注在英国戏剧中是非常具有主导性的,以至于很难通过这些关注推进到作品本身的内容。当然,把布莱希特的戏剧解释为对“自然主义”的一种抨击是很流行的,因为在每一个新的季节,都会有一部戏剧上演,这部戏剧被宣称是某种反自然主义的最新版本,即便作品本身明显地是对自然主义特性的再现。然后当我第一次读到布莱希特的极为有趣的批评作品和理论作品的时候,对我造成最大冲击的是当时他对他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奇怪描述。假使可能跨过两千年相遇,布莱希特对它的解释会使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感到非常惊讶。布莱希特实际提到的是自然主义戏剧,他所关注的是移情问题。布莱希特的理论建立在某些现实连续性、某些现实突变的基础上,当然也有个别的规避和晦涩之处,他从这一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政治立场。《伽利略》非常有力地再现了与异化了的科学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将其与原子弹问题联系起来,但是这是一部关于17世纪的戏剧,就像《母亲的勇气》一样。在当代现实的本质中必定存在着某种东西阻止了另一种方案。布莱希特已经展示了如何超越作为资产阶级形式的现实主义,既然利用布莱希特反对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新的激进模式,有必要指出他的作品与自然主义之间消极的连续性,而且他的作品相对缺乏作为其目标的变化。

超越布莱希特戏剧的局限以展示转变中的关系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必须在非常确定的背景中加以考虑,我认为,在戏剧中很少有标准的这类作品。一种自觉的少数派都市艺术不会是藉以取得那种进展的手段。电视剧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更为引人关注。但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悖论。最初的自然主义方案是要展示环境对人物的决定性压力,它成熟于19世纪最后1/4时期的资产阶级戏剧内部。百年以后,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进入大量作品的制作过程,这些作品即使不是由工人阶级创作的,也是与他们有关的。现在出现的事实是,在再次遭遇同样的技术问题之前,某些最初的自然主义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完全崭新的社会经验领域相符。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更多地被排除在戏剧而非小说之外,因此它进入自然主义形式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像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戏剧的处境,当时存在着大量素材等待用戏剧加以表现。像《希望的日子》或《小船到达终点的时候》前面的情节,这样的作品显然能够在再次遭遇同样的问题之前毫无疑问地把握它们的新素材。这种自然主义的兴趣中心典型地是回顾性的,即在中断之处填入工人阶级以前从未被呈现出来的历史经验;其冲动与新近的重要历史著作是同时发生的,那些历史著作同样重建了一个没有被记录过的阶级的过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可能一直在前进的人们需要完成这一迫切的必要任务,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任务也把戏剧形式的处境置于它以前曾经面对的情况。

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展示变化,除非你提出在布莱希特戏剧中实际上包含了先例的那种区别,这种区别或许最好被表达为戏剧形式内部陈述模式和虚拟模式之间的不同。一个陈述性的戏剧模式所宣称的是,这是现实所像的样子,这些是显现出来的冲动,那些是被阻碍的冲动。它也许不得不表现某种社会处境,在这种社会处境中,某个层面上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或者即使某些限制

被向后推移,据说只要阶级社会保持不变,它们就会依然存在。正是在那一点上才需要引入虚拟模式的观念。我故意使用这个词语,而非使用乌托邦模式或未来派模式,它们有其他的含义——但是,虚拟模式准确地保存了布莱希特戏剧最为重要的意图。突然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在布莱希特戏剧中被演了又演的场面。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巨大革新。在布莱希特作品中,一个典型而不大引起关注的模式是某些行动注定的结局,这种结局的挽回只能通过观众领悟到舞台上的人们是错误的:他们被挫败了,但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被挫败了,因此你的任务是回到家里进行自己的革命。虚拟模式允许另一种解决。在《第三帝国的恐惧与不幸》中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其中有一场就上演了这种结局,随后引入一些其他因素,这一场被重新表演了,其结果则是不同的结局。

这种对虚拟可能性的认识是我与那些抨击现实主义的人进行争论的基础,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形式,除了一种不同的批评之外,他们并未提出任何独特的替代方案。请允许我用加奈特(Garnett)和艾伦(Allen)的电视剧《大火》作为例子。因为它开始的时候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完全是一部陈述性的戏剧。事实上它在工人进行重组和罢工的关键时期重现了利物浦码头工人的封闭世界,戏剧采取的表现方式几乎内在干或有赖于对罢工的认同。剧本随后揭示了,在当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之内,在对改变那一秩序没有任何怀疑的前提下,为改善条件而采取的所有武力抗争都遭受了挫折。所以,你之后能做什么呢?你可以把这次罢工表现为英雄式的胜利,或者表现为悲剧性的失败。但是在《大火》中,即使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也存在着一种不同做法的尝试。在某一时刻,罢工者说:“假定我们再前进一步,假定我们占据了码头,假定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对码头的控制,情况会怎样?”整个遵循的顺序真正是虚拟性的。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这样做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发生的是控制。在这一事件

中,当军队武力进入工作场地的時候,工人被击败了。然而,剧本成功呈现的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的现实主义性质不是在记录当代现实的陈述性意义上,而是于现实之外在虚拟性意义上推测一种可能的行动顺序。相比起来,一种乌托邦式或未来派的戏剧会完全不真实地转移到一个由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码头,那里不再存在任何冲突。在那种模式里,没有任何途径从当下进入到未来,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定义,那种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我对这个剧本进行了思考,并把我的思考告诉了托尼·加奈特(Tony Garnett)。我对他说:大量的早期素材只是用来使人接受这些是码头工人,这是他们谈话和思考的方式,假定你已经放弃了这些素材,因为它太长、太封闭;假定你已经提出占据码头的相似处境,由于背叛或者缺乏准备而被军队击败;你或许已经重新安排了接管码头的情节,工人们在进行其他部署并导致了其他结局。那将会激起来自普通批评家的强烈反对,说它缺乏现实主义——他们会说上演一段情节,然后回到开始的地方再次演出这段情节是荒谬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一趋势正是现实主义方案现在应该成为的样子。有关戏剧假设的想法与现实主义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个例子里,就像我已经提出的那样,为什么这种假设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更为清晰?没有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本来应该由主张布莱希特权威地位的“左派”人士从另一个方面对《大火》进行批评。因为,虽然布莱希特并没有以任何持续性的方式这样做,但是与我所知的任何人相比,他都给出了关于虚拟情节的更多实际例子。

你已经非常有帮助性地集中谈论了你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观点,它关注的是自然主义基本的被动性质——戏剧中的人物被永远超越他们的客观力量所决定。你目前已经表明的是,在不与现实主义意图决裂的条件下,从陈述性形式到虚拟性形式转变的方式可以允许各种可

供选择的未来和不断变化的情节上演。然而,你批评自然主义的另一一个罪状是,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两极对立。实际上你主张,布莱希特从未与这一本质上的自由主义二元论决裂——他的图解式的戏剧错失了所有的间接关联。现在如果有人考虑那个问题,关于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问题就可能会被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有两种可能的解读。一种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卢卡契式的,另一种可能是更为形式主义的。卢卡契式的版本是这样的:卢卡契用与你非常相似的术语把现实主义阐释为一种由个人和社会构成的综合,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伟大的美学成就,当时资产阶级仍然处于其历史的上升阶段。自然主义是对它的一个衰落的承继,它割裂了男人女人和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动态连接,实际上把社会投映为一种第二自然。自然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变成基本上是被动的——《情感教育》中的男主角是其原型。卢卡契指出,当资产阶级在19世纪的欧洲不再扮演进步历史角色的时候,自然主义到来了。在这一解释中,1848年当然是转折点,此后福楼拜出现了,随后是左拉和莫泊桑,呈现的是一条逐渐衰落的审美曲线。在这儿,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历史性地建立了,与一个阶级出现变化的社会命运相一致。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你对自然主义的使用相当接近地符合这一编年性的大纲,因为对于卢卡契来说,它开始的时期已经是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开始盘旋向下的时期了: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存在着巴黎公社的分水岭,对他而言这代表了自然主义在1848年重大转折之后做出反应的另外一个阶段。这样一种阐释也似乎符合你自己的说明,你极大地强调了这个事实,自然主义戏剧即使在其顶点也没有能力重新创造或体现一种由个人和社会构成的动态的相互关系:自然主义最伟大的大师们没有达到那一点,然而现实主义小说的大师们做到了。根据这一阐释,有人可能会主张,在自然主义形式重大危机的尽头,会有人期待来自一个崭新阶级的作家

们——在他们当中布莱希特可能是一个预兆性的先驱——尝试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综合。在这一期待中,至少没有什么直接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崭新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之一大概是对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僵局的打破,不仅表现在情节和变化上,还表现在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上。那就是说,舞台上存在的人物既是确定的社会关系的承受者又是它的改变者,但是这些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具体的阶级结构的间接联系,而非自然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另一方面,另一种阐释是可能的,你似乎已经在早些时候暗示过——如果不是从情节的意义上而是从相互关联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戏剧与生俱来就没有能力重现现实主义的综合。你可能设想了一种现实主义戏剧,它有不断变化和转变的情节,然而在这种戏剧中,舞台上人物的图式化必然保持于他们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具体体现的下限之下。这两种看法中,哪一种最符合你的立场?

首先,关于艺术形式和一个阶级所处时期阶段之间的关系,请容许我就这一非常有趣的问题说一句。当然,卢卡契的说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有人能够坚持它,这一问题会容易得多。但是这里存在着严肃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讨论了自然主义戏剧的局限,但是在我看来,它仍然致力于卢卡契在别的地方描述为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案:表现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努力生活得更为完满却遭到了特定社会秩序的客观限制,描述向往另一种生活的冲动与社会的结构性约束之间的创造性矛盾——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不是被视为个人的冲动,而是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渴望。那种描述正好适用于易卜生和早期斯特林堡的戏剧。但是它却不能与资产阶级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要点不是在谈论资产阶级的主要意识形态代表。我们正在目击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最近 100 年里的奇怪现象,非常重要的群体可以说是在资产阶级自身关系内部与它决裂了。说他们不是处于资产阶级自身关系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们与资产阶级决裂了。这

种戏剧的整个社会形式即使在制度层面上也使人想到那种运动。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戏剧,它非常有力地把社会重现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存在的只是调整问题和态度问题。英国自然主义是一个这样的完美例子。然后,在同样的10年或者15年之内,在很多欧洲国家里,新的自觉的少数派先锋戏剧出现了突变。这些国家在其社会构成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出于它们的戏剧却宣称社会生活是令人窒息的,并确认了被抑制的欲望和冲动的合法性,其戏剧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虽然根据解释,作品并未达到与整个秩序的决裂,但是它质疑了整个秩序。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自然主义,它引起了术语上的极大混乱。如果我们称它为现实主义戏剧,或许会更简单一些。但是那样会留下小说和戏剧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卢卡契对小说的历史时期划分似乎以巴尔扎克和左拉之间的对比为支点;有人注意到,他的大部分解释实际上都来自法国文学。我认为英国小说有其自身的特殊发展。

但是,把卢卡契的范式(paradigm)改写为狄更斯和吉辛(Gissing)之间的差异应该不会困难吧?

那没错。但是另一方面,从乔治·艾略特到哈代的运动将会截然不同了。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的结论是,当冲动触及某些限制的时候,是人的智慧接受了这些限制并学会慎重地顺从。在《无名的裘德》中,这些限制甚至更为可怕,因为它们对于冲动的承载者完全是毁灭性的,然而小说的整个情节对于产生了那些限制的社会秩序是颠覆性的。哈代表现了一个完全正当的、从未受到质疑的欲望,这一欲望完全悲剧性地遭受了挫折但却没有取消其冲动的合法性,而且这一欲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对使其遭受挫折的社会秩序进行了质疑。在这一方面,哈代引人注目地与易卜生处于同一时代。

你现在似乎在使用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定义。存在着这样的情节，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寻求一种更为自由的、能够得到更大价值实现的生活，却发现社会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壁垒，对其追求的认可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抗议——这不是卢卡契所称的现实主义方案，毋宁说它是卢卡契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前的《小说理论》的主题。那时，福楼拜——根本不是巴尔扎克——毫无疑问是他的美学典范。戈德曼后来接受了卢卡契早期哲学著作中的这些观念，但是戈德曼当然从未同意卢卡契后来的文学理论或者支持现实主义这一范畴。孤立的个人欲望反抗阻碍它的社会的斗争是一种主题模式，对于大量不同类型的19世纪作品来说，这一主题模式是共同的。它实际上并不区分任何特定的形式或阶段。例如，你曾经生动描述的易卜生作品中的那些东西，在司汤达的作品中也一一存在。你自己已经引证了哈代的例子。我们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相应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在易卜生和哈代的成就之间存在着某种实质性的不同吗？或者说，他们使用的这两种模式是否只有形式上的不同？

非常意味深长的是，在《无名的裘德》之后，哈代停止了小说写作。任何人都可以推测其原因，而我则认为他在他的小说形式里达到了某种极限。不管怎样，且让我尝试更为一般性地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目前恢复现实主义方案不仅存在着可能性，还存在着必要性。但是它会涉及与传统意义上自然主义的最为明显的区别。假如你看看大多数关于工人阶级的小说，甚至那些工人阶级作家创作的小说，或者伴随着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对英国文化的贡献而出现的戏剧，显然，它们主要停留在自然主义模式之中。它们通常回顾性地传达了一种关于牢骚和不公正的感受，用自然主义的语言说出了真相，这始终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它们并不提出替代性的观点。现在，在我所了解的所有戏剧形式之内，我并未看到现实主义方案如何能够恢复，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戏剧形式之内都是这样。无论如何，我认为变化的关

键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与观众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形式产生于其中的实际生产关系,就永远不可能最终明确地规定这种形式。我在最近论述英国自然主义的文章里指出,在一个自然主义本应该非常强劲的国家里,高雅的自然主义戏剧却从来没有实现,这正是由于作为机构的伦敦剧场在本质上对形式的压抑,以及这些剧场所代表的观众的阶级特征。然而目前在电视里——尤其是在英国国内,发展了一群完全不同的观众,他们彻底超越了都市剧场里的固定观众与戏剧之间格外受到限制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电影和电视中与戏剧不同,由于摄影机的原因,更为机动的形式是可能的。我早些时候指出过,在剧场中,任何戏剧形式都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难以等效地像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那样极好地完成对人物和地点的定位与实现。但是摄影机现在恰恰允许电视或电影去做戏剧在 19 世纪做不到的事情。它提供机会在完全具有真实感的历史场所里复原公众参与的行动,将戏剧从封闭的房间里或者从抽象的简单空间里,搬到工作场所、街道和公共广场。我认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未来存在于三种趋势的结合:由摄影机导致的更为机动的戏剧形式,与更为普遍的观众的直接联系以及虚拟情节的发展。

这里是否存在着夸大剧场的各种局限并过高评价电视和摄影机的潜在价值的危险?至少在英国,前几年出现了不同类型剧场和剧团的显著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在电影里,甚至在电视里,尽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发展同样原创性的作品已经被证实是极其困难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电视和电影仍然是极其昂贵的媒介,需要巨大的资金来源,资产阶级公司或者官僚企业必然对这些资金控制得很紧。技术方面的最近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潜在可能——直接的视觉呈现设备被纳入到每一所学校的预算之中,录像带可以被重新使用,诸如此类。但是这远远不是此刻的现实。在英国,

甚至把电影的基础建立在商业发行圈之外的最为谨慎的尝试都正在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与此同时,以艺术委员会提供少许资金帮助的方式,现在可能有超过 20 个剧团活跃在英国的各个地方,它们的倾向是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民粹主义的。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一现象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7:84 剧团,它主要演出约翰·迈克拉斯(John McGrath)创作的戏剧,约翰·迈克拉斯本人有工人阶级背景,以前正好致力于电视和自然主义电影。这一剧团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它不把很长的演出档期放在挣钱上,它从来不去伦敦西区^①;它演出的地方基本上是外省的剧场、礼堂和俱乐部,在那里有工人阶级观众。它的戏剧之一是《绵羊、牡鹿和黑黑的石油》,尝试回溯从苏格兰高地大清除到石油公司出现的苏格兰历史。它无疑满足你的标准,即积极的历史倾向和多样的表现方法——它特别有效地使用了歌曲与音乐。在苏格兰,可能超过 10 万人现场观看了这出戏剧。它随后在电视上播映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它却是一个明确的舞台作品。像这样的作品似乎代表了某种在电影或者电视形式中还没有达到与其同等意义的发展。

我一直在欧洲到处告诉人们,《绵羊、牡鹿和黑黑的石油》是英国近来最重要的戏剧。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因为这部戏剧享有的有利条件正好是苏格兰的文化定位,它不仅保证了观众与戏剧形式的非常特殊的联系,还使某些素材能够用来作为新的表现方法——那是指大量连续不断的流行歌曲。共享的歌曲在剧团与观众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占据了非常可观的部分;它们不必被创作出来以待牢记,它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纽带实际存在了。在此意义上,《绵羊、牡鹿和黑黑的石油》是相对独立的受益于传统文化连续性

^① 伦敦西区是英国伦敦中心区的西部,以时髦的街区与商店、剧院而著名。它包括梅费尔高级住宅区与海德公园。——译者注

的案例之一，这种文化既是工人阶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在威尔士文化中有可能存在着这种纽带。我过去认为这些纽带在工业化的英国很少能够得到——它们显然需要更多的技巧——但是迈克拉斯本人最近已经使我相信，如果积极地寻找，它们可能就在那里。

更为概括性地说，1960年代最引人关注、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是新剧团的出现，它们能够绕开主流文化的封锁，以不同的方式演出街头剧、地下室剧和午餐时间剧。这些戏剧相当于新型期刊出版的显著爆发，也依赖于一种正要进入视频领域的可以利用的廉价技术。然而，虽然这些替代性的方案是极其重要的，“左派”从来没有能够使自己满足于一种并不侵犯主流创作手段的文化方针。因此，完全真实的是，许多人现在正在地下舞台获得他们的经验，不过事实上这些情况是在日益集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内部进行的，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边缘地带，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容忍了，甚至以某种相当冷淡和复杂的方式得到了扶持。为了重大的计划，你确实不得不借用重要的创作手段。

是的，如果存在能力和机会实现这样一种借用，你无疑是对的。但是在此期间存在着一个可以用来反对你的论点。为了采取如今最有影响的个别文化创作手段，在一个既定社会内部关于电视观众本身可能会有某些特殊的、无法改变的东西。你曾经非常生动地把资产阶级戏剧的本质强调为一个空间。例如，你写道：“任何与自然主义的决裂都是一种与这个空间的决裂：决裂于那一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它位于资产阶级城市的上空；决裂于一个空间的陷阱，在那个陷阱里受害人彼此折磨；决裂于那个日常的空间，在那里险恶的代理人莫名其妙地来临了。当然，它主要不是一个与演出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意识有关的问题。在这个空间里上演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

态里,这些事从一个外在于人们的决定性世界里发生在他们身上。”^①在你的就职演说中,你谈到与这个空间有关的戏剧,观众席可以说是这个空间里的第四面墙。^②现在存在着一种情形,你的那个论点反过来也适用于电视。因为有人可能会想到电视机,把它作为真正的资产阶级空间里的第四面墙。当然,多数观看它的人是工人阶级,然而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事实上,同样的表述可以用于观众与这种形式的联系。无论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摄影机的机动性或者不同的外景和不同的时间,即使最先进的电视技术仍然被彼此切断在无数私人空间里的观众所接收和同化了,就在接收你所发展的现实主义戏剧的同时或者之后,他们真实地接收到了莫名其妙到来的其他节目,这些节目被看做是来自一个支配性和决定性世界的信息,通过这面墙的开启从外部来到他们面前。用萨特的术语来说,电视观众在原型上是连续的——一种“空间化”的客体。然而一旦人们走出那些空间到剧场或俱乐部里,或者去看在工厂、乡村礼堂或地方学校进行的演出,他们就像你必定偶尔做过的那样,通过与其他观众的共同关联,进入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里。戏剧与你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它与你自己处于同一个场地,戏剧的能量和流动性可以用非凡的力量感染两三百人。难道不可以主张说,由于其观众的社会组织状态,与电视剧相比,这种戏剧现在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形式?

当剧团和观众将他们自己置于有意改变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否认所出现的那种能量爆发——那是一种新型戏剧的效果。我也不是不同意,为了把电视理解为一种媒介,必须把舞台的功能理解为一个空间——它实际上是用一种不同的技术实现了一系列同样的社会关系。然而,电视被发展为家庭接收器这个事实不是由于

① DIB, p. 325. ——原书注

② *Drama in a Dramatized Society*, Cambridge 1975. ——原书注

技术上的影响,它是由资本做出的特殊投资决定的结果。一些激进团体正在进行试验,他们使用分画面电视,使用巨屏电视,这在10年之内毕竟是大致可能的,这种试验现在正在创造出把电视带到客厅之外的可能性。

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电视显然将会有一种不同的潜能。但是如果你想要与当前存在的社会关系做斗争,你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关系在目前的组织方式。

同意。但是最终即使是那种组织状态也已经允许了工人阶级戏剧在电视中的播放——加奈特、洛奇的作品,星期三剧场的某些作品或《小船到达终点的时候》,在我看来那已经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成就。作为自然主义的复兴,无论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局限,它们代表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作品。然而,虽然在我看来,激进分子在一种文化未被占据的边缘地带取得成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并不认为,现实主义方案大体上正在这个地方被大量重新采用。你所看到的是非常有效地利用某些戏剧模式进行的政治讽刺,或者围绕特定论点进行的动员,它所针对的是新型观众。具有讽刺性的是,某些参与这些激进戏剧的人对待现实主义的观念就像对待资产阶级先锋戏剧一样怀有敌意。不管是对是错,其实正如这种戏剧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在一个更高社会阶段恢复现实主义戏剧的方案是有差距的。

你认为在你所说的现实主义方案恢复和革命政治之间存在着任何本质性的关联吗?存在着某种通向这种形式的必然阶级路线吗?

基本上是这样。战胜个人“社会或者家庭”环境两极对立的唯一可能性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必定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但是这种方案的困难是巨大的。事实上我自己

现在认为,小说中的文化生产问题非常严峻,与小说相比,在整个戏剧范围内存在着更多的实践可能性,对我来说这尤其包括了电影和电视。听到人们抱怨当今小说的单薄是非常无聊的,他们忽略了任何人面对桌上的图书从一开始就会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可以找到出版商的现代小说的典型长度大约只是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或者巴尔扎克一部小说中的一个片段而已。虽然存在着用三部曲或者系列丛书超越这种局限的可能性,其效果实际上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些涉及了形式组织方面的根本差异。我不是说现实主义的实现是按体积衡量的,只是现实主义要求一定的范围余地,以容许一定的复杂性和观点的改变,在8万单词之内,这些完全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电影和电视以某些方式可以更快地发展,然而同样的是,把个人和社会之间两极对立的极端情况戏剧化要比表现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或者探索适合现实主义方案的间接关联容易得多。所有这些都需要空间,这是当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压力通常所不允许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你一开始对现代戏剧进行说明,你就谈到了你所讨论的最初几部戏剧——特别是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你说它们在尽最大限度达到不可能真正在舞台上达到但是对于电影实际上是预兆性的效果。你稍后对斯特林堡重复了同样的评论。^①从你的论点进行推断,有人或许会说,电影中的形象化浓缩可以表现某些东西,其功能类似于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通过大量间接引语所呈现的冗长的肖像描写或性格发展——就其解释,正好是你已经提出的对于戏剧是不可能的因素。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有人或许会把自然主义戏剧在一个更大的划时代意义上视为一种过渡形式。因为,在摄影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必定是非常巨大的欧洲意识领域——关于再现或表

^① DIB, pp. 43, 76, 93. ——原书注

现的视觉准确性的含义——之后，它毕竟出现了相当一段时间，它的进程在 50 年的时间里与电影的起源和发展是交叠的。这一点你实际上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讨论过。按照这种观点，构成自然主义僵局的两个因素是情节和相互关联方面的局限，历史情节的问题在舞台上可能会得到解决——就像布莱希特的作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显示的那样，然而间接关联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舞台之外，在于电影或者电视新近获得的相对丰富的影像之中。这样主张是否行得通呢？

可能吧。任何人都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最近 30 年或许 40 年的全面危机中反复出现了一些尝试，以创造难以用陈旧的术语进行归类的新形式。例如，在电视范围之内已经出现没完没了的有关电视剧与纪录片之间关系的讨论，讨论中包括了正在受到进步制片人抵制的官方法令——是在观看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视剧，在任何情况下这对于观众都应该始终是清楚的。可能从这些新形式中出现的作品不会太像现在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在表现方法的意义不一定全然得到了戏剧性的表现或者叙述，但是可能仍然是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可以问问你对电影的观点有什么发展吗？你在战后是怎样开始写作《电影序言》的？

这本书的激发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自己当时在成人课程中讲授电影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来自奥洛姆的建议。我当时和奥洛姆已经好几年没有接触了，他建议我们合作一部电影，同时用一本书的形式介绍我们的方法。当然，后来出现的情况是，这本书问世了，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关于电影的方案根本没有实现。

《电影序言》的美学主张在“总体表达”(total expression)的范畴里达到了顶点，你把它解释为“关于一种完全得到理解的戏剧的理想”，

其中“每一种被使用的因素——言语、音乐、动作、图案——在表达的时候,都与随后被使用的任何其他因素具有一种受到制约的、必然的和直接的关系”^①。考虑到“表达”一词的主观主义暗示,在历史上,与类似这样的措词相联系的是几乎与现实主义无关的美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象征主义的通感概念或者瓦格纳歌剧的总体艺术作品概念。你使用这一概念的意图是什么?

这个概念在那里的提法不太适当:我本来应该谈论总体形式。对此的说明是:在现代戏剧领域,自从戏剧导演出现以后,在作家和作品的创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成问题的关系。在英国,那种情况是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罗伯逊(Robertson)到来的。导演作为真正的创作者越来越有力地介入其中,与此同时和最初的创作者——作家保持着日益暧昧的关系。典型的思维方式是作者为“创作”提供“剧本”。随后这在电影工业中变成了标准的工作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其结果大抵一直是灾难性的。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当然不必只有一个作者,但是在这一体系之内,写作被贬低为提供在其他地方得到加工的原始素材。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用契诃夫的典型例子激烈反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改编的戏剧,显而易见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必须做些什么,因为契诃夫写出的作品不适合表演。在最近80年里,戏剧作者一直抱怨他们在接下来的舞台创作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被失去了的东西——文本——继续存在下去了,而被实现了的东西——表演——却不是这样。因而真正的问题是,你怎样才能找到一种适合于书写的符号呢?这里说的不是书写简单的对话,而是书写一个完整的戏剧情节。构想总体形式这个概念是用来表明一部戏剧作品的所有要素都应当处于一致的把握之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典型分裂过程中

^① PF, pp. 52, 54. ——原书注

的一些奇想。电影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在技术上实现总体表演的希望,与此同时,又像书面文本一样持久。因此,我对曾经出版自己剧本的伯格曼(Bergman)产生了兴趣,《戏剧表演》结束于对《野草莓》中的符号问题及其具体实现结果的分析。

毫无疑问,《戏剧表演》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在于,它以某种宣言的形式断定电影在当今的首要地位。你始终提倡书面文本与活跃的表演在戏剧中极为可能的融合或统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合乎逻辑的是,你应该结束于讨论战后电影的代表性人物——某些导演,只要商业压力允许,他们写出自己的剧本并指导最终电影作品的每一个方面,一直到最后的细节——他们是最终作品的理想的完全控制者。你实际上是在主张,一种总体表演可以在电影中以某种方式得到实现,那种方式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戏剧里。在戏剧里,演出或多或少趋向于拙劣或者好坏参半,对于剧作家写下的文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演出是对它的一种粗糙模仿,在最糟的情况下,演出是对它的一种彻底违背。是这样吗?

不,对于戏剧中的文本来说,那种情况并不必然发生。这是一个符号问题。就我们能够重建的情况来看,在古希腊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中存在着文本与表演的统一,一系列共享的表现方法使得这种统一成为可能,这些共享的表现方法不仅支配着对话的写作,也支配着演员在舞台上的动作和分组。当今存在着某些相似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剧本的写作是为了在一个特定剧团里进行创作,例如布莱希特为柏林市民剧团写作的作品。在这个例子中,不是存在着已经了解的剧团演出习惯,就是存在着大量关于创作的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没有被书写出来),因此可以假定文本在表演中将会被完全实现——毫无疑问将会被实现——而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问题的出现始于现代戏剧文本被导演看做只不过是脚本,这其实意味着它只是对话而

已。用适合于屏幕和动作的符号形式打量一个文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伯格曼的作品所主要关注的东西。在我看来，当前的戏剧缺乏足够的表现符号，某些戏剧问题确实可以在电影中被绕开，因为在电影中对于文本精确限定的表演是可能的，在理论上它服从于整体性的控制。

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应该强调一下，我不是指任何个人的控制方案，总体表演可能十分明显地受到一个合作群体的控制。我也不是想要暗示电影在实践中必然是一种定位于这种表演的较为从容的形式。相反的是，与戏剧相比，电影甚至已经更为典型激进地把作家贬低为脚本写手了。电视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我自己实际上经历了这种经验。在写出一部电视剧本之后，我被邀请一起参加制作过程——没想到我发现的是，作者在那里是一桩十足的麻烦事儿，你必须裁掉一场戏中的10分钟并需要迅速进行重写，或者一些新的线索必须被写进另一场戏。即使与一位非常合意的导演合作，作家也只是某种类型的助手，见证着某种他并未想要创作的作品的制作过程。

你已经说过，你在学生时期最深刻的文化经验是电影。你后来认为，电影至少在原则上具有文本和表演完全统一的潜在优势，这样，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完全消失，最终的作品可能会等价于一首诗歌或者一部小说。然而在《电影序言》中，你没有引证现实的例子来说明你所坚持的电影的创造性成就。那引起了与你在战后观看的电影类型相关的一个问题。哪种类型的电影能够超越易卜生或者斯特林堡，实现最为接近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自1946年到1960年这段时期，我比以往任何时间看的电影都少得多，基本上是因为我当时生活在一个乡下小镇，并且是在晚上授课。早期的苏联电影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作品，它吸收了世俗的、当代的、具有广阔社会性质的初期自然主义方案。但是通过在制作过程中应用

新的观念,它已经把它的倾向扩展到公众情节和历史情节之中了。在那个方面,20世纪的苏联电影决定性地好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赞同新现实主义,因为它呈现了新的社会素材,这在战后有許多适当的例子。但是它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倒退,很像我曾经谈过的后来表现工人阶级经验的英国戏剧。可以与布莱希特“复杂的看”相联系的爱森斯坦(Eisenstein)电影在观念上的革新不见了。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复杂的看”的发展,但是没有任何太多结果。看的复杂性变成了在损害被观看事物的情况下盲目迷恋于对观点的关注。这种电影全神贯注于技巧问题,在它的方法与应该诠释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充分的联系,在此意义上,这种电影可以真正被描述为形式主义的。在1930年代晚期,对《卡里加里博士》或《大都会》的认同事实上是进入剑桥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条件。当我如今再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的感受是“60年代到来了”。如果对表现主义电影与当代电影两个时期之间在技巧上的差异留有余地,它们在主题上的关注是非常相似的。对于形式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在1960年代和1920年代对于它们同样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有趣混淆。它们完全被混淆在一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最终这两者不得不将会再次被区分开来。

你对战后的美国电影是什么态度?

我和奥洛姆最终的最大争论是关于好莱坞的。当时我们在讨论,借助于一部由总体表达构成的电影,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请他就他的看法提出一个例子。他回答道:《在雨中歌唱》。起初我完全不理解——我以为那是一个玩笑。随后对抽象于任何内容的技巧的强调完全使我感到了厌烦。我自己的想法源于1920年代的电影,这使我的观点看上去是保守的,我正在罔顾当时完全不同的电影制作条件。我当时实际创作的情节是根据当代处境尝试改写一部《威尔士传奇》。

与《在雨中歌唱》相比,它可能会是一个较好的方向,但是确切地说,它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选择。总之,我只达到了写这样一部作品的程度。

电视的发展后来改变你的总体表演观念了吗——或者说,你是否认为电视的技术可能性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电影屏幕的缩微形式,影像比例的缩小产生了一种性质不同、更受限制的媒介。^①你认为那是将在未来流行的电视的本质特征吗?

不一定。大得多的屏幕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当然,即使是如今的许多电影,实际上也是用来在电视上播放的。影像的技术复制问题仍然存在着,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你能获得某些益处,你也必须做好接受某些损失的准备。然而,很难预期短期内会在这个国家里看到活跃的电影生产的任何复苏,我们现在已经在15年或16年里对电视剧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我在欧洲谈论当代英国戏剧的时候,我被问到的典型问题是关于一些其文本得到翻译或者其作品得到巡演的戏剧作家的;当我回答说其实在电视方面存在着更多的重要作品的时候,他们起初通常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例如,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这似乎是难以置信或者可笑的。另一方面,他们会说,好吧——证明给我们看,这时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不可能放映给他们看。关于重播电视作品存在着严格的协议,尤其由于衡平法,看到这种戏剧中的任何一部都是极为困难的——那就是说,甚至在它们不是恣意侵犯可以非常容易地被存储的作品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为了集体讨论而再次观看《大火》,极为不同寻常的规避手段是必需的:实际上必须把它走私出去。

^① TTCF, pp. 62~63. ——原书注

在电视剧作品基本具有可重复观看的性质之前,难以想象它在任何地方建立了一个连续传统。那对于任何正在进行中的发展过程都无疑是实质性的,尤其是这些发展过程还伴随着大量同一形式不同风格作品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确实是这样吗?

目前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我此刻正在卷入一场运动以使它得到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上不会涉及任何非常重大的社会环境变化——只涉及对曾经是相当合理的版权和行业协议的一种明智的重新协商;与改变资本主义电影生产性质中出现的问题程度相比,这无关紧要。无疑这需要时间,但是它可以实现。

IV. 文 学

1. 《阅读与批评》

当你写作《阅读与批评》的时候，你和《细察》传统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吗？现在看看这本书，二者非常接近，不过或许存在着没有表现出来的差异？

我当时自觉意识到一个差异，这个差异现在看来可能不太明显，但在当时是很重大的。《细察》标准的小说批评实践是通过分析一段散文体的例子来判断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小说家的性质，这段例子被认为是这个作家总体作品的代表性范本。这一方法基本上是被发展用来分析独立的短诗，我认为它不会对小说起作用。在准备文学荣誉学位考试的时候我已经搜寻了很长时间，以求找到出于乔治·艾略特和劳伦斯的相匹配的散文体例子来论证这一点。我选择的那些例子所展示的结果是，一对例子表明乔治·艾略特是比劳伦斯更为优秀的作家，而另一对例子表明劳伦斯是比乔治·艾略特更为优秀的作家。当时我觉得这是对正统批评的一个挑战。当然，我后来可以说，对用来进行精密分析的某一段文字的选择，通常以某种对于该段出自作品的未经检验的判断为前提，对作品的判断源自别处。

你在《阅读与批评》中对艾略特和劳伦斯的段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从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是，需要分析的不是武断地加以孤立的段

落而是全部的作品。你接下来尝试这样说明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现在你对那一章的感受是什么？

我认为，虽然那一章采用的也是较短的作品，但是它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过这一章说明的是那种批评分析的局限——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具有反讽性的是，康拉德的文本引起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关于帝国主义，后来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但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它们。在一个完全关注语言运用或者主题组织的过程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可能被讨论到。

那引出了与你当时的一般理论立场有关的问题。《阅读与批评》包含了一些对宽泛的利维斯式理性原则的挑衅式的重述。例如，你非常大胆并且故意地嘲笑了这样的观念：文学评价在任何意义上都受到更为广泛的理论观点的支配，更不必说文学评价还受益于它了。你写道：“‘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会被在理论上加以对待，但是有关文学评价和文学价值的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实际判断似乎常常极少具有实用性，无论它对于其他知识部门可能多么有用。事实上，任何人都了解，这样一种理论兴趣转移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注意力。”然后你继续说：“对于‘文学价值是什么’和‘文学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可能只会回答说‘它们是文学作品本身’。”^①那不是标准的利维斯式的极为循环论证的主张吗？

是的，这或多或少是一种正统立场的陈述。不过，与其说我当时是在思考与文学有关的理论，不如说我是在思考与文学评价有关的理论。虽然我现在不会以那种方式提出，但是实际上，我仍然坚持同样的被称作批评理论的观点，它与文学理论或者文化理论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关于做出评价的过程存在着大量貌似的话语，这一评

^① RC, pp. 25~26. ——原书注

价过程作为一种孤立的的活动再现了孤立的批评实践本身的局限。

在这本书结束的地方,你说,文学是“具有重大价值的,主要因为它是得到连贯表达和评价的详细的个人经验记录”^①。对于你的写作而言,即使在当时,那似乎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陈述。

没错。现在尽管我会保留“详细的”和“经验”这些成分,但我显然不会再使用这些措辞。破坏了强调重点的是“个人”这个词。使用这个词的意图是抵制作为一种文学抽象的关于社会的观念。如果不是说文学作品沿着更适于研究同样社会系统结构的话语形式方向被取代的话,实际上,正如我后来主张的,一个社会系统只能在非常明确详细的生活与联系中得到理解。但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是使用“个人”一词在另一个方向上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据。我想要坚持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同样也是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但是我的解释形式延续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错误对比。

《阅读与批评》引发的最后一个问题直接把我们带到当下。对于目前的新读者,这本书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主题是你在某些方面对批评的大致辩解以及你在这样做时所使用的措辞。你写道:“批评遭到广泛的憎恶,它招致了如此频繁剧烈的敌意,因此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情感力量卷入其中。理解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困难。”^②你抨击了把批评视为一种纯粹“挑剔的、吹毛求疵的行为”^③,其目的是要夺走读者的愉悦,你还宣称,批评实际上是在成熟的阅读中对标准进行评价和比较的合理过程。30年后,在《关键词》关于“批评”的词条中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讨论中,你采用了完全同样的

① RC, p. 107. ——原书注

② RC, p. 3. ——原书注

③ RC, p. 2. ——原书注

措辞,但是对于你曾经公开指责的对批评与吹毛求疵之间的等同,你现在似乎是支持的。在《关键词》中你明确地写道:“针对[评价]习惯上的狂妄,继续把批评理解为吹毛求疵是最有益的语言方面的影响。”^①你意指这是对你早前立场完全有意的颠覆吗?

当然,这样说是非常自觉的。不过,这种变化不仅与我的作品发展有关,还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一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是,实用批评运动的早期阶段与对某些类型当代作品的相应支持是相关联的。1920年代新批评的力量直接与艾略特或者乔伊斯的新型诗歌和散文联系在一起。过去的文学作品当然常常被借用,但是它们与当前的文学实践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当我们在战后直接采用实用批评口号的时候,我们感到存在着一场即将发动的文化斗争,存在着某些我们想要抨击的人物或者写作风格,例如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他正好以创造性作家的傲慢语气做出了回应——“这些剑桥的青年人在挑剔谁呢?”那正是我们当时所指的对批评的憎恶。另一方面,我们很不清楚当代文学可供选择的明确方向。那种不确定性后来被1950年代普遍的漠不关心承继了,当时很少有批评实践对于当前作品中的随便一种倾向以任何方式提供即便是有限的支持。这两者变成完全分离的了。利维斯在这一转变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除了几个幸存的早期作家,他抵制战后的一切作家作品。当代作品现在得以评价的绝对标准完全是过去的作品。结果出现了大家熟知的由过去的文明与当前的混乱构成的社会—文化教条,与之结合的是主张文学批评对于所有文学实践的优先权。到了1960年代早期,人们普遍认为,与进行创作的尝试相比,指出当代作品中的缺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活动。在那种程度上,可以更为恰当地说,吹毛求疵正在被提升为英语研究中的一门主要学科——在性质上不同于实用批评最初特征

^① K, p. 76. ——原书注

的某种东西。

现在,我看到反对现实主义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电视或小说中的他们自己这一代人正在形成一些非常严厉的观点,他们否决了利维斯批评传统的所有前提并从完全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继续前进,但是他们正在以某种非常相似的敌对情绪对他们同一时代的作品做出反应,这时,我禁不住感到这个文化由于批评而腐烂了。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恢复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批评实践不与某些对文学实践的拥护联系在一起,它将会更为接近被以一种粗野的方式描述为纯粹的挑剔和吹毛求疵,并且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粗鲁的反应: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写出一部更好的小说或者电视节目——把它写出来,我们也会这样看待你的作品。当然,当这种反应来自那些忙于妨碍他人创作作品的人的时候,它常常是一种粗野的错误信念。最近爱丁堡的电视戏剧节是这两种态度得以显著展示的一个场合。一方面,你可以听到极为自满的“具有创造力的”人告诉年轻的批评家们:“当然,你们不过是批评家,我们才是制作这些节目的人。”这种答复把我带回到了1947年的立场——对这种答复我会再次写出同样的对批评的辩护。另一方面,对于因为不理解“我们具有创造力的人”而被拒绝承认的批评家们,当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讨论他们的批评方向以及批评与当代作品的联系的时候,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的批评与任何可供选择的实践都是脱离的,那样的实践本来应该是批评兴旺的条件。

此外,你不可能把批评的制度化视为在考试卷或者大学校园评论中延伸的一种教育实践而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它对受训于想当然的批评特权的一代人起到了什么作用。使我具体确信这一点的事件是当时我读到完整的一组试题答案,它们涉及的是琼森对李维(Levet)的悼文,在悼文的第二节,不但把李维描述为“坦率的”和“真诚的”,还把他描述为“爱管闲事的”。“爱管闲事的”在18世纪通常是肯定性的词语,其含意是“乐于助人的”,但是现在它当然意指跋扈的或者碍事绊

脚的。一个教师可以原谅任何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但是对于那些在一个关于美德的列表中发现这个有疑问的词的大学生们,他会期待他们愿意坦率地承认“即使我不能解释,这里也存在着某种使人迷惑的东西”。对我造成非同寻常冲击的是他们的狂妄,与这种狂妄相伴,他们的答案要么求助于源于实用批评的专业性神秘化做法——那是一种有趣的模棱两可的话:既是高尚的又是爱管闲事的;要么简单地断言,琼森思维混乱了,没有能力选择用词。那种不进行自我批评的习惯得来毫不费力,对任何人没有什么好处。一种风格逐渐形成了,完全不具有建设性——它越制度化就越变得更加狂妄。事实上,它目前在某种反政治的犬儒主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像这样的批评家非常适合于挑刺儿,当出现某种关于工业化的争论的时候,他们会分析总是包括了某些错误和老生常谈的那些斗士们的语言,而不是谴责与争论相关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不管以何种方法加以限制,必须明确表达对纯粹作为吹毛求疵的批评的认识。这就是我在《关键词》中有意改变我的评价的原因——捍卫那些需要某些捍卫的人们。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对此有强烈的同感。你的回答实际上使人想起了《阅读与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个特色不容易从简单的文本对比中推断出来,但是应该是对这本书进行回顾性评价的一个构成部分:你当时试图改变利维斯—瑞恰兹式批评的社会关系。瑞恰兹的读者事实上是社会精英,利维斯的读者在规划中是知识分子精英,而你的直接读者大体上是工人阶级,他们受到的教育来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是以那种观点来理解他们的教育实践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实际上立足于你一直在谈论的那种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之外。

那在客观上是真实的。不过我并不认为我当时对那种区别是如此自觉的。当然,正如我解释过的,成人教育是不同因素混杂的一场

运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仅仅是精英教育的一种延伸。不过,工人阶级学生的出现是这一混杂运动中的另一个部分,使批评实践适合于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批评实践的修正:改变了的社会关系必然产生一种改变了的社会声调。

2. 《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

就文学批评在你自己一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想问你一个笼统的问题。在《阅读与批评》和《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出版之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在你再次出版一部完全符合英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作品之前，你一直在从事文学教学，先是在成人教育中执教了15年，然后又在剑桥执教了七八年。那是一个显著的中断。文学批评与你在那段时期的其他作品之间有什么关系？你是否想要在这个领域创作一部全面的作品？

不是，我当时对此没有特别的兴趣。当我在成人教育中从事教学的时候，我通常把每年2/3的课程用于那些我以前从未读过或者所知甚浅的作品。因此我完全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更为广泛的阅读上，我并不特别想要写作文学批评方面的东西，《文化与社会》和《长期革命》占据了我更多的注意力。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我不再把批评方面的作品看做是我想要创作的那种作品。例如，我并不紧跟所谓“文学”的发展。当我回到剑桥的时候，我和文学完全没有什么联系；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学学者。对于从我学生时期以来出现的那些重要作家，我不得不阅读关于他们的所有出版物，以使我自己跟上时代，甚至对于我一直不断在思考的那些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我也没有读过那些批评著作，更不必说文章了。

当我回到学院氛围之中的时候，不用说被认为将要从事的是批评工作。“你正在致力于什么呢？”人们会问，我会含糊地回答，“不是很确定，与戈德温、赫里克(Herrick)或者某些别的东西有关”。然而事实上，我回到剑桥创作了两部作品，其中包括文学批评，但也包括对其他问题的关注和论辩。它们是《现代悲剧》和《乡村与城市》，前者的写

作是因为我震惊于大学校园中关于悲剧的思想体系,后者则源于在同一时期对田园诗的讨论。这两本书的创作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自对于这种文学批评氛围的重新进入。但是在当时,它们没有一本被认为是文学批评著作。最终我只出版了关于英国小说的那本书,它起初是一系列的讲稿,其中某些独立的部分在他人的作品中以极高的比例出现,因此我认为我最好表明自己的立场。它不是一部计划中的作品,很快就完成了。我只不过找到我以前的笔记和抄本,把它们写成了一本薄书。

许多读者肯定觉得这本书在措辞上非常清晰和紧促,也许因为它首先是用口头表达出来的。最终的文本与起初的形式非常接近吗?

是的。在我回到剑桥之后,我对自己当时正在讲授的小说课程非常投入。它得到了大量的回应,在这些年期间,好几个研究生开始从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著作,这包括特里·伊格尔顿、派特·帕林德(Pat Parrinder),还有其他一些人。许多想法的闪现是在当我正在讲课的时候,例如,我记得有一个时刻我把对于《米德尔马契》的写作分析和乔治·艾略特早期社会观点的丧失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一联系在那一刻之前还没有闪现。我和学生始终都在讨论,特里·伊格尔顿当时坐在前排,他坐得笔直,因为他是如此投入到辩论之中,以至于他不能当即理解从辩论的逻辑中刚刚产生出来的评价上的改变。当我检查记录下来的材料时,我保持着进行讲课时的情形,有意把这本书保持在那个水准上。当时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随后我想,假如我要创作一本会被我的同事认为适当的书,那将是一项要耗费多年时间的庞大工作,其结局将会完全不同。如果它是一部以当时的学院风格构思的作品,它甚至不可能被写成。对于我自己,我当时觉得一段时期已经结束,正好是时候把它公之于众了。

对于熟悉利维斯作品的任何人来说,《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有一个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特色,对于在《伟大的传统》中可以发现的那些作者、评价和重点,你的作品明显持续性地近乎将其颠倒了过来。在各自的实际情况中,这两本书都始于简·奥斯汀,她并未获得关于她的一章,而是扮演了某种传统起始点的角色;但是利维斯把狄更斯取消在他的传统之外,与之相反,你非常坚定地在他的传统中把狄更斯作为第一个详细讨论的作家。继续进行到乔治·艾略特的时候,利维斯把他的重点全都置于《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这些较晚的作品,你恰恰反对这些作品损害了《亚当·贝德》和早期的作品。此后,当利维斯忽略哈代、毫不犹豫地转到詹姆斯(James)的时候,你直接转到哈代,删掉了詹姆斯。即便对于劳伦斯,利维斯坚持《恋爱中的女人》是其巅峰成就,你却把这部作品挑出来进行责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赞美利维斯所忽略的《儿子与情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看上去你好像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利维斯在进行争论,并且寻求颠覆他所描绘的文学地图。你对这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这样做的?

在某些地方完全是故意的:对简·奥斯汀与乔治·艾略特或者艾米莉·勃朗特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对狄更斯的评价(利维斯当时至少已经修正了他对狄更斯的评价);从乔治·艾略特到哈代而不是到詹姆斯的过渡。我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我对《伟大的传统》的了解不仅仅是熟记而已。有人肯定记得,当时利维斯虽然仍然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把自己看做一个局外人,但是他已经彻底取得了胜利。我的意思是指,假如你向任何人谈论英国小说,包括对利维斯怀有敌意的人们,他们实际上在脑海中重现了利维斯对小说的历史形成的认识。因此我不可能仅仅责备那种情况。我认为它正好错误地影响了我,因为我现在不会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而是会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这才应该是恰当的时期,一个对象戈德温这种作家的新型小

说尝试进行压制的时期。我认为,对于简·奥斯汀以及随后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重新出现的一种类似小说,本来可能产生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小说本应该与一段儿得到更远回溯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我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因为18世纪90年代根本没有出现在小说的传统地图之上。

关于利维斯,事实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强烈地认为,即使对利维斯和他的所有评价做出最为宽容的裁决,他也不应该对哈代那样做。我不能理解他对20世纪中期文学作品的态度,无论如何我拒绝接受他的态度。除了对他做出极其糟糕的评价之外,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为哈代采用那种挑剔的语气。即使是他在阐述中有错误——他对英国风格的强调或者对特定类型的乡村共同体的强调——至少也应该关注一下哈代,而不是把哈代排除出他们一直在促进的这一特别传统。

答案是否在于,他很可能感受到了来自哈代的激进主义的真正威胁?你在你的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哈代在许多方面是劳伦斯的重要先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劳伦斯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你不想过于接近地考虑与阶级和权力有关的现实,劳伦斯非同寻常地比哈代要较少具有暴露性,尽管他跟随的是哈代的方向。

那是正确的。但它仍然是讽刺性的。在他1930年的《少数人文化》专题论文里,利维斯应该已经把哈代列为伟大的名人之一,然而到了《伟大的传统》的时候,他俨然以施舍的态度对待哈代,几乎把他看做一个乡巴佬。我认为你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是正确的,对于试图使精致的、文明的、和谐判断合理化的人来说,哈代完全是一种妨碍。哈代暴露了如此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被从其社会处境中移开,这种情形在后来的作品中尤其如此。我的剑桥课程的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开始了对哈代或许还有韦尔斯(Wells)的重新评价。通常认为韦

尔斯被弗吉尼亚·伍尔芙所终结——“没有人读那种东西”。我寻求表明，韦尔斯和詹姆斯的论战是一场完全没有结束的辩论，而非詹姆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谈到利维斯在 1920 年代认可地提到了哈代，对于哈代，弗兰克·查普曼(Frank Chapman)事实上在《细察》较早的一期里已经给予了积极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另一本小说，利维斯夫妇曾高度重视但却未能够就其进行写作，那就是《尤利西斯》。在哈代的写作策略，特别在他组织的话语中也许存在着某种东西，它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实际上摧毁了利维斯关于具体化的美学观念，这种策略在乔伊斯的小说中更为明显——从你的不同立场上，你能够对它非常有效地进行分析——难道不可能是这样吗？或许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小说使他产生了挫折感。

我认为那大概是正确的。根据利维斯声明的对口语体和鲜活经验的立场，《无名的裘德》或者《尤利西斯》应该是《细察》注意的作品。然而实际上当时存在着日益增长的运动正朝向替代性的传统，朝向更为正式的、更为有意识地教养化的、更为统一的文学形式。这些批评家发现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他们自己面临着某种口语体和日常性，它不但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而且就存在于自己所处的空间里，存在于他人当中，这时，这些批评家的整个计划遇到了困难。没有利维斯不得不绘制的非凡的文化地图，你不可能赞美这些过去的优点并唱出它们现在的挽歌。所有这些东西曾经是真实生活的部分，现在它们则是纯粹的粗俗行为。这就是它完全终结的地方。

在你对哈代的许多讨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可认知共同体。这个范畴在其含义中既是社会历史性的又是文学文本性的，它是这本书的组织原则。不过，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没有

给予任何直接说明。关于可认知共同体,你能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定义吗?

有些小说通过充分显示直接的关联,可以达到某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社会经验范围,这些小说具有某种可认知的共同体。哈代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地域性的作家,但是这个用词是错误的。地方是更为宽广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域性小说并不包含与更为宽广的社会有关的冲突。存在着大量的 20 世纪乡村小说,你不可能从中推断出英国社会中的任何重大运动,在此意义上小说是地域性的。这绝对不是与哈代相关的事实,他的小说揭示了 19 世纪晚期英国的重大危机。通过以明白的方式表现一系列对他来说是完全可知的关联,他可以达到一种非常宽广的社会经验范围,他可以在小说中具体地表现这些关联。然而对于狄更斯,那是不可能的,狄更斯不得不为一个复杂得多的城市世界想出不同的小说策略,这个世界日益受到只能用统计或分析方法加以理解的某些进程的支配,是一个根据表明的经验不可认知的共同体。相反的概念——不可认知的共同体——对于这本书的论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独的可认知共同体这一概念可能暗示了,除了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在 20 世纪不可能写成小说。这样的结论当然违反了我自己作品中的一切,在这里,对于我自己的实践,这些问题非常直接地被提出了。

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有一系列明确的评价,它们引起了许多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我们或许应该考察一下。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于简·奥斯汀的文学成就与其进行创作的阶级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对于她的小说中的道德规范与她的世界的阶级选择之间的关系——你所采取的论述方式。你实际上指出,简·奥斯汀的小说基调的显著统一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对她来说,道德的进步在某些方面与经济的进步是有关的,甚至是同体的——换句

话说,在她的时代,与英国农业现代化的优点潜在关联着的美德是个人的自律、对比较愚蠢的自私形式的拒绝和弥漫在其小说世界中的其他价值标准。你主张,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她逐步提出一种如此强烈和自治的道德辨别力,以至于它最终成为经济社会本身可以得到评价的标准——随后乔治·艾略特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采取了这一步骤——这时,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实际出现的是两种进步的区分。你写道:“在《爱玛》、《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出现的是对某种坚定不移的日常道德的发展,这种道德实际上是可以从它的社会基础上分离的,换句话说,可以变成与其社会基础敌对的。”^①

现在的困难在于,试图把一个像简·奥斯汀这样的作家的美学成就与其阶级的社会规范区分开来,是否不现实?事实上,有人能从她的作品中以这种方式区分出一种非阶级的道德吗?是否存在恰恰相反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小说的特殊美学价值是当时英国地主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特定社会类型的产物?换句话说,与你的认定相比,在这些小说得以写作的社会立场和它们的文学价值之间也许不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根据我的观点,简·奥斯汀进行了艰巨的尝试想要统一不可统一的东西,即某种必然的进程和结构。它与一个她所效忠的阶级有关,也与某种道德传统公开规定的诚实、友善和责任等普世价值有关。那就是我为何使用了这样的措辞——她必须像一个神奇的代理人一样引导人们走向财产和德行的和谐。我通过这样的措辞所传达的意思是,她的解决是一种不真实的解决方案。早期的乔治·艾略特把同样的价值更为广泛地适用于现实社会关系,比如说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这时,对简·奥斯汀的基调显著统一的确信就被打破了。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对统治阶级内部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某种明显成功的统一

^① ENDL, p. 23. ——原书注

之后,这是一种频繁出现的模式——伴随着实践,相关的价值标准得以形成,相关的价值标准又为对这种实践进行批评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关于道德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意你刚才所说的全部内容,然而在你对奥斯汀的处理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倾向,使作家的特定美学成就——在奥斯汀这个例子里明显与道德感知的清晰有关——对立文学形式所来自的阶级,换句话说,你提出了,在个体中存在着与出身阶级有根本性分歧的创造力、智力或者感性的盈余,它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尝试性地加以表达,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是,每一个在历史中上升的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创作出重要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这个阶级在它的时代对社会的体验。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假设一种偶然的而非对立的联系。例如,与一个阶级固有的全部统治和剥削相伴,获得一个统治地位的经验同样涉及实现对这个世界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实际控制。以任何一种欧洲观点来看,奥斯汀在文学上的平衡都是非常卓越的;它看上去表现的是当时在革命后已经存在了150年的一个阶级的显著自信和成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奥斯汀在那个意义上应该被视为她的阶级的最好的产物,而不是被视为一个脱离她的阶级的人物,可以这样认为吗?

我根本不想否认那一点,用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表达它就是:一个阶级的艺术成就是其兴起的附属物。这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它。但是我认为存在着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情形,在一个阶级的历史中,某种特定作品的成就出现在一个非常晚期的阶段——甚至当它处于显著危机之中的时候。戈德曼对拉辛的分析是一个研究实例。另一个不寻常的例子是“复辟”戏剧,比如康格里夫(Congreve)写于1700年的《如此世道》,当时适合那种作品的社

会基础已经显然消失了。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发现了形式在一个非常晚期阶段上的完善,没有像我们通常正确地做到的那样,与一个阶级上升中的活力和优势联系在一起。对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小说而言,后面这种联系是真实的。不过这些情况与19世纪早期艺术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更符合资产阶级的现实活动:小说家自己就富有探索性、占有欲和投机性,和他们描写的活动一样。他们不是冷静的而是精力充沛的。当你想到特定的完全非常冷静的作品——例如简·奥斯汀的作品——的时候,就涉及了另一种相互关系。你不可能对二者都使用自信这个词。假如你这样做了,它也是一种不同的自信。一种自信是由想要胜利的意志和取得胜利的兴奋所构成的力量,另一种自信则是源于一套用来统一整个社会进程的价值标准的冷静,它为特定的想象创新提供了基础。我一直常常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恒常的模式:一种形式完善的特定作品出现在某个阶级历史中的最后阶段,尽管不一定是在它被摧毁的那个阶段——在简·奥斯汀所处时代的例子里显然就不是该阶级被摧毁的阶段。我认为我们对这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可能关注得太少了,因为另一个命题——主要的艺术与统治阶级的自信和活力联系在一起——带给了我们一种良好的方法。实际上,在某种艺术的社会立场已经变得不可能的时期,有可能存在着这种艺术格外完善的类型。

你的大体论点非常引人关注,但是对奥斯汀作品的特定时期划分似乎有问题。通常过分地认为,存在着的要么是一个阶级的历史上升,要么是它的衰落,而实际上,当这个阶级不是正在上升也明显不是正在衰落的时候,存在着稳定的、已经达到常规情形的典型稳定状态。拿破仑时期的英国无疑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特拉法尔海战之后和改革法案之前,拥有土地的资本家阶级当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其政治权力的顶峰。那不是个上升的时期,但也不是非常晚期的阶

段。

嗯,在关于简·奥斯汀的这一章中,最使我满意的是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英国的历史正确地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她的小说据说总是关于个人关系的。我们在主要论点并无分歧。在像拉辛或者奥斯汀这样的例子中,你不可能把非凡的成就与社会处境分开。问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就必须分析它的限定条件。在奥斯汀的例子当中,其意识形态立场的两个特殊限定条件是决定性的。作为本阶级内部的衣食依赖者,作为一个女人,她在与本阶级的联系中被双重边缘化了。

把话题转向狄更斯,你几乎和利维斯一样彻底感到了后悔。在《文化与社会》中,你对《艰难时世》的责难是非常严厉的。你写道:“《艰难时世》在语调和结构上都是一个已经‘看穿’社会、将其揭穿的人的作品。其唯一的保留是对于那些顺从者和受苦者,对于那些将要继承土地而不是‘焦煤城’和工业社会的人。这种原始的情感结合了对于已经揭穿每一个人的积极确信,是出自一个青少年的保留立场。这种单纯使成人世界显得可耻,同样在本质上拒绝了成人世界。作为一种整体反应,《艰难时世》更是工业社会混乱状态的一个症状,而非仅仅是对它的一种理解。”^①你对狄更斯艺术作品中的前成人因素——“单纯”这一主题——的批评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你认可狄更斯的地方正好是他不顾通常所说的正确社会观察、赞美一种虚构的单纯、并为通常被当做不合情理的缺点以及从中产生的幻想而开释的地方。你当时断言:“很容易证明,在把某种社会环境解释为美德或恶习的原因之后,狄更斯几乎不可思议地从在其他人身上产生了恶习的同样环境中出示了美德,

^① CS, p. 107. ——原书注

就像在《小杜丽》中那样……作为一种社会观察,我们可能相信它,也可能不相信,虽然它具有奇迹的性质,但是它是那种发生了的奇迹;通过描写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人们,无法解释的爱或活力在绽放。那就是说,对于爱或者单纯,除了几乎被这一普遍性的环境所磨灭的人性之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可以描述的制度内对于人性之物的排除毕竟不是绝对的,或者说,为异化的人命名没有任何意义,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异化。狄更斯如此依赖的不可能被毁灭的单纯和奇迹般地介入的善被作为多愁善感随随便便地勾销了,单纯和善具有真正无法解释的性质,因为它们就是无法解释的。最终可以解释的是有意无意被创造出来的制度。”^①

这段话——值得相信的是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抵制:它太接近神秘主义的逻辑了。不过与此相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反对它的理由。你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的整个理论主张像在《长期革命》中一样,有赖于现实主义形式中个人品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的分离被你谴责为导致了心理小说或者社会小说的崩溃。有人可能会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整体相互关联这一观念是你整个文学理论的支柱。那时你对狄更斯的看法无疑与这一原理存在着绝对的抵触,因为你实际上相信狄更斯明确地抽象出一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社会性的人性:一方面存在着制度,另一方面存在着战胜制度的人们。是这样吗?

对我来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简单的地方和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简单的地方是,这一段的语气和语调告诉我,它是在做无谓的争执。它是那种来自作家过度沉浸于其中的兴奋言辞,是对于他自己看待世界方式的同化:早前我在卡莱尔的例子中提到了这种无意识言说的危险。我现在当然不会想为那一段的措辞辩护。它们掩饰了一个

^① ENDL, pp. 52~53. ——原书注

更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我现在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你像我所做的那样,把作品的基础建立在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不可分解的统一之上,那么你就面临用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解释那些行为与反应的问题,可以说,社会环境或者社会关系不像我们通常可以确定的那样,已经准备好做出那些行为与反应。我现在的立场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不管一种社会制度可能多么具有优势,其优势的真实内涵包括了对它覆盖的活动的一种限制或者选择,所以根据解释,它不可能耗尽所有的社会经验,因此这些社会经验始终潜在地包含了空间,适合于尚未被清楚地表达为某种社会制度甚至社会方案的替代行动和目标。不过,我现在更不想把这一观念应用于狄更斯。我认为他不得不用难以解释的方式提出他的价值标准,因为用其他方式呈现它们就意味着与他不想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那些力量结盟。但是,不管他的反应冲动与反应能量的最终形式如何具有意识形态性,那并未使得可以用任何方式忽略它们。

不,他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的,错误的是不可思议的处理方式——狄更斯不可能作为一个站在其阵营中战斗的小说家得到辩护。他在小说中重新产生某种基本解放冲动的高尚情感和巨大愿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们被小说的结构扰乱了。你对狄更斯的极大称赞是因为他有能力通过对一种非常新颖的隐喻和象征形式的运用,以其他作家不可能做到的方式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组合起来。你也承认,奇怪的是,他没有觉察到在他自己的时代正在寻求革新制度的那些力量,但是你把这低估为他的洞察力的限制。然而,狄更斯作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对于制度——英国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本质野蛮的生产模式——的一种过度的整体化,另一方面,这又随后造成了对完全处于制度之外的明确要素——不可思议的过于具体化的个人品质——的求助,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在经济生产模式的

严格意义上,即使在其自身的强制性选择之外,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也从未详尽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经验,因为其他生产模式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着。这一社会构成比简单的“焦煤城”计划要远为复杂得多——尽管“焦煤城”在他的作品中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然而,对于英国社会,对于这一社会抵抗资本秩序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细节,如果狄更斯具有一种更为丰富的洞察力的话,他本来在审美上会更有说服力地将他试图描述的价值标准具体化,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呢?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那恰恰是我认为《艰难时世》的错误之处。你抓住了这种文本里面的典型矛盾——小说始于对一个城镇的描述,在这个城镇里,所有人都是彼此完全相似的,然后,由于狄更斯是这样一种小说家,小说就接下来表现彼此完全不同的人们,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彼此反对对方。然而作品最初的陈述从未得到修正。我对这一点的感受在围绕《董贝父子》和《小杜丽》进行写作的时候还不太强烈。但是作为可能的对立之源或者狄更斯时代的社会中可供选择的方向,实际上存在着其他社会经验。需要一种非常精确的历史分析来确定这些,它们不容易在小说分析中得到实现。不过我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尝试,因为事实上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资本主义关系,不管如何,他通常求助于某些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如童年、田园生活、疾病或残疾,作为他的世界中的保留元素。无论如何,如果某些价值标准可以被用并非不可思议的方式回溯到社会的源头,就还保留着这样的可能性:其他价值标准完全形成于确定的模式范围之外。如果我们尝试确定《呼啸山庄》中标新立异的两性关系观念的源头,同样的问题就会再次出现。当人们正在生活于某种支配性的制度之下的时候,你既从过去幸存下来或者积极反对支配性制度的其他模式中获得了可供选择的社会经验来源,又似乎要获得还没有被已知聚结力量引起的其他冲动。但是任何人都绝不应该说:因为这些冲动还没有

被已知聚结力量引起,它们就根本还没有被任何力量所引起。在你引用的那段话里,那就是我当时试图说出但又说得不充分的东西。不过在我对狄更斯的态度中,一直这样摇摆不定。我永远不会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也许有人可以。

你谈到《呼啸山庄》中的一种相似的困难。实际上你对艾米莉·勃朗特的讨论可能对读者导致了一种相似的困惑。因为你的主要焦点在于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关系的性质,你说:“那种关系的黏合,那种绝对的在场、在另一个人中绝对存在、在彼此之中绝对存在的感觉,事实上是一种日常的经验,不过当然也总是一种处于转变中的经验……不是对于另一个人的渴望,而是希望存在于另一个人之中的渴望。”^①你还说过:“就其确定的性质而言,这是社会和个人、自我和他者从同一个根上发展出来的地方。”^②你在这里扩展的似乎根本就是对优先于任何社会与个人之间区别的某种联系的描述。你所使用的意象使人想起植物的成长。不过你可以回顾一下艾米莉·勃朗特是怎样对它进行表达的,她恰恰否定了那种意象。凯瑟琳说的是:“我对林顿的爱就像森林中的植物:我清楚地意识到,时间将会使它改变,就像冬天改变了树木。我对希思克利夫的爱却类似于下面永恒的岩石。”换句话说,这种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地成长的,而是在正常自然发展之外被赋予的。语言的形而上徽记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你的评论与解释似乎正在认可某种东西,它在你大致描述小说人物关系的措辞范围之内似乎很难得到成功的处理。

我看到了那一点。我承认,可以认为我所使用的隐喻与她是相抵触的;她的隐喻无论如何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其潜在层次的意义可

① ENDL, p. 86. ——原书注

② ENDL, p. 67. ——原书注

能是什么呢？它应该要么表现了某种完全物质性的东西——我认为它不可能是唯一的因素；它要么表现了某种魅力的构造，这种魅力预先假定了某种完全决定性的天性，它会支配一切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艾米莉·勃朗特实际上确实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童年以后在时间中的曲折变化，这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当然是成长。我自己的意象——唯一的根——只是想要表明，这种关系和最为真实的个性来自同样的经验——不是说这种经验是前社会性质的，而是说它出现在独立的社会和个人范畴相互发生关联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唯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极其显著的程度上占据了我的思想。当某种制度似乎还没有被社会环境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如何说明通向这种制度的解放反应的可能性呢？某些关系出现了，它们非常难以通过标准的经典作品加以理解，它们为形而上的或者主观主义的解释提供了说服力，因为这些解释事实上是剩下来唯一支持它们的语言的。我非常渴望发现替代性的语言，但是我同样也受到了限制，这说明了我的夸大其词，也说明了我不赞同“左派”通常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例如，在《呼啸山庄》的例子中，你具有代表性地尝试把希思克利夫解读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形象。以那种方式是不可能解答的。我还注意到另一个危险，可以理解，人们感到需要抵制形而上的或者主观主义的解释，他们完全适当地把重要性更多地放在辨识始终存在于作品中的意识形态逃避——这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比在勃朗特的作品中更多——而不是放在探究意识形态当中提出的问题上。真正的问题因而仍然保留着，通常被遗忘了，或者被推到一边，或者在确有把握的阶级解释之后被延宕了。我认为这与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于性问题和根本性的两性关系问题的普遍忽视有关。对这一层面上的深层问题、深层缺陷——然而与此同时也是深层的可能性——的感受差不多就是 19 世纪 40 年代社会危机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社会危机得到体现的方式是,通过在那一层面上以比普遍接受的语言更多的激情,在政治解放和性解放之间制造出大量的混淆,实际上,在这方面我基本上站在辩论的另一方。不过我仍然会坚持,社会危机在那个方面也爆发了;不过虽然我可以说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不清楚它是如何产生的。正如从你提出的每一个例子中都可以看到的那样,我曾经试图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哈代或布莱克(Blake)的例子中我可以更多地把它与其来源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某些其他例子中我没有把握能够做到。与17世纪政治中的异端激进主义相伴,同样的问题再现了。根据一个被拒绝接纳的阶级的已知社会环境,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呢?它涵盖了从精神错乱到非凡的想象与洞见的所有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它仍然是一种完全无法解释的性解放方案呢?我认为现在存在着某种对此不予考虑的特定危险,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特别没有耐心的那种现象,事实上这种批评有意识地用它的科学分析形式使它自身游离于这种现象。然而在最为显著的意义,与这些不可追溯的或者说不可直接追溯的解放冲动相关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分析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当代政治问题。

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继续向前,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里,你的针对利维斯的辩论动力似乎的确在这本书中导致了某种有害的片面性,那就是你对詹姆斯的描述。你对詹姆斯的处理好像是在报复利维斯对哈代的处理,对于二者来说,那其实都不是最好的回应方式。你的评论实际上是非常简洁断然的,但是你对詹姆斯的基本指控是他对历史没有兴趣。“他实际排除在外的是历史:从司各特开始,经过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直到劳伦斯(而不是到乔

伊斯),另一种价值尺度已经使散文体小说发生了改变”^①。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评价。毕竟是你本人曾经指出,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存在着明显具有历史特征的多重社会进程,她的小说以某种比通常的看法远为直接的方式受到她的时代的激励。你的主要论点是,她根本不是不触及历史的——她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作家。根据你自己的批评标准,同样的评价无疑更有理由可以用于詹姆斯吧?他的全部作品都被打上了烙印,标记着对于财富模式和依据这些财富模式所产生社会关系的强烈的唯物主义兴趣。对这些模式的回溯覆盖了一个比对简·奥斯汀的回溯更长的时间范围,包括了许多更为连续的历史变化:任何人只需要想想在《欧洲人》和《金碗》之间发生的复杂真实的社会历史就知道了。此外,詹姆斯的大量作品中首要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美国与英国社会或者欧洲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这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人可能会说,对于康拉德的世界来说,詹姆斯的世界是硬币的另一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剥削当时正在与英美资本主义之间宗主国关系的重新确定相伴,康拉德描写的帝国主义的全部未来基本上在于吸引了詹姆斯的盎格鲁血统美国人伙伴关系内部的力量调节。即使在今天,后一进程也从未得到“左派”非常彻底的研究。对于中期或者晚期的詹姆斯,存在着许多有待做出的评价,但是在任何一种均衡的看法中,对历史的忽视是否不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纠正——我对詹姆斯的评论受到了辩论语境的影响。关于詹姆斯的主要情况应该像你提出的那样认定:我特别同意你对与盎格鲁血统美国人的关系的强调,在论述詹姆斯的作品中,那种关系还从未得到真正充分的注意。我唯一仍然会加上的限定是,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存在着某种从历史走向景观的东西。在小说发

^① ENDL, p. 133. ——原书注

展至关紧要的时刻,他率先全神贯注于这一景观进程和观察这一景观的进程。那可能与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封锁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上的封锁阻止了他彻底谈论他的独特领悟。作为征兆的其他例子是他作品中不可思议的单纯或者命中注定的美德,就像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一样显眼。因为它们出现在大体冷静且完全不受蒙蔽的观察之中,考察了金钱和金钱关系对人们的作用。在出版《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之后,我开始与他人合作,专门研究詹姆斯作品中的金钱问题。我不断地惊讶于詹姆斯在论述上的严密,他不仅严密地论述了资本和权力、富裕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还严密地论述了金钱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詹姆斯的评价,那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是的。你在自己的书中责备他忠实于福楼拜,但是实际上,他总是说他师从巴尔扎克——一个毫无疑问比狄更斯更为历史主义、更为唯物主义的作家。在对金钱作为一种堕落力量的认识上,詹姆斯非常接近地与巴尔扎克联系在一起。他的想象力的分叉有时是如此远离目标——在《一个女士的肖像》中,结局是财产作为自由选择的命运礼物被给予了伊莎贝尔——以至于任何人都不确定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事实上正在表现的东西。

我在重读《波音顿的战利品》的时候印象格外深刻,这不仅是由于它对金钱的论述,还由于它对金钱的引人注目的呈现。即使它被表现为一个景观,绝对没有可能对目击者造成任何欺骗。它是对某种拜物主义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力展示。有人可能甚至会说,在《资本论》第一章之后,应该建议人们阅读《波音顿的战利品》。

你在论述劳伦斯的那一章延续了早期在《现代悲剧》中对他的有趣论述——在《现代悲剧》中你比较了《恋爱中的女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两次论述谈到了在你的作品中隐藏的一个重要主题——世代

的连续性和生活的连续性以及家庭和孩子们的连续性。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比,你对《恋爱中的女人》进行批评的一个重点似乎是劳伦斯拒绝“不仅仅是单一世代中某种联系的那种个人整体生活”。你写道:“在他所有后来的作品中,劳伦斯反复把对个人生活的解释简化为一个单一的世代,而且他一直被这样得到理解。父母是遥远的、无意义的……存在着某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对孩子的拒绝。”^①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谈到,劳伦斯表现了“没有结果的情感”,那个语境表明,你用结果这个词意指的是孩子。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夸大的危险?你对《恋爱中的女人》的总体批评是,它在一切现实的社会语境之外推断各种个人的联系,然后在某种结晶体般的孤立中发展这些联系,从而达到与先前现实主义传统的破坏性决裂——包括与劳伦斯自己早期作品的决裂。这一批评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在什么程度上它需要明确指出叙述某个单一世代的局限性呢?对你的论点感到疑虑的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利维斯从个人偏好出发批评劳伦斯没有孩子,断言这是劳伦斯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男人衰退的原因。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包括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确实充满了对被限制在一个单一世代里的通常非常理想的各种关系的表现。任何人只需想想司汤达就知道了。你的措词“那种个人整体生活”难道不是具有某种过多的完整性含意吗?

请允许我即刻说明一下,我对这部小说和单一世代的评论涉及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以一个明显的共有世界作为出发点,劳伦斯做出了重要的延伸尝试,把对生活和两性关系的感受作为某种整体变迁进程的一部分进行阐释。单一世代的选取对那一探索产生了某种非常特殊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会脱离其他非常复杂的两性关系进程产生作用,当然,这些两性关系进程在一个单一世代里得到了完整的

^① MT, p. 135; cp ENDL, p. 181. ——原书注

经历。我的确不想暗示个体两性关系的结果只能是其他生命和其他世代。但是在劳伦斯的例子中,根据本性当中的创造性行为模式和破坏性行为模式进行理解,对单一世代的专注以这种模式化的方式在紧张的个人两性关系和整体生活进程之间造成了过于巨大的间隙。那一间隙太过宽阔而无法跨越,它把这部小说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置于了可疑的位置。如果这部小说只不过是四个人在相互联系中的历史,没有劳伦斯提出的更为全面的意识,它至少会在自身的措辞上更加连贯。当你把《恋爱中的女人》与《安娜·卡列尼娜》进行比较的时候,劳伦斯的一个突然转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二者的分歧不仅明确与孩子有关,而且还与劳动的进程有关。这包括了对自然的认识,自然不仅被视为一种与劳动有关的环境,而且还被视为一种我们劳动于其中的环境。换句话说,在劳伦斯的小说中发生的情况是,个体关系被考察到这样一种程度,至少其中某些关系被感受为否定性和破坏性的;随后通过把同样的景象突出到某种绝对和普遍的程度,某种巨大的飞跃就实现了。这里的自然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在试图重写同一问题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这一缺口不是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一个版本中,劳伦斯本来应该尝试把这一进程重新定位于工业化的英国,而非他结束的地方——一个乡村化的英国,后者允许紧张的个人关系和宇宙自然力量之间的某种更为似是而非的转变。不过那时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然后,从有限的群体关系到宇宙力量模式的思想跳跃,以及创造性和破坏性两极在每个人内心里的均等,都被证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是对源自《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尝试保持相同连续性的其他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范围的一种显著缩小。

《现代悲剧》中一个最有力、最重要的段落实际上把与自然和世代有关的这些主题联系在一起了。在批评加缪和萨特对于死亡的哲学

论述的时候,你写道:“当假定的非理性——非常接近所有这些作品创造性根源的一种关于自然的假设——不仅是冷漠的,更是敌对的时候,与推论看法相矛盾的只不过是这个世界。实际上,生与死的矛盾被限于资产阶级哲学特别典型的那种个人意识。在这种经验内部,‘我存在——我死亡’似乎是绝对的。”^①你对此表示了反对,“生命不只是被死亡所否定,它也通过新生命的诞生重新开始”。然后你继续说:“正如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经验根据被忽视的假定局限于个人的孤立经验,所以,根据相关的假定,自然被转变成了某种戏剧……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式的马克思主义把自然作为有待支配的物质的版本中,还是在存在主义把自然视为冷漠的或者对抗的版本中,都没有对共同进程或者共同生活的任何认识,这本身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类似情况,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绝望。”^②当然,存在着某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否认了与我们对自然的统治相关的全部主题,强调我们与自然的亲和力,那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与此同时,通过唯物主义地重新把基础建立在死亡问题上,如今由蒂姆巴纳罗最为雄辩地代表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了自然对我们的支配。然而,对于你所说的共同进程或者共同生活,二者都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认识。你当时在什么程度上觉得你的论点对于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来说是不同寻常的?

对于目前的在我之后的传统,我觉得不太熟悉。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读到过任何“左派”人士把自然的进程与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若非在偶然的情况下通过别人的叙述,我就完全不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直到最近它的轮廓才清晰起来。与此同时,我自己特别清楚这样一种认识,在这种认识中,社会主义观点被局限在一个完全城市工业化的前景之中——完全武断地与由自然构成的前景分离了。因

① MT, p. 188. ——原书注

② MT, pp. 188~189. ——原书注

此我强烈感受到这是那些极端的例子之一，正如我在《乡村与城市》中所说的，在这些例子中，我看不到将要包含那种意识的传统在何处可以被恢复；有人会不得不说，“把它搁置在一边吧，对于这些方面，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它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搁置的东西。我认为现在证明这个问题要容易得多，并且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看到有人尝试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从某些对拒绝和冷漠的深刻感受出发来完成这项工作。萨特的稀缺理论是一个例子。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反对这一理论的，因为它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两极分化。然而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它是我理解或者感受这个问题的方式，而是说它是一种面对这个问题的起始途径，而不是一种主观的论据——不只是在早期的存在主义小说中，包括在各种各样的不太重要的空洞作品中，这些复杂的感受都可以被毫不费力地得到充分利用。

回到英国小说的话题，你对英国小说历史发展的总体看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你指出，在小说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之间出现分裂的原因和时机导致了 20 世纪差别悬殊的小说形式，一方面是纯粹的社会小说或者纪实小说，另一方面是心理小说。你鉴定其分界线是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并提出韦尔斯和詹姆斯以其不同的方式代表了对于这两个选项的鲜明立场。当时你并未真正探索这种决定性变化的原因，但是你似乎暗示了两种解释。你在一个地方谈道：“我会接受说，已经形成的自信孤立的中产阶级——你可以在这个世纪自始至终看到、听到其出现的这个阶级现在已经成功了……一种崭新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英国人——在其与世隔绝中的独立和强大或许只是因为那个岛屿在一个岛内统治了一个帝国，统治了半个世

界。”^①在这一模糊的评论中,关键的从句似乎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它使新兴的中产阶级隔绝于某种经验的丰富展开,然而正是那种经验允许了整体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存在。你认为这一暗示的影响如何?虽然普遍的帝国意识毫无疑问要回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或者英国更早的时期,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帝国主义当然确实以某种更为外在的系统形式变成了一种操纵大众的意识形态。在另一个段落里,你提到对于你正在描述的分裂的一种可能性解释,它扩大了可能作为原因的因素范围。你写道:“在一个单一社会、一个民族内部,它不仅仅是一种危机;在从狄更斯到哈代的这一代里,那种明确的英国性还是一种力量、一个焦点。以前含蓄表达的更为宽泛的问题现在变得明晰了:这包括当时已经疏远或者边缘化了的战争与帝国主义以及具有新的国际意义的贫困与革命。从那些确实决定着生活的人类危机到可以被直接、具体地理解为……詹姆斯如此正确地称呼、强调的‘感受到的生活’的结构,存在着一段极其漫长的道路——它看上去不可能再长了。”^②在这里再次值得怀疑的是,帝国主义在从狄更斯到哈代的这一代里是否被疏远和边缘化了。在这整个时期内,爱尔兰毕竟是非常封闭的。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并不比90年代更少——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英格兰更糟糕。与1872~1914年的长期稳定时期相比,革命更多地出现在从1848年到巴黎公社时期的欧洲。战争在塞瓦斯托波尔^③、马詹塔^④和色当^⑤实现了它的现代科技形式,此后出现了40年的欧洲和平。你留给读者一个重复的问题。在关于小说的形式中你注意到某种中断,与你在《文化与社会》传统中称之为过渡

① ENDL, p. 122. ——原书注

② ENDL, p. 131. ——原书注

③ 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国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译者注

④ 马詹塔是意大利北部一城市,位于米兰西部,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所在地。——译者注

⑤ 色当是法国东北部一城市,1870年普法战争战场。——译者注

期的中断相符。但是你对此提出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你能为我们进一步证明或者详细说明这些解释吗？

这些解释是尝试性的。我在小说和文化思想中注意到这些变化，然后认识到它们可以在所有的社会史中被联系在一起。我现在会挑出来加以强调的两个重大变化，我想，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出现，以及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在文化上的分裂。首先，非同寻常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关于贫困的思考是多么局部化，这正是因为对有关资本主义的一种完全当代的、积极的替代制度没有任何感知。我认为，对于曾经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成就的丰富扩展的社会想象，一个具有表达能力、重新组织的现代工人阶级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提出了性质崭新的问题——我这样说仅仅是作为一种假设。它意味着，许多问题直接进入了那种正好不适于现实主义固定模式的语言。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虽然工人阶级的文化贡献似乎比早前一个时期要少，但是它以某种方式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造成了对陈旧景象的根本挑战——当我提到贫困与革命的时候，那正是我真正想到的。在当时的同一时期，同样存在着某种非常深入成功的对资产阶级文化和教育机构的重新组织：新型公立学校的创立、牛津和剑桥的改革、充分扩大范围的资产阶级新闻业的发展以及出版的现代化。与这些变化一起出现的是伦敦的日益中心化，它当时更多地作为帝国的文化首都发挥着作用。结果产生了以前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未存在过的一套完整自信的资产阶级文化机构。1880年到1930年间作家的社会基础与1830年到1880年间相比要更为狭窄和标准化。那就是我使用“隔绝的”这个词的原因——作家们自己当时拥有的是一种更为有限的经验。典型的转变是从乔治·艾略特到福斯特(Forster)的变化。当时福斯特宣称的是与乔治·艾略特同样的目标，但是存在着某些社会经验的领域对于他来说不再是开放的。与英国性有关的景象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在早些时候，英

国性其实是英国内部固有的,但是在 1880~1920 年这一时期,这个词更多地根据某种外部的帝国角色得到了解释。汤姆·奈恩(Tom Nairn)指出,英国因帝国主义而丧失了某种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这与我的意思相关,英国性在这一时期大成问题了。从那时起将要成为英国性的是完全崭新的东西。英国性在这些非常严格的训练和日益标准化的阳刚制度中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得到了解释。我重复一下,这只是一些启发性的意见。理解 1914 年以后的历史形式要容易得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 19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时间开始,在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剧变之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上的根本性转变。

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我们还有另一个想问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你没有在任何一处向读者提出任何建议,比如像《阅读与批评》中的创新因素——解决问题的程序,即对一部完整作品的系统分析。你代表性地从一部小说中取出一段或者多段文字,这些段落可说是作为这个小说家整体作品浓缩的轮廓,然后对其进行了评论。但是没有对任何小说的结构进行同样的分析:例如,你从未提及叙事技巧,只有在哈代的例子中,你停了下来,密切地考虑作者的散文体结构。这本书的潜在重点是要试图使读者远离对传统形式问题的关注吗?值得注意的是,当你确实提及形式问题的时候,某种反复循环的辞藻华丽的修辞出现了。你开始评论说,一部特定的小说具有某种非常完美或者晶莹剔透的形式:《米德尔马契》、《恋爱中的女人》或者詹姆斯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例子。你所使用的是品质最高的形容词:“极好的”、“杰出的”、“晶莹剔透的”、“完美的”^①。然后你接下来批评或者拒绝这部作品,质疑它过于形式化了:《米德尔马契》太冷静了,《恋爱中的女人》远离社会中的生存空间问题,詹姆斯的

^① ENDL, pp. 91, 135, 179. ——原书注

小说把生活转变成了景观。另一方面,在形式方面通常被认为是不太娴熟、不太完善的小说得到了你毫不吝惜的认可,例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或者乔治·艾略特的早期作品——与她后来的作品相比,你给予了更为重要的强调和评价。这是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给出的某种故意强调并且愿意为之辩护吗?或者说,它更多的是你在这本书中只能有限说到的论据的某种意外的副产品?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本书基本上是一系列讲稿的改编,面对众多的听众你不可能认真考虑对所有形式的相同分析。不过,我也意识到,在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的图谱和源于美国新批评的处于发展中的形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联系,我试图对其加以抵制。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形式通常只是在某种相当完整的古典主义意义上得到理解。然而在形式上遭到打断的乔治·艾略特的早期小说,或者狄更斯小说本质上混乱的形式正好与他们的小说所致力于的那些问题有关——它们是一种比特罗洛普(Trollope)的小说更为有力的小说,特罗洛普在复制普遍认可的形式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哈代,当人们说哈代写得不好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文学评价问题。为什么他在两三个不同的话语层面进行写作?他是如何试图统一它们的?这种变化完全符合他的社会谈吐。因此,虽然这些讲稿并没有系统地考虑形式问题——假如我是在分析英国小说中的各种形式,这将会是一本不同类型的书——不过我不得不加以改变的评价将会很少。

你采用的讲稿模式的难点在于,你进行论证的方式与你早些时候批评过的利维斯的方式有时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从一部小说中的某一段落进行推断,达到对作品整体的某种评价,但是却没有证明这一段真正是代表性的。在这里,形式的实用性在于,通过对比,它告诉读者到作品的整体效果中去寻找信息:小说中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个要

素在哪个地方必定就其他部分或者其他要素做出了回应,因此每一部分或者要素都对最终做出的评价提供了一种对照标准。这种对照标准的缺席或许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对于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你似乎一直在避开就作品本身做出任何比较性的评价。你对此并无直接的兴趣,这样说对吗?

完全如此。就段落问题而言,我唯一一次出于评价的目的分析一个段落是讨论哈代书面语言中的不同层面,在那里相应进行了细读。在其他场合,引文全都用于说明性的而非分析性的目的——作为一部作品主要关注的东西的标志,而非作为其文学价值的验证。因为那毕竟不是我当时正在表达的问题。

然而在这本书中,实际上传达了某些有力的概括性评价。重要的推测得以做出,重要的评价得到强化,但却常常不是依据特定作品的性质证明而得到直接的支持,在此意义上,实用批评和利维斯传统的遗产仍然是存在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你在断言从艾略特到哈代而非从艾略特到詹姆斯的联系的重要性时所采取的方式。你只是直截了当地说:“在英国小说中重要的不是向詹姆斯的发展,它是向哈代小说的发展。”^①这是一种权威式的有主观主义倾向的表达风格。它引起了这样的回击:它对谁是重要的?为什么它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只有一种发展是重要的?直接表明你的评价并从文本加以证明不是更可取的吗?

那是对传统的相反评价在论辩中的攻击。它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做法。我不可能在讲稿中试图就全部形式进行分析。我在课堂上做过一两次详细的说明——关于《米德尔马契》的课程实际上彻底失败了,因为它进行的时间太长了。但它不可能是我想要花费大量写作时

^① CC, p. 181; cp ENDL, p. 95. ——原书注

间的东西。我不是反对这样做(我认为它是不重要的),但是只要你这样做了,你就会误导所关注的趣味中心——一部作品的设计(project)。一旦你理解了狄更斯的设计是什么、艾略特的问题和设计是什么、哈代的设计是什么,你就能够提出关于形式的问题——它可能需要极为技术性的分析。在批评性的论战中,处于对立立场的人们经常会使用同样的方法,但是他们使用这些方法的目的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开始由美国新批评中出现的小说技巧手册可能看上去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但实际上它甚至不能被称为形式主义的,因为与这种彻底被根除了的学院分析相比,俄国形式主义者对于何为文学设计(literary project)有一种精确得多的理解。《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是通过挑战这一整体方法来使这一领域明朗的一种尝试。它的最大价值大概是指出其他人写的四五本小说,它们在这本书提问的那些问题中占有起源性的位置。但是趣味的中心必须被转换到一个不同的问题上:这些小说是关于什么的?在观念中存在着某种新颖的东西,这不是对于那些作家而言,而是对于他们同时期的评论家而言的。

你最后转向了与最近和现在有关的一些问题,在《长期革命》中关于现实主义小说的那一章,你是通过这样的评论结束的:“现实主义小说显然需要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一个这样的共同体,其中人们不仅通过某种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或者家庭关系——而且通过多种关系的勾连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想要找到这样一种共同体显然是困难的。”^①在这里你使人想起现实主义小说发展中的一个危机,它本质上应归于工业化规模的发展。然而,你刚才提出,瓦解了19世纪现实主义易于处理的社会世界的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解释。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你主张,

^① LR, p. 312. ——原书注

在 20 世纪中期英国小说的质量方面并不存在某种重大的衰退,不过需要却难以见到其存在的是对共同体进行表现的某种当代语法。在什么程度上你把对这样一种语法的发现与在现代小说中对工人阶级的表现联系在一起?

我在 20 世纪 30 年代意识到的前进方式是使现实主义转向工人阶级小说。我现在仍然对那种努力产生的文学作品怀有强烈的敬意——从像吉本(Grassic Gibbon)这样并不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作家的作品,到 20 世纪 30 年代威尔士和伦敦无产阶级小说家的某些作品。我认为它被严重地低估了:如今,即使学习文学的“左派”学生似乎也并不读它。但是问题在于,在我曾经加以解释的意义上,工人阶级小说可以非常容易地变成一种地域性小说。它描写了一种非常引人关注的、生机勃勃的、自治的共同体,就像简·奥斯汀笔下的某个共同体一样,这个共同体同样需要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接受,或者被当做《米德尔马契》中的共同体,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延伸,但是仍然是高度选择性的。工人阶级小说应当围绕写作的是直接的创作者在一个阶级社会内部明确与其他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鲜活经验,然而奇怪的是,对自治的强调常常否定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极其可悲的是读到某些无产阶级小说,它们完全是真实的,具有 19 世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那种宽广的影响,然而,那些从外部作用于这一阶级本身的形成和命运并且导致了苦难与剥削的力量却不能在这些小说内部得到呈现,在此意义上我最终感到它们完全是地域性的。在这些小说中最多可以被引入的是偶然出现的阶级访客或者阶级敌人。有时你甚至在最后一章发现某种宣传式的努力,加入一个特定的政党就是小说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过,工人阶级小说极其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走出问题的方式——因为那是很困难的——而是找到进入问题的方式。即使在关注的焦点范围比较小的地方,就像在 20 世纪威尔士小说中的例子一样,这也是正确的:你不可能在不写英格兰的情况下写作一部关于威

尔士的完全现实主义的小说。

这一问题把我们带到了 19 世纪以来小说家主观情况方面的重要变化。自那时起,在对于可供选择的信息模式和分析模式的意识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例如,统计证据独自就可以揭示处于以其他方式无法了解的社会之中的某些进程。当代的小说家难免更多地意识到那种信息。与此同时,如今作家的情形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可供选择的有关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解释也有显著的差异,那时这些哲学体系尚未存在。比如说,我现在不相信你能写出一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共同体的现实主义小说,除非你能在你的小说里面包含那些革新所涉及的那些认识。我相当谨慎地提出这一点,因为我并不确信我们应该尝试把这些理论性的论点结合在小说中——尽管也许存在着那种可能性。不过,当代的难题在于资产阶级小说家并不希望或者并不寻求解决这个问题——与狄更斯或者迪斯累利(Disraeli)把官方报告迅速小说化的对比是非常显著的。尽管小说是关于人的,小说的现代结构却刻板地把这些领域作为抽象概念排除在外了。不过对于社会主义小说而言,重要的是能够把它们包括进来。一般而言,说这些类型的证据能够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很容易,问题在于要知道如何表现它们。

如果那是与共同体相关的语法问题,同样也存在着词汇问题。《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有许多极有煽动性和刺激性的段落,它们涉及你所说的前后作家作品中显示教养的语言和习惯语言之间的关系。那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你是否认为现在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 19 世纪的时候小了?你指出劳伦斯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获得了风格的某种统一——叙述者和被叙述的人物实际上说着同样的语言,对于艾略特或者哈代来说那是难以达到的。你是否因此会说,从那以后这一问题在小说中基本上减少了?

它应该已经减少了。实际上它已经减少了,但是危险在于这种共用的话语常常只是现行沟通体系的话语。另一方面,现在存在着一种跨越阶级处境的更为扩大的词汇——在这方面,20世纪70年代作家处在一个与19世纪70年代作家完全不同的位置。

逻辑上情况应该如此,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科贝特和狄更斯使用了非常巨大的词汇量,可能比现在用尽一切手段贴近读者的大多数作家都要广泛得多,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阶级背景方面。你说有关狄更斯的完全新颖之处在于他的写作源于某种大众文化。如果真是这样,与那种文化相关的专门词汇是作为某种造成冲击的东西出现的。在当代是否存在着效果相当的词汇?

是的,狄更斯的词汇量是非常惊人的。当然,是有一小部分工人阶级包括在他的读者之中。不过他们从名著中学习读和写——这些作品表达非常清晰,词汇非常正式化。真实的情况是,在劳伦斯的成就时期之后,一种普遍的专用词汇被创造出来用于选举的目的,即《每日镜报》采用的一种跨阶级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比19世纪中期更为贫乏的词汇。一种人为的习惯用语已经以非常集中和专业化方式被确定下来了,它更为有限,与扩大关注范围所需要的那种词汇是相反的。不过我认为,一种更为有效的共同语言的可能性如今是存在的。在狄更斯的作品中,观念性的语言常常在形式上等同于口语,用很长的话表达简短的思想,他的大量笑话就是以这种用法为中心。虽然我可能受到了蒙蔽,但是我认为现在某些传达观念的词语正在失去它们的理论陌生性,可以被吸收到小说的语言之中。如果有人想要设法解决小说创作方法的问题,以便能够允许与统计信息相当的东西,可能就涉及这样的一些观念,解决方案将会依赖于它们。我现在是以一种完全推测性的方式在谈论,因为你只要用语言表达一下这个问题就会认识到它是多么极端的困难: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

把它看做荒谬的而取消对它的讨论。你可以在我曾经提到的最近关于电视剧的争论中理解这种困难。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家们主张,重新创作显然经验过的工人阶级世界是某种形式的移植,这种移植致使它不可能解释那种工人阶级经验,也不可能说明这种重新创作可能是不同的:他们说,这种电视剧使用的语言不过是在广告中模仿工人阶级习性的一种“左派”变体。这一批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它的替代选项通常不过是一个名字,布莱希特,而且那个有力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加以掩饰——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布莱希特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除了罕见的例外情况之外,他并未解决自己作品中的问题。然而,谈论这一问题的唯一目的在于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小说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学习某种模式,它把虚构的章节和更像社会分析或者社会史的章节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模式。我们可能不得不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结合形式加以考虑。此刻,它看上去可能是古怪的或者荒谬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个理解它的作家,这就是托尔斯泰,他自己有时接近于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把自己关于小说的著作限定在英国范围之内?相对于你关于戏剧的著作,其差异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这本书的民族性范围应该归因于剑桥英文系的某些课程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具有悖谬的性质,因为在成人教育中,我至少有一半课程的讲授涉及英国之外的作家:在我关于小说的图谱中,至关重要的作家如今仍然会包括巴尔扎克、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卡夫卡或者普鲁斯特。我现在多么希望在1950年代我已经像对于戏剧的写作那样写出关于小说的同类著作。我当时本来可以做到的——那将不过是我当时在成人教育课程中正在进行的教学内容的合并。然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方案——正如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最近百年欧洲戏剧的写作,与围绕最近150年的欧洲小说进行写作

相比,其抱负一点儿也不小。生活在学院环境里对这样的写作冒险是非常不利的,倒不是因为我对这样的冒险非常担心。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我不愿尝试写一本关于小说的全面著作,因为在作为一个小说家尝试解决其中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很难作为一个批评家就这一题目进行写作。无论如何我会说,我认为优先有待完成的关于19世纪文学的著作永远不会越出特定的民族传统,任何人都应该随后再从特定的民族传统转向比较研究。然而在20世纪,应该沿着相反的另一条路径进行——从对于国际范围内文学作品的综合性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再到对民族的或者国内的小说进行研究。

3. 威尔士三部曲与《志愿者》

我们可否以这样的提问开始,你的小说在你作品整体中的位置是什么?从你自己的说明来看,小说在你的公开作品中所占的比例——迄今在已经出版的全部 20 本书中有 4 部小说——与你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作品中投入的精力和智力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看看你的传记日期,在 1947 年和 1960 年之间你似乎单就《边村》就写了 7 个连续的版本,一起在写的还有其他三部未出版的小说。同样的模式在稍后的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似乎再次出现了:《为马诺德而战》经历了 5 个版本,从 1956 年到 1977 年跨过了 12 个年头,而《志愿者》则花了 6 年才完成。在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中,对你来说,论证性的作品和虚构性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吗?

就得到出版和重视的作品进行比较,我的确对小说给予了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作品都相对更多的时间。在 1940 年代晚期,我把小说视为我最想做的工作。现在我对它们的感受有所不同。以前在小说中始终存在着某种强加于我的东西,我完全不可能发现任何替代它的写作方式。然而现在,小说是某种我准备持续工作一段漫长时间的作品,我不会感受到任何要迅速完成的迫切。

不过造成我独特的写作时间排列的原因涉及比这更多的因素。自《边村》之后,我始终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小说的基本形式违背任何一种把作品的意图和相对迅速的实现简单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在这个程度上,我始终意识到写作与形式本质之间的对立。19 世纪的小说形式形成于资产阶级世界之内。因此,最初接近工人阶级经验的小说模式常常是那些源于某些远方观察者的模式。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些作家,他们在工人阶级共同体中长

大,试图重新建立工人阶级共同体的世界——一个典型的关于童年或者家庭的世界,与此同时却从这一原初的处境中取消了他们现在的自我。其结果是关于工人阶级共同体的相互独立的小说,小说中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变成了一种地域性的形式——这个封闭的阶级被看做某种地域性的经验。在所有这些小说中非常典型的是,它们是基于回忆的——重温源于另一个社会领域的某种早期经验。《边村》早期的几个版本与这种作品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对那种形式不满意。最初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随后我逐渐认识到,由于1945年之后的变化程度,应该解决的问题在于找到某种小说形式,它既允许描述内在可见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又允许描述人们在仍然感受到他们的家庭联系和政治联系的情况下迁移出这一共同体的运动。那种经验的变化在很多个人的生活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它似乎具有某种可想而知的社会重要性,但是适合它的小说形式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许多作家在1950年代迅速转向了新的形式,这些形式通常是逃避现实的小说形式,劳伦斯的一部分作品已经着手这样做了。它们的主题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逃避——向上层空间的移动或者迁徙的经验。他们缺乏对工人阶级生活连续性的任何认识,这种连续性并不仅仅因为任何个体的移出而中断,但是它本身内部同样在变化着。通常这些小说会对他们正在抵达的那个世界表现出非常粗鲁的态度,有时又对他们正在离开的那个世界表现出感伤的回忆。但是它们表现的不是我最有兴趣的东西,即某种持续的张力,以及穿透这种张力、必须被重新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非常复杂的情感和联系。对此没有任何形式适合。我当时发现自己正在表达的是某种不确定的矛盾经验,这与发现一种适合它的形式构成了双重的难题。因此我以艰难的方式学到了理论上的教训,如果一个作家在某种确定的状态下并不具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形式加以展开,那么他的写作经历就可能被延长、就可能很困难,而且其作品就更加值得怀疑。实际的写作过程从未如此中断:

问题始终存在于形式方面,要寻找某种能够使我满意的形式。

当然,我自身大概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某些拖延——当我在一部作品上受阻的时候,我会转到另一部作品上去,诸如此类。在《乡村与城市》和《为马诺德而战》的定稿之间有一段漫长的间隔。实际上,《乡村与城市》经历了几乎同样的过程,因为当我致力于其他作品的时候,它被搁置了3~4年之久。不过总的来说,我在最近10~15年里发现,我能够计划一部理论著作并相当直接地完成它,但是小说一直是以另一种方式写成的——即使有人可能曾经对我说,他坐下来一个晚上,毫无间断地把《边村》读了一遍,仿佛它完全是从笔端涌出的一样,那是一种宽容和客气的称赞,与我写作这部作品的经验完全不同。

在寻找适当的小说形式的时候,你有任何的文学参照或者以前的模仿对象吗?

我知道一些围绕内战时期工人阶级进行写作的威尔士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卓越作品,不过大多数作品现在都不为人知了。他们也一直在试图寻找某种形式。但是问题始终在于,那些居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作家对创作这样的小说存在着极大困难,他们的作品倾向于接近自传、政治性的宣传册,或者一种像杰克·琼斯(Jack Jones)的《不着边际的朗达》那样新奇的全景体裁;然而那些从工人阶级当中离开的作家——例如格温·琼斯(Gwyn Jones),当他写作《在这样的时代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学教师了——创作的小说由一个封闭的工人阶级世界构成,向外走出这个世界的运动没有成为小说的组成部分:人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频繁地离开,但是由连续性和中断性结合在一起的经验并未加入到小说中作为一个主题。当然,确实加入这种经验的是劳伦斯的作品,不过经验的中断性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因为他后来作品的发展离开了丰富的社

会联系。我唯一真正感到从容的,是我能够确立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同并探索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一问题的时候;至关紧要的是,这时我能够获得对工人阶级生活内部那种张力的认识,其方式则是通过小说中某个主要人物的离开来说明分歧的道路。

实际上,对于我当时正在尝试做的事情,我在19世纪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先例,即成功地研究某种人口的流动和在两种生活之间流动的不确定性。但是我当时关心的是几乎令人尴尬的实践情况,19世纪小说家享有的基本物理空间与战后小说可以获得的空间相比是如此巨大。如果你尝试着描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生活和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流动的人们,19世纪作家可以进行创作的空间在比例上大约5倍于任何一个战后小说家可以实际期待的情况。商业出版的经济情况现在对作家施加了显著的约束。出版商在这些日子里对小说家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很好,不过不要超过8万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不断地构造出我认为节奏适当的某些东西,然后发现作为小说中一个事件发展的内容已经比出版商愿意接受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长了。因此,我当时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寻求内容的浓缩或者形式上的解决方案,以使用某些更为经济的方式把材料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个感受,我当时感到自己完全是在格格不入地进行写作。

围绕着当代小说容量比例的缩减,许多20世纪作家采取的一种方式是系列小说,它可以跨越好几本书再次创造一个相当的空间。你自己曾经考虑过这种解决方案吗?

系列丛书是面对这种困难最有效的反应,但是它有自己的内在的问题。首先,你根本不可能保证人们按照特定的顺序或者作为一个整体阅读这些小说。因此你不得不在每一部单独的小说中确定建立在它们自身基础上的要素,在一部较长的单一作品里你就不会这么做。然后,你往往被迫以概括的形式重述笔下人物的过去,除非你采用目前

相当普遍的表现方法,不加解释地呈现人物,不介绍人物的过去。我最接近达到系列小说形式的是《边村》、《第二代》和《为马诺德而战》之间某些人物的连续性。我不断发现我想要假定读者知道这些人物,但是我当然认识到情况通常并非如此。然而我认为,对于那些对波幅宽广的社会经验感兴趣的当代小说家们,系列小说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唯一技术解决方案。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我并不确信与长篇小说有关的经济上的问题像出版商们说明的那样难以解决。当来自美国或者俄国的长篇小说出现的时候,人们说,它是多么出色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家们仍然还有想象力方面的必要宽度和深度。当你的作品已经被压缩了的时候,就很难听到那样的话了。英国的这种情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小说罕见地依赖于公共文学制度。

经济上的约束的确导致了小说数量比例在英国的紧缩。不过无疑同样存在着与现实主义形式难题有关的社会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是这样吗?

当然。首先,存在着叙述定位的问题。如果你采用的是一个单一的全知叙事者,你可以更为快速、更为经济地前进。但是正是单一的全知叙事者如今遭到了质疑,特别是在我已经试写的那种小说中更是如此。与19世纪巨大容量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在不同世界之间进行转换的条件要复杂得多,然而实现的空间已经相反变小了。这是一个难题。另一个是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难题。在大多数现代小说中,任何人物的出现都没有太多的解说。他或者她被给予一个名字,通常通过说某些话或者做某些事得到呈现,除了在随后小说情节里显示的内容,不会获悉更多关于他们社会身份或者个人身份的信息。如果你看看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就形成了对比,当人物得到介绍的时候,他们被给予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网络——各种细小的技巧变化被用来确保这一点。当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介绍的时候,它不仅仅

像在当代小说中典型的那样是与一个事件相关的地点,而是通常得到大量回溯的一段历史的具体化。正是这种内容现在通常没有适合的空间,看起来好像最容易被删去。然而,这种删略实际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变化。因为与这些形式上的方法相应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卷入其中的最关键的时刻:从这一时刻开始,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成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如今的主导形式中,不再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历史。在任何时刻,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流动的个体,通过一系列的遭遇完成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实际上完全不受任何更为巨大的力量所决定。如果你对那些更为巨大的力量感兴趣,他们会说,你应该写社会学著作或者历史著作而不是小说,落入这些表现原则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效果。其结果是最近的资产阶级小说形式,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避开这种形式。但是它至少不应该被不加怀疑地加以接受。

这些当代表现方法内部的限制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小说的写作。不过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从20世纪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在重现19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现实主义的成就方面有什么内在的困难吗?这一问题依次分解成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在某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样一种现实社会态度的转变本身是否涉及一种着眼于社会的不同写作方式?19世纪小说的这些成就在何种程度上与对20世纪另一个社会阶级提出的问题是直接连续或者密切相关的?其次,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问题——结构方面的变化不仅存在于每一个国家的结构内部,还特别可能存在于许多具有决定性的共同生活进程的全球化之中。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匿名性和非人格性,这一点经常受到争议,它排除了在巴尔扎克甚或狄更斯作品中可以典型发现的那种总体化想象力的可能性,可否设想19世纪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能够应付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增强的复杂性?然后是第三,分析性话语最终在20世纪被发展到社会科学之中,

令人不解的是,19世纪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信心与理论上对分析性话语的无知是否并非密切关联的?你是否强烈感受到其中的某些问题也是你的问题?

引起许多创作者关注的普遍性问题在于,是与现实主义传统完全决裂,还是尝试对它进行拓展,这种情况在戏剧中常常比在小说中出现得更多。我想,这里有一个例子有助于理解在何种程度上资产阶级形式典型排斥的某些领域现在可以被整合到小说里面。关于劳动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哈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劳动根本从未作为一种重要的经验进入到小说之中。当然,资产阶级世界的劳动有时得到了表现,比如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但那不是劳动工人的经验,也不是产业工人的经验。尽管有各种困难,作家们的经验仍然提供了理解现实主义形式是否能够得到拓展和改革的可能性。我自己认为这个方案是值得尝试的,并且我已经在自己的小说中对其进行了探索。

全球化的问题在这里唤起了一个绝对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正如我早前说过的,某些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最忠实的纪实小说实际上确实变成了地域性小说。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某些重要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可能认可那种形式。田园小说(rural fiction)之所以成为地域性的,不是因为湖泊地区没有伦敦中心区重要,而是因为,在外部更为广阔的经济状况在小说中缺席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写出一部关于湖泊地区的现实主义小说。那引起了传统形式的极其复杂化,因为在我看来,传统形式确实依赖于可认知共同体的观念,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可能被称之为共同体,而且用以前的方式也是不可认知的。其结果导致了形式上的极度危机。我发现有趣的是,很多作家已经转向本质上不同的戏剧形式来表达这种经验,而不是转向小说,当然这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就不同话语的发展而言,你可以看看乔治·艾略特的典型例子,与那些对其他话语一无所知的例子相比,她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她不

仅了解其他类型的话语,还以某种非常引人关注的方式在小说形式中使用了它们。在英国文化中存在着极端想当然的假定,认为作家不应该太多地思考,因为在小说中不可能容纳各种观念。然而绝非所有的小说家都遵守这种假定。这导致在风格的不协调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难题:我发现当我在修改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常常更换那些非常明显来自某种不同意识的措词。不过我认为,对所有可资利用形式中的可能性进行某种更为广泛的理论讨论是必要的。最近,迅速转向某种类型的电视剧基本上是社会主义作家做出的最引人关注的选择,但是我认为这最终可以完成的不过是一小部分必须要做的工作。伴随理论上的争论,我们需要有大量实践的例子,以便人们可以认定在什么范围内可以采用一种特定的形式。我们对此必须完全从实证出发。

你自己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实验进展如何?在《边村》完成和出版之前有 10 年的时间,同一时期你写了三部没有得到出版的小说。它们是什么类型的小说?

第一部小说我写于 1948 年,名为《莱德伊尔》。它是一种新奇的尝试,我现在可以理解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试图通过一个曾经去过克朗代克^①的英国人的相当离奇的叙述,来使人们理解某些关于当代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思想。小说记述了他在那里的旅程和他在金矿区的经历——在那里他发现了金子,但是最后以毫无所获告终。我选择的形式是一个探险故事,但是我一直试图使这部小说同时成为某种寓言。两年后写的《阿达姆森》又是一种运用某种现实可用的表现方法的尝试——这次写的是一个人触发了身份危机,他从自己以前的生活中消失了,然后用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别的地方。第三次实验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书名叫《蝗虫》。虽然当时我希望看到它

^① 克朗代克河,在加拿大西北部。——译者注

问世,但是如今我很高兴它没有得到出版。这部小说把一群因为变革的紧迫性而不能调停自己感受的人们从他们周围相当迟钝的社会中孤立了出来,他们自己建立了一支滑稽的突击队,为了组织某些变革而四处行进。如果一个城市正在尝试改造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却在通常的官僚主义拖延中陷入了困境,他们会简单地出去一个晚上并把交通标志移动。书名既暗示了他们在地方政治僵局中的干涉模式,也暗示了我对那种活动的感受。回顾一下,我现在可以设想,如果这部小说已经得到出版,人们可能会说它是一部相当典型的1950年代小说,或者说它是对1960年代的某种预期,实际上它就是这样。在早期的这些小说中,它是我唯一努力尝试想要出版的一部。

你曾经说过,作为一个青年,你非常想写小说,而不是成为一个大学讲师或者批评家。在谈论1930年代你所使用的文学形式的时候,你谈到最感兴趣、关注最多的作品是《芬尼根守灵》——两战之间距现实主义最远的海岸。然而根本无法想象你所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的结构出自乔伊斯的一个赞赏者。就纯粹文字理解的层面而言,《边村》是完全不加修饰的,很少使用隐喻或者明喻。这本书的风格特别朴素,其张力几乎总是通过口语对话的节奏来实现的,不求助于任何辞藻华丽的形象。战后在你的文学鉴赏力方面出现了某些重大的变化吗?你在《边村》中的写作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

像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我记得自己用乔伊斯的风格进行创作练习,在1940年代,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写作方法。在那个年龄,你有抱负写出某种一般性的、非局部性的东西——但它不是我现在会在理论上提出的那种情况,在与身份和社会关系相关的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你写的是你自己的存在。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作家都受到了乔伊斯的激励,但是我认为很少有人后来继续受到他的影响,除非是他的冲击影响了作家们很长一段道

路——但那不是作家们自己的道路。乔伊斯的个性太强了,你可以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但是危险在于你会被乔伊斯的影响所控制。我最终发现,乔伊斯的作品中使我兴奋的东西属于某种非常特殊的相关意识,它恰恰不是我自己的。所以,一旦你度过了形式上的迷恋,就会认识到,你自己的方案可以与欣赏你自己不想模仿的另一种作品并存。

另一方面,在写作《边村》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希望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在英国被确认的“威尔士风格”进行写作。在我的大多数同时代作家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反应。在英国作为一种流行模式确立的威尔士风格实际上与乔伊斯有某些关系,这表现于口语的极端丰富方面——从自由的联想到特别生动的隐喻,所有事物都是如此。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是这一时期威尔士文风最著名的榜样,其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把威尔士人变成了这种风格渴望的人物——古怪的饶舌者。它代表了可以观察到的威尔士社会习惯形式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更有必要退出这种风格模式。不是说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但是当威尔士作品在193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早期之间流行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一时代的人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有必要摆脱这些作品投映到外部世界的对威尔士的理解。现在许多人说——有些人比我表达的还要有说服力——这些作品的语言是文化顺从的一种形式,是威尔士人能够将他们自己呈现在伦敦读者面前的唯一形式——在微妙的条件下稍稍降低了尊严。在所有事件上,我的确决心要避免那种情况。

如果说你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一种传统威尔士风格的反应,你在《边村》中的写作实践完全是有意为之的吗?

写作小说是与其他任何写作形式完全不同的一种经验。你不了解你实际上正在说什么。与通常提出的解释方式相比,可以对此给出一个更为现实的解释,我认为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作家们受到某些节奏的约束——在我的例子当中是某些威尔士日常谈话的节奏。与

此同时我非常清楚面临的问题，在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语言与所有对话语言之间存在着距离，后者不同于极为精简的标准英语。我不希望在小说中的两种语言之间出现某种抵触。不过大体而言，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更为难以预料的，因为与其相比，在写作其他类型作品的时候，我可以在我面前的纸上准备好预备写作内容的大纲——出乎意料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大体上你知道自己正在向哪里前进。

你是对《边村》的草稿进行了连续性的修改，还是每次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其进行了重写？

虽然实际上在最后一个未发表的版本中我放弃了许多内容，但是对它的修改从未以完全重写的方式开始，那时我确信大部分内容来自于记忆。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草稿进行修改的情形——那是《边村》最后阶段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我傻傻地在地板上一摞摞纸张间穿行，对它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列，以达到适当的形式。一旦我完成这一步骤，然后就对其进行改写以彻底达到小说中的流畅感。

《边村》中的主要人物是哈瑞·普莱斯，对他的描写是非常有力的。其效果的实现部分在于与他的朋友摩根·罗瑟尔和他的儿子威尔的对比，摩根后来成为一个小工厂主，而威尔则成为一个大学讲师。在某些完全不同的方面，摩根和威尔具有不断变化的个性。哈瑞被呈现为一个性格健全的人，博得了绝对的尊敬，他的妻子似乎代表了这本书中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标准。尽管对哈瑞的塑造是可信的和感人的，其附加的主题意义却较成问题。实际上，哈瑞被视为一个真正没有任何矛盾的形象，甚至对他的身体描写都强调了某种存在的统一性，那种统一性在这部小说里似乎具有某种标准化的力量。在关键性的一个场景里，摩根试图说服威尔与他一起经营他的新工厂，哈瑞被

问到对这一事情的意见,哈瑞说:“你为自己安排一份工作,然后完成它,我同意,这份工作可能是不合意的,你也许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养成这样的习惯,当你难以留下来或者离开某个别的地方的时候,并不是这份工作没有价值——那可能无关紧要,而是你,你自己没有用。没有人会给自己安排他不渴望的东西。你给自己安排的东西是你渴望的,或者你看上去渴望它。现在,它是你不会想要错过的那种机会,我对此并不多么担心。然而,一旦你从给自己设定的位置上改变方向,一旦你没有完全尽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随后会怎样,不管其他人怎么说,它和你得到的东西更加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完了。”^①这无疑是错误的,人们毕竟有相互冲突的欲望、冲动和雄心;他们确实为他们自己设立他们随后并不渴望的目标;他们总是倾向于转变和变化。可能存在的严重压力似乎是一种常态,在哈瑞的信条中它被忽视了。这样一种道德上的统一主义——人物被假设为一个统一体,即使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观念的分歧也被视为一种瑕疵——在小说或者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认同你对那种考虑事物方式的批评。我在这部小说中的意图是要表明,它既产生了某种毋庸置疑的力量,也产生了某种错误的观念。没有人会给自己安排他不渴望的东西,这一观念不但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哈瑞来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不是哈瑞·普莱斯给他自己安排了某种生活,他被放置到某一处境之中,经历了一个适应和结合的过程,同时也为自己的生活廓清出一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感受到自己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其中。这部小说的要旨实际上在于,那种显然统一的道德价值观点所提供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哈瑞的例子中,当死亡逼近的时候,这种力量最终就耗尽了,死亡给一切观点都设置了期限。当他病倒下来、不再能够工作、奄

^① BC, p. 240. ——原书注

奄一息的时候,在其他方面非常坚强和自信的这个男人身上存在着某种完全不知所措的感觉。在关于生活的统一观点和人物的力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旦支持这种联系的条件——他的体力、健康和他所习惯的处境——在实际中消失,这种联系就失效了。在这一场景中,他的心智不再统一了,给人的印象是,曾经看起来如此强大的意义正在失去它们的力量。他的儿子不仅看到了死亡对肉体的临近,还看到了死亡临近时带来的混乱和对世事的冷淡。这是造成儿子极大困境的原因——他一定会尊重他父亲的榜样,但是他也一定会感到那是不完善的。在他的反应中,那是一个危机。

你已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你的意图。不过它确实在这部小说中明确地得到了传达吗?死亡以及之前的疲惫和不知所措是一种普遍性的生理限制,它可以抵消任何计划。读者有可能毫无疑问地分析出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特定意义吗?

威尔最后的谈话有意要传达他的经验。他说:“仿佛我在直接凝视太阳。当我正在学习观看的时候,阳光使我失明了。”^①这是一个用阳光构成的意象,意味着生活的某种源头,它被确认是极其强大有力的,但是它同样也可以使目睹者失去观察判断的能力。一个儿子从父亲那里获得自己关于身份和生活的观念,对此的通常理解在这里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自足视阈得到了强化,当然,这一视阈最终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在经过数次重写之后,我决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哈瑞·普莱斯这个人物,而且这样处理不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哈瑞不是我自己的父亲,因为我父亲的许多特征也被加到了摩根身上。把他身上对立的冲动结合到同一个人物身上是可能的;我那样尝试了,不过最终决定还是把这些对立的冲动区分开来,创造出另

^① BC, p. 351. ——原书注

一个人物，他代表了我父亲性格中更为不安分的方面——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面。我当时认识到存在的危险，如果我取走这些特征，可能就会只剩下一个过于单一的人物。你可能是对的，就像经常出现的那样，观察世界的某种特定方式的力量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如此明显的传达，以至于它的条件或者局限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在《边村》中，人物之间有一次公开的交流，它违背了你的意图，那就是哈瑞病倒之后摩根和威尔之间的一场对话。摩根说：“哈瑞则不同。他改变一个事物是因为他渴望新的事物，他关注它是因为他希望它一直自始至终，而不是因为对它的排斥迫使他这样做。”威尔反驳说，“结果是同样的”。摩根对此回应说：“不，威尔，结果是不同的。仔细看看吧。”然后威尔说：“但是最终他躺倒在那里，处于近乎癫狂的状态……如果它是适当的话，他应该安然无恙才对，那就是我如此焦躁的原因……我们留心不要像他那样生活，我们照料好我们自己。”^①此处表明的是摩根正在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妥协进行自我批评，作为一个由于不满而发生了改变的人，他确实曾经消极地排斥他周围的环境，对变化的渴望把他从信号塔的工作岗位上带走，使他成为一个果酱工厂的厂主——阶级立场的变化无疑呈现在批判性的光柱之下。另一方面，当威尔与他父亲的立场保持距离的时候，其答复的意义在于，它对某种难以实现的价值标准提出了反对，因为那种价值标准会使任何试图符合它的人感到绝望——然而，“我们照料好我们自己”这句话反讽性的力量无疑在于，放弃那种价值标准是自我保护的某种形式。换句话说，这里似乎表明了，与其说哈瑞的生活方式是不充分的，毋宁说它过于苛刻了。这是否是对这场对话的一种误解呢？

决定做一件未曾做过的事，是因为你渴望这件未曾做过的事，而

^① BC, p. 288. ——原书注

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以前所做的事。这一观念在这里得到了支持。然而,当威尔说,“如果它是适当的话,他应该安然无恙才对”,这个时候,其意义不仅是指他的父亲即将去世,还在于说,假如它是适当的话,那么它应该是适合我们所有人遵循的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说“我们通常并不让我们自己冒那么大的风险”同样是以某种方式在问:假如我们使自己冒那么大的风险,这种生活方式会是适当的吗?与可能存在的最坚强的人相比,存在着某些难免要有巨大得多的力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与所有这些力量抗衡,使其得以维持吗?那是我当时考虑的东西。

一个与你个人生活事实有关的小问题——对小说中儿子这一角色的双重命名,你是取自自己的经验吗?

是的。所有在我 18 岁之前认识的人都叫我吉姆。我在大学使用了依法登记的名字雷蒙德。在小说和我自己的经验中,双重的命名都强调了有待认识的两个不同身份的问题,都强调了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进行协商的问题。然而我总是奇怪地发现,一个人以某个固定的身份适应某个被固定称呼的名字是多么的迅速啊。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边村》是一部关于英国阶级关系的小说。它的一个重要情节发生在大罢工的漩涡之中。然而,一旦现实主义小说得以写作的阶级立场发生变化,对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在 19 世纪,一个源于虚构的想象、一场包罗广泛的运动可以在某些作家笔下得到实现,艾略特、左拉或者哈代就是榜样,他们从自己生活并工作于其中的熟悉的资产阶级世界或者被资产阶级同化了的世界出发,向下注视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社会同情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左拉的作品中最为明显,在哈代的作品中非常清晰,在艾略特的作品中也不可低估——容许在他们的小说中对社会等

级进行全面的考察。除了政治反抗之外,你曾经提及的体力劳动者的世界在左拉和哈代的作品中差不多都得到了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这些作家在表现有产阶级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可是,问题出现了,在20世纪,那种包罗广泛的呈现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倒退了?在尝试把他们自己阶级的社会经验和决定这种经验的总体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工人阶级作家是否不可能以类似的同样程度的移情,在非常适当的理由下把他们的想象力扩展到压迫者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可以推测,与某些19世纪小说相比,在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写成的一部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里,具体再现的生活空间——这里使用《细察》的术语——可能相差更加悬殊。当然,在大多数19世纪小说里,这种差距也是非常悬殊的。在《边村》中,资产阶级的世界是非常遥远的——对以工人和农夫为中心的村庄几乎根本没有任何紧密接触。不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由于我们就你个人生活经历已经谈论过的原因,这部小说描述的社区没有比较重要的当地剥削阶层。不过,如果存在着一个地位牢固的强大的当地统治阶级的话,在小说中描述这一阶级是否对你造成了严峻的难题?

是的。在严格的意义上,《边村》中的阶级关系是在铁路线的末端出现的,它的呈现采取了这样的方式:铁路公司试图在大罢工之后通过它的远程电报和通知与工人们谈判。资本家的世界是不在场的,它根本没有被直接引入小说之中。如果它被引入到小说中,我将会感到进退两难。但愿你阅读了富有同情心的19世纪小说,它们从工厂主的房间里出发,往下表现工厂工人,然后再返回到工厂主的房间里,你关注到的是某种感受——无论如何都充满着这种感受,像在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中那样——能够居住在那样的房间里,在里面亲近而温和地对待下层的人们。现在那样表现将会是极其困难的。首先,工厂主的房间和楼下的工厂是19世纪紧密直接的阶级压迫形式所特有的。然而,资本家的权力现在会施加在哪里呢?通过某些结构施加到办公

室里。对这些结构的描述将会需要某些不同于物理观察的东西。与用想象力捕捉一个更为局部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理解一个会计师决定停止一项特定工作的过程将会涉及完全不同的难题。在《边村》中,我所写的是一个可以在较小范围内得到描述的社会情况,因为它是更为可见的。我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关系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分隔开来,就像在一个现代工业社区里更具代表性的那样。当我写作《为马诺德而战》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得不一直回溯到白厅^①,在那里,政府部门会议做出了远距离的决定。这是一个我如今了解更多的世界,但它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

《第二代》在你的小说当中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好像是在1960年到1962年之间突然写出来的。那是否意味着,你在《边村》中为它的续作建立了推动的基础?

虽然它是作为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开始的,但是它的进展确实相当具有连续性。我最初的想法是挑选一组牛津的学生,然后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密切观察他们的不同发展道路。一个汽车工人的儿子最终成为《第二代》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只不过是这组学生中的一员。后来我遇到了常见的问题,如果我要继续这一关于很多人的方案,其结果将会是一部因为篇幅过长而不可能写成的小说。因此我对这个人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把他视为对一个城市内部不同世界进行对比的途径。一旦我确定了这一点,这本书的写作就相当迅速了。

《第二代》的构思形成于你完成《边村》的时候,抑或完全是后来形成的?

在写作《边村》的时候,我对于写作主题有一些想法。我希望把下

^① 白厅,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为政府办公机构所在地。——译者注

一步小说的背景设置到威尔士之外,引进我的大学经验。但是《第二代》目前形式的浮现是在《边村》完成之后。

你是否感觉到同样类型的形式上的困难?

有一些。不过根本性的问题是不同的,因为在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移动的中介者形象现在更为复杂了。在《边村》里,这种移动在马修·普莱斯从伦敦到威尔士的旅程中是物理性的,所以在此意义上它比较简单。在《第二代》中,我发现我需要更多的空间,最终形成的小说太长了。当时有人给出了有益的建议,对于我来说,可能很难把这部小说缩短,不过出版商的一个编辑将会非常乐于尝试一下。后来证实这个编辑是戴·刘易斯(C. Day Lewis)。他确实进行了精炼的浓缩,然而却是成功地把这部小说的整个意图颠倒了过来。在读过最初的10页之后,我无法忍受再读下去,不过我的妻子确实读下去了;每一次在汽车工人的儿子彼得·欧文和他的导师罗伯特·莱恩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莱恩指出需要对英国社会持某种均衡的观点,而欧文则对其做出激进的批判,这时,莱恩谨慎的言谈被留在小说之内,而欧文的答复则被删掉了。结果我不得不取回手稿,自己把它缩短。这个小插曲值得注意,因为那个编辑是戴·刘易斯,从1930年代延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并未离我远去。

与《边村》相比,《第二代》是一部更为直接的政治文学作品——有人可能会说它是拒绝妥协的、好斗的。考虑到它对汽车制造业阶级斗争的描述,以及对高校里的妥协和堕落的描述,毫不奇怪,就像《边村》受到了广泛的赞美那样,它受到了几乎同样广泛的批评。然而对于这两部小说而言,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模式,它可能受到来自“左派”的质疑。即某种对比,它们一方面似乎表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则似乎暗示了个人的理性。在《边村》中,摩根·罗瑟尔最初

对政治变革的要求比哈瑞·普莱斯更加迫切和彻底,然而,当他的希望由于大罢工失败而破灭的时候,他那向外倾泻的不安分的精力把目标转向了在某种程度上靠不住的在商业上的发展。在《第二代》中,两对工人阶级夫妇,凯特和哈罗德、格温和迈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样的对比。强调的重点再次涉及广泛致力于政治或者某种思想所付出的个人代价,这种强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工人代表哈罗德的例子里,其代价是某种使人失去活力的疲惫,在凯特的例子里,其代价是对他人的反复无常和不尊重。相反,格温和迈拉,同一代人中的另一对夫妇,提供了另一种例子,他们的期待和兴趣保持在某种更为有限的范围之内,在迈拉的例子里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因素,她比较呆板,除了在共同的危急时刻之外,拒绝参与更为广泛的议题;然而正是他们没有决裂,还在他们的家里保持着根据直接情感构成的价值标准。在工人阶级经验内部,你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或者必然的紧张状态吗?

我那时是这样想的,而且过去一直没有改变我的想法。写作《第二代》的时候,我感到在这个阶级内部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危机。人们普遍地满足于某种个人经验的狭小领域——当然并不伴有任何反对工会的态度,不过基本上完全生活在与工作有关的那个世界之外。种种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施加影响的参与,不管它是一个工会代表的艰苦工作,还是一个更为理性的视野,正在开始因为这种危机而失败。某种内在的分界线在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把这一阶级在政治和企业方面活跃的部分与它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后者尚未收回它偶然出现的一般性同情心,但是并非在以前者的方式生活,因而可以被说服,向完全不同的社会观点蜕变。我认为,尽管那种危机后来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但是在当时,我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的情况,而不是做我或许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通过观察许多我所认识的人,我完全理解这种危机的过程。此外,在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不同类型校园政治的特定维度。可能我受到自己经验的过多影响,我曾经见证过人们在那

一时期积极卷入政治之后的引火烧身。不过,对参与代价的强调不是想要说明某些其他的选择更好。因为退出那个世界以形成一个甚至更为安全的封闭区域——在那里你可以完全只关注个人的生活——并不起作用。然而与《边村》相比,《第二代》中这种对比的意义并不在于说,如果你遵循那种处于某些约束之中的生活方式,你就能够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能够过一种更为完整的生活。与《边村》相比,《第二代》的形式应该使这一点更为清晰,因为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更多的性质不同的人物和处境,不存在任何主要的或者支配性的人物。这部小说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标准分布得更为均匀。

与这部小说中不同的工人阶级家庭形成对比的是来自大学校园背景的两个人物——罗伯特·莱恩,一个社会学家,他是彼得·欧文的论文导师;还有亚瑟·迪安,一个政治学讲师,他与凯特·欧文之间存在着秘密的性关系。他们每个人都以某种形成对比的基调体现了政治保守主义和道德堕落的结合。莱恩劝告他的学生以明智的学术上的稳健为目标,并且不道德地利用他长期患病的妻子。迪安开始了与凯特·欧文的控制性性关系,与此同时却冷嘲热讽地否认工人阶级具有进行斗争或者改变社会的任何能力。在效果上,一个鼓吹听天由命的精神上的平静,另一个则鼓吹剧烈的虚无主义。这两个人物个性的对比引起了某些疑虑。根据经验,把政治反动与个人的空虚或者堕落直接等同似乎是可疑的。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秩序的某些支持者,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他们的私人生活都是适当的和正直的——比如说,处于这一世界中的基斯·约瑟夫夫妇。把社会性的反动举止等同于性忠诚的缺乏似乎是一种危险的审美简化。

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是这样。不过我当时已经观察到某种特定的具有很高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故意等同的意义上,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存在着某种非常典型的“左派”人物(你了解他们最终

被证实是怎样的一种“左派”)，在工党内部，他们是智力上的活跃分子，代表了与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无关的某种政治联系，在客观上他们当时实际正在利用和背叛工人阶级。很多人对我说，他们感到并不同情莱恩这个人物，当时我对莱恩并没有那样的意识，我把他预定为一个冲突掩饰者——在全部意义上这是他与彼得的关系。但是我并未想要让他堕落，只是打算让他再次成为那种相当常见的成年男人形象，他非常希望一切事物都比当下的情况更好。在那个方面，你可以说，他的许多反应取自我能够在自己个性中感受到的因素。当然，关于彼得，存在着一个对比，我想要获得对于某种不同的——我希望未予理想化的——奉献的认识，这种奉献属于这样一种人，他经历了各种可怕的困惑，但是最终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有效性在结束的地方并未得到证实，但是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不过他也代表了极其不同的一代人。

关于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个人堕落与社会堕落之间的联系，我在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觉得，当时已经发生在“左派”和工人阶级身上的事实涉及某种比普遍承认的情况还要更为深层的骚乱。当时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是突围和解放，在我看来它们太过简单了。仅仅通过对许多群众的观察，我就认识到了相当大的危险——人们用不同方式尝试生活在某种秩序的压迫之下，这种秩序系统性地挫败了他们，我认识到了他们将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与我曾经写过的任何其他小说相比，《第二代》更多地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在此方面它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描述，当我回顾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不会说它是不适当的。但是我希望，通过选择共存在一个城市之内、像智力生活与体力生活之间的分裂那样的某种事实，我至少能够呈现这些混乱当时正在出现于其中的现实剧场。

知识分子世界和产业工人世界内部各种冲突在写作上的结合给

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欠缺,它可能导致强调重点的严重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工人在工厂里的斗争从来没有与敌人资本家本身进行对抗。工业权力的现实中心在小说中仍然完全是抽象的:公司统治集团中得到呈现的级别最高的人物是当地的人事部门经理,哈罗德是在令人难忘但却短暂的一幕场景中见到他的,哈罗德怀疑他对面的这个人可能出身工人阶级背景。大体上,工厂完全是通过生产线上工人的经验得到了呈现——读者根本没有看到工人们正在与之斗争的秩序的掌控者。另一方面,在小说中得到有力的具体表现的是大学。对两个讲师——莱恩和迪安——的描写从而趋向于取代对雇主的描写,不适当地在结构上发挥了作用。其结果是赋予他们以过分的含义,把他们看做资产阶级英国的代表。在接近尾声高潮性的一幕场景里,彼得公然用响亮的措词指责迪安:“你们控制了英国。”^①然而事实上,尽管大学无疑要为主导性的社会秩序服务,但是它们绝不意味着是政治统治或者经济统治的现实场所,并且除此之外——部分上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它们拥有某种智识上的相对自治。把工业方面的批判对象置换为文化上的批判对象与某种错误意识因素直接有关,确实是这样吗?

我对此表示同意。这个问题涉及我自己的社会构成和工人阶级总体经验中的某种更为普遍性的局限。工人阶级通常直接接触到的社会权力的最外层,是它在当地面对面与之冲突的那个层次。现在很明显的是,一部致力于某种政治观点的小说将会采取的策略是着眼于经济和社会中的最高决策层。那么你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呢?假设我写到了汽车企业的董事会,写到了其间的全部联结——银行和国家机器。这可能会好一些,但这正是不容易在小说中实现的。我对现实中统治阶级的了解目前仍然主要是通过阅读实现的。然而,创造出你

^① SG, p. 318. ——原书注

没有从内心深处有所感受的人物极其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你就没有足够的激情去表现他们。因而在小说中,大学常常作为对社会统治秩序的替代发挥着作用。在我看来,至少在那个时期,这种情况可能依然是符合现实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倾向于把学校里的人物看做统治阶级的优秀代表,这正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与统治阶级更为接近——尤其要考虑到,英国对阶级的描述所依据的是口音、外貌、细微的气质等外表上的特点,而不是依据对社会和经济权力的运用。所以,《第二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工人阶级观点本身的某些缺陷,无论如何,它不仅是我自己在观点上的不足,也是制度运作方式的一个部分——通常可以达到的对于权力的最大程度的理解是某些处于中间层次的权力功能的执行者。我不断地发现工人阶级经验中的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仿佛由大公司和银行构成的整个世界如此遥远,以至于不能真正被记录下来。我也分享了那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不是说我在理性上不了解与权力有关的现实,而是说,在虚构中对这些与权力有关的现实进行写作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应该说,很少有小说尝试覆盖全部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范围。在这方面无疑可以得到高度评价的一部作品是《地狱第一层》,它确实从头到尾考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等级体制。当然,苏联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社会秩序更为均质化,它的权力结构更为明晰——在此意义上它可能更容易实现虚构性的表现。同样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的是,索尔仁尼琴在青年时期似乎深信斯大林主义,因此在他的例子里,把自己的态度和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的问题要少一些。

在我看来,《地狱第一层》中的非凡之处在于对彻底贯穿这部小说中各种关系的某种制度的理解:最终,当你抵达这个制度的最高层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本人依然被视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给人的印象

是,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任何人都希望用英国的专有名词来实现某种类似的结合,但是在英国这个国家里,相当完美地隐蔽起来的权力是统治阶级关系的典型特征,由这种隐蔽的权力构成的世界是非常难以了解的。

关于这个世界的上层所及的范围是什么样子,《西塞尔·金的日记》提供了一种令人相当吃惊的印象。正如在西塞尔·金的记述中所显现的那样,它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报业巨头、上层公仆、内阁大臣、大商人和政府部门领导之间直接的、无中介的个人联系,以及由于对日复一日的阶级斗争现实进行无情而直率的谈论所流露出的文雅的虚伪。当然,西塞尔·金在这个世界里像是一只离群的凶猛野兽,通常隐蔽了起来。

这些在实质上相当于迪斯累利(Disraeli)想要从中阅读了解19世纪工人阶级的那种文献——像他那样的小说家不是通过与工人阶级分享面包来了解他们的。《西塞尔·金的日记》不是唯一这样的揭示。汤姆森(Thomson)叙述了在从前合作的《市民报》发生危机期间,他与威尔逊(Wilson)乘坐豪华轿车从一个宴会回去,威尔逊试图说服他买下这份报纸。他的意见是:“哈罗德(Harold),我是不可能使这件事在‘垄断调查委员会’通过的。”威尔逊对此回答道,“我会给你一个书面的担保”。这样的交易大概是典型的。当这些人出现在他们自己圈子之外的時候,他们更加小心——百叶窗被挂上了。在小说中,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开始欣赏那些能够被写出来的甚至是邪恶的人物——使他们不仅仅是我们反对的那些形象。有必要理解,在他们傲慢地决定如何处理从工厂到军队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对食物、饮料和同伴的喜好在其语气中的作用。如果你不能传达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爱好是如何产生了良好的情感,使他们在这样的情感状态下有时能够控制自己的事务,你就不会创造出可信的人物。那应该与非常清晰

地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保持一致——但是这在实践中是非常困难的。

《为马诺德而战》花了你超过 10 年的时间才完成——比《边村》还要久,然而实际上在 1960 年代中期你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了。为何它的写作拖了如此之久?

哦,它开始时进行得很快。现在书中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的内容似乎完全是从笔下流淌出来的。我不仅描写了村庄和山谷,还勾勒了已经准备好的从伯明翰和考文垂到伦敦政府部门的轮廓。因而整部小说当时完全是以那种形态定形的。然后我注意到,我已经完成了原计划三十章内容中的六章,以单一的步调在前进——我当时认为小说能够以这样的步调适当地得到完成。这样,小说将会超过 20 万字。问题不仅在于出版的长度,另外还在于对《第二代》的回应。我尝试进行压缩,但那似乎不起作用。我把它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许多别的事情开始发生:1966 年决定性的政治决裂,以及开始致力于《五一宣言》那非常吸引人的工作。此外,一个读了《第二代》的电视制片人来请我写一个剧本。我认为这种形式很有吸引力,但是具有讽刺性的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乡下来信》最后只上演了 30 分钟,而不是原本的 75 分钟,不过第二部电视剧《公开调查》被按照通常的长度制作了出来。我欢迎这种形式,因为一段情节可以是孤立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仍然这么觉得,对我已经计划的那种小说进行关联写作具有比我想说的东西更多的意义。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有一个月不受干扰的时间,我就会回到这些章节重新尝试;这些章节的内容一直在扩展。当时我以布鲁塞尔为背景写了附加的几章,主要人物之一去那里捕捉到了最初的集体创意,以便在威尔士的一个山谷里产生全新的城市解决方案。所有这些都只是一般性的写作难点——这些难点如今也是很常见的,尽管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长度的限制非常显著——但是到了 1960 年代晚期,我日益意识到存在着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的

累积导致了我在观点上的转变,不过在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不连续的地方。我当时看到了乡村与城市的整个联系,它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大致性的主题,对于我来说,它是当代社会分析中极其重要的那种联系。记得我也已经开始着手《乡村与城市》的写作,但是当时对这部书的预期是一部较小规模的、比较明确的文学作品。现在看来,乡村与城市的联系似乎贯穿了一切事物。我扩展了它的方案,并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计划。有一段时间它成为我唯一的大规模工程,但是随后我将它放下了,原因在于思维上的障碍。我做了一些次要的工作,然后突然以新的形式非常迅速地写出了整个《乡村与城市》。这本书很顺利,但是我仍然会回头打量那些已经写出的小说章节。我不想放弃它们,不过当时这部小说的许多更为宽泛的计划已经进入到另一本书之中了。我一直在对其进行思考,后来我认为我看到了一个替代性的形式。我把它放在那里好几年,但是因为它一直是有意义的,最终我再次拿起它来,毫不困难地完成了它。当然,无论好坏,它已经不是我最初开始写作的那部小说了。

从一开始你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就是作为一个三部曲的结束吗?你吸收了前面两部在技巧上没有关联的著作,以产生相互关联的三重奏,其目标是什么?

是的,从一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就有一个三部曲。前两部在地域上没有关联,但是格林多与相距几英里的特劳斯菲尼兹之间的关联已经被提出来,做好了使用的准备。在主题上,三部曲的形式是清晰的。它们是有关横跨边境的某种特定变化的相互关联的版本。《边村》虽然是现在时态,但它包括并试图聚焦于刚刚发生的过去;《第二代》是真正的现在时态;《为马诺德而战》也是现在时态,但它试图包括并聚焦于未来。在前后相继的流动方式——《边村》中的铁路,《第二代》中的汽车运输和工厂,《为马诺德而战》中潜在的电子技术——之间甚至

也贯穿了某种关联。在每一部作品中,贯穿这些不同处境,与学识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决定性问题呈现了阶级和政治的不同方面。当然,这些都是作为三部曲的基础构造,在每一个阶段,人的特殊性必须是突出的。顺便说一下,对于《为马诺德而战》来说,那是造成特殊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它的大量内容是规划和想象一个未来,不过不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未来,而是以某种途径从根深蒂固的现在而来的未来。这在亲历的经验和被映射的——实际上这种映射是失败的——历史运动之间造成了一种更为困难的权衡。这部小说结束于对某种可能方向的认识——我认为那是适当的主要方向——不过仅仅是在现实和过去的沉重确定性之外唯一应该坚持的方向。当然,那种确切的感受是我最终为这部小说设想的形态,截然不同于最初计划中更为全面的互动。

《为马诺德而战》中许多内容的建构是围绕两个人物的对比,一个是来自《边村》中的人物马修·普莱斯,另一个是来自《第二代》中的人物彼得·欧文。在威尔士一个新规划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在土地使用方面出现的腐败和投机,两个人的不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情节的解决方案。不过在对二者的处理上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不对称。马修毫无疑问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对他的描写具有某种内在的性质和深度,这在对彼得的描写中实际上并未得到提供,尽管彼得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意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赋予当地乡下人中某些次要人物所具有的那种个人思想,反而是那些次要人物得到了非常细致的表现。他主要是从外部得到理解,通过他的妻子或其他人。你认为这是对这部小说的一个批评吗?

是的,可能是。不过在《第二代》中,他的呈现在大体上也与此相似。我想写这样一个人物,他虽然始终在思考、判断和行动,但是对他而言,深层的内在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达到的。我想要的是这样

一个人物，他的内在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只能通过他人得到理解，因而他不断地使他们感到迷惑。我想我了解他，但是当然我不能判定我是否已经在作品中实现了他。我感到遗憾的是不得不放弃以布鲁塞尔为背景的那几章：他的综合性飞跃和创新性认识就发生在那里，然而当我看到最终的形态的时候，这几章处于极其不同的一个空间范围里。尽管如此，日后我可能会把它们放回原处。当然，更为概括性地讲，在这种对内在精神的接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持续的不对称问题：一个非常棘手的文学表现方法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果戈理观察到的，在一部小说的人物当中总是存在着不对称，从某一观点出发它总是无法辩解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努力寻求完美的对称，你就打破了可能存在的小说的限度。马修与彼得的对比当然是重要的，我绝对无意要以任何方式（包括比较的方式在内）指出彼得是不道德的。关于马诺德地区的人民，至关紧要的是，他们应当是完全的主体，特别是格温·沃恩、茅德林·詹金斯、特雷弗和盖辛，甚至还有丹什，他们的自治是至关重要的。

这部作品的题目具有某种悖论性的因素。马诺德山谷社区的当下困境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印象，如果英国-比利时合资公司迁入的话，可能会降临社区的命运也得到了生动的想象。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叙述本身几乎没有展示事实上的斗争。媒体对政府计划以及政府与公司关联利益的曝光，威尔士激进组织的暗中援助——可以说，这些都是被推断出来的，是在幕后发生的。在看来能够抵制或者改变全部事件过程的情节里，没有任何力量得到了真正的呈现。与《边村》或者《第二代》相比，集体场景的缺席是显著的。没有任何与铁路线上或者汽车工厂里的团结相当的东西。重要人物群体性地聚集在一起的唯一场合是一场婚礼。这种削弱是你故意的吗？它似乎为这部作品提供了某种悲伤的潜流，不同于前两部作品。

我已经对此给出了部分回答。这部作品最终的形态实际上是某种确定的悲伤感：不是许多乡村小说中基于回忆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明确的当前时代的悲伤——完全可能的未来与现实障碍矛盾之间的某种联系。对它没有任何适用的字眼，不像在基于回忆的例子中可以使用怀旧一词那样。它是怀旧的对立面，当然，它与我们许多人曾经怀有的对未来的那种信心具有区别性的不同，我常常通过写作试图重建那种信心，因为它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要重建对未来的信心，就意味着穿越某些破坏性经验的阴影，与这些破坏性经验相关的是战争、发生在最好的革命性社会里的那些事情以及在这里以前看来显然没有任何问题的工人运动的可怕瓦解；当我们开始理解复制(reproduction)与收编(incorporation)不仅仅是作为概念，而是将其作为对肉体与鲜血的厌倦和替代的时候，极度的悲伤就出现了。我想要捕捉住那一时刻，共同的行动是潜在的，毫无疑问地完全是潜在的，但是由于整个一系列的偏差没有成为现实。顺便说一下，作品最初的形态包含了城市内部的抗议情节和威尔士的抗议情节，用较为宽泛的措词来说它们是相关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可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你展开得越宽泛，它们就越不会关联在一起。两个其他因素决定了作品的最终形态。首先是威尔士乡村现今非常独特的悲伤感——我最为尊敬的威尔士作家们，尤其是埃米尔·汉弗莱(Emyr Humphreys)更为强烈地带有这种悲伤；其次是成熟的体验。虽然我有时感受到了它，但我指的不是在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体验，而是我非常了解并怀有深刻敬意的某些少数人的成熟体验，在他们的一生中，在他们积极的一生中，他们一再进行斗争，并且已经清楚地预期到了那种体验——将会出现通向未来的决定性突变。我曾经看到其中一两个人居然由于深刻交融在一起的社会悲伤和个人悲伤而在哭泣，他们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了解与这种感受对立的主张但却仍然在某种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受到这种感受的支配。实际上，我已经在欧洲最好的两个

知识分子斗士身上辨识出这种感受；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不打算提他们的名字，但是在他们公开推翻这种感受的地方，他们已经把自己那一代的这种感受展示给我了。马修·普莱斯在《边村》中当然与我十分接近，但是在《为马诺德而战》中他已经变得与我非常不同了，我对他的写作是想尝试理解在他身上产生的这种感受，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与《边村》中的马修·普莱斯无关的粗鄙、顽固的家伙，但是我认为，或者说希望更加能够完成和推进这种感受。

《为马诺德而战》是你有关威尔士作品中可以追溯到的最为强烈和直接的一部。你对威尔士的感情，包括你自己的身份感受，显然从你第一次离开潘迪之后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你能否告诉我们，你与威尔士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

是的，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我以往对威尔士这块土地的完全无法抗拒的感受中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正如我的情感和写作始终保持的那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与威尔士作家和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接触，根据这种文化的最好传统，他们都是高度政治性的人物，我对此留下好奇的印象。突然间，英国——资产阶级的英国——不再是我的参照点了。我是一个立足于威尔士的欧洲人，在两个层面上都感到了不同。自此出发，仍然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然而我几乎无法描述当时在威尔士与作家们和政治上的同志们谈话及相处时的那种不同之处，他们全都艰难地面临着这种情况——从外部看来它体现的是一种非凡的活力，客观上也确实是那样，但是在那里它体现的是内在的一种强硬、可怕的斗争性感受，甚至是一种苦涩的共同感受，那正好是我的感受，在最为真实的意义上也是我现在从其出发的感受。通过实际上非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我希望威尔士人民——依然是激进的、有教养的人民——战胜、征服或者超越资产阶级的英国，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从错综复杂之处得出的。对我

来说,相关联的意义是: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可避免地是欧洲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左派”人士,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同志,像巴霍(Bahro)这样来自东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我这种类型的人;我来自这些人,属于这些人,正如我所感受到的那样,我身上更为自觉的威尔士特性是我理解这些联系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说威尔士语的民族主义者仿佛要给予我信心,他们告诉我《边村》及其社会思想具有彻底的威尔士特性——我过去通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高度国际主义的威尔士知识分子则对我所有范围的作品提出了赞誉——确切地说,我正式的英国同行们没有一个人看到理解这些作品的可能;从威尔士特性到国际主义因素,我跨越整个行程,然后置身于某种文化之中,在这里我才可以呼吸,或者说,至少我可以喘喘气,以便回去对付资本主义的欧洲和资本主义的英国,并且毁灭它们。然而它们就在那里,必须在马诺德——资本主义的威尔士那里得到展示。

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写作《志愿者》的呢?它是一部与威尔士三部曲完全不同类型的小说。

我当时想要写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的政治小说。我最初的想法是集中于一个来自工党的部长或前部长与某个涉及反政府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之间的暧昧联系,以军队对罢工的镇压为背景,后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复杂情况。在原来的版本中,这位工党政治家有一天失踪了,他的衣服被丢弃在海滩上,后来一个记者追踪到他隐匿在瑞士。在小说的这一部分写完不久之后,史东豪(Stonehouse)或多或少将这一情节付诸行动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朋友们相信我,但是别的人不会——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完全是在史东豪事件出现之后利用这一事件。因此我不得不重新修改这部作品。我当时的想法是改成一部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小说,三个部分采用连续穿插的不同叙事立场,其中一个立场是那个记者的。令我惊讶的是,当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从那个记者的观察出发以一种高效可行的形式写出整个情节似乎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决定意味着要忽略很多东西,那是最使我感到苦恼的。然而与此同时我采纳了这一解决方案在形式上的可能性,然后就非常迅速地写出了这部小说。

在何种程度上你是有意采取了惊悚小说的流行形式并将其用于政治目的的?几乎就像科斯塔-盖维拉斯(Costa-Gavras)的电影《Z》或者《戒严令》所做到的那样。当然,这样的策略在进程中改变了作品的类型。对于《志愿者》,你当时瞄准的是更为广泛的读者大众吗?

不是。它始终更多的是选择某种手法以使我能够写出我的素材,而不是决定使用某种手法以得到不同类型的读者。当我形成这部作品的外观形式并且看到它被刻画成一部政治惊悚小说的时候,我感到了惊讶。但是当我这样对出版商说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多年以前,你曾经和我谈过,完全可能采取像惊悚小说这样的流行形式加以好好利用。”所以,谁知道呢?我现在所说的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我当时在寻找某种形式上的解决方案。当然,看似局部性的决定常常可以具有结构上的影响。但是在当时,在这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中,我对于保持了记者式的叙述手法而放弃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感到惋惜。例如,关于在武力攻击配电房过程中被杀死的那个人,在第一个版本中提供了一段我们早前谈论过的那种类型的前史。但是在最终的版本中,他只是作为阶级冲突的一个典型的牺牲品消失了,与我想要描写的那个人不一样。在我最初的构思里,他完全把他的工作视为他的家庭收入来源、视为他向上爬的源头,但是突然间发现他自己在一场产业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角色。

就其完成的形式而言,这部小说仍然包含了不一致的素材,它显然违背了通常受到褒奖的小说的统一。为了标明格温特郡作家团体

对配电房袭击事件的叙述,甚至存在着印刷字体上的变化。因为《志愿者》中这种基调的混杂,你已经受到了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有意这样做的?

我希望它呈现那种情形。实际上,如果我是更为自觉地写作一部政治惊悚小说的话,应该会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说,这部小说将会更加不平滑。第一页就是一个这样的信号。在听到与暗杀企图有关的消息之后,那个记者突然开始了他的故事。随后紧接着发生的是把简短的电子信息译成全面的新闻写作用语。那意味着用一种突然直接的方式提出了语言问题。尽管我出于作品总体长度的原因减少了所插入的格温特郡作家们的叙述,但是一些人还是对此表示不满。然而当你从一种表现方法转为另一种表现方法的时候,不平滑的方式是故意用来强调有关产业斗争的陈旧观念和涉及的工人经验之间的那种意识上的分裂。举例来说,记者本人——刘易斯·瑞费恩这个角色的构思是作为一个可以被读者接受的聚集不同感觉和意识的中心。他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于他的“左派”历史,他可能对民俗博物馆具有批评性的指责,但是这些与他责备同行的方式是完全冲突的——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具有不值得信赖的名声。

作家团体关于配电房袭击事件的叙述以及关于民俗博物馆的冗长陈述,似乎是在小说内部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成功的换挡。前者是小说里面最为有力的延伸之一。不过,在《志愿者》中,还有其他不同的成分看上去有些失控,更有可能得到不连贯的反对意见。事实上每一章的第一句话都是一个简洁的表达,大概六七个词的长度,一种不变的形式被设置了,以遵循记者式的表现方法。但是在叙事中的关键地方,瑞费恩进行叙述的整个句法节奏没有任何预示就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复杂、细腻并具有沉思性。有一个例子与为了报复对配电房的夺取而枪击内阁大臣的场景有关,那就是对这一场景进行重建的一个

长长的段落。打破这一段的节奏,以惊悚小说的套路回到调查人的清晰措词似乎无意识地造成了不和谐。有人可能对这种差异不加考虑,认为这些相对并不重要,因为叙事人是一种形式上的设计,被用来呈现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情节,对于这些经验和情节而言,他本人只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变成了整个情节的叙述支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力量由于他作为一个角色的可信程度而面临危险。在最后的几个场景里,对武装报复负有责任、一直在追踪地下组织的记者转变了,变得与地下组织极其团结,并且他本人动身走向了一个未知的政治目的地。那种变化的可能性其实有赖于要在前面进行确认,他有能力以某种内省的深度和本质上的细微差异对事件做出反应,而那种能力从根本上在记者式的风格中被消除了。问题在于,在这部作品的结尾,读者可能觉得没有为瑞费恩的对话提供充分的动机,因为它建立在叙事人转向不同感受或者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大量的措辞并未给人提供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种转变。

我意识到了这种困难,但我不可能判定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被赋予了动机。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场对话,其意图是为了表明叙事人对他自己的轻率风格的看法,当时他转变成了另一个人物,说“我了解像那样说话的人”——这表明,至少在对某些表达可能性的公共控制方面,那种贯穿了整个社会的无情作风总是在产生作用。其叙事手法更多的是叙事人面向他人的报导,而不是内在的反思。但是同样相关的是,结局实际上并不是一场对话,我对此思考了很多。“你不具有任何外在于这一过程的身份”,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是想要在结尾产生重要的影响。记者与事件进程的客观联系在小说的结尾被清楚地给予了。当然,此刻在最后这些情节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本来可以采取其他行动方式的,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新闻故事,这可以使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取得成功,他也可以出卖所有卷入其中的人——显然他已经获得了那样做的潜在能力,这说明了早期为什么有

必要在各种地方表明他也可能有其他感受。不过在一般意义上,我依然不认为他是在最终做出了行动抉择。由此,对志愿者的理解得到了展示——放弃工作为他人作证而不是促进自己的利益,对他而言并非是自愿的。他是被迫陷于这样一个处境,在这种处境中他发现——奉献并不总是像通常趋向于认定的那样是自愿的。在一个更为完整的人身上,这种变化本来应该是内在的和自愿的。但是就他而言,既存在着自愿的潜在可能,也存在着某些障碍。因此我反复重写了一幕场景。在这幕场景中,地下组织逐渐对他施加了压力——他处于某些危险之中,如果他不做出这种选择就会招致风险,当然,这种选择也可以完全被当成是对他以前的政治忠诚的回归。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只是想以另一种方式考虑他的行动,大体而言,这不是我表现这种情形的通常方式。同时,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其他人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为社会所接受的传达,从未与他们的个性分裂,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记者是这些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决定离开一方并加入到另一方的自愿的代言人。他最后的活动是整个一系列变化的条件,那些变化源于他个性上的这些分裂以及早期尚未确定的忠诚和机会主义。

情况也许是这样,从这部作品的叙述立场中看似矛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作品中被浓缩了的因素。有人会怀疑,是否某些主题或者变化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得而被省略。例如,前议员马克·埃文斯,这一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模糊,因为根本不清楚他的整个职业是一种预先建构的掩护,还是在某些时期他的政治观点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异母兄弟是一个活跃在配电房斗争中的工会会员,这一事实得到了呈现,但是这并未构成充分的理由。你是被迫进行删节的吗?显然,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间,不同范围措词的调整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在一个受到限制的篇幅中,立场的转

变将会更加突然和显眼。

最终的版本是 10 万字,但我当时仍然被要求删掉 2 万字。也许我本来应该坚持额外的空间以备调用,我不知道应该这样。有趣的是,你提到马克·埃文斯和他的异母兄弟的例子。我不得不删略掉的一个场景是两人之间的一场会面,那解释了两人的关系。另一幕场景则是叙事人对埃文斯的母亲的拜访以及与他第一位妻子的交谈。我同样非常严重地删削了埃文斯与叙事人之间的最终对话,在那一幕场景里埃文斯谈论了他自己。但是如果我把这些场景和其他一些场景纳入到小说中,我就会退回到更为传统的标准形式,具有更大的篇幅。

2 万字增加的篇幅不会超过 50 页,对于一本书的价格来说,它真的是出版需要考虑的决定性事项吗?

出版商现在身处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对小说有标准的格式。对于许多小说来说,4.95 英镑的价格现在是一个固定的最高限度。

在《志愿者》描绘的未来政治中,工党完全消失了:一个中央政府掌管着英国,在主要范围内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抵抗。地方性的罢工和占据持续着,但是这部小说整个情节的前提是,“左派”一方不再有任何群众政治纲领。因而,在瑞费恩和地下组织领袖大卫·埃文斯之间的争论中,行动的选择从而被缩小了——在国家机器的内部或者外部进行不同形态的秘密颠覆活动。你认为这种规划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即使承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顺从,小说中提出的选择范围难道不可以被指责为一种言过其实的、甚至是冒险主义的狭隘吗?

这部小说中设想的未来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但它是一个完

全可能的未来。小说投映到未来的1987年到1988年,工人阶级仍然有能力采取斗争行动,但是其斗争状态在范围上是区域性的,在目的是党派主义的。在它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发挥作用的地方,它被以经常发生的方式引入了歧途。在这样一种形势中,你会不可避免地经历这些不同的冒险活动。这部小说试图理解那种冒险活动的开端,但是也间接表明了对它作为一种象征性举动的内在批判。在瑞费恩和地下组织之间,存在着关于它的极其漫长的争论,我不得不将其省略掉。有一些句子被留下了,但是最初有一个很长的段落,瑞费恩指责他们是冒险主义和替代主义。《志愿者》做出了一系列推论,如果英国工人阶级被限制在局部的斗争之中,他们就被压制性的右派政府所控制或忽视,就被极为彻底地击败了。因而人们很可能会采取秘密的暴力行动。我并不希望看到这些行动,但是与我不断进行争论的意大利朋友们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之中,这些秘密的暴力行动正在被日益重要的青年组织所采用,虽然这些组织的规模非常小。我并不想支持那种模式——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它为恐怖主义。不过我也不想用从前的恭顺来简单地反对它,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依赖于恭顺的做法。当然,前途是可以改变的。

你计划写更多的小说吗?

是的,我想再写两部。一本是《兄弟》,其性质介于《边村》和《第二代》之间;另一本会更为雄心勃勃——尝试写一部不同类型的历史小说。这种小说中的大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全部,实际上都是关于一段时期的,而非关于更为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本身。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出发,写作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应该是一种可能的形式,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在实际上它是否可以完成,主要的问题显然在于恢复必要的统一。我想尝试通过地点的连续性而非人的连续性来获得它——采用的是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期(我对此将会极具选择性)

由不同的人定居,显示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实践着不同的利用土地的方式。正巧,我最了解的威尔士的一个地区与这种连续性很相配,由于极其漫长的农业传统和工业传统,对它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牧羊人社区。我可以从这里开始,在 20 世纪或者稍前一点的时期结束。与这样一部小说相关的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在小说中,人们自己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联系。例如,在我安排的一个情节中,一架战时的美国飞机坠毁了,当地人上去把机组人员弄出来,其中一个机组人员有一个威尔士的姓氏。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然而读者会从小说前面的部分知道,这是一个在 19 世纪移民美国的家庭的后代。人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可能完全一无所知;对于他们来说,呈现了历史连续性的物质性石块、废墟、地标或者姓氏常常是无法知晓的。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展示这些联系已经被打破了,但是一个人有希望表明,在这一联系中断的过程中,某些东西能够再次关联在一起。

4. 《乡村与城市》

《乡村与城市》引出了大量关于文学、政治和历史的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涉及你对于文学文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的概念，它自战后以来似乎经历了一个缓慢起伏的变化。在《阅读与批评》中，文学被定义为“人类经验的记录”^①。在《文化与社会》中，你一度把它称为一种“记录”和“回应”^②，然而你对19世纪工业小说的讨论表明了，在并不适用“记录”观点的文本中，某种主动的过程在起作用。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你把文学描述为“价值标准的戏剧化”，是“一种姿态”。这些连续的定义似乎标志出两种本质不同的观念之间的紧张。第一种观念与利维斯所属的传统有关，正好把文学看做是记录—回应—表达。第二种观念通过它得以形成，有时还使用它的词汇，但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学视为生产。现在有人可能会说，《乡村与城市》把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带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在这本书中，文学第一次被拉开距离，与被系统、单独地加以分析了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文学被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意义生产方式；它不再作为一种记录被描述为有用的或有效的。某些当代的思潮可能得出这样的推论：下一步议程将是某种关于生产手段的一般性理论——换句话说就是关于形式的一般性理论。不过你同样始终强烈地抵制形式主义。你对关于你的作品的这种解释有何反应呢？

《乡村与城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出发点：如何阅读英国田园诗这

① RC, p. 107. ——原书注

② CS, pp. 99~100. ——原书注

一问题曾被大量讨论过。它的目的是重新评估针对田园诗提出的文学批评问题。当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文学性的问题通常带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前提,那就是田园诗作为一个突破点对我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对抗性的作品,其构思像《现代悲剧》——是对某种特定文学正统的强烈反应。田园诗通常被介绍为关于乡村庄园的记录,因而记录的是英国一度存在的有机乡村社会,记录的是后来被资本主义摧毁了的真正文明形式。但是当你对其进行批判的时候,同样的人总是已经准备好转变他们的立场,说:“毕竟它只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我决定必须在两个基础上对其进行质疑。首先,有必要非常具体地说明,萨克斯汉姆和潘谢斯特这样的庄园根本不像琼森或者加鲁写作的关于它们的诗歌那样;其次,同样有必要理解,他们察看这些庄园(或者对它们视而不见)的特定方式恰恰深深地贮藏于诗歌本身的形式和文学表现方法之中。在此程度上才有可能继续说,既然所有的文学都是一种使用某些文学表现方法的生产方式,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把我们对这一事实的理解系统化,形成一种全面的文学理论。然而这不会是我的结论。把我所发展的这种形式分析仅仅当做是生产手段全部库存中的又一个条目,对于这些诗歌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充分的反应。这样一种形式主义会使任何对萨克斯汉姆或者潘谢斯特进行准确说明的尝试显得粗俗或者离题,因为我们恰好是把它们作为诗歌记录下来的。我的方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方案,我不能确保我总是取得成功,它是完全不同的:它试图同时展示文学表现方法和某些历史联系(前者是对后者的反应)——以便同时理解这些(创作)生产手段和形成这些生产手段的条件。因为,对于任何有关生产手段本身的实质性理解而言,形成生产手段的条件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左派”某些最近的批评文章中有一种倾向,一直要把这些条件排除在外,把任何对这些条件的关注作为历史相对主义或者唯社会学论而加以抛弃。与此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戏剧性地表现这些庄园

与田园诗之间的紧张,在这两者之间形成对比。这部作品的重点当然不是把文学文本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而是作为对历史的表现——包括我依然足够现实主义地认为的那些错误的表现。这些不仅仅是立场中立的文学表现方法中的某一种或另一种,它们当中有些是体现了利益的谎言;有些是观看事物的方式——与之联系的不是谎言,但却是特权;有些是更为深层、更为不自觉的洞察力的限制——它是由某种承袭的立场或者阶级立场所致;有些是局部性的突破;其他的则是相对完善的洞见。除非一直明白所有积累的文学表现方法和这种实质性的界限,否则陈旧的形式主义就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要接受首先在理论上承认文学是一种生产过程的事实。那些生产手段包括的不仅是文学表现方法,还有全部的社会关系,任何未能铭记这些生产手段的马克思主义,当它面对琼森的诗歌或者杰弗瑞(Jefferies)的小说的时候,都注定会迷失其中。我宁愿冒着在这部作品中我非常清楚的那种危险,简单地说这种田园文学与乡村历史不同——因此有几个人批评我是幼稚的现实主义——然后采取相反的方针,只写了《田园诗的几种形式》。不过我毫不怀疑我的写作是一种非常独特和充满困扰的过程,那就是我为何在写了四章之后对其停止写作达数年之久的原因。当我不得不对其进行扩展的时候,我被这一计划吓坏了。我从未写过这么一部作品,对它所导致的方向感到如此惊讶。

这是一个非常明晰的回答。不过在《乡村与城市》中存在着一个仍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你在开始的地方表述:“我们已经召集的证据引出了与历史事实和历史观点有关的问题。这些论据所说的内容并不全都采取同一形式。它们作为论据,其范围涵盖了从戏剧中的一句话、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到文章中的一个论点和刊物中的一条注释。当这些论据是诗歌的时候,它们同样也是不同类型的诗歌,这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出这些关键区分的话,我们就只

能分析这些重要的感受结构。”^①在田园诗的例子中，你实际上认为这些诗歌是历史见证的障碍，宣告它们是虚假的证据。此后，通过许多作家，文学形式和历史经验之间继续了同样的对抗过程。总的来说，似乎存在着面向某种更为重要的社会事实的行进。这可能显著地表现在 19 世纪的散文体小说中，真实的历史条件通过连续的文本得到相当更为清晰的泄露，尽管从来不是以某种完美的状态出现——它们总是有可能遭到某些重要的纠正或者修正。然而，不太清楚的是：你对社会现实与文学形态之间裂隙的解释是如何影响到对这些文本的严格审美判断的？在这部作品中，你似乎伴着这个问题前进，但却根本没有解决它。然而它被非常尖锐地提了出来，比如说，你引人入胜地解释了马维尔 (Marvell) 在《阿普尔顿庄园的上空》中所赞美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对于你的解释，这一问题要问的是，由于文学作品仍然是由现实的审美价值构成的，在一首诗歌中的乡村景象或者一部小说中的城市景象与真实的历史事实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如果相差很远，就像与马维尔诗歌有关的这个例子那样，这种价值存在于何处？

我认为在这个论证中有两个步骤都是有效的。首先，把已经产生的文学作品恢复到其生产条件中这一过程揭示出，文学表现方法具有社会性的根源，它们不是单纯写作方面的形式技巧；其次，对某种文学表现方法的历史认同不是一种纯粹中立的表达，它与对这种文学表现方法进行评价是矛盾的。实际上，就适当的文学评价而言，我要说的是，关于在某种文学表现方法内部对好的例子与坏的例子进行区分，虽然不存在某种无用的模式（我不愿意用比此更强的语气对其进行表达），但是，明确的评价活动在于从一个经过慎重考虑并公开宣告的利益立场出发，对文学表现方法本身进行判断。目前，我从通常的英国

^① CC, p. 12. ——原书注

文学研究内部得到的对这部作品的最为认同的反应是：如果我们评论家接受这些形式，仿佛它们是可靠的历史观测结果，那我们就太轻率了；你已经指出它们不是，它们只是文学表现方法而已。其结果是我所推掉的不恰当的赞扬——仿佛我们只能说，这些文学表现方法存在着，它们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之上，把文学史作为更为宽广的历史的一部分加以认识就是对它们的认识。因为，对它们同样要做出一个必要的评价。你必须能够超越这样一种理解——诗歌不是田园生活经验的记录——认识到这些文学表现方法产生的不仅是诗歌，还有各种活动和关系，它们处于有待评价的状态。在琼森和加鲁的诗歌之间做出区分并不困难，与后者相比，前者在技巧完美的标准意义上写得更好。但是比这种优点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文学表现方法的优点：那种理解形式产生于何处并且正在产生什么的能力。某些文学表现方法的确不如另一些文学表现方法。如果在文学中仍然存在着有待评价的地方，那么，那就是必须得到评价的方面。这不同于说诗歌与历史不同——虽然也有人这么说。因为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可能从根本上与任何真实的历史都不相似，但却通过它对可能存在的情境的表现而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最合理的文学表现方法并不总是现实主义的，与相反的情况相比这通常更多的是事实。每一种文学表现方法必须根据它植根于其中的东西和它所表现的东西得到评价：与某种更为普遍的历史判断相联系的一种评价。这种历史判断同样也是与历史的某种联系——它所联系的历史不是所有那些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而是亲身处于其中的历史。

然而，根据生产力的标准，你无疑不得不承认，《乡村与城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在田园诗中具有更大决定性影响的表现手法是一种非常多产的形式，这没错吧？即使把我们自己仅仅局限在你所讨论的从维吉尔到克雷布(Crabbe)的诗歌，田园诗的成就不可否认也是相当可

观的。你不可能说这是一种不具生产性的表现手法。

哦,当我说生产性的时候,大概用错了词。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对最终根本不可能被分开的两种不同判断进行区分。存在着这样一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形式在历史上是多产的,因而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在此意义上它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我们必须能够以某种截然不同但却具有关联的方式说,它是一个灾难性的巨大贡献。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能力或者它的各种政治制度,同时却使自己远离它们,作为创造物,它们后来不仅成为人类自由甚至人类进步的障碍,在与它们的构造模式相符的某种重要意义上,它们始终是人类自由甚至人类进步的障碍。一种成就的力量不是自足的价值。如果你不能做出第一个判断,那么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一种当下的道德,并且不再存在任何历史。如果你不能做出第二个判断,我不知道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对我来说将会是什么。琼森必须找到一个资助人,为了找到一个资助人,他不得不对那种庄园进行赞美,这就是那种文学表现手法的实质。然而,琼森在他的诗中取消了劳动者的角色,如果我对此不会感到严重不爽的话,我现在能与劳动者建立什么样的紧密联系呢?当然,如果你在第一个判断的前提下做出第二个判断,其结果是幼稚的:你将不会充分理解历史,从而没有能力在历史中为自己定位或者对所有的历史都感到不快。另一方面,在最为严格的意义上,如果你对这种意义深远的、习惯性的神秘化并不感到不快的话,那么,团结的意义何在呢?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具有那种立场。不过有人想知道,正如你所提出的那样,你在《乡村与城市》中是否已经完全保持了那种平衡?让我们谈一个直接相关的例子——你令人难忘地说明了从黑暗时期直至中世纪晚期英国封建主义的起源和特征。你写道:“通过他

们的地位权利、他们的血族关系和他们的领地,在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武装团体这种坚持不懈的移入,其目的是以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生。这种武装团体成为社会和自然的秩序,受到他们的神灵和教堂的保佑,在几个世纪的故事中,伴随其存在的是在金字塔底层进行劳作的耕者——那些普通人。那些普通人有时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找到了一片定居下来进行劳动的土地,同样,这片土地也常常会遭到剥夺。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打破了这片土地和他们自己的束缚,支持这一正在兴起的社会阶层。可以看到,这种支持在中世纪诺曼底人的‘秩序’和后来英国国王的‘秩序’中达到高潮;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支持,其原因在于更有组织和更为广泛的剥削……只存在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我们读到在这种秩序轮到衰落时对于骚乱抱怨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我们认同谁?认同的是农奴、雇工和佃农,还是那种抽象的秩序?对于这种秩序而言,贯穿连续几个世代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来不过是工具性的而已。”^①像这本书中的许多段落一样,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段文字。然而,尽管它博得了直接的赞同,通过反思,它同样也唤起了某种真正的不安。因为你说只存在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你刚才的回答不是暗示了通常不只存在一个问题吗?在这个例子里,显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你的说明中所遗漏的是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城镇的扩张和欧洲封建文明的整个文化发展。你谈到中世纪的教堂,仅仅把它看做加在穷人身上的负担,有赖于穷人的劳动;然而它们无疑也代表了至今可能仍然赞赏的不朽建筑作品。在像这样的段落里,历史被视为双方之间的冲突,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个人站在哪个立场上,这种历史似乎不仅制衡而且遮蔽了另一种历史——被视为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某种连续发展的历史,通过社会分层和社会剥削的特别形式,后一种历史一直是现实中人类财富

① CC, p. 38. ——原书注

增加的原因。同样的问题似乎确实伴随着庄园出现了。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站在哪个立场上”这一说法的提出针对的是一个特定的上下文——“当我们读到对于封建秩序衰落的抱怨的时候”。因为，大多数关于英国历史的文学描述都导致了某种奇怪的节略（在那里存在着某种对于中世纪的相当暧昧的乞灵），然后故事的开始被呈现为一种古老文化秩序的可悲可叹的衰落。我的论辩暴力实际上瞄准针对的是那种自满的反应，那的确引起了你對自己定位的问题。更为普遍地说，我同意马克思主义有关封建主义对文明的历史贡献或有关资本主义成就的完全正确的描述。但是这一经典观点——这些秩序对文明做出了它们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尊重和敬意，此后它们完全枯竭了，被更高的秩序所替代——总是使我极度不安，因为其中某些贡献的吸引力对我依然如此强烈。早期的礼拜堂和大教堂激起了我非常强烈的情感，然而如果我不把它们理解为人们身上的巨大负担，我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在我的工作领域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我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话，这就不会是一个同样类型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问题，我感受到了那种负担，就像我感受到了那些庄园所造成的负担。有谁不曾赞赏过这些值得赞美的建筑或者可以在其中发现的那些家具呢？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是一种贡献，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它们是一种障碍。它们的力量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像最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所暗示的那样，以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随其时代而终结。大教堂并不仅仅是信仰的纪念碑，庄园并不仅仅是典雅的建筑。它们永恒地作为“我们的传统”被呈现给我们，包含了理解这个世界和关联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定方式，伴随着我们对其价值的承认，这一点必须得到批判性的提示。我总是把它们理解为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当然，如果我们不承认它们的贡献，我们就会完全退回到对一切文明到来之前朴素的农耕者的认同，那将是荒谬的。

对此陈述我们完全具有同感。不过,再一次提问,你是否在这本书中完全遵循了它?你已经令人信服地为你关于封建主义的那一段文字做了辩护,称它是论辩性的驳斥,针对的是在文学研究中可以发现的普遍盛行的对于中世纪社会的感伤,这种文学研究与艾略特或者利维斯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之前的一页里,你似乎同样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批评。你写道:“自马克思之后,在某些语境里谈论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资本主义之内谈论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步性,这一直是陈词滥调。两种做法在某种确定的历史规划之内并存着,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控诉,以及对它在工厂和城市里所造成的长期痛苦记录的控诉,另一方面对于同样的事实却再三使用‘进步的’作为一个毫不吝惜的形容词。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轻率、浮躁的所谓现实主义反应,它所针对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突破而产生的生产率和以新的方式解放的生产力;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特殊形式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谴责和理想化;对于人对力量、产量、生产的控制以及对于人对自然的统治的某种不加反思的歌颂——仿佛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可以脱离同时发生的对人的剥削。他们所说的肯定是这些,称赞的肯定是这些;但愿解决这种情感混乱的理性程式是辩证法。”^①为何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混乱?你会提倡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像“轻率”或“浮躁”这类词语的修辞用法确实讽刺性地描述了实际当中对待过去的唯一反应态度。对于工业革命早期的钢铁工厂厂主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写过赞歌,但是他们也确实拒绝对这些人进行纯粹的道德—政治谴责,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导致不可能理解历史的整个运动。马克思主义传统确实强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者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度全都呈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坚固结构,但是也强调了依据经验,它们每一个同样也与更为显著的人类解放形式联系

^① CC, p. 37. ——原书注

在一起。你真的拒绝这种立场吗？

不是。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正好采取了那种立场，并因此遭到“左派”的批评。我曾经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出版业建立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突破。对于这样的断言，我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资产阶级报纸的出现绝对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即使作为当代资产阶级出版业绝对的反对者，一个人也必须承认这一点。我发现做出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困难。如果因为18世纪晚期或者19世纪早期的英国出版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对其进行批评，我不会把这种做法视为合理的。

好吧，联系一下你对琼森的评价标准——它没有确切地记录工人阶级的生活。

我不会把我的评价局限于此。出版业的出现是进步性的。我以它为例正是要说明我完全赞成合理地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或者赞美。因为在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出版业一直在有意识地尝试着挤压、收买、竞销和投资于受到大众喜爱的激进出版业。在那个时候，即使扩展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领域，它也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换句话说，我认为存在着一种科学的关注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谴责或者赞美资本主义都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因袭的不加考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资本主义完全是错误的。那种不加考虑的做法通常与某种自信联系在一起，当我年轻的时候，那种自信在共产主义政党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你可以任意进行谴责和赞美，因为你确信人类历史的下一个时期所提供的是什么。当代的一个例子是，一些“左派”人士仍然愉快地接受跨国公司的发展，理由是垄断的发展只会推动社会主义的接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说明。它是完全正确的，目前我们并

不确切知道历史将要采取什么方向,所以我们不能不加预设地轻易给某种现象贴上标签,把它作为必须接受的进步性发展或者采取相反的做法。但是以往我们确实有一个准绳,比如说,对于14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历史发展,我们不必做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们可以探索着描绘出它们对欧洲社会演变的复杂影响。当然,相对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存在着一种非常连贯的完全替代性的观点,最初通过本雅明尝试性地得以表达,后来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有组织地系统化了。它强调使所有其他现实归于无效的首要现实永远是每一个时期人类的实际苦难:整个历史可以被归纳为新型剥削形式的不断复制——一切进步都是向以前状态的回归。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立场感到有共鸣吗?

没有。我完全接受这样的实践——对一切社会秩序的正面的影响和反面影响、成就和失败进行区分;历史性地追溯当一种秩序受到另一种秩序的威胁或者替代的时候,进步事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反动事物的过程。这种实践的最佳代表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历史分析方法。然而这种实践可能退化成我正好曾经称之为公式化表达的东西。在那个程度上它变成了一种障碍。以对自然的统治这一著名的口号为例。任何一个以唯物主义方式观察历史的人当然必须看到,在自然的范围之内进行理解和劳动的过程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首要熔铸因素。但是把这些活动描述成控制就是要把自然视为仿佛只是有待支配的原材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转换成了它无法与之调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于“生产”或者“生产性的”这些词语的合法使用在他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今当我们有理由意识到这种公式化表达的后果的时候,对这种用法不加思考的重复实际上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做法在我心中引起的怒火出现在这部作品中,既有个人经历上的原因,也有当代文化上的原因。因为,最先强制推行统治这一观念的农业资本主义秩序的价值标准现在正在被作为文明的顶

点呈现。某些资产阶级庄园和家具建造得很美,在此意义上它们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在它与当今的某种反动关系发生关联的意识形态核心之处,我发现有必要极其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庄园首先是剥削、掠夺和欺诈的地方。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这一事实——它们当中的某些建造得很好并且看起来赏心悦目——使那种情况更为恶劣。然而,就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把人类历史视为永恒的剥削循环而言,《乡村与城市》的论点在于,阶级社会的连续形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你引用的那一段中,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出租或者农业劳工相比,中世纪秩序中野蛮的肉体征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剥削。对于把社会历史看做永久的不幸与苦难的观念,我没有一点儿兴趣,实际上那是宗教观念关于堕落的人类的一个变形版本。我的立场也不同于萨特使用的匮乏范畴,至少不同于它的某个版本,因为具有讽刺性的是,某些类型的贫困明显增多于18世纪的英国,一个农业生产能力发生了显著进步的时期。我始终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引起生产力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包括了崭新、稳定的剥削形式。

这些对于你在《乡村与城市》中的论点是重要的澄清。因为对于这本书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批评:通过以某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写作,你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之间造成了一种结合,而后来那些社会主义者对待过去的态度实际上是轻率、浮躁的,甚至常常是不成熟的、愤世嫉俗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有一些段落遭到你的反对,但是他们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化约为这些段落。

当然。我乐于承认,我当时批评的那些观念必须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除了赋予这些观念某种确定依据的少许附带说法之外)。它们也应该与现在的某种给人深刻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开,因为我发

现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品中的这种思考方式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确实认为,我当时正在使自己脱离社会主义运动中某种一直实际存在的有害传统,它为人们提供的憎恨资本主义的理由实际上把他们带到了资本主义之中。因为,进步被认为等同于工业和城镇,从这一作为进步的资本主义版本出发,到把社会主义的未来视为城镇和工业对乡村与土地的胜利,这是可能发生的。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城镇与乡村关系的复杂思想的一种彻底稀释。恩格斯的基本命题——如果要出现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劳动分工形式——被遗忘了。苏联社会呈现为社会主义的,仅仅是因为1930年代它正在变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1945年之后的反讽性情形是一种完全替代性运动的出现,首先出现在中国,然后出现在印度支那——对此我完全赞同。

在这儿我们正在接近你在《乡村与城市》中整个论证的另一面。这部作品是一个持续的讨论,它针对的是某些错误的尝试——理想化并恢复由统治阶级主导的农村秩序在以往的价值标准,无论那些价值标准是封建制度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诉求,呼吁关于乡村生活与乡村劳动的真正价值标准之间的连贯性和相关性,这种诉求产生于直接的生产者本人,其目的是为了由当今日益工业化的社会所构成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过于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念,以至于他们不能毫无疑问地想象这种可能性。这一点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讨论。他们意识到许多过去的成就可能会被注销一段时间,但是却以一种更为解放的未来中作为有效的价值标准和经验重新显现出来:希腊民主在许多方面先于资产阶级民主,罗马法先于中世纪的法律。然而他们从来不是这样的历史观念——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刻,所有得以保存的过去都被封装到当下之中。真实的情况是,他们的作品大体上缺乏一种观念——来自过去的价值

标准的连续传统激活了当下的斗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无论它们是贵族、工匠或者农民，其价值标准在过去都得到了识别和考虑，但是在当下，它们通常不被视为能够具有持续的影响。存在着一种假设：工人阶级自身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内部可以找到必要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阶级的反抗力量——设想一种替代性社会秩序的能力——来说，仿佛切断这个阶级自身的乡村过去并非一种非常有害的打击。把你的论点解读为在部分程度上是对这种假设的批判，这样是正确的吗？

是的。不过我关注的背景不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是与社会主义中某种倾向的冲突。这种倾向在工党内部发现了它的主要制度体现，在成功的没有资本家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发现了它的意识形态目标。当然，那个目标将永远不会实现。然而对于它的压力包括了剥削和特权在国际和国内的长期存在。在威尔士，我有一些朋友和邻居，他们被一个整体性的由各种力量构成的联盟挤了出去（这些力量包括了从大规模的资本到工党中的“左派”），因为他们是“过时的”，他们是食物生产者。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可以告诉我（这讽刺性地发生在一个乡村酒吧里，因为“乡村是你周末度假的地方”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绵羊是一种不经济的牲畜”，威尔士的牧羊人放弃放牧或者实现垄断得越早，情况就越好；离开那些山陵，把它们作为空闲消遣的地区，用于对大自然的发现。当我听到那种最终的经济普遍主义的时候，我感到了愤怒，不仅是因为我有一些邻居正在养羊，他们正在做出一番值得一看的事情，比多数经济学家更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且是因为在现存的官僚体制内，对于山地牧羊的未来，“顾问们”可能比任何一个山地牧羊人都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不能确定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和我一起出来宣称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对于这种轻率的革新论（这种革新论谈到过时生产的合理化，而事实上关于这种生产并没有什么过时的），一直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的默许和

观望。代表了这种版本的对于自然的统治的是与乡村生活对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乡村与城市》中,我不得不批评它是绝对的历史错误,它不仅要被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模式所取代,而且与任何关于当代社会经济的唯物主义评价是矛盾的。我已经习惯于听所有的人说:乡村的价值属于过去,因为文明的那个阶段如今被取代了。突然我明白了:真正发生的事实是,食物生产在帝国主义体系之内已经被转移了;无论如何通过城市科学提高土地的生产价值,在农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仍然存在着土地和劳动的危机。不过在这本书中,对应的主题当然是现代城市的解放性特征和启蒙性特征——就在这里见证了社会主义最初的体制与发展方向的存在。我的一些最有力的强调就定位于城市的价值,定位于城市的进步贡献。

在此程度上,重新收集迄今为止的某些讨论线索并陈述对于你的作品的一种更为全面的反应,这样做似乎是适当的。首先要表达的是,《乡村与城市》是一部具有深刻原创性的重要政治作品,它在某种现实的意义代表了一种进步,超越了存在显著问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我们以前没有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从研究特定的文学问题出发的。这部作品突破进入了本质上完全崭新的讨论领域:实际上,对于这部作品所致力的问题,尽管在经典作品里存在着某些说法和暗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从来没有被深入彻底地思考过。有人相信,关于一切重要主题的定论要么会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找到,要么会在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找到。应该把《乡村与城市》给这些人读读,说服他们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存在着许多有待追溯的重要东西,那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相反并超出其范围的仍然有待言说的东西。

但是与此同时,你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贬低了这本书对某种支持革命的主要社会主义传统的矫正程度——那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甚至是驳斥性的矫正,由此你不是也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吗?因为在这本书

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样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我们早前引用过的段落里,你在那里谈到大城市的社会主义者们受到了剥削者蔑视农业生产者的长期传统的影响;第二次在同一处的结尾,当时你简要地谈到苏联的经验、欠发达世界的农业革命和恩格斯关于消灭城乡之间分裂的观点。对待甚至完全次要的英国诗人,你都给予了直接详细的原文引用,如果你这样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同样曾经提到的托洛茨基,那不是会好得多吗?你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纠正对于这本书无疑是充分具有首要地位的,这本书需要适当扩大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接合。那样不是也避免了把相互独立的问题与思想家一起塞进少数段落的危险吗?

我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于自信的方式对于我的特定人生轨迹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如今应该清楚了,我当时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进入某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之中,那发生在一个完全特定的时间,伴随着特定的困难和局限,伴随着妨碍这种进入延续的非常复杂的情况。实际上只是在最近,当我坐下来致力于某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必须把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以某种相同的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其他某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于这个问题必然要说的话联系在一起。如果你看看我曾经写过的几乎所有作品的暗含关联,就会发现,我一直在与我所认为的英国官方文化进行辩论。我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那样做,然而不管是否认同,永远是在我视野中的那些人作为另一种传统存在。现在我完全不是为此辩白,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在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工作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那种关注仍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我现在非常清楚地注意到这种关注是在回顾——当我提到这种或那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时候(有时公正地,有时不太公正地;有时充分地,有时不太充分地),我是在谈论我在学生时代最初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而集中关注的那些人物和观念。处于其他事物之中的那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

环境确实拒绝接受乡村生活,如今它已经不再存在了。我自己那一代人的不足在于,他们实际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品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而且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作品选自对我来说常常是如今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不重要的部分。这并不是申辩,但它是一种解释。英国知识分子的环境在最近10年中的改变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现在我不会想就任何问题进行写作,除非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追溯了它的历史并随后留心我是站在哪个立场上与其发生了联系。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正在思考的那些人的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完全根本性的方向转变。批评家们把它视为观点上的一种变化,当然,已经存在着一些观点的变化,但是我却把它看做一种更具特殊意义的言谈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高估这方面已经存在的变化程度。当我能够更为广泛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作品的时候,我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部分有了新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导言中,我曾经尝试着对其进行传达,当然,我发现存在着一些我以前没有遇到的已经形成的论点,那意味着我发现存在着某些我本来应该直接结合但却尚未结合的立场。

另一方面,说过这些之后,还有一个有趣的脚注,我的一些学生用积极的安慰说——至少他是在直接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他已经克服了他的障碍并成为一个人。大家知道你曾经具有活力,但是此刻有迹象表明你仍然具有活力。不过,这里当然存在着某种危险。我确实看到尽力使人普遍接受的必要,看到尽力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发展和重新评价的需要(这最主要地与《新左派评论》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情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成就。它意味着,即使是我们这一代当中的某个人,现在也已经获得了一个可以致力于其中的完全额外的理性世界——这是出现更多重要作品的一个条件。然而,我在目前的文学圈子里非常关注这一发展消极的一面:对于我当时介入的读者和反对的思想,现在的“左派”人士趋向于不再介入和反对。在

某种意义上,得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力量可以提供理由,拒绝在我看来依然必要的与已经确立的英国文化的接合。为什么我对一个18世纪二流作家的讨论比对马克思还要详细?因为在这个地方,一种真正反动的社会意识不断地被复制出来,直到你自己对其进行替代的园地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实际上,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陷阱。如果我把自己余生的时间花在整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某些问题上,英国文化圈子里有很多人将会感到欣喜。我并不打算令他们满意。

没错。现在的大学圈子里存在着某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依恋,他们在其内部造成了注意力的如此集中,以至于实际上资产阶级文化之内的一切事物都被抛弃或者忽视了——通常是没有被理解。既然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前进的先进科学道路,根据释义,其他思想就被视为是无效的和无关紧要的。你的作品创作总是针对这种浅薄的必胜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是一个百分之百诚信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停留在这一传统之内,就可能不会写出你已经写成的那些作品。

不过,如果从现在出发,这个传统看上去将会是不同的。

是的,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对自然的统治存在着绝对赞美的倾向,你对这种倾向的批评与后经典马克思主义内部相似的批评(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发现以更为精神化的形式存在的同样主题)相比要更加实际和唯物主义。它允许你进行政治性的论证,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如今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仍然像它们在过去那样重要,并且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可能将会保持不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则典型性地止步于哲学的沉思。然而,对于你的说明,我们想要加入一个重要的保留,你说明的与其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与自然的关系,不如说是他们面对的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你引用了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乡村生活的蠢行”(“The idiocy of rural life”)的著名评论,把它相当温和地描述为一种“与之相关的平静措辞”^①——有人觉得,考虑到你在《乡村与城市》中汇集的那种证据,根据某些印象,你本来可能对其使用更为强烈的语言的。那种措辞不是孤立的,它是马克思反复使用的一种措辞,在你的作品语境中读到这种措辞是一种有益的震动。不过仔细考虑一下,这里存在着一个被你对唯物主义的粗略处理所消除了的文本问题。那就是:这一措辞实际所指的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所想的是什么?他们当时似乎很可能在思考欧洲传统的农民共同体。正如许多人类学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在乡村的共同体内部,经常存在着一种对妇女和儿童的完全不加掩饰的压迫。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内部,受到剥削的农民在教权主义或民族主义反应的旗帜下一再扮演了具有讽刺性的保守派角色。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对农业人口进行反革命动员的形式始终是完全存在的。1794年法国的旺代(Vendee)起义、1799年那不勒斯农民圣战对帕特诺倍共和国的扼杀、1804年蒂罗尔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扎克雷暴动都是欧洲记忆中的最近事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形成的政治经验中,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加利西亚农民被哈普斯堡皇室的专制政权操纵用来镇压波兰起义,与此同时,第二帝国则在法国农民选票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是为“乡村蠢行”这一措词本身提供了理由或证明。但是它确实表明,当马克思或恩格斯写作有关农村地区的内容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考虑的那种乡村景观在某些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作为你的作品对象的英国场景。原因在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地主—佃农—雇工三位一体的系统在英国农业中的极早植入,到了18世纪晚期,在英国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农民。事实上,《乡村与城市》最有益处的影响之一正好

^① CC, p. 36. ——原书注

是要破除关于英国农民的神话,以及展示从至少 16 世纪以来与乡村社会秩序有关的各种非常特殊的复杂因素和变化。马克思可能思考了的那种社会现实在英国历史中是不常见的。另一方面,你的研究尽管具有普遍性的标题,它关注的却是英国,其农村地区在许多方面就欧洲经验来说是没有代表性的。那种差异难道不能被主张用来缓和马克思的措词吗?

我要说的是,当我读到“乡村生活的蠢行”这一措词的时候,它使我无法接受,但是即使是在这种完全不同的英国乡村经验内部,我立即知道了它们所指的是什么。对某些已经确立的神秘化事实和迷信的坚持,持续地顺从或者放弃政治权利,没有受到其他类型地区的处于解放中的共同体的影响——当我正在走出乡村地区的时候,我非常强烈地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不应该使用那种措词,因为他们当时所指的是一种剥夺过程——源于无知和缺乏读写能力的过程。他们了解那种非常重要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被剥削者将他们的剥削在男人与女人和小孩之间传递;他们也了解一个男人被非常艰难的工作环境变得残酷无情的方式,工作环境使他在身体上筋疲力尽,他可以神经紧张地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家庭里复制出那种野蛮的行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应该按照这些事实的本来面貌对其进行描述——它们是社会剥夺和社会剥削的产物,然而他们却捡起了“蠢行”这个词,这是对乡村正式不予考虑的一种因袭表现。

就政治问题而言,我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过去已经澄清,不仅在过去的经典例子里,甚至在我们自己如今的政治中,乡村地区都是某些类型反应的蓄水池(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地区长大的,对其非常了解),我将感到非常满意。再一次声明,无论如何这种现象与蠢行没有任何关系。它在部分程度上关系到非常复杂的城市社会主义政治,除了贵族影响的持续之外,乡村地区通常了解它们有实质性

的物质上的理由反对它。不过当然,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关于农民在反抗某种压迫性制度中已经成为一种进步力量的某些例子,任何人都可以检阅历史并提供比较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农民被动员起来或者甚至有时站在反动的一边进行干涉。所有这些都将阻止任何纯粹推翻这种与之相关的措辞的做法。不过,一个人因而也将不得不在一种历史的观点中纳入某种过程(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处于一个对这种过程进行观察的位置,而且恩格斯确实极为明显地对其进行了观察),通过这种过程,他们概括为蠢行的这些特定类型的现象已经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替代性苦难(在城市中剥夺和剥削给人们造成的苦难)中产生了裂变。如果有人提出与迷信和神秘化有关的典型例子,他一定也记得城市和郊区蠢行的那些典型变异,那实际上是相当显著的。非理性主义已经在 20 世纪的乡村里活跃起来,同时也被纯粹的理性之光从市郊或者城市里清除了——这种说法绝不是事实。实际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为多产的发生器是目前某种确定的城市凝聚作用。现在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经验中都没有正当理由把乡村地区或者乡村劳动视为与任何意义上的蠢行(或者某些较为温和的词)联系在一起。这不是考虑这一问题的途径,正确的途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剥夺和剥削范畴。

完全如此。不过在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一个潜在的分歧点。你说,城市在 20 世纪已经以一个或许甚至比农村地区更大的比例见证了受到操纵的无知和非理性。那是真实的,但它仍然是一个过于不合群见的笼统陈述。因为,虽然在 19 世纪有许多农民起义,但是也有许多对于农民的反革命动员,在历史上对于城市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反革命动员:不管是在 19 世纪还是在 20 世纪。如果我们仅仅谈论城市和市郊的政治疯狂形式,这一根本性的差异可能就被隐藏了起来。因为这些形式典型地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者长期失业者的

爆发。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曾经被席卷进这样的运动。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尽管纳粹党自身基本上是从小资产阶级中招收成员并由大资产阶级提供经费的,主要的纳粹选票实际上来自农民选区。德国工人阶级始终坚定地投的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源于艾米里亚和罗马涅的乡村地区,从来没有获得对城市无产阶级的任何控制。这不是要把工人阶级的现代历史理想化。在纳粹的反革命之后,德国工人阶级一般而言确实集结起来进行了战争努力,许多美国工人也支持在越南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在这个世纪,与其他任何社会阶级相比,城市无产阶级一直相对更多地免于群众政治的非理性主义。那种负面的事实与它积极的历史潜能并存在一起。你已经有益地持续说明了,对于农村地区在人类生活中的未来角色和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低估。不过仍然真实的是,独自可以把道路引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必然社会代表一定是产业工人阶级而非任何乡村人口。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一点也不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泛工业化的秩序。它只不过意味着革命性变化的力量必定主要位于城镇内部。在此意义上,你的最后一章里存在着某种含糊不清的因素,你在那里谈到在小农社会中已经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在这种社会里,在推翻陈旧政权的过程中,主要的大众力量是乡村人口。这些社会尚未产生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秩序,它们的缺乏民主确然与它们缺乏成熟的现代工业条件这一事实有关:它们缺乏所有定位于创造集体工人的文化技能和社会技能。集体工人在技术上有能力掌握主要的先进生产工具,因而对于一个自我管理的自由社会是有准备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消亡了。那种自我管理永远不可能从源自农业经济的一次跳跃中达到。任何最初建立在小农阶级基础之上的革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化,为其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如此强调地提出这些是有益的。在这本书中,在我写社会主义运动在伦敦发展的部分,我想我确实说了与此类似的一些内容,“在这座新都市绝对的混乱和穷困之中,为了恢复一种民族性的情感,一种源自社会某种崭新景象的文明力量在斗争中被创造了出来并蔓延开来,它收集起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几个世代的苦难,以这种出乎意料的挑战形式成为这座城市对于乡村与城市中长期类似的不人道做法的人性回击。”^①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除了产业工人阶级之外,一个人实际上不可能指望任何别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与一直累积的证据相反,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与农业生产者的关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根据我的观点,产业工人阶级将不得不痛苦地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它与原材料生产者和食物生产者的关系,从而扩大通常被削减了的设想(这种设想被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未来)。由于作为消费者的立场,产业工人阶级不时有在客观上对这些生产者怀有敌意的危险。如今你可以听到可笑的抱怨,这包括来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观点:与一个多雨的年景相比,在一个干旱的年景里对土豆的花费要更多。忽视原材料生产的习惯(仿佛它们的存在不说也行)导致了这样的观念:唯一真正的工作和真正的人类活动是对这些材料的二次加工和改变。最近关于威尔士水源和伯明翰供应的争论就具有极其急躁的特征,由于这种急躁,甚至非常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也受到了来自乡村的抗议,他们反对建立剥夺了人民土地的水库,因为输送水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那些现实地生活在这个水坝之下的人却不能得到穿过乡村流向伯明翰的供应。像这样的冲突揭示了现实关系的失败,危险地类似于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唯一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完全忘记了它的生活资料来自何处。一旦这样一种利益的对立爆发,它可以被右翼政客在任何一端

① CC, p. 231. ——原书注

充分利用。许多以反动政策为目的的对乡村舆论的动员都利用对于城市蠢行(既然这一措辞已经到处使用,我愿意用它称呼某种认为食物从商店里长出来的观念)的怨恨。在国际政治中,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在那里任何人都绝不可能排除这样的事实,对于一个非本国的原材料生产国,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客观上正变得相当反动,他们支持各种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压低对于初级产品的花费。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我认为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人都不能在1950年代预见到,当帝国主义秩序仍然保持更大力量的时候,食物和原材料如今实际上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心。毫无疑问,我不希望在这本书中已经形成的关注被颠覆为对社会主义的放弃,以适合某种与政治无关的生态主义或者乡村主义,那根本不是我的意图。我认为必然的观点是在两个劳动阶级之间进行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重新协商——一方是依赖于收到的原材料进行劳动并依赖于收到的食物供养自己的劳动阶级,另一方是仍然处于某种极低的政治和组织发展水平、生产出原材料和食物的劳动阶级。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方少数几个接受这一论点的共产党之一,它最近的规划批评了以意大利的农业发展作为代价、用于出口市场的工业投资的集中。你可以看到废弃了的工厂遗址遍及意大利南部地区,投机商已经从国家提供投资的建筑中拿走了佣金,然后就将其遗弃了,在规划者的脑海中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观点:在乡村生产劳动中进行投资可能是更为可取的。在此期间,意大利已经成为了一个食品净进口国。当造成城市与乡村差别悬殊的运输技术类型和传播技术类型已经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对这一整个发展方向的反对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恩格斯对挪威的佃农

是充满了称赞的。马克思毕竟也高度关心俄国的乡村公社,指出它们能够直接成长为社会主义。有关俄国革命随后那些年的当代研究趋向于支持他的观点。尽管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错误,在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中仍然有许多对于乡村地区的积极评价。

马克思最初论述政治的文章就是关于在莱茵河畔森林里捡取木材的。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基本的例子了。

5.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是以一种介绍性的文本形式出版的。然而它的许多内容在理论上相当难以理解,似乎代表了你作品中的一个新方向。你是如何理解该书的这种性质的?

在一套丛书之内出版的条件施加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长度限制——大约6万字。我本来也不会选择与它的现存形式不同的形式进行写作,不过某些章节当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压缩。我的目标不是要写一部一般性的介绍,更正确地说是试图显示出过去15年左右我自己思想中的某些变化。自从写作《长期革命》第一部分之后,除了两篇文章之外,我没有写过任何理论性的东西。这是一个陈述我的当时立场的机会。我不时有意识地反对我早先曾经持有的观念。由于写作这本书前几年关于语言的作品,许多新的强调更加敏锐——那些关于语言的作品出自我与接近我的一些人关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讨论,当时,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是文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这样。这本书最初基于大约1970年我在剑桥开始的讲稿,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那些讲稿里没有任何关于语言理论的内容,但是现在它却是这本书中最长的部分,而且我愿意说,它是最关键的部分。我认为,除非这一立场被视为这本书的基础,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在关于语言理论的那个部分,我特别感受到了长度的限制,因为当时单就那个题目,我可以写出一整本书来。

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整体姿态上的变化。我们曾经责备你在《文化与社会》中的转向过于相反,以至于在对右派的某种政治

取代中向非常保守的人物做了让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似乎不时朝着极“左”的激进主义转向。这部作品的一个主题正好同样是对文学观念的正面攻击。事实上,你抨击它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拔高,把某些写作形式提升到一个特殊地位——“文学的”,你说像“神圣的”一词在封建社会中一样,“文学的”一词是一个具有同样反动魔咒的范畴。目前这个论点激起了许多反对。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你寻求把关于文学的概念一扫而空的时候,你想要保存关于文化的观念。然而正如我们早前指出的那样,以某种更为显而易见的方式,文化才真正容易受到含糊和冗余的指控攻击——它包含了什么含义是“社会”或者“艺术”所没有的?即便如此,仍然有令人满意的理由在唯物主义者词汇里保留它。至于保存某些关于文学的观念,似乎有更多的理由。你的根本论点好像是存在着创造性传播实践的某种完整的连续统一体。因此,既然一切写作形式依据解释都是创造性的,那么给予某些写作形式作为文学性的特权从而或暗或明地贬低其他写作形式价值的做法就是反动的和排他主义的。不过,把这些与特权和压抑有关的含义附着于作为一种专门写作种类的文学概念之上的做法为何是必然的呢?专业化并不必然就是对支配力量的行使。对于文学领域的划界,为何关于审美功能的传统标准是不适当的呢?如果你严格保持当前的立场的话,不是就导致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吗?按照这种相对主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在不同的写作形式或者作品类型之间做出区分。

哦,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当时希望将会发生的是,当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被清除出场之后,有可能发现某些允许特定强调重点的崭新概念,否则就明显存在一种相对主义的危险或混杂的危险,对此我非常理解。那一步必须完成——它将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即使关于审美范畴,我也说抵制把审美概念看做由某种确定反应构成的特定领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排除发现符合它的某些永久性理

论结构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当然不会排除这一范畴实际上形成于其中的接合性历史结构。在与文学有关的情形中，发现词语意义中的历史转变是一种由洞察力和惊奇构成的活动。如果文学概念仍然意味着它在 18 世纪的含义——一组具有某种严肃程度的书面作品，能够维持其他作品无法引起的关注——至少在这种情形中绝对没有任何必要抵制文学概念。然而自 19 世纪之后，文学的定义已经建立在一种不断稳固的分隔之上，在想象与现实、虚构与事实、为了创造一个艺术整体的作品和符合一切其他功能的作品之间做出了区分。这种日益增长的专业化有两个后果：首先，被描述为创造性、艺术性或者虚构性的作品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各种相互关联从视野中消失了（它们大体上始终是存在的）——它们被建构为一个保留的领域；其次，没有这一标志的各种作品把它们自己作为对现实的写作而呈现，其呈现的方式阻碍了对它们的产生和写作过程进行任何检查，而这些过程实际上与所谓文学保留领域内的写作过程是完全同类的。事实上，在一篇科学论文里确定某种表现手法的存在——有人可能仍然喜欢把它称作某种文学性的表现手法——与探索一部被作为文学挑选出的作品里的某种表现手法可能是一样重要的。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来说，我们自己的时代是一个不健康的时代。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极度的自信，对抗着我们已经习惯称之为文学的那些形式。我充分了解，在我批评文学概念的时候存在着使这种情形甚至进一步混乱的危险。然而我的批评却如此彻底的原因在于，我已经从文学批评本身的传统内部判定，它的文学范畴和批评范畴引起了如此深远的危险，以至于它们必须受到完全的挑战。有必要表明，通过写作模式以及与写作姿态或者写作焦点有关的深层表现手法，（再次使用简略的表达）各种各样的作品都产生了意义和价值。隐藏在陈旧概念里的错误前提必须被清除，以便我们能够在写作实践范围之内开始再次搜寻一系列更为合理的重点——我同意，伴随一个没有差别的写作实践范围，

你不可能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把它接受为一个基本的写作实践范围,在一行文字的这一面和那一面之间没有任何绝对的分界线。

即使承认对于讨论范围的论辩性澄清是必要的,你的论点似乎依然产生了不必要的大量余地,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危险。如果接受你关于科学论文的例子,那么,在你连续的写作中,关于社会和自然的讨论通常被辨识为科学性的,它们的情况变成什么了呢?在你大概包含了自然科学在内的关于文化生产的激进历史概念中,有可能再谈论真理吗?那无疑是构成任何科学性概念的最低限度的基础。

这里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首先要说的是,当自然科学的各种模式被延伸到社会科学和文化分析的时候,科学性的作品包含了文学性的表现手法,牢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的表现手法是完全客观的观察者姿态:通过可说是观察者客观性证明的某种写作模式,这种特性被创造出来,对产生这种特性的方式进行说明是值得的。我现在可能比大多数“左派”人士更为极端地认同在自然科学中完成的许多作品,我试图沿着这些作品的方向前进。与科学家对此进行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把从经验观察(他们知道自己受到训练的目的就是为此)到书面报告(在这里他们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领域)的转换看做是很成问题的。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怀疑写作活动,后者并不专业性地涉及把可以说是可靠的实验性观察转换成引起了其他问题的报告。科学家们较少可能出现通过书面报告简单回推实验所犯的误差。当客观观察的模式被延伸到社会科学或者文化生活的时候,这种区别就变得绝对极其重要了。在符号学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宣称:既然它完全是被书写出来的,你能说的全部内容就是它是书面的。现在我毫无疑问对这种倾向没有任何迁就。结构主义发展的这种结果是一种消除一切的唯心主义。在科学论文和实验性的观察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发

现和控制的关联。实际上,许多科学著作是一种从著述回到实验观察的非常严谨的改写,这被看做科学方法本身的一个条件。在此意义上,一个科学性的文本作为一部著述是非常开放的:资料没有被写作的事实耗尽,实验性的重复是可能的,你根本不会处于一种在文学成分之外没有任何吸引力的情形。社会科学中一个合适的例子是布迪厄(Bourdieu)与他的同行们对统计数据的复查,在法国,某些关于机会均等的教育理论就建立在这些数据之上。他们完全通过数据,通过鉴别这一事实中的解释模式而非写作本身的形式,从那些理论进行回溯,能够指出从数据到著述然后再到理论的意识形态转换——这些转换可以被纠正,以从同样的数据中产生出一种不同的说明。含义创造的过程、意义与价值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写作和传播行动本身所固有的。目前虽然必须打破写作模式之间的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事实的二元论,但是,有些写作模式记录的是在别处做的活动,可以用反复出现的形式恢复,有些写作模式——例如诗歌——则处于频谱的另一端,在那里这些条件并不支持,在两类写作模式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同。不过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完全把一首诗歌恢复到它的产生环境之中,这是我现在想要提出的重点。以我的观点,尽管这是源于研究作品频谱另一端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但它是将要替代文学批评的活动。毫无疑问,它将会结合文学批评的某些步骤——例如,细致的文字分析实践、对叙事方法或者象征类型的研究当然应该得到保留。但是它将从我们习惯的批评性分析中走出来,通过对写作技巧、修辞性的形象或者教义影响——在学术性的英文研究中存在着关于它们的数量庞大的材料,尽管人们通常不知道利用这些材料做什么——的适当的文学史分析转向研究当时必然更为宽广的社会现实。这不会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尽管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排除像作家的工作环境或者影响文学生产的经济关系这样的问题,不过,那不是一个人应该主要前进的道路——应该转向表现手法,在那个意义上转向更

为深层的历史形式。当一个人已经做到那一点的时候,他将会经常发现根据其可以复原的产生环境不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作品。在某些例子里,当你已经使用这种分析直达深层形式的时候,你可以继续下去,就像我的年轻同行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加以说明,然后工作就结束了。存在着适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作品,但是它绝不适用于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整体。在不适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地方,注意力必须被转回某种较为不能分解的成分——那种成分拒绝彻底的当然也是还原的分析。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说我们必须极大地强调这种类型的某些作品——这不是一种对价值的强调,但它无疑是一种对不同之处的强调。其结果将会表明,各种写作实践形成了一个真实的变动范围:它们不可能被传统的二元性或者与二元性有关的变量所包括。我愿意期待对于不同类型作品的大量更为精确的分类在将来出现。决定性的关系始终介于一部特定的作品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在这个频谱的一端将是一种关于科学作品的标准,科学作品根据它的产生条件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在这个频谱的另一端,将会存在着重要的诗歌,在这里,作品产生的条件不是对于写作的一种充分说明。

你关于科学的谈论停留在你的理论立场并不容易容纳的某种区别之上——科学观察与科学论文的书面叙述之间的区别。科学观察优先于科学家叙述的观念不是回到了你非常强调抵制的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吗?

我认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观察方式以及实际的传播方式和记录方式并不限于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的资料最初根本不是语言的——它们是我们当中那些主要接受语言学教育的人发现难以认知的东西。因而存在着把它们转换成语言以及在特定的日常语言中进行转换的困难。不是所有类型的成分都是语言的。然而,显然具有重大价值的非文字

传播依然可以在任何对科学的唯物主义说明之内得到容纳,不过它是在作品本身之外的主要科学传播方式。没有任何你提到的那种二元性在此处被证实——因此我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不同意见。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里,你把结构语言学描述为某种形式的抽象客观主义。在讨论索绪尔(Saussure)的时候你指出,他在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区分是社会和个人之间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对立的一个实例。随后你批评了关于符号任意性的观念,你说这种观念只可能出现在一个语言系统完全从外部得到理解的地方,它的现实社会联系被抽象化了。目前,就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而言,这两个范畴共存于同一个平面——社会极为典型地提供了个人运行于其中的约束。是否可以这样主张: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是极其不同的,因为语言从未得到实现——只有言语是在场的;语言是不在场的储藏,是言语的生产资料;换句话可否认说,言语是传达(communiation)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语言?如果是这样,索绪尔的区分就不可以被看做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有关的一个特殊例子。就符号任意性观念本身而言(任意性时常是目的不明确的意思),它涉及的事实是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符号与指示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天然的联结,而非社会关系在语言中的某种缺席。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个观念被引入用来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符号是一种象征。它无疑是正确的,在语言中,词与物之间一般而言不存在任何一种抽象的必然关系。但是把符号描述为任意性的或者目的不明确的,就对整个理论问题做出了臆断。我说它不是任意性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俗成是某种社会进程的结果。如果它有一段历史,那么它就不是任意性的——它是那些发展了这种正被讨论的语言的人们的特有产物。你必须牢记,这种社会一个人的对立能够以许多方式被概念化:社会秩序可以被视为优先于不过是其个例或者标本的个体,或者社会可以

被呈现为自由个体在确定自由的条件下出于某些目的的创造物。语言和言语之间非历史性区分的说服力在于,人类的言说只有根据一种前在系统的约束和有利环境才是可能的。这种区分目前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除非一个人正在利用这种系统化的语言资源,否则他是不可能说话或者被他人理解的。但是,那一系统化的组织仍然是现实的人在现实关系中的社会创造物。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点,因为人们总是假定那只不过是在说,语言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化了。所以他们对下述观点没有也必定没有任何意见:从有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研究(那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转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向。不过,语言本身的系统性特征是一种结果,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结果,它源于现实的人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各种活动,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所包含的个体不仅仅是作为社会的产物,而且在一种确定的辩证关系中既产生出了社会又由社会所产生。对此的忽视导致了关于语言的观念,把语言视为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含义在社会中确定有效的部分,一切个人的言说行为都是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含义的例证;这尤其存在于后来对1960年代结构主义(它完全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的严格理论化之中。语言活动只不过是一种前在系统的演示,这种前在系统既符合现实,同时又远离整个现实;那种距离在意识形态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否认了由重要现实活动构成一种持续过程的可能性,那些活动有能力改变这一前在系统,并且确实显著地改变了社会语言系统。在其他事物当中,我们所谓的文学的历史是发现语言学新的可能用途的一个特别验证。人类创造了语言,他们还将更新它,不仅仅是宣称这样做——尽管他们有时只是说说而已——而且在他们全部的社会经验持续期间将其作为正在进行的一种常规进程。

你自己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态度始终是极其保留的。通常当你提到弗洛伊德的时候,指的是他后来的元心理学著作,你在《长期革

命》中说这些著作的根本理论基础正是反复出现的由个人与社会构成的资产阶级对立。对于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来说,你认为弗洛伊德的作品没有任何相关性吗?

让我根据写作实践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弗洛伊德的了解是一系列特定的书面作品。牢记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在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医生显然是医学性的实践经验和他的书面作品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忽略,其作品完全被接受为那种经验向我们的传达,没有任何写作性的成分介入其中。当我第一次读到《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时候,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回头再次阅读的时候,由于已经受过写作分析的训练,我禁不住对弗洛伊德收集的证据(证据本身必须被还原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时期、阶级环境,等等)与他的证据提出方式(他观察到的某些口误可以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得到明白的解释)之间的分歧产生了印象。换句话说,始终有必要把方法的有效性(这是他吸引关注的地方)与他既是文学的(其作品的写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又是理论的(他铸造了一些概念以理解这些方法)写作形式区分开。这是目前在文学研究中对心理分析传统不加批判的运用所未能做到的,它完全把这些解释或者理论模型连同结论一起作为科学接受了。在这一点上,像我们某些文学分析家目前正在开始做的那样,把弗洛伊德的作品作为一系列的文本进行重新研究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只要这种研究没有以一种令人敬重的揭示性方式完成),不过这是作为一种对其写作方法的研究。符号学家喜欢评论说弗洛伊德是一个反传统的小说家,因为他揭示了行为从中产生的条件,而非仅仅揭示行为本身。考虑到小说的实际传统,我不会将那种做法称作反传统小说家的方法,但是符号学家们想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想要证明小说的移植。与此相反,我将会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弗洛伊德看起来正在做现实主义传统在其极致状态所做的事情——他的陈述集中于个人的某些典型事件,个人的历史以一种非常

有力的方式得到了解释和概括。我认为,实际上这才是正确的强调:弗洛伊德的作品与其说应该被解读为一组科学作品,不如说应该被解读为所谓的另一种小说——虽然它们当然有一种显著不同的地位,但是这样它们就格外引人关注。一个人阅读着这些作品,就像一个人将要阅读有着密切联系的斯特林堡或者普鲁斯特的当代作品,不用因为它们建立在临床经验之上而承认其任何必然的优先正确性,因为在临床经验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写作过程。毕竟,斯特林堡或者普鲁斯特的正确性是什么?他们的作品清楚地表达了另一种经验,一种发生在写作过程之前并延续到写作过程之中的对经验的观察。以同样的方式,拉康的作品目前不应该被视为确定的依据,视为对其他作品在其中得到解读的某种框架的规定,而应该把它本身视为一种我们都认为有影响力的文学创作。

现在,一旦一个人在那种指引下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其经验可能就是非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我曾经说过,当我于战后在一种非常骚动不安的环境中致力于欧洲戏剧的时候,我确实在阅读的时候觉得我的生命受到了质疑。我认为大多数人在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会有那种同样的感觉,尤其是在他接近与精神紊乱和灾难性事件相关的临床经验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功劳我们才了解:我们经常说某些话以避免说另一些话,我们在言说某些确定内容时的困难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阻碍或者压抑有关。然而,你对此了解得愈多,在判断这些困难的所有优先权方面就愈加根本不可能向任何人让步。你可能在一个平等的层次上交流你对它们的体验——你可能从别的某个人那里接受这样的陈述:你正在说这些内容,或者你正在避免说那些内容,因为它进入了痛苦、羞愧或者错乱的区域。你将永远不会接受的是这种专门方法的持有者、那些熟知并有能力进行这种解释的人对这些洞见的令人恐怖的应用。当一切反应都可以作为证据被解释为对于这种解释的受到压抑的抵抗的时候,理性的话语变得确实不可能

了。弗洛伊德对于这种无边无际的神秘化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它已经伴随着后来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系统化而兴旺了,而且,它在哪里兴旺,就在哪里制造出一个文化的灾区。

我谈到弗洛伊德主要是根据他后来的作品,我这样是不适当的吗?无疑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关于人类历史、文明特质或者艺术本质的更为一般性的命题。弗洛伊德对艺术的说明给我以特别显著的印象。弗洛伊德把艺术家呈现为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现实冲动的人,这些现实冲动在他的描述中是男性资产阶级社会群体的一系列不容置疑的庸俗生理状况(一个对于女人的不幸结果——女艺术家有什么用?),随后通过在艺术作品中的迂回升华而得到满足。就我的看法而言,整个理论完全是简化还原的,这或许因为它已经太专业化于艺术之外了。这涉及我认为自己从未完全充分陈述过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论点:自觉的故事讲述的出现,对于某种经验的深思熟虑的精炼表达——这些都是从可以观察到的日常话语成分之中发展出来的。在某种确定的程度上你可以合理地谈到有关这些活动的某种集体意识,它们所出现的场合的设立,将其作为标志艺术的表现手法。不过这些审美情境——我们此刻将要被告知一个故事,我们将要聆听一首诗歌——所标志的活动与那些在日常话语中发生但却没有如此标志的活动并无不同。这种基本的人类联想活动在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很多值得注意的有效形式,认为它体现了某些原始挫折后果的那种观念不是十分严肃的思想。社会秩序被看做一个由各种约束和禁止构成的纯粹消极的体系,整个这一观念属于极为规范的资产阶级理论,我对它自然是非常敌对的。毫无疑问,个体实现的机会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受到了彻底限制,然而那正好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个人作为大量本能的集合被对立于以社会命名的某种封锁事实。在弗洛伊德对战争或劫掠的解释里,当个人攻击的归因被投映到历史中有组织的社会攻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终结于关于永恒动力的某种神

话,对于这些动力,如同阅读尼采的作品那样,一个人只能将其作为想象(有时是非常有力的想象)来理解。

你对有关文学概念的拒斥伴随着对有关批评观念的激烈批判。你呼吁“对这种评价习惯(或者权利、责任)的意义重大的拒绝”,这在《关键词》中极为清晰。你继续说:“因而,当继续进行同类活动的时候,要点不在于发现某些其他术语以取代[批评],而在于摆脱那种根本性地依赖于对来自其现实处境和现实条件的反应进行抽象的习惯,即对于评价的拔高以及对于某种显然普遍性的方法的拔高——这时需要理解的始终是这种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一种评价,而是一种实践)的特异性,其特异性始终存在于与它的实践处境和实践条件的运动着的复杂联系之中,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与其他一切实践处境和实践条件的运动着的复杂联系之中。”^①你的论证逻辑在这里似乎导致彻底消解了传统上被认为是批评的主要功能的区别和评价作用。因为,如果对于一部作品的任何审美判断都必须被逆向解构成某种特定的条件反应,那么此处与历史相对主义的界线是什么?流行的虚无主义自愿且炫耀性地放弃了建立一种文学作品评价基础的任何尝试,只是声称要解码这些文学作品内部的散漫结构,你如何使自己免于这种虚无主义的危险?无论如何,直言不讳的问题必须被提出:评价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对?那不是我们在所有其他生活领域都必须做的事情吗(我们必须对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或者社会结构做出评价)?为什么写作活动应当例外?无疑存在着一些语境,在这些语境里,“评价”这个词具有一种受到批判的或者惩戒性的含义,但是这些语境在日常语言中毫无疑问不是约定俗成的。评价无疑是阅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你怎么可能消除它呢?

^① K, p. 76. ——原书注

如果被理解成我说那种评价不会发生,那么我感到非常遗憾。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不可能放弃它,也不建议那样尝试。我的理论论证再一次应当被更为适当地看做一种清除性的工作。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批评得到理解的是一种独立的过程。你从我早期作品中引用的这一说法强调的是训练有素的关注、适当的反应,等等。它们遍布于这样一种传统:评价过程是发生在任何一种特定步骤或者特定情况之前的事情。我非常努力地受过这种训练——你被吩咐要做的是忘记你自己,处于与文本的一种没有任何遮蔽的联系之中(不过这当然要与你的训练一致);与此同时文本本身同样被取了出来,处于它的一切限定条件和环境之外。我与文学批评的整个对抗实际上就围绕着这种伪客观的尝试,即在完全没有感受到正在做出评价的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评价作品——其努力是要抛开它自己的环境、超越历史来谈论文学,而不是谈论正在做出批判评价的个人或者群体。相对于利维斯,我在这个地方反对更多的是新批评主义后来的发展。因为如果赞成利维斯,一个人绝不会处于忘记一个非常明显的个人始终在那里做出评价的危险,实际上,新批评主义所认为的利维斯作品中的幼稚因素和道德说教因素在我看来是对他的最好辩护。他并不总是清楚地说出他的预设或者把他的前提坚持到底。但是被后来的新批评主义视为污点的东西是结构主义的直接前身,相比起来,现在似乎是值得赞美的。然而与此同时,利维斯本人自相矛盾地展开了一切关于有教养的人、受过文学训练的批评家的话题,并且随后惊骇于这样的事实:受过完全像他那样多的文学训练的其他人对于同样的作品具有根本不同的评价。因而他只能贬低他们。

现在如果正如我所提倡的那样,一个人把关于某些特定作品的评价回推到这些评价得以产生的环境之中,其结果就不是相对主义,因为他同样也对那些环境做出了评价。不过这时他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某些更多地被理解为批评之外的东西。请允许我结合一个非常重要

的例子,以澄清我对利维斯的态度。我曾经在剑桥这个地方对人们说:1930年代,你们在宣布对于弥尔顿的严厉的限制性评价和对于哲理诗人的相对赞许的评价,那实际上重绘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地图。那时你们当然是在做出文学评价——你们的证据确凿的引用和分析证实了它,不过你们同样也是在询问关于在全民族范围内度过政治和文化危机的方式。一方面,你们接受了一个人,他完全致力于某种特定的立场和事业,在那种冲突中暂停了你们称之为文学而实际上却不是文学作品的著述。另一方面,你们接受了一种高度睿智且精妙的作品,它是一种把对斗争或者对经验的不同态度同时在思想中保持在一起的方式。这在一场危机期间对于任何一个高度自觉的人都是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种是行动,与某些困难、某些天真、某些作风密切相关;另一种是意识,其复杂性的状态是一种度过危机而不毫无保留地成为其中角色的方式。我说,当你们对这些诗人做出你们的评价的时候,你们不仅仅是在就他们的文学实践进行论辩,你们是在就你们自己当时的文学实践进行论辩。我的这番话引起的反应是反感的否认,他们否认任何受到如此影响的东西可能已经进入到这种批评过程之中。然而,如果一个人看看所有包含这些当代根源的关于这一讨论的术语,要证实这一点是做得到的。事实上,对批评的抽象,以及批评作为一种独自对诗人进行评价的活动在假定的清白中都是虚伪的。你问我:如果我们完全转向,说没有任何评价是充分的,除非我们知道这种评价是在什么环境被做出的,从什么立场被做出的,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保留我们仍然称之为评价的概念呢?由于评价完全消融到了环境之中,那不是完全取消了评价吗?我同意这是一个危险,不过如果我们同样评价了做出评价的环境,那就避免了相对主义。我们对作品的反应因而就变成了一种比这一完全非同寻常的特权领域(在这一领域里,读者被置于一个评价者的位置,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代价地担任这个角色)还要广泛得多的实践了。文学批评导致了批

评家凌驾于评价过程之上的人格化；以人们在当代日常争论中做出评价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之内做出评价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你对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说明似乎令年青一代不安。毕竟即使在 1950 年代，也有被提供给学生以获得一张全面学科地图的标准入门著作，这毫无疑问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原理》——对欧洲和美国的各种批评原则、理论和学派的一个比较性的详细考察，这本书的许多内容正好致力于你一直在提出的难题。例如，在这本书中，主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批评家在某个时期的特定历史关注与作家在另一个时期的作品之间的叠合，以及二者之间同时存在中的连续变化。存在着这样的假定：批评家不受时间影响的判断与文本之间毫无疑问的联系产生了某些固定的评价，从此以后就一直保持被记录下来。然而情况远非如此，困难再三得到了强调：一直存在着很多批评上的重大变革。你对文学批评的拒斥似乎基于狭隘地把它认同于 20 世纪的一个美国学派——例如你忽视了与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有关的所有美学史。你似乎在主张，既然新批评主义如此令人反对，我们必须简单地抵制文学批评。这有点儿像某人在说——我听到许多目前关于货币主义的经济学争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显然处于优势，所以让我们取消经济学吧。这无疑不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吧？

要牢记，“文学批评”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裔美国人传统的一种创造。它不是与文学讨论有关的这些活动通常在其他欧洲语言中得到描述的方式。我认为它们在那个方面建立在更为确定的基础之上。在非英语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历史和理论范围，直到美国文化最近的优势赋予批评概念一种确定的影响，它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被广泛接受。假如你观察一下这个词在英国自始至终的演化，即使在像琼森或者柯尔律治这样的个人的作品里，批评的

定位和本质也完全不同于后来把批评视为一种首要活动的意识形态孤立。费克特(Fekete)的最近著作《批评的黎明》回溯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一实践一度被作为科学提出——这是其主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与此同时它又被孤立于历史,在英语世界内部作为批评的有效意义出现了。当然,它随后经历了日益抽象和人为精确的各种阶段——费克特考察了它在北美的整个阶段,从它仍然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立场(可以在兰色姆早期作品中发现的南方反动的农业主义)联系在一起,到它作为一种假定客观的技术(它排斥被视为非批评性作品中的一切其他类型的分析或者影响)的主导地位。结构主义完成了那一理论发展。它在法国的发展一直被美国新批评主义深深决定了——这绝不是对其法国信奉者或者那些把它再一次从法国输入到英国的那些人的任何恭维。像是一个长期失去踪影、长大成人并改变了模样的表亲,它在20世纪20年代从英国向外移民,现在则以这种改变了的更深的异化形式回来了。

现在,假设你通过那种抽象和孤立感受一下训练有素的读者和文本相遇的情形,实际上最终做出任何评价好像都是荒谬的。在阅读和解构诗歌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自身冒称批评之名的那一进程的讽刺性结果是——根本不存在任何评价。实际上,评价的根据可能是什么呢?只要它关于一致性的观念不是非常严格(它经常是这样),它能够发现的就是不一致。不过,存在着一些真正不一致的形式,它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析建立一致性。另一方面,你会经常发现的由表现手法的不一致或者语言的极端不一致所引起的问题直接把你带到了文本之外。不过一般而言,对批判性读者与文本之间纯粹评价过程的孤立最终趋向于阻碍公正的评价。因此,如果一个人要辩称评价(judgment)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实践,他就必须对批评(criticism)进行抨击。我现在能够注意到,自己本应该把这一点解释得更为清楚的。

在那种情形下,你不是将要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战斗吗?因为当你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抨击“评价习惯”的同时,关于目前在某些方面占据更多优势的模式——对评价的谨慎节制,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当然,评价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被夹带进了这一进程,不过是典型地根据兴趣焦点的许可。这种批评代表性地选取一两部作品进行反复的解码,在效果上是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价值选择在发挥作用。对比较过程的检验(在这里,评价真正开始成为得到验证的和可以证实的)通常完全被避免了。

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一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一节中我确实对其进行了批评。它一直在非常迅速地发展。我认为它对评价的放弃不可能超过一段对新的技术方法(事实上,其中的一些技巧方法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产生兴奋的短暂时期。如今它已经最终进入到评价之中——这是对你希望我做出的强调的修正,而且我非常乐意做出这一修正——评价是不可避免的。

在你早期所说的内容与你此刻正在做出的修正之间不是存在着矛盾吗?你曾经非常尖锐地指出,把读者具体化为一个鉴赏家是非常有害的。另一方面你又强调没有任何人能够进行5分钟的阅读而不做出一次评价。这些评价大概是具有派性的,而非来自教授讲席。但是在《关键词》或者《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你所表达内容的派性一面在很大程度上从读者面前被遮蔽了。例如,在你有关文学的章节里,利维斯和新批评主义甚至都没有得到提名,更不必说以你现在所做的方式对其进行区别了。这本书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夹杂感情的,客观主义的,而不是明显争论性的。你谈到你始终努力把资产阶级文化主流保持在自己的视阈之中——我们非常赞赏这种斗志。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你知道你正在针对的是谁——但是你告诉你的读者了吗?

在部分程度上那无疑是正确的——我本来应该更为明确一些。

我因为写作空间而受到了约束,而且我想我当时觉得,如果我陷入对批评学派的讨论之中——仅仅因为我有责任对它们了解这么多——讨论本身将会成为一本书。我也特别不希望那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与《细察》集团之间在1930年代未完成的争论的再放。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攻击更多针对的是最近主流的结构主义批评模式的局限,因为它在遍及西欧和北美的地方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接受。在任何一个前进的方向,你必须接受某些收获并承担某些失败。我在导言中明确地说过,与我以前作品涉及的话语领域相比,这是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话语领域之内的贡献。在此方面它有所收获,其意义在于致力于文学研究的意大利人立即就明白了我的各个主题所相关的内容——我们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概念。反之,英国特定的实用批评很难在产生了这种实用批评并使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文化情境之外被十分认真地接受,很难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一起谈论它——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非常轻率地拒绝接受它,把它看做是可以忽略的。当然,并不是说我认为逐条驳斥瑞恰兹、艾略特或者利维斯关于文学的观念是不重要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在别的地方那样做过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一部不同类型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的迅速转变——那似乎是对与那些人进行争论的一种突然放弃,因为我觉得在另一方面,有一种唯心主义文学研究模式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以及它在许多其他领域与有力的知识分子运动相结合的声望,存在着这种模式爆发的更为紧迫的危险。因此我更多的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那意味着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在这一潮流的语言之内进行论证,同时把英语论争内部的大量难题抛在身后。

你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关于写作的一般性理论建立在激进的历史假设之上。我们非常不公正的社会史始终是与自然史一起得

到了清晰的表达,自然史将我们这一物种带人到存在之中,很可能依照着对于社会史分析来说完全无法觉察的节奏在改变着它,并且在某一天也许会再次将其一扫而空。第二种历史提出了一种合理的有关人的唯物主义概念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这一概念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举一个本土的例子,利维斯关于生活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性的。蒂姆巴纳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最近已经极为有力和清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社会历史的世界在自然的世界中的隐含,后者无疑并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解的任何意义上规定了前者,但是它却包括了前者,而且较为短期的社会变化领域不可能逃脱它的范围。你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吗?如果接受,它对于你书中那些主题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阅读蒂姆巴纳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健全核心恢复了,这一传统在我看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或者仅仅在数量逐渐缩小的一些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中继续存在。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潜在的重要性和实用性,特别是对于所谓的传统美学而言。这就是为什么与书中别的任何一章相比,对于标题为“审美情境与其他情境”的推论性一章,存在着更多的困难。我当时一直在设法通过谈论完全物质性的写作影响(它在一种社会学起源的传统中无疑已经被忽略了)指出这一领域的方向。因为在语言和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物质纽带,是全神贯注于信息和数据传递的各种传播理论所典型地遗漏了的。实际上,许多诗歌、许多不同类型的写作以及大量日常的谈话在传达着一种事实上的生活节奏,这些生活节奏的相互作用很可能是与写作和阅读相关的物质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至少是一个方向,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寻找某些范畴的基础——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将这些范畴称之为审美范畴。我非常自觉地保留了这样的可能性,可能存在着持久的结构可以说明例如美的概念所指向的那

些反应。取消这种可能性将是一个错误。

但是只有科学的研究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发现：它不可能推测性地提前得到预示。如果你从生物学普遍性的观念开始，那么你将止步于乔姆斯基(Chomsky)结束的地方，那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乔姆斯基对生成过程的强调最初是对以前的系统规定语法观念的如此重要的一种纠正。事实上，如果我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个唯一的抱负的话，那将是把它们与实证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因为目前即将完成的工作使这样做成为可能。奇怪的是，这是瑞恰兹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同样抱负——它在后来的剑桥理论体系中被取消了。其实，一个人通过回顾可以明白，它受到了某些特定科学家的严重限制，其失败就归咎于他们。多年以前，我试图进行一些实际的实验，研究在某些阅读语境中身体节奏发生了什么情况，然而如此专业化的氛围导致了这项工作从未得到完成。不过我相信，许多科学家特别关注语言运用与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走向与他们的积极合作。我对拉康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他的某些关于语言发展阶段的概念已经被提升成文学符号学的理论楣饰，这种完全不加批判的方式是荒谬的，在当前的世界里存在着一种非语言学类型的科学著作，一切拉康这样的概念必须被带入到与那种科学著作的相互影响之中。对于行为主义在实验性社会科学之中的支配地位，在“左派”一方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合理的怀疑：对于心理分析以及源于心理分析的各种学派的主张，一直存在着一种过分迁就，这些主张看上去极为接近和极为激进常常正是因为它们的文学性质。需要的不是把关于文学的概念与来自拉康的概念混合在一起，而是把文学实践引入到完全不同的实验观察实践。那将是唯物主义的还原。

你已经主张了，在批评的传统实践场所，文学研究如今应该采取一种双重运动的形式——一方面，追溯一切既定作品的物质和历史产

生条件,另一方面,追溯我们自己对其做出反应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你大概是在暗示,如果我们实现了那种双重的过程,我们将会达到对作家和作品的崭新评价。你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吗?你已经谈过弥尔顿(Milton)的例子,一段著名的讼案,但是它缺少足够的力量,因为说弥尔顿在战前被永久彻底地抛弃了有点儿像是虚构——艾略特本人很快放弃了这种说法。而且在战后,对弥尔顿的重新评价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视阈——从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一直到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是你自己在《乡村与城市》中对田园诗的分析。你在书中深入研究了诗人与资助人之间的准确关系、作为诗歌对象的庄园的真实历史、支配其写作的表现手法——基本上包括了诗意的建构与其作品的现实条件之间的所有联系。与此同时,在同一本书中的别的地方,你向读者非常清晰地陈述了你自已作为这些文本的一个解释者或者读者的个人立场和社会立场:你是作为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孙子,作为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这本书中缺少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对于这些文本本身的一种现实评价,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你似乎在避免这样做。然而,一种后批评(如果可以这样表达这一过程的话)的整个过程不是同样将要在这一双重过程结束的地方包含某种评价吗?

我认为它会包含的,虽然我不能确定“评价”是否完全是适合它的一个恰当的词。你可以说,第一个过程本质上是普遍性的,如果是正确地得到完成的话,可以经受他人的理性检验。第二个过程必然是个人性的,是关于利益的陈述,由于每个人最初都处于一个不同的处境,因而它完全是变化无常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此之外的与阶级联系相关的基本共同模式。那是一个难点,然而考虑到对训练有素的读者、见多识广的批评家或者有教养的绅士的不断神秘化,对于处境进行陈述的倾向是极其重要的。它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因为出现于整个过程中的频繁评价不会与那些由一个人自身处境造成的

因素相关,那些因素实际上只是与一个人生活中的事实有关的特性,它们导致了个人的偏好——我对赫里克的反应是一个例子,由于我在《乡村与城市》中提到的原因,我很不喜欢他的诗歌;这些评价被与在某些更为普遍性的评价过程中把一种评价与其他评价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因素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应该能够区别评价的性质和一个人始终表示的风格偏好,对于向别人传达来说,评价的性质是极其重要的,而风格的偏好对于一个人自己无论可能多么意义重大,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却没有真正的价值。在一个主要话语领域的中心,后者并不值得关注,尽管有一种批评已经尝试过这样拔高它——最好的批评总是努力克服后者,但是它有时通过对个人的偏好的提升,经由某些压抑,会达到一种貌似客观的评价。与之相比,严肃的评价活动是那些具有一种广泛连续的积极影响过程的活动。它们是面向某种特定状态的起始方式,把这种特定状态展示在不同寻常的光亮之下,不仅影响着我们对其做出反应的某些方式,而且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某些方式。许多过去的文化形式对于人们做出评价和行动的方式施加了一种积极的力量,原因在于其构想源于被他们作为伟大作品评价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因而这一普遍而且可以传达的评价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你的读者留下了明确的印象,你在《乡村与城市》中详细讨论的前三首诗歌分别出自琼森、卡鲁(Carew)和马维尔(Marvell),其中你对马维尔的诗歌有明显的偏爱,尽管与另外两首诗歌中的任何一首相比,正如你根据诗歌所写的这个家庭的经历——菲尔法斯的女儿与巴金汉后来的婚事——所说明的那样,它在某些方面代表了一种更为令人惊讶的对社会的神秘化。这是那种你希望从中取消其重要性的那种评价吗?

这正是该种类型的例子。在这里,评价根本不可能超出从某种形式内部的相关力量或者范围中产生的术语。一部作品常常在这种意

义上是非常明显有力的,然而正是那种评价随后可能必然包括了一种更为严格的全面考虑。我正在拒绝的是缺少这两个定位过程中任意一个的那种评价观念——那种逐渐被作为批评概括表达出来的评价观念。如今它甚至已经脱离了它惯常附属于的历史模式。一篇文艺复兴时期的悼文将受到学生强烈的反对,只不过因为它的语言是陌生的、“不自然的”。那种批评是浅薄无知和自满的许可证。公正地说,对于实用批评而言,只要实用批评仍然是一种存在的力量,这就是它会憎恶的那种反应。然而如果你把“我的直接反应”上升为一种评价的标准,在原则的基础上就很难排除这样的反应——可以说你已经获得一种非常庞大、直接的……这是目前消费社会典型强调的观念——在其跨越历史的所有范围之内,人类生产的目的在于把前后相继的对象带到一个人面前,他具有消费者至高无上的权利检视它们,看看他是否喜欢它们。那种观念现在伪装成了一种知性活动。当然,这不是批评的全部历史,但是在我早些时候离析出的英语世界中的这种倾向内部,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必然性倾斜向浅薄琐碎的偏好,或者倾斜向以没有任何类型的评价为结果的技巧至上主义——对于文本的一种简单的技术上的改编。

在其关于形式主义的论点里,雅各布森和迪尼亚诺夫(Tynyanov)主张,当代范畴完全包括在一个既定时期里发挥作用的任何一部作品。因此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说内欧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不是一个当代小说家的时候,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当代性的,因为它们 在 20 世纪晚期的英国文化中继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便那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对于任何一种集中关注文学生产条件的文学研究方法来说,那似乎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作品的生命可以穿越它们的产生时刻;它们不仅产生于历史之中,而且超越时间获得了它们自己的历史,尽管这不一定是

一种连续的历史。根据这种考虑可以说,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19世纪几乎不存在,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文化中却具有一种非常有力的存在方式。这个世纪有效建立的文学研究的出现已经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难度,用你的术语来说,增加了古代部分的容量,这一部分被视为截然不同于当代文化内部的残余文化,并且常常以复杂的方式支持了残余文化形式以及其他文化形式的继续存在。你如何在你有关书面作品的理论中容纳这一现象呢?

毫无疑问,还原一部作品至其产生条件的方法可能在一种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得到了理解。澄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并不读莎士比亚,我们读的是有关莎士比亚的各种版本,这不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指涉这些书页被印刷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在一种非常实质性的意义上指涉文本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的再现。对于一位在每一个时期都不断被重新介绍和广泛阅读的经典作家,我毫无疑问会把他的生产条件视为包含了那种重新介绍的过程。由于他的作品被阅读和搬上舞台的非常多变的方式,莎士比亚是一个特别有力的例子。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存在着是一部发生史,这个莎士比亚截然不同于最初那个进行创新的作家个体。另一个例子是贺拉斯(Horace)著名的颂歌《快乐的人》,它在古典文化复兴的不同接替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重新介绍,显著的是,常常遗漏了最后一行诗句,因而就忽略了它的写作所处的社会情况以及这首颂歌的整个意义。当然,翻译尤其严重地造成了这一问题,正如我在通读易卜生不同版本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那样。产生条件因而总是包括了使一个文本成为当代性的条件,忘记这一点将会陷入一种纯粹关于起始条件的唯社会学论。一切保持文本流通的力量都在其产生条件之中。

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两难选择,引起它的是关于以往艺术的可以社会性地传达的评价与其他潜在评价之间的可能矛盾。通过

选取建筑而不是文学为例,我们或许能够更为清晰地聚焦于此。因为建筑在艺术当中的特殊性在于,与绘画或者写作不同,它的作品典型地涉及大量的财富和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剥削。对于大多数现在被视为精美的建筑,这一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不能完全包括其他形式的建筑。与文学或者绘画相比,交替的主流建筑风格更为密切和直接地与统治秩序的物质特权关联在一起。因而适当地说,《乡村与城市》中最为有力的段落之一不应该适用于田园诗,而应该适用于庄园本身。你写道:“赞美这些格外众多的庄园很流行:广阔的庄园,新古典主义住宅,它们如此密布于英国乡村。人们仍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经过,手持旅行指南,去看下一个和再下一个实例,去看建筑用石和家具。但是站在任何一个位置看看那片土地,作为劳动者对其进行彻底的思考,想象一下,为了以那种规模建立那么多的庄园,那种剥削和攫取必定是多么的漫长和多么的制度化。对比看看任何一个古代农庄通过一个实际存在的单一家庭无论如何持久地努力、以无数世代的劳动所设法达成的模样,然后回头看看这些不同的‘家庭’、这些制度的主人已经积聚了什么,傲慢地宣称了什么。看看这土地,然后看看这庄园,你看出的不仅仅是为了造成那种程度的差别、在如此漫长的期间必定存在着多少掠夺和欺诈,你还看出了野蛮的不成比例。在庄园旁边的劳动者的农场和村舍是如此狭小: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或者通过被留给他们的一份家产所实际建造的东西处于人类成就的通常范围之内。这些‘宏伟的’庄园所做的事情是打破那一范围,通过的是一种与对于他人真实的制度化剥削相符的意志行为。”^①这是非常感人的一段。在这里,与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的任何内容相比,在某种更为明显和切实的意义上,要求读者考虑现实生产条件的呼吁伴随巨大的力量奏效了。你正确地指出,这些生产条件不仅包

^① CC, pp. 105~106. ——原书注

括在经济上对土地的征用和对劳动力的剥削,还同样包括把统治、支配和差距铭刻于建筑本身的绝对比例和外形之中的那种文化意志。

如今在这本书的另一段里存在着与这一段的一个显著对比,那构成了它的姊妹篇。你引用了《序曲》中的诗行,在这首诗中,华兹华斯从威斯敏斯特大桥向外眺望,赞美“船舰、塔楼、穹顶、剧院和教堂”,“一切都在没有烟雾的天空中闪亮发光”。然后你说:“我已经一再感受到[同样的赞美冲动]:文明的宏伟建筑、会场、图书馆与剧院、塔楼与穹顶以及常常比这些更为令人感动的房屋、街道……我发现我并未说或者并未仅仅说‘那是你们的城市,你们资产阶级的丰碑,你们这种依然还不稳定的文明的高耸建筑物’;我同样说了,‘这不是人们已经如此频繁建造的宏伟建筑、不是在当时可能做到的一切吗?’”^①在这里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反应。然而事实上在历史中,城市中那些塔楼与穹顶的建筑师和资助人常常是设计并建造了乡村宅邸的同一群人。雷恩(Wren)、吉布斯(Gibbs)、豪克斯摩尔(Hawksmoor)、肯特(Kent)不但建造了教堂,还建造了乡间别墅;不但建造了图书馆、法庭或者大学校舍,还建造了郊区豪宅。为所有这些建筑物提供资金的财富同样榨取于那些直接建造的劳动者。塔楼和穹顶也建筑在一个更高的人类标准之上,同样被设计用于压制和威慑。你比较了巨大的庄园住宅与任何一个现实家庭凭一己之力可以建造的房屋之间的大小,其要点是绝对生动和真实的;但是一座大城市的宏伟建筑之所以激起人们的情感,同样只是因为很多人付出劳动去建造它们,他们处于强迫和剥削之下,有时要经历许多代人。你不会想到把圣保罗学院或者国王学院称作野蛮的。无论协调这两者可能如何困难,高高居上并进行支配的直接意图似乎一直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对美的平衡和秩序进行创造的能力。在你不同反应中的冲突完全说明了这种矛盾。一种唯物主

^① CC, pp. 5~6. ——原书注

义的审美理论难道不应该能够论述这一问题吗？

我认为最好承认这一矛盾。我当时在这两个例子里都是从强烈感受到的反应出发进行写作，结果确实引起了理论上的问题。通过在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之间做出区分，我可以走某些老路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我知道那样做存在着混乱，因为存在着私人建筑被转换为公共用途和某些公共建筑被转换为私人用途。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一方面在应用完全合理的与公共权力和公共享用相关的标准，另一方面则在应用完全合理的与个人权力相关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任意一方的影响？一个人能够以某种完全物质性的信息显现实际的分歧吗？我认为一个人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些标准。我希望我能说，一个人可以完全一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我对教堂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它在我身上确实真正引起了敬畏和崇敬，这种敬畏和崇敬同时又被某些战争荣耀、旗帜或者某些牌匾中的字词所打断，它们使我非常明白教堂的设置方式想要诱发什么类型的充满敬畏的崇敬。如果说我对于教堂的感受方式二者兼有，那么对于城堡，我的感受方式基本上始终只有一种。但是即使是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一次发现自己在赞美一座前诺曼底时期的威尔士城堡，认为它与构成它的巨石一样坚固，然后我突然认识到——天啊，我在说什么呢？而当我看到像哈莱奇或者加拿芬这样牢固建立的英国城堡的时候，我憎恶每一块精美的建筑石料。事实上，当你想起一座建筑，把它当做我们可以前去的某个地方，或者当做我们的敌人进入其中并从那里控制我们的地方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一个诺曼底人对于这些城堡可能有相反的评价。不过，努力最大限度地揭示与评价有关的事实仍将符合我的一般性立场，那将容许其他人脱离这种评价；但这种脱离因而是公开的，而且不是依据假定的范畴。

就庄园而言，一个人必须确信，他有能力以某种方式（在诗歌中的声响方面，瑞恰兹展示了应用这种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将建筑的纯粹

物理特征——比例特性、石料的性质、地理位置——不仅区分于其自身的目的和功能,而且同样区分于当你凝视它的时候你的眼睛完全意识到的内容:导致人们说这是一座美丽建筑的那种社会性冲动。我在回答的时候确实感到了自信,大部分庄园并不是美丽的住宅——你把它们看做美丽的住宅,这是一种向作为官邸的它们表示恭顺的方式。不过此后我对于其他显赫的建筑遇到了困难,例如帕台农神庙。因为在帕台农神庙中存在着某些性质,非常清晰地利用了同样的感官吸引力。当我把这个问题应用于对土地非常强烈的审美感受的时候,我发现甚至更为困难,这种困难对于土地甚至比对于建筑更为难以克服。我不完全理解这些审美感受,部分原因在于我在这种视觉辨别方面从未受过任何训练。在文学作品——我在其中能够做进一步的精确分析——的例子里,我认为我能够做一般性的说明,因为整个形式(例如歌颂英雄的诗歌,一种在我身上引起两种强烈冲突反应的特别有力的模式)有哪些目的,所以它具有这些审美特性。

你现在的表述逻辑可以被概述为一个你可能最初想要驳斥的命题:审美范畴必须保持独立于对一部作品的道德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反应,在两者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那是出现真正摩擦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吗?

那种紧张毫无疑问是出现这种困难的地方。我根本不想否认你称之为审美的那些经验。它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财富,是通常在没有任何其他考虑的情况下,以绝对的精确用来关注某人塑造一块石头或者发出一种音乐旋律的方式。对此进行否认将是对许多人类文化的抹杀,那将是一场笑剧。但是我认为,对于释放出那种反应和那种关注的情况、场合和信号,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特定的分析。我绝对不愿意承认任何预定类型的对象有一种不成形的优先权,或者认为所有这些信号都是同等有效的。我们需要一种非常复杂的关于场合和暗示的

类型学,虽然它不可避免是不完整的,但是我认为非常可行。因而,一个人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信号、暗示与实际上非常重要但不能放弃的其他体系发生冲突的场合与时机。至关紧要的是,我们要抵制把它们无条件地预设为一个保留领域,抵制针对在其他价值体系中取消这些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置于与其他价值体系的关联之中的那种极度严格的训练。在各种各样的评价中一个人无疑将会被发现说——我实际上确实发现这对我产生了影响,尽管我不喜欢这一事实。通过真正探索那种矛盾,我也许能发现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某种重要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现在所能说的。

你对恢复现实主义方案的致力唤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作品与卢卡契作品之间的联系。特里·伊格尔顿最近把你和他进行了比较。在你的文学立场和卢卡契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这包括你们各自对自然主义,甚至哲学现代主义的批判。与此同时,你们对20世纪作家的评价常常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同——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戏剧方面,你以完全异于卢卡契的方式称赞了布莱希特或者贝克特。对于这些相似与差异,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在现实主义小说范围之内,我感到在方法上与卢卡契非常接近,尽管当你归结它的时候,我们的说明并不相同。卢卡契把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倾向描述为戏剧主人公对不公正社会所造成的限制的发现,这虽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法国小说和某些俄国小说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小说之上。我觉得,假如我向他这样提出,他不会说:你在用完全不同的理论术语进行思考;而是会说:好吧,其他模式是什么呢?我们将会用同样的术语进行论证,但是我认为会达成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当我们面对20世纪作品的时候,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分歧。原因

在于,尽管难以用某种整体性的方式谈论卢卡契——他的立场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如此之大,但是卢卡契确实持有那种可以与文学模式进行比较的关于某种先在社会现实的概念——他的概念比我以前要强烈得多,而那正是我疏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此之久的主要原因。无论呈现一种多么复杂精密的形式,这一概念仍然是卢卡契思想的不变前提,当他对现代主义者进行评价的时候,那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一部出自乔伊斯或者卡夫卡的小说不是根据司汤达或者莫泊桑的小说就可以不言而喻地判断的。我认为,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这是某种马克思主义主流所困惑的地方。作为与那种小说相应的社会现实,它所能设想的全部就是某种被它描述为颓废的异化状态。即使现在当这些作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正被再次发现的时候,其依据也在于存在着由阶级分裂和现实社会中的冷漠构成的某种环境,这种社会要求新的小说形式。沿着那条道路前进是不可能有效的。它太消极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想当然地把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化了。

所以,对于某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我的解释和卢卡契的那些解释可能是非常相似的,这部小说与用其他方式可以观察到的(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决定而非预先存在的”一种说法)社会现实相比如何?——对于这种文学作品,这一问题似乎没有任何不妥。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并未造成必须澄清用其他方式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与预先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同。它们看上去几乎可以互换。然而一旦你向前推进到20世纪的小说,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理论分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从不关心在卢卡契所赋予的反动性历史意义上或者在那些正在抨击现实主义的人所限定的反动性历史意义上为现实主义辩护。我对现实主义的论点始终在于,它是对于现实的某种确定感知和对于相互关系的某种确定认识,而不是说它带有某种确定的构成模式或者具有某种与先在现实的第二顺序的关联。最终存在着那种重要的差异,它在19世纪现实主义的情况里恰巧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20世纪小说

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你把自己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理论立场描述为文化唯物主义。事实上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传统上经受的与其说是唯物主义的过剩,不如说是唯物主义的欠缺,因为在实践中,它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趋向于把与上层建筑相关的活动去物质化,通过比较那些与基础相关的活动而剥夺它们事实上的物质性。贯穿你自己的全部作品,你总是说出你所论述的任何一种交流实践的技术的、物理的、物质的条件。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一次包含了对这一强调的完全陈述,它现在雄辩地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例如你写道:“最经常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生产观念]压抑的是‘政治’的直接物质生产。然而任何统治阶级都投入相当一部分物质生产以建立一种政治秩序。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就像创造了它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一样必然是物质性的生产。从城堡、宫殿、教堂,直到监狱、作坊和学校;从战争武器到受到控制的媒体;任何统治阶级都以变化无常的方式但却始终物质性地生产出某种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些绝不是上层建筑的活动……这种过程的复杂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显著,它完全不适当地把‘生产’和‘工业’孤立于可以比较的对‘国防’、‘法律与秩序’、‘福利’、‘娱乐’和‘舆论’的物质生产。这种特指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未能把握社会和政治秩序生产的物质特征,同样,甚至更为显著地未能理解文化秩序生产的物质特征。因而,‘上层建筑’概念不是一种简化,而是一种逃避。”^①贯穿这本书,你拒绝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整个区分,谈到了同时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某种唯一的、不可分解的现实过程”。

^① ML, p. 93. ——原书注

对于理想主义地把文化解释为一个由无形观念和价值构成的领域,你强调了这种做法的危险,你还指出任何文化都是由传播和再现的现实物质过程构成的,在这些情况下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它因此“完全不适当地把‘生产’和‘工业’孤立于可以比较的对‘国防’、‘法律与秩序’、‘福利’、‘娱乐’和‘舆论’的物质生产”?我们早前批评了你的一种倾向,你没有看到因果关系等级在历史分析中的重要性,在历史分析中,能够离析那些具有较多容量以引起大规模社会变化的力量非但不是不适当的,而且还是绝对必须的;我们还指出,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你倾向于忽视这样的事实——经济生产为文化生产提供可能性所采取的方式并不严格对称于文化生产所对应经济生产的那种关系。你最近的强调在目前似乎产生了一个新的循环论证,其中所有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因素都是同等的,因为它们都是物质的。然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不管你是否喜欢,某些形式的事物比其他形式的事物更有物质效力。在你的例子中,你说政治秩序必然是一种对宫殿、教堂、监狱和学校的物质生产。但是建立政治秩序的当然不是这些建筑本身,而是统治秩序的官方代理人或者民间代理人,他们控制着这些建筑并规定了它们的功能。法庭或者监狱不是资本主义法制系统的必要场所——在紧急情况下,法庭进行露天宣判,犯人被监禁在船上或者旅馆里。而对于大型工厂和机器——工业经济的复合体来说,情况显然并非同样如此。在一场革命之后,监狱毫无困难地被转变成了学校,就像在古巴发生的那样,但是钢厂能够变成法庭吗?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表达:你谈到战争武器和受到控制的媒体,但是你忘了,它们依赖于基本的工业生产过程,是这一过程之后的产物。牢记这一点对于你应该没有任何困难,但是在你敏锐的论辩中它似乎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反对对构成社会总体的各种生产过程范围进行过分的分析性区分,认为这种区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存在着对这些生产过程范围的有害抽象并把关于它

们的抽象概念看做是具体的存在。但是,毕竟肯定有一些人相信,现实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分割开来的,所有属于经济的对象都处在一个区间里,所有那些与政治直接有关的对象处在另一个区间里,而那些与文化直接有关的对象则处在此外的又一个区间里。

通过与你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强调进行对比,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有两个重要段落,其含意似乎更为正确。有趣的是,其中一个段落是在《文化与社会》中,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相比,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部不那么唯物主义的作品。你批评瑞恰兹把文学视为生活训练基础的观念,说这种文学观念是卑微的,然后你写道:“伟大的文学实际上是丰富、解放和净化性的,但是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仅仅是一个读者,即使在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之前,他实际上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别的什么。”^①这里存在着你通常抵制的某种与优先性相关的观念。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讨论《还乡》中令人难忘的一段里评论道:“它也是这样一种过程,无论需要什么样的代价,文化与富裕逐渐被认可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并且扭曲地认可了在任何现实的历史中,后者将始终是第一位的选择。”^②在这里,你又一次承认了在其他方面你似乎不愿意承认的某种与物质的优先权相关的顺序。你愿意把这些句子接受为对于你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论点的修正吗?

这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我并未发现自己不同意你的批评,那意味着在我自己的表述中一定存在着错误,或者我一定是受到了误解。当时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完全把文化生产精神化了,另一种把它降低为第二位的,我当时是在试图说一些与两种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我的目标是要强调文化实践是物质生产的形式,

① CS, p. 245. ——原书注

② ENDL, p. 104. ——原书注

在这一点得到理解之前,不可能在这些文化实践的真实社会联系之中对它们进行思考——存在的永远只能是一种第二顺序的相互联系。不过,存在着无论何时何地都先于其他所有形式的物质生产形式,这当然是正确的。我非常乐于做出那种澄清——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一种让步。然后一个人必须要说的是,这些生产形式实际上是真正非常基础的;它们是食物的生产、住所的生产以及对食物生产工具和住所生产工具的生产——后者是一个延伸了的范围,但仍然与维持生命的绝对必需条件有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中这些是首要的生产活动,经典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巨大理论转变具有极为基础性的重要意义。然而如今常常从这种形式的活动不知不觉陷入了某种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结构,仿佛出现在当代工业或者农业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言而喻地与主要必需品相关的生产形式,与创作小说或者绘画是对立的。我认为,在对此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只是倾向于取消这一错误的强调。不过我当时的反应针对的是像“英国经济的关键是汽车工业”这种措辞的典型使用。在任何意义上汽车工业都不同于对食物、住所或者建筑材料的生产,不是维持人类生活的首要生产。它甚至不是对于移动性需要的首要解决方式,因为存在着较少具有社会性差别的其他运输形式。与此同时,在严格的工业生产本身内部,大量与社会身份有关、或者实际上与娱乐休闲有关的东西如今都被生产了出来。目前在这个地方历史性地论证我的问题将会好得多。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相比,马克思描述的经济更为直接地与满足(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未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相关。当百代公司生产唱片成为工业生产的时候,在别处写作音乐或者制造乐器的某个人反而至多处于生产的边缘,此时你必须了解这一点,整个关于活动分类的问题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接受某种普遍承认的分类,首要、次要和一般部门之间的工作分配现在也是没有先例的。正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与以前相比,如今维持人类全部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是工业产品中

更小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些必需品呈现出多样的形式：不同类型的食物、不同类型的住所等等；一旦你离开基本必需品的领域，根据我的意见，你就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进入到一个无可争辩的政治和文化领域，因为投资和产出是如此明显地由整个社会秩序的性质所决定。传统意义上基础生产的比例如今是如此之小，如果我们简单地保持经典定义，在当代经济，甚至在某些因果关系（我认为你在这个地方做出了极为有力的立论）方面，我们就可能严重地误导了我们自己。这既涉及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的修正，也涉及对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的修正，因为你所说的是：我应该从历史的观点考虑它，而你则是正确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你从历史的观点考虑它，你就不会完全像你陈述的那样做出你的表达。

这无疑有效地应对了一般性的异议。但是你可能仍然有过于量化地考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倾向——即使在那个方面，虽然不可否认在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从事传统意义上基础生产的工人数量与过去相比更为有限，但是你不应该忘记，国外看不见的生产者保证了这个社会的进口需要。无论如何，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性质上的重要性和生产的各自形式在任何一种既定经济内部的功能。当然，证实不同部门活动的相对因果效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为我们提供实验室里的那些实验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对中止每一种活动的影响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某种大致的因果等级指数。即使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根据反思也会承认，假如所有英国的小说家都停止写作一年，其结果将绝不等同于所有汽车工人停止劳动的社会秩序。举一个与你的论点更为相关的例子，信息传播产业——电视、广播和纸质媒体——的完全中断会严重影响任何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但是其影响与发生在码头、矿场或者发电站的重大罢工是不能相比的。在这些产业中的工人有能力瓦解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构，其生产

活动的重要性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只有在1974年矿工大罢工那样的时刻我们才能看出现实隐藏的因果关系,在以上的例子里,马克思将这种因果关系称为经济的决定。

请允许我对此表示赞同,然后再引进另一种考虑。不同类型的生产是作为社会需要的供应者从而成为有效的历史原因,提出一个有关它们的相对等级并进行必要的修正(因为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上说存在着修正的必要),对此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困难。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主要变形之一正是它对那种区分等级的糅合与混淆,它甚至一直在用不断变化着的人类历史术语这样做——它从来没有长久地得到过那种权利。我非常乐于承认有关因果等级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不愿意说,在这一等级的顶端是制造业,然后是政治机构或者大众传播手段,再然后在它们之下是哲学家或者小说家的文化活动。不是说始终不会存在那种类型的确定等级,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中日益存在着某种倾向,从第一等级中绝对必要的需要不知不觉地发展向并非必要的再生产条件,以对这一秩序或者在其内部维持生活的能力进行再生产。我们可以想象某些生产的崩溃,对于这些情况,人类可以通过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来做出某种非常困难的适应。这个等级大体上遵循这样一条线索,从符合基础物质需要的活动向下直到那些并非不能改变的活动——你至少可以否定性地说,如果不进行这些并非不能改变的活动,人类的生活并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毕竟,虽然电力或石油的中断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立刻会使生活难以忍受,但是历史上非常明显的是,我们的社会直到最近才拥有电力和石油,生活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得到维持。再举一个例子:据估计,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如今半数以上的就业人口涉及各种各样的信息处理问题。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一次信息罢工就会非常迅速地使人类生活在那种社会秩序中的维持陷入问题。在那种意义上,根据其基本需要,现代工业社会与过去不太具有生产性的社会相比更多地处于危险之中;理

论上它们可以在长期混乱之后走出这样的危机，但是伴随的苦难将会比得上饥荒或者飓风。

在这个意义上，生产等级本身是在一个文化秩序的内部被决定的，但是文化秩序绝不意味着可以分开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人们在文化秩序里想要知道的是生活最终关注的东西。在一个存在着由生产观点和娱乐构成主要产业的经济体中生活，从性质上不同于生活在一个由牧师或者作家教导其信仰的社会。在以斗争方式确定必需品的每一个地方，文化秩序都决定性地卷入其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个作为典型日常例子的关于社会民主的论点贯穿了资产阶级政见的整个传播，我们如今在每一次内阁竞选中都可以听到它，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必需品的生产，然后我们才能有你想要的一切其他事物，例如学校和医院。作为优先考虑被区分出来的那些事物绝不是比学校或者医院更为不可缺少的——任何人都需要被提醒这个事实，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达社会，医院都应该在第一类被放到维持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范畴，排在食物之后不太远。仍然被用资本主义术语描述的必需品生产实际上意指的是在狭隘意义上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因而根据某种对马克思主义过于简单化的歪曲，对它而言一切别的东西都是上层建筑的。我想要理解的是那些主导性的、新出现的和次要的词汇，它们被应用于描述生产过程整个范围在历史上的变化性质——尽管这种变化不是绝对性的。一旦我们从承认这些生产过程都是社会—物质性的出发，我认为我们就处在这样做的一个位置上了。我不是说我已经这样做了，我当然还没有。但是如果我能帮助引起做这件事，那将是一个贡献。

在讨论与决定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你批评了“决定只不过是限制”的观念，你指出，这事实上是根据某种假设的先于社会存在的个人而把社会看做一个约束系统的资产阶级观念。你强调决定不仅仅是限

制，“它也是压力”，然后你写道：“它始终也是一个伴随着非常强大的压力的建构过程，这些压力在政治、经济形式中和文化形式中都得到了显示，而且为了承担起‘建构’的全部分量，这些压力内化并成为‘个人的意志’。”^①“建构”这个词在这里真的被赋予其概念上的全部分量了吗？既然压力与限制一样是一个内在强加于某人的过程，那么个人/社会的对立并未通过在限制之上添加压力而被取代。所以，即使在这个修正的表述中通过“建构”这个词极其有力和恰当的粉饰，实际上的“建构”允诺在由压力和限制构成的概念中也没有实现。在这里是否遗留了个人/社会对立的残存因素？

那样说也许是公正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区分出两个层面是很重要的。在基本的层面上，早在个人能够充分意识到它们之前，各种局限与压力就出现了。这个层面形成了由那些个人构成的真实社会建构；内化不会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它与个人的实现从来都不是可以分离的——它已经发生了。不过，当这些限制和压力继续贯穿成人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在一个不同于建构性的层面上考虑限制和压力的问题。存在着一些形式，它们指引了或者由于它们的瓦解妨碍了某些发展，这些典型地被感受为限制或压力。保证限制或压力在数量上占决定中较大部分的某种改进很可能总是处于建构的层面，在这里谈论内化是误导性的，因为在你可以使社会因素分离于个人因素的地方谈论内化没有任何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然而到了某人成为一个自觉的个体，甚至有能力和自觉评估与他的自身建构有关的因素的时候，内化之门可能打开也可能关闭，压力可能得到发挥也可能受到抵制，限制可能遇到对抗也可能受到克服。我非常希望在一个并非建构性的层面上保持那种积极持续的过程，因为当前的各种理论倾向于扭曲决定概念，使其含义接近于对再生产过程的决定，

① ML, p. 87. ——原书注

其危险在于它们低估了成年人的那些实际存在的选择权——这些选择权不应该被简单地用个人的、唯意志论的措词加以考虑，而是应该更多地根据那些替代形式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加以考虑。

关于决定的任何一个概念在知性上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它必须具有某种确定的一致性、稳定性和严格性，不允许它向一种单凭经验的方法发展——尽管这种单凭经验的方法不断以一切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实践中必定会采取的方式得到了授权；另一方面，它必须能够说明在个人的生活中、在合乎自然规律的历史中、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客观可供选择的事实。在你的回答中，你似乎在用一种概括性的方式描述某种大概作为实证记录的个人经验，而非寻求一种理论性的定义以说明那种与选择、可供选择的办法或者错失的转机相关的经验。针对你对决定这一概念的表达方式，有人可能会提出图解式的意见（这种意见也许开始接合了有关这一知性问题的两条相互分歧的线索），决定实际上可以在极其可能的意义上得到解释，它不仅与再生产过程有关，而且与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总是一种矛盾的产物。

是的，我大体上同意。那正是我当时试图就“基础”的现实本质所给出的要点。

V. 政 治

1. 英国：1956～1978

1956年，由苏伊士入侵和匈牙利动乱导致的两场危机动摇了英国“左派”的政治结构。在一年之内，共产党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成员，伴随着第一次向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①的示威游行，核裁军运动开始了。这些事件之后出现了两份新型社会主义刊物——《新智者》和《高校与左派评论》。你与这些新兴事物的关系是什么？

在《文化与社会》完成之后和出版之前，通过彼此在牛津的共同朋友，我受邀到伦敦的“高校与左派评论俱乐部”进行演讲。在那个时期我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接触——当时我正住在哈斯汀，除了偶尔拜访在当地集会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之外，在我与共产党的联系中一直存在着一道鸿沟和党内的非正式对立。因此在伦敦与“高校与左派评论俱乐部”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处于那种群体之中了。这些集会得到良好参与、充满活力的集会，开启了完全崭新的讨论领域。在来自牛津、发起出版《高校与左派评论》的群体与经由匈牙利事件从共产党中出来、单独创立《新智者》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整整一代人的分歧。不过核裁军运动很快提

^① 奥尔德玛斯顿，位于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译者注

供了一场共同的运动。在那些早期的奥尔德玛斯顿示威游行中,我遇到很多经年未见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共产党背景的人,像是分离十多年的人们沿着各种各样的道路偶遇了。核裁军运动提供了那种聚焦的中心,人们当时突然更加接近了,包括当时正在兴起的年青一代。

当时我与这两代人相联系的悖谬处境是,按照年龄我属于那个已经离开共产党的群体,但在关注的东西方面,我实际上更为接近发起《高校与左派评论》的那个群体。《新智者》在我看来是一份更为坚实的刊物,通过一场运动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与争论涵盖的国际性范围而产生影响。它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情形的讨论、严肃的历史和哲学短文。《高校与左派评论》通常被认为是生动的,但分量较轻,然而对我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它致力于某些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生活方式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论争内部当时还不是非常显眼,包括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论争中。《高校与左派评论》的那些人倾向于把冷战时期的冲突视为一个过去的阶段。他们更多地把方向确定为英国迅速变化着的社会中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来自《新智者》的人们更为清楚整体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其理解与英国某些明显的情境变化不那么紧密。这是适合消费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类型出现的时期,与之相伴的是性质崭新的各种杂志、广告、电视节目和政治竞选活动。当时还不彻底的“新左派”文化的介入对资本主义新阶段勾勒了一种必要的新型分析轮廓。在其最佳状态下它也不是“文化主义”,它是一种对新的斗争形式的强调,实际上就是现在被普遍呼吁的“文化革命”(例如在鲁道夫·巴霍的例子中)。《文化与社会》在这些影响的共同增强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与此同时我自己常常感到,我宁可确保精力用于探索文化经验中的当前变化,而不是费力重复更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论点。当时我是以那种方式进行表达的。那时我可能说过,这是崭新的工作,与之相关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将会进入到当代政治之中,

而其他事情只不过是重新体验过去。不过凭借着后见之明的有利条件,我现在认为,重复过去的那种努力是必要的,而且这种努力没有得到贯彻的程度和另一种作风替代它的程度是一种缺陷,随后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当时我完全被吸引到了另一个方向,无论如何它非常接近我当时正在写作的主题。这不是说我那时认为跨越代沟建立联系是容易的,当时基本上是年青一代具有我的趣味,而较为年长的一代实际上更多地具有我的经验和风格。

对于通过这两者的融合所造成的前景,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没有卷入导致了《新智者》与《高校与左派评论》合并成《新左派评论》——它由前两份刊物的编辑们负责管理——的谈判。但是一旦合并的意见达成一致,我相当早就被引进到新评论的策划阶段之中。当这两个群体融合的时候,它们努力在一个宽泛的范围里争取大量左派人物,这些人物在其政见和经验方面是形形色色的。其结果是一个相当大的董事会,作为一份评论刊物的工作群体,与它可能做到的相比,它从一开始在公众面前就看似要更好一些。不过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意识:设法把已经被10年冷战经验所分裂的整整一代人聚集在一起。尽管如此,我感受到的是被聚集在一起的一代人,而不是真正走到一起的一代人。这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新评论的创立会议上,我记得我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说,说“左派”的两个传统——斯大林主义和费边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垮掉了,现在需要一个将会具有一种更为宽泛的政治观念的不同传统——一个“新左派”,尽管如此,“新左派”这个词不是始于这个群体内部,并且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对它感到不舒服。在同一会议的一个较早的演说中,爱德华·汤普森已经用某种新型大众运动的观点发言,说这种运动或许会彻底改变或者替代现存的工党。我说,任何人都期待这样,但是,如果在10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有二三十本关于当代英国(不是关于过去的

英国)的社会主义优秀著作和 100 期评论的话,我将不会非常满意(最近当第 100 期《新左派评论》问世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这些)。换句话说,我当时知道,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出版大量的新书并提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讨论,而且我当时认为,我们始终应该努力做的还是寻找某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运动机会。我现在认为,当时我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则是错误的。在评论的董事会产生的时候,它也是松散地负责协调许多俱乐部的活动,这些俱乐部不仅被视为进行讨论的论坛,还被视为一种新型政治运动的雏形。这种双重角色在董事会内部导致了大量争论。我的立场始终是:保持出版和讨论计划的运转需要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我指出,如果我们努力争取巨大的目标——一场政治运动的迅速具体化——我们可能就不能完成这一适度的目标。我认为我当时关于这一点是正确的。我的错误之处在于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文化和教育计划独自就可以使左派复兴或改变大众的观点,足以使工人运动的传统机制发生变化。就其本身而言,它与在这些俱乐部进行的尝试所包含的那些更为困难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啻合。不过要注意,你可能概括为这场论争中的另一方从来没有充分地面对这些情况。我尤其记得与爱德华·汤普森的讨论,他完全正确地为 1959~1961 年期间那场新运动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尽管他对于这些俱乐部有更为远大的想要实现的目标,它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清晰的意义上会作为一个政党的预备性组织。因此,即使强调重点的分歧在当时相当尖锐,这些也只是一个主旋律的各种变异。

你如何评价“新左派”在 1960~1962 年的经验?

刊物最初做得很好,吸引了许多作家。当时,在盖茨克尔(Gaitskell)领导下的工党右派看上去正在完全放弃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抵抗,而工党“左派”的定位预期则基于普遍贫穷的存在和老式的阶

级结构,看上去全然没有能力讨论这种新型的社会,唯一看来正在当代世界中提出社会主义论据而又不同于先前群体的是新“左派”——特别是较为年轻的一代,这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英国正在变化着的文化模式。这种意识所付出的代价是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中尚未发生变化的所有事物。人们普遍觉得,某些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属于一个过去的阶段,你可以穿过它们继续前进。其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本性低估。由于我们与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文化性变化所采取的手段非常接近,我们高估了通过文化上的变化作用于“左派”的可能性。我想,已经离开共产党的群体实际上并不更为接近地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就其继续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程度而言,与通常看到的相比,它当时正在构成更多的贡献。无论如何,这两种倾向都把新型的大众政治——示威游行和俱乐部——视为通向某种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动员的方式。你看看新“左派”提出的问题,那是核裁军问题和此后一系列范围的文化与社会公益事业问题,其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没有得到多少讨论的政治领域。我们对工党的态度尤其是错误的,它从来没有被充分认真地接受。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意识,既然它成为北约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它就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组织;在示威游行如此浩大、“左派俱乐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时候,这个过时的机构可以被遗弃、终止了。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核裁军运动似乎正在取得重大成功。人们已经在推测工党消失的日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样。因而1961年核裁军投票的逆转是作为一个令人惊讶的打击出现的。大家根本没有想到工党机器的力量,或者右派能够赖以在其内部为了争取胜利而组织起来的政治技能。示威游行开始衰落,由于最初乐观观点的消失,“新左派”创立的这份刊物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紧张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这份评论内部还存在着其他问题。在这份刊物开创的时候,斯图亚特·霍尔被任命为编辑,他创造了一种较为接近原来

《高校与左派评论》的刊物风格,与新的文化风格、新的视觉表现方式相联系,其语言风格不同于典型的“左派”期刊。董事会的许多人对此不满。我感到完全与他站在一起,因为我认为,即便我自己不一定喜欢每一期刊物,他正在努力出版的这种刊物起到了名副其实的作用。伴随着关于刊物方针的内部备忘录的不断散布,他的压力是巨大的。我认为,对于结果多多少少留给编辑独立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过董事会承担集体责任的清楚指示。他在极大的困难之下进行工作,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经常仅仅因此而得到责备——一种相当典型的“左派”处境。关于进行一场政治运动还是运营一份刊物,在董事会内部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此外存在着通常类型的关于刊物临时债务的普通问题。最终,斯图亚特与霍加特在新建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接受了一份工作,所以这份评论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了。一个由四位编辑构成的过渡群体接管了刊物,不久在他们与原董事会之间就出现了冲突,当时我发现自己在两个争斗的群体之间处于调停者的位置。一种新的刊物风格开始形成了,既然不存在一场运动的支持,就放弃运动的设想,全神贯注于基础性的智力工作。我更加可能接受这一方向,因为从开始我就主张教育计划的优先。但是我也是原董事会的成员,在原董事会里存在着对刊物新的界定的大量阻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行使法定版权的行动,以阻碍改样后的刊物以《新左派评论》命名。我首先寻求努力避免以董事会的名义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或声明,情况显然,如果董事会坚持它的权利,将不会有任何刊物存在,它将完全解体。因为新的编辑们只可能凭借由原有刊物名称所带来的良好关系发行刊物,原刊物仍然有其订阅和资源。我写信给我极为了解的原董事会中的董事们,说:“你们可能不喜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做这件事情,这是维持刊物的一个先决条件。”当时不是一个风格选择的问题,而是是否有“左派”刊物将会继续存在的问题。与《政治与文

学》那份刊物有关的经验已经使我感受到,如果它可以继续延续那么多年,我宁愿发生任何事情,甚至将我自己排除在刊物之外,也胜过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在同样的压力下,它完全不复存在了,以至于不再存在支持那种工作的任何刊物。如果《新左派评论》在1962年至1963年彻底失败——那是非常可能会发生的,无疑别的某种刊物会随后呈现——在1968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会有一些岁月的损失和沉默。我主要坚持的是一种生存策略。

1961年右翼在工党内部胜利之后不久,紧接着盖茨克尔的去世和威尔逊(Wilson)的继任,习惯上威尔逊被视为1963年工党中的“左派”。一年以后,选举出了一届工党政府。你对政治形势中这些迅速的变化持何态度?

在核裁军投票表决的逆转和导弹危机之后,核裁军运动受到了很大削弱。威尔逊在1963年成为工党领袖,带来了一种完全崭新的说服力语言风格,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核裁军运动支持者非常迅速地转变回到CLPs^①之中——回到他们所说的“新型”工党之中,奇怪的是,这竟发生在工党核心组织的力量通过核政策的逆转得到展示之后。我认为,最大的错误不是从1958年到1961年高估了一种替代性运动的可能性,而是听任再次接受随后从1962年到1964年的常规政治——与此相伴的是赞同性的关于工党的幻想。当然,我也同样拥有期待,希望下一届工党政府会在社会领域采取某些我们广泛认同的措施。我不指望它理解新的文化问题,但是至少我认为关于这些文化问题的对话将是可能的。本(Benn)或者詹妮·李(Jennie Lee)这样的人看起来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且对这些问题是开放的。然而被普遍遗忘的是以前的教训,不仅包括关于核裁军运动的经验教训,也包括关于

① CLPs,即选区工党。——译者注

1950年代早期工党内部左右之争的教训——在北约中的英美军事政治联盟和可能发生的本国社会经济优先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相互联结。当时,当许多社会主义者在1963年回到工党的时候,他们开始非常有说服力地谈论工党政府正在社会领域完成的所有改革,甚至还有他们可以解决某些新的文化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绝对致命的有关对外政策的遁词。我很高兴自己在当时所做的一件事情被记录了下来,我当时正在就美国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进行写作,确信工党的对外政策是非常危险、非常暧昧的。一旦工党政府就职,其后果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左派”政治组织方面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时期从来没有被直面或者被解决,当认为工党可以被撤在一边、因为游行示威和俱乐部会取代它的时候是这样;当认为有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回到工党并把它保持在正确路线之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一个错误。

你的立场暗含了对1950年代以后工党内部力量对比的判断。你对比万主义(Bevanism)和威尔逊本人从中脱颖而出的传统工党“左派”的观点是什么?

工党“左派”在1950年代代表了某些非常好的、被普遍接受的要求和立场。它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斗争,反对西方军事联盟的整个重建,首先是关于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即使具有某些盲目的爱国主义蕴涵,武装德国也使人感到不安。关于苏联,他们说了某些必要的话,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说那样的话是适当的。他们始终在产业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些斗争中有几次密切关联到铁路,所以我在那个方面与他们非常接近。他们赋予社会公益服务以高度的优先权,抨击混合经济的各种观点。然而与此同时在我看来,他们根本并不理解战后英国的各种变化。它们当时正在描述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萧条和灾难性贫困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其社会

主义强调的重点是一种再分配政治,然而当时需要的是一种可能解决工作问题本身的生产性社会主义。矿山或者铁路的国有化没有改变工作关系或者工人在国有产业内部的地位,它们只不过围绕实际上完全没有改变的、在其深处毫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增加了新的机构。矿工或者铁路员工很快发现,与以前一样,它们并不是“我们的矿山”或者“我们的铁路”。漫长的政治控制渠道通过工党政府得到延伸,但是当它们以那种方式延伸的时候,环境变化极少——实际上在某些情形中恶化了,正如矿山逐渐恶化了,铁路也逐渐恶化了。但这不是你能够在当时的工党“左派”中追踪到的主题。后来当人们开始只是把他们称作老一代“左派”的时候,我常常生气,因为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年轻人的修辞,10年或者15年之后,当人们自己无论以何种方式变老的时候,这种修辞就使其自身无效了。然而我认为,当时的工党“左派”在真正意义上是老一代“左派”,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革新,他们可以被用许多方式在谋略上击败。如果他们不是那样,1958年后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看上去不会如此重要。在比万主义1950年代早期的活动中,我广泛地认同它,但是我从来未能与工党“左派”建立现实的合作。具有代表性地,他们甚至不能理解一种较新的细微创举。我记得,当我进行讲演,要求由承租人对委员会的财产自主管理的时候,我在一个选区工党里受到了绝对的质疑;当我写信给《论坛报》,建议由我写一系列关于词汇的通俗文章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理解——后来这些文章变成了《关键词》。

你如何看待比万本人?

我从来不相信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原因是讽刺性的,一个威尔士人了解另一个威尔士人。他来自距我只有20英里远的地方。我从大约两岁开始,已经听过如此多次的那种威尔士的演说风格,所以我从来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者那样被打动。那是一种绝妙的

公众演说形式,总是假定一种共同的信念。我认为这样的信念产生于教堂,在教堂里你不必提供你是否应该信仰上帝的证据,每个人都那样做,所以你可能只是对于人情世故非常机敏,或者对于不公正的行为非常愤慨。但它不是一种适合严肃论点的风格,因为你的信念从一开始就被预先假定了,所以很难了解比万在核心处信仰什么。你看看他的书,他可能会对国会下院人为的古式氛围给出精彩的描述,但是他的政治哲学是极其靠不住的。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套强烈持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信念,源于独特的威尔士经验——具有这种经验的人们如此长期地在对变化的希望中和相对的孤立中团结起来,他们认为,他们其实只需吹响号角,四周的高墙就会倒塌。毕竟,如果可以通过空谈实现,威尔士可能在192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你可能会说,威尔士人如此久远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而没有任何必要通过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争辩。这是非常典型的比万风格。这样你就理解了这个公共医疗部门杰出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工党的都市议员——一个令人窒息的形象以及最终对氢弹问题模棱两可的人。所以,即使当比万正在领导具有某些公共影响的激进运动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认为他正在界定出当代英国社会的问题。当然,威尔逊是另一个问题,当比万被逐出影子内阁的时候,威尔逊把自己展示得非常清楚:被期待站在“左派”一方的威尔逊最后接管了他的位置。

第一任威尔逊政府组成于1964年10月。你已经说过,对于已经由“新左派”提出的文化问题,你期待来自工党政府某种程度的赞同回应。你自己的著作《传播》展示了一个针对主要媒体的全面改革规划,大概是测试其实际反应的一个例子。对于这本书的接受情况怎样?

《传播》源于一次关于当代出版的会谈,其动机是为了全国教师联合会以“大众文化与个人责任”为题的研讨会。企鹅出版社委托我根据这次会谈写一本关于传播的概要性著作。我利用这个机会把两个

目标结合起来,一是用我已经形成的适合成人教育课程的分析方法写一部教科书,二是为制度上的变化做一项有计划的工作,企图促进更为全面的“左派”政治运动。当时在传播领域基本上完全不存在任何党派政治。所以看上去这是一个提出具体建议的良好机会,结果我为三个阶段的变化设计出了非常详细的方案:目前的、过渡期的和长期的。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存在着某些可能性,至少第一个方案也许会被工党汲取,不过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在传播领域展开一种新型的“左派”政治——既是建设性的,又是批判性的。左派对一切事情的答复都是公共所有权,但是没有任何人曾经解决,在一个像这样敏感的领域里公共所有权将意味着什么。考虑到由国家所控制的媒体的借鉴,官僚式垄断的前景被恰当地忧虑为只是从煎锅中跳入火里。在现有资本主义媒体工作着的人们当中,其结果将导致顺从地接受。我的建议的实质在于,基本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应该与其使用权向自我经营团体的租赁结合起来,以保证媒体风格与政治观点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并确保反对官僚化的控制。在从新闻出版业一直到广播设备、电影的全部领域,这一原则都是完全可行的。它代表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方针。批评家们随后的反应是非常具有敌意的。《传播》被广泛、愤怒地批评为一个适合于文化国有化的方案,无论如何伪装——因为它提倡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责任而非更多的控制——都更加危险。这本书受到来自“右派”非常尖锐的对待。

自从你首次写完之后,《传播》已经经历了三个新版本,它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这既体现在它对短期目标、过渡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全面表达——这种表达在支持革命的“左派”纲领文本里是非常罕见的,也体现在它开拓性地进入到与文化组织相关的特定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它提出的问题或许迄今只有一次曾经在历史上被斗争争取过——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它的

观念似乎与布拉格之春直接相关。你所描述的英国右派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工党内部的反应是什么呢？

具有讽刺性的是，右派惊恐和敌对的理由之一在于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工党政府就职——这在1963年看上去是即将到来的——它将会受到像这样的观念的引导。当工党赢得大选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喜剧性的插曲：《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特别文章，名为“新秩序”，一排面孔跨过页面顶部，包括汤森（Townsend）、霍加特、艾贝尔·史密斯（Abel-Smith）和其他人，还有我本人。据推测这些人将向工党大臣们提供理性的秩序。事实上，在1960年代工党政府执政的整个6年里，我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工党政府或者工党组织的任何一次咨询，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私下的还是公开的，也没有受过任何一次邀请去委员会或者参加会议，一次机会也没有。另一方面，依据一个文职官员透露的私下消息，霍加特、我，还有音乐家协会不得不反对班尼特（Bennett）关于对商业广播站建立报告约束的一个提案。开放大学把我对传播和成人教育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事情上，对我没有任何咨询——不管什么样的。我非常强烈地支持开放大学的想法，但是我也认为它可以结合对成人教育的改造。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成人教育已经陷入了新的困难。在以电视、广播和函授课程为手段的教育和已经被工人教育协会很好地发展了的由教师辅导的课程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我确信，针对其右派敌人，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想要推动实现已经准备好的关于开放大学的想法。但是詹妮·李后来在《守卫者》的一次宴会上（我遇到她的唯一一次）告诉我，作为对此负责的部长，她决定绕开老式的成人教育，建立一所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像是传统类型的大学，包括那些“附属品”。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甚至在根本性的创意之处也被同化了，开放大学仍然没有任何适当建立的辅导教师机构，也完全没有我们从前的教育民主。

你当时对工党政府可能的对外政策几乎不抱希望,并且怀有许多恐惧。威尔逊政府就职之后不久,1965年美国在与工党政府的勾结下断然升级了越南战争。你如何看待这一举动?

哈斯汀是一个外省小城,不存在任何像牛津或者剑桥这种中心的政治活动范围,当我于1961年迁往剑桥的时候,我很快就比在哈斯汀更多地卷入到直接政治之中。我在剑桥的最初两三年里,一直到与首届工党政府选举交叠的期间,在剑桥存在着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性“左派”。因此我最初是通过这儿的“左派”团体卷入越南问题的。1965年,我们很早就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下议院就这一问题提出抗议,那里的氛围是非常有启迪性的。谢利·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完全不愿谈论这个问题,我是在我向费边社团讲演的时候相识的。斯坦·纽文斯(Stan Newens)开始就莫边府和吴廷琰^①向我们讲解,其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地低于那些到达过越南的人,仿佛我们对越南一无所知。在议会中产生的观念——人们来关注你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为了听你讲述你所前往的地方——似乎甚至已经控制了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下院议员。我站了起来,争论说,他不应该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想要讨论应该做些该死的什么事情来阻止工党政府支持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发生在少数派内阁时期,如果希望的话,“左派”下院议员们本来是可能在越南问题上向内阁施加巨大压力的,因为工党政府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投票。对于他们而言,围绕像越南这样的问题冒扳倒内阁的危险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更加关注使这个法案或者那个法案通过下院,他们不能理解与美国的结盟正在决定着工党政府的根本政治属性。

所以我后来加入了越南团结运动(the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在反战运动中,有一段时间在结束美国干涉的号召与简

^① 吴廷琰,1901~1963年,南越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单正确的方针——以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团结和胜利为结果——之间存在着冲突。然而这是一个不同于核裁军运动时期的世界，那时候人们反对的是假想的事实，而非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对越南革命的支持在“左派”一方引起了更为猛烈、更为富有战斗性的运动。尽管我始终对美国社会具有友好的情感，但是由于越南战争的原因，在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拒绝接受邀请去美国。

在其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和文化政策的无能为力显示之后，你对工党政府的态度是如何发展的？

从1964年到1966年，我在剑桥熟悉的大部分“左派”人士都抱怨首届威尔逊政府，不过他们说，由于它在议会中的微弱多数，它被阻止做它想做的事情。此后，1966年3月的选举为工党提供了100个席位的多数。发生什么了呢？在三个月之内，威尔逊在电视上尽其所能破坏海员大罢工，公然把他们的领导者抨击为一个具有政治动机的小团体。没有任何人从内阁辞职——这非常彻底地揭示工党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一个月之后出现了7月的英镑危机，如果这恰好是“左派”政府的一个阴影的话，当时威尔逊的辩才本来可以毫无疑问地确认出某些具有政治动机的小团体——但是没有，出现的是通货紧缩和社会公益服务的削减以支持汇率。观察到这两次关联的表演，我得出结论，这是这条道路的尽头了。我决定离开工党并写一部“宣言”，非常清楚地声明工党不再仅仅是一个不适当的社会主义代理人，它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衍过程中还是一个积极的合作者。

那是在7月发生的事情。8月份，在伦敦偶然有一次集会邀请在最初的新“左派”瓦解之后彼此失去联系的社会主义者。我去参加了这次集会并提出关于宣言的想法。关于由谁主笔这个宣言存在着大量的讨论，一些年轻人在我和爱德华·汤普森之间进行了非常刻意的调解，因为我们在《新左派评论》的改革期间曾经有过分歧。最终，斯

图亚特·霍尔、爱德华·汤普森和我被指定为共同主笔。那就是《五一宣言》的缘起。

《宣言》事实上是怎样写成的？

我自己差不多写了1967年版的全部，不过在那份草稿的最后阶段，在许多广泛出席的会议上（那像是再次重新组成了早先的“新左派董事会”）存在着得到非常良好支持的讨论。后来在我们自己印刷的1967年版问世之后，企鹅出版社建议出版一个平装本。这次我被安排为主笔，但是与第一版相比，尽管爱德华和斯图亚特不是正式的主笔，实际上他们为第二版《宣言》贡献了更多的内容。几位新人进来写第二版的某些部分：一群人常常聚在这里在周末工作，起草不同的章节。后来我终于把所有这些编成一个单一的文本，就像一项重写的工作一样。最终的各章在最后一刻由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家里完成，以赶在1968年5月出版这部《宣言》。

《宣言》被设计成一次全国层面的政治介入，从中产生的组织观念是什么？

我们希望《宣言》会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的讨论，激励创立“左派俱乐部”论坛，人们可以从中开始形成政治辩论和政治行动的实际公共中心，同时也不用放弃他们自己在现存政治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在那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并非极其不同于1959~1961年的观点。最初建立了相当多这样的论坛。当然，与1950年代晚期许多人都正在“左派”中寻找家园相比，这时在英国存在着整个一系列相当充分地得到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体。《宣言》的原则在于，人们应给能够加入论坛而不必与任何其他组织决裂。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念，因为任何意图成为大量其他团体共同成分的形式都容易被理解为实际上想要以其自身替代其他团体。因此我们决定称其为全国大会：我们邀请我

们所知道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筹备委员会来组织这次大会，大会的目标是赋予这场运动更为全国性的实力，并对工党政府日益增长的右倾倾向发动一场更为广泛和更为有力的抵制——工党政府当时刚刚发行了它自己的“中期宣言”，那看起来是对我们的“宣言”的一次反击。我们得到了来自不同组织和个人代表对筹备委员会的广大范围参与。大会本身是一个艰难的场所，因为各种团体之间的暗斗是非常激烈的，唯一遵守开始时建立的所有章程的人是共产党的代表们。不过大会也是充满争论和生机的。争论典型地围绕着与相当遥远的过去——通常是 1920 年代中期——相关的问题。关于英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和像越南这样的重大国际问题，存在着共同的阵线。尽管有这些斗争，一份实质性的文件确实在大会中形成了——一系列比《宣言》本身更有针对性的政治观点，还有号召所有组织的代表成员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建立“左派”团体。伦敦的筹备委员会与来自各个团体的全国代表平起平坐，这些团体将会受到它的协调。

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延续的呢？大多数主要的社会主义团体向进行协调的委员会派出代表——尽管是不定期的，而且大量新的地方团体被建立起来。存在着真正的团结以反对工党政府的工会立法，反对鲍威尔主义^①的出现，反对越南战争。然而 1970 年大选随后一开始，就发现了在政治观点和政治策略上根深蒂固的持久分歧。一旦委员会不得不讨论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的方针，你遇到的反应范围就会从“无论可能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必须集合在工党背后，因为我们必须阻止保守党上台”，到对工党的较为有条件的支持，一直到我所享有的这样的立场——我们实际上应该反对工党。我所属的那种倾向主张，我们应该尝试在 1970 年的大选中竞选“左派”联盟的候选人。立

^① 鲍威尔主义，指 20 世纪英国保守党议员鲍威尔鼓吹的限制或终止有色人种向英国移民等政治和经济主张。——译者注

即出现了对这一主张的议论,先前合作的工党“左派”人士很快退出了,抨击工党政府但是坚持必须为它的大选投票的社会主义团体也离开了委员会,而且重要的是,经常比它应该做到的更多地一直对此付出沉重劳动的共产党也这样做了——即便它还致力于提供它自己的候选人。当他们看到这种不同的方针出现的时候,三方都彻底离开了,所以委员会分裂成四条路线,从未再次聚集起来。涉及选举方法——是否允许委员会对工党“左派”进行选举干涉,一场在相当范围内设法维持“左派”团结的运动分裂了。一个共同行动的策略可以挺过任何事情,一场大选除外。

五月造反运动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与《宣言》在英国的发行是在同一个月。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认为法国的“五月事件”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并且觉得与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当时正在致力于《宣言》的那些人始终在这里和巴黎之间往返。我觉得这是同类运动的一种不同表现。工人学生的联合与我们当时正在其中逐渐推行的观点是相似的。工党政府当时正在通过它的反工会立法;看上去存在着一个良好的机会,在当时可能把工党政府当做敌人理解的工人阶级与从1950年代晚期一直在增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结合点。与我们已经预见到发生在英国的任何事件相比,法国运动的爆发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范围内,但它处于同样的维度。当然,即使在英国也存在着当年10月关于越南的非常巨大的示威。因此五月造反运动既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又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已经预见到的事情作为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唯一有效的社会主义回应发生的时候:好像并不是没有人谈论过革命。人们在1917年左右一定感受到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场运动持续得尽可能地长。不过同样,当它后来完全结束的时候,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这场危

机中挣脱的方式也是非常意义重大的,它是通过诉诸选举(这展现了“左派”被毫不费力地置换为混乱的政党)和不仅作为秩序被重建而且作为民主被重建的选举过程。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来自那一重要事件的教训。

保守党获得英国 1970 年的大选胜利,在希斯(Heath)政府领导下开始了动荡的 4 年。你对 1970 年代早期新的政治危机的反应是什么?

一直到由 1973 年和 1974 年的矿工大罢工构成高潮的整个一系列斗争是对现实阶级政治的一次回归。保守党政府统治下真正大规模社会主义斗争状态的再次出现在我看来正好确认了我对工党的评估:一旦其目的在于避免一切现实阶级斗争的对于阶级力量的操纵不再有效,形势就会变得更加具有对抗性和爆发性。不过那种情况反过来又允许工党再次重复 1960 年代的事件模式了。我在 1971 年为《国家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预言在野的工党为了下一次大选,将会再次以一种温和的激进宣言采取“左倾”的姿态,而且将会像在 1964 年那样在重新聚集“左派”的伪装下再次胜选,然后会再一次实施右翼政策,为下一任保守党政府铺平道路——因此我们将会只不过再一次经历结果没有任何重大差异的 10 年。通过《宣言》努力真正重新聚集“左派”的失败在政治上对我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不再参与的一件事情就是重演 1960 年代的历史。

在英国社会自战后经历的最为公开的两年阶级斗争之后,1974 年 3 月的大选宣布开始,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尝试,以重复已经在法国发生了的同样操作过程。一个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在矿工投票之后做出了非常意义深长的评论:“他们已经投了他们的票,现在我们要投我们的票了。”那就是事情如何被规划的——利用选举挫败罢工。在那种形势下,保守党政府通过战胜集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而重新上台执政将

是灾难性的。有必要做一切事情阻止那种情况。当时甚至不存在曾经在1970年存在过的最小限度的独立干预基础,所以我投了工党的选票,并且在他们的某些集会上发了言。然而我发言的题目却是“在周四推选他们,在周五与他们斗争”——那是我唯一准备采取的立场,并且的确是在周五与他们进行了斗争,而不是在一年之后。在工党赢得大选的时候,我对其角色的整个政治分析非常迅速地得到了证实。因为极为显著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内部对秩序的彻底回归。通过重新开始的工党统治,英国社会曾经经历过的这场由于对保守党统治的斗争而引起的非常重大的危机迅速地被遏制和平息了。从那时起情况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了,对于英国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转,一个我所命名的后社会民主政党是绝对必需的,在这样的时期里,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运动要求工人阶级的重大中立。我认为自1966年之后把工党作为一个社会民主政党谈论一直是错误的。

你借助于后社会民主政党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直到1948年和1949年,英国工党还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在此意义上它并不试图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通过阶级力量和阶级统治中的决定性变化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它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之上确立某些社会优先权,例如公共医疗服务。公共医疗服务不是被看做为工业供给健康劳动力的制度,也不是被看做来自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而是被看做与一个凌驾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上的社会目标相关的主张。经典的社会民主立场在托尼(Tawney)的发言里得到了表达,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截然不同。托尼说,没有任何社会贫困到不能拥有公正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任何社会富裕到能够无需它的存在——换句话说,主张社会需要和社会公正,而非仅仅关注边际产品的分配。那种传统如今实际上已经自工党那里消失,从大约1966年以后,用这些社会民主的措词为工党的计划辩护就

是不可能的了。意味深长的是,工党领导人甚至已经停止了以那种方式谈论改革。他们现在提议的改革完全是计划用来使资本主义经济合理化和人性化,即使调整剩余产品的分配,也要接受其投资和消费的优先性。如今从来没有严肃地提出对于高于一切的社会效用和社会需要的主张,这就是从前作为一个社会民主政党与现在作为一个后社会民主政党或者非社会民主政党之间的分界线。

你对工党的历史叙述难道不是有问题的吗? 毕竟,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因素在工党 1945 年的规划和实施中是非常明显的,其规划实质上承袭于战争期间在国家机器中赢得大量影响的贝弗里奇和技术专家统治论者。即使在 1978 年令人遗憾的工党中,仍然存在着与之相当的因素,你将其描述为某种适当的社会民主方案;工党始终设想其社会改革的资金提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在今天,卡拉汉(Callaghan)不是也在指出通过北海石油巨大红利实现的经济恢复将会再次为生活标准曲线的向上恢复和社会公益服务的延伸提供基础吗? 在你对工党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蜕化过程的描述中所缺少的是它运作于其中的经济环境的非常剧烈的变化。似乎可以说,像其他社会民主政党一样,工党仍然是一个矛盾的组合,在其内部,某种残留的社会改革方案已经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历史性地不可分的了,而且在那两个目标的分布中决定了这些变化的是最终分析中的国内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环境。这样说是否更准确呢?

我认为这是蜕化的原因,毫无疑问。工党发现,你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拥有社会民主,尤其是在一个二流的、受到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差不多它所有的意识形态转变可能都源自当它被展示在英国主导政治派系面前时的连续危机——他们一直在对于他们过于巨大而无法控制的势力之内进行活动。在工党内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过对目标的进一步保留,这些目标是值得努力的,但是在当时由于国际

约束而不可能实现。意识形态中那些转变的总和迄今已经改变了工党内部的力量平衡。“左派”自己的计划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更多的公共介入或者公共参与。

然而工党保持着一个社会民主组织的结构特征,在其内部,有组织的工人在政党的基础上保持着全国层面的巨大权力。与你在谈论中的暗示相比,它似乎保持着一种更为柔韧的政治形式以及对于工人阶级相应更大的当下可信度。如果工党已经蜕化到你所声称的那种程度,那不是等于说工人阶级的很大部分当时处在正要与其政治决裂的时候吗?

但是,在哪个方向的决裂?少数工人阶级一直在向左发展,远离工党,如今已经有10年到15年之久了。另一方面,伴随着过去10年中工业活动的增长。同样似乎已经存在着工人阶级重要区域政治觉悟的下降。如今存在着某些斗争模式,对于它们而言,美国工团主义的经验可能与英国工人运动的过去一样是相关的。存在着一种富有战斗性的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经典意义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然而它却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一部分——一个缺少任何一种广泛政治维度的议价过程。一个比较性的例子是医院最近的医疗顾问大罢工,除了其阶级归属之外,在所有的特征上都与传统的工资斗争相似,不过在它与当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联系方面却根本不同。在产业工人阶级自身内部,如今可能存在着一种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室内静坐或者罢工,以阻止被一致决定由美国资本家接管的某个特定工厂被关闭。设备制造者可能因为工资差别而罢工,在很大程度上像医疗顾问一样用同样明了的措词说服他人。在像这样的例子里,工人不再将马克思主义者自视的阶级历史使命付诸行动或者想要付诸行动,也就是说,不再对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施加如此深远的压力以改变它们。当然,由于更深的

制度矛盾,这些行动仍然可能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各种目标和动机,但是当人们开始将这些目标和动机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使这一制度陷入危机。不过,这里涉及一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当这样一种危机发生的时候,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发生的事情。

目前的运动不是全都沿着一个方向。矿工关于生产率协议的最近投票是一个相反行为模式的重要例子,它否决了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你是在一个富裕的地区,你应该投票支持自己的利益,不要管那些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较为贫穷地区的人们的不幸。威尔士的矿工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给工资赋予这样一种超越所有其他考虑的优先性,至少是要驱使人们忘我地工作以得到他们的奖金,这伴随着对自己和他人的更多意外风险,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社会提议。那是完全相反的反应。如果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动作为经济上的斗争归类在一起,我认为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问题。毕竟,没有任何人比一个股票经纪人在寻求他的暴利时更富有战斗性了。战斗性的行动不必然是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因为整个职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手段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民主性的了。在富有战斗性的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和富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后者的核心必然包括一场政治运动,一个改造社会的主要战略目标,当然,在中间过程中存在着所有这些作用,历史中经常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一场罢工始于反对无法忍受的环境或者争取更多的薪水,与此同时并没有考虑社会中比此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客观上却成为一个质疑整个阶级制度的行动——阶级制度成为下一个必须质疑的问题。在真正富有战斗性的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下不存在任何其他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的佣金。

你是说这种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形式正在英国工人运动当中成为支配性的形式吗?

不是,我认为它仍然处在博弈之中。毕竟工人阶级在1973年至1974年对矿工的支持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了对于社会主义绝对必要的支持性力量和创造性手段。不存在任何有关抹杀那种集体行动潜能的问题。当集体目标已经明确被取代的时候,你不太可能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达到它。不过依照领导核心正在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无论如何,去政治化的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将依赖于英国政治秩序的整个结构是否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因为它的发展与英国两党制令人窒息的独特机制是密切关联的。英国资本主义步出每一次危机的典型途径都是主要政党的轮流执政;在其他任意一种重要选举形式缺席的条件下,只要那些政党保持着它们的凝聚,这一轮流执政的方法就可以多年连续地引发并平息不断的危机。政治联盟在这个国家不是固定的,它们通过投票制度水到渠成地得到实现,因此两大政党实际上甚至不必就它们的政策进行磋商——它们为了大选草拟一个政策,但是一旦当权,他们就为所欲为。这是英国政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性,使它有别于同样面对通过选举方法调节根本性社会冲突问题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社会。

在我看来正在从相反目的出发对那一制度施加压力的有两场运动,这也是我支持这两场运动的主要原因,这两场运动是威尔士、苏格兰的民族运动和以统一的欧洲为目标的国际运动。例如在战后的威尔士,对于工党“左派”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把另一种政治倾向引入到平衡之中。与此同时,就英国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被整合到欧洲选举过程之内的程度而言,一旦我们超越非常特殊的英国情形及其奇怪的选举限制,必须作为一种设想开始通过极少的磋商(这种磋商在这个国家里被完全阻塞了)在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缔结其他可供选择的联盟。尽管我不同意汤姆·奈恩的所有论点,我确信他是正确的,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国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威胁,而且如果它们夺走

工党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两个传统大本营,就可能在工党内部促成一场危机。关于把英国政治搬到更为宽广的欧洲舞台上的积极影响,我认为他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当然,两种变化在其自身之内都是不充分的——我们仍将在英国的核心地区需要一场适当的“左派”运动。不过当你开始对工党最猛烈地进行谴责的时候(那是一个令人深为气馁的结论),看到其他运动和其他介入类型的出现是某种补偿,它们可能把这一受到特别操纵的制度置于危险之中,并且可能甚至开始打破这种制度。

对于 1980 年代英国政治中的“左派”,你将如何总结自己的大致观点呢?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活动的意外结果一样,如果在投票制度中存在某种变化,对“左派”策略的整个讨论将会值得注目地发生改变。因为比例代表制会使它更加貌似真实地建立一个有能力认真介入大选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社会主义联盟。既有的选举制度用任何措辞都是站不住脚的,政治上的当权派对改革选举制度的反对程度预示了他们多么害怕:如果两党的垄断终结,游戏规则将会被改变。极为重要的是,“左派”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变化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明显好处,绝对不要介意自由主义者对它的任何要求。过去,英国“左派”在传统上采取了相反的观点——在投票表决上工人阶级应当没有任何分裂,必须统一起来以达成一个工党政府。如今那种观点是一个时代错误。比例代表制作为一种投票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是更为可取的,作为一条实现工党“左派”重要政治存在的道路,它在策略上也是适当的,能够在背后向工党自身施加压力。在意大利,即使相应的政党是小规模的,它们的存在在政治制度之内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同一范围内部而不是在另一个范围之内与共产党中的“左派”相应。只要有一个可以察觉得到的与其“左派”相应的力量,不仅从事议会之外

的反对或者认识上的反对,而且正好涉及它自己的选区,在全国层面上意大利共产党本身的路线就会受到影响。

更具普遍性的是,英国社会的稳定性如今正在逐渐消失;事实上,在我看来,动荡的速度现在非常快。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应该是极为令人鼓舞的,因为只有极端的动荡才会提供新兴力量从中出现的可能性。某些看似正在解开英国僵局的发展是受欢迎的;无论苏格兰、威尔士或者欧共体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将是一种积极的变化。然而存在着将会伴随某种大量苦难的其他动荡进程。整个种族主义现象将会继续破坏英国的城市生活,传播暴力和混乱,因为态度变得强硬了,阵线划得更为清晰,某些不公平的妥协出现了破裂。另外,在所有的动荡性力量中,一旦公众认识到失业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主要的动荡性力量当然将会是严重失业的持续。在任何一种切实可行的资本主义观点之内,任何恢复终身雇佣举措的不可能性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增长的迷失和苦难;这种可能性甚至在十分迅速地扩大,实际上,即使社会主义者也将不得不停止用资本主义的终身雇佣范畴进行思考,尝试超越它提出一个困难的替代性概念:适当的和公平的生活资料。我认为,这一前景将是对社会主义者勇气的一个巨大考验。因为,在每一个社会主义者身上都必定存在着某种东西来自于同样的价值标准,涉及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渴望,是渴望一场导致社会主义的革命,而非仅仅渴望一场革命。一场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正好不断地引向妥协、调整、没有太多动乱和苦难的得过且过,是资本主义政党利用的由人民的渴望所构成的巨大资源。或许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直到一个人认识到作为历史客体的人民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才能够理解这种渴望的深刻要甚于寻求平息无法忍受的矛盾以保持现有制度的那些政党和机构的意识形态影响。只有当人们理解了这些矛盾的代价甚至比终结这些矛盾的代价更加无法忍受,他们才会获得勇气自始至终地参加一致的社会主义政治,

理解到动荡和苦难不是由那些为了终结产生它们的这个制度而组织起来的人所引起的。目前，“左派”摆脱它在英国边缘处境的客观条件正在日渐增长。但是我认为，正在阻碍英国工人运动重要部分的首先是这种情绪——善良的人民由于对变化结果的畏缩而导致的犹豫不决。对于你如此憎恨的社会制度的分裂，在 17 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但是随后兴高采烈的程度就逐渐减小到决定性的可怕程度，认识到革命性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将会是什么，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放弃了革命，完全向右转了，在平静生活的借口下满足于一切事物，明智地放弃了改变世界的难事。然而，我认为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那些人，因为他们在工党中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如果你不能从工党中争取他们，在英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未来。

2. 《奥威尔》

自1956年以来,你的政治作品采取了大量不同的形式。在讨论你对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政治重大问题所持立场的大致演变之前,我们想通过提问你一些问题开始这次访谈,这些问题与那些直面冷战问题和东方革命问题的文本有关。首先,我们可否从你写于1970年代早期的关于奥威尔的研究开始?这是一部具有非常强大吸引力的作品,与你写过的任何一部其他作品相比,它可能更为紧密地把“政治”和“文学”结合在了一起。它同样也呈现了你的政治作品范围的重要延伸,因为在这本书中你第一次把与帝国和帝国主义有关的事实完全作为核心重新统一到你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社会的意象之中。它们在你别的作品里仅仅出现在边缘地带,但是在《奥威尔》这本书里,它们以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完全转移到了描述的中心。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在1950年代的英国,沿着你前进的每一条道路,奥威尔的形象似乎都在那里静候。如果你尝试发展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分析,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想要记录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参与了对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论证,一个巨大膨胀的奥威尔形象在那里向你发出回头的警告。直到1960年代晚期,报纸上的政治社论还会经常提醒较为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阅读奥威尔,看看他们全部的主张会通向何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错误的,奥威尔的历史在我看来更为复杂和矛盾。尽管如此,奥威尔的许多作品在总体上是明显反社会主义的,而不仅仅是关于特定问题,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社会主义影响。我从1960年代早期就一直想要写一部简短的关于奥威尔的一般性著作,适合那一确切形式的时机显现是在1960年代结束的

时候。我对这本书最满意的部分是尝试阐释有关朴素的奥威尔散文风格这一特定问题,那种风格作为一种充分超越文学的惯用表现手法曾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已经成为一种记者报道格式和电视风格。我和我的现代主义者朋友对任何看似如此自然的东西共同具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有一章是我绝不会漏写的一章,在其中我讨论了对于一个名为奥威尔的人物的创造,这个人物完全不同于名为奥威尔的那个作家——它是对于一个普通人的成功扮演,这个普通人以一种没有任何中介的方式跌撞入经验之中,并说出了与这种经验有关的真相。

许多资产阶级读者本来会认为你对奥威尔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令人反感,甚至缺乏应有的尊敬。它必定代表了或许是唯一来自“左派”对奥威尔的原则性批判。然而最后你好像相当轻率地宽恕了奥威尔,给予他了你自己的证据似乎并未得到证实的某种豁免。这本书的总体论点是要提出,奥威尔的作品总体影响基本上是非常反动的,这既表现在他在冷战时期助长释放的十分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方面,也(可能更多地)表现在他在战时和战后的英国所助长回归的社群爱国主义方面,但是奥威尔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然后悲剧性地但却或许是不可避免地误入了歧途,即便如此,他也留下了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一种不朽的力量,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对于奥威尔来说,如今这一情形的症结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的政治观点中的突然变化。在你的说明中,他从西班牙回来时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然后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他遗憾自己没有参加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觉得由于错过了这场战争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对此引用并评论说:“根据这一解释,奥威尔的突然转变完全是一种隔代遗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在单一的重新调整表

象之下——这在传统上可以实现的——一种更为深刻的挫折过程一直在发生着。”^①那么，这种更为深刻的过程是什么呢？你的回答如下：“他已经使自己面临如此多的苦难，而且随后如此艰苦地进行了斗争；在西班牙中了一颗子弹；染上了严重的结核病；把他如此多的精力付出到一个似乎由政治上的幻想、谎言与失信构成的荒漠之上。在关于‘英国’的神话与完全破灭的欧洲理想之间，他必须做出他能够确定的调整。”^②这实际上是你对奥威尔的大转向所做出的唯一实质性的评价。事实上你说的是，奥威尔非常厌烦了，他的精力耗尽了。但是你的语言——“他已经使自己面临如此多的苦难，而且随后如此艰苦地进行了斗争”——发出一种似乎企图为他开脱的怜悯语调。奥威尔值得称赞地在西班牙进行了战斗，这当然是真实的，然而与奥威尔相比，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同时代人用更长时间、更为艰苦地为社会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们并未如此轻易转变立场。想象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这样的人，他曾经在波兰的地下革命组织工作，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破坏性，他在乌克兰有更多的直接经验，而且当时还是一个居住在英国的流亡者。他并未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下产生突变，变成一个社群性的爱国者，更不必说变成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在战后对奥威尔非常了解，还写出了迄今对奥威尔最为尖锐的评价之一。同样几乎不需要谈论托洛茨基本人，他当时仍然活着，处于无与伦比的更为巨大的不幸之中，与此同时奥威尔正在赞美英国社会团结的神话并且显著地认为他“与任何一个如今活着的人一样要为俄国的独裁负同样的责任”^③。为何仅仅因为奥威尔厌烦了，他的信念崩溃就应该得到原谅？毫无疑问这是逼近这一问题的错误方式，难道不是吗？

① O, p. 64. ——原书注

② O, p. 65. ——原书注

③ Cit. O, p. 63. ——原书注

我想这样做或许是错误的。一旦你把奥威尔置于一个完全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当然存在有着更多经历的同类人。推想起来,简单地说他疲惫了,说他受到了伤害,这里存在着感情用事的因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触手可及的可以使自己感到厌烦的情形,可以说,对于一个多伊彻或者托洛茨基这样的人来,那是不可想象的。那是在英国格外普遍的一种观念:英国社会可以通过战争行为得到改造。然后就出现了从那一立场到社群爱国主义的决定性滑动,在此意义上这与后来的工党主义和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问题在于,你是设法按其本来面貌感应理解那一过程,并因此收回击打的重拳,还是直接从那一过程退却,并简单地以一种更加严厉的方式说它是什么样的。关于我在《文化与社会》中对于某些人物的处理,我们有过同样的讨论。在194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之间,我通常倾向于从前的影响。我不是在为此辩护,我只是在说,这是我当时开始做的事情。

在关于奥威尔的政治转向问题之外,当然还存在着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价的难题。即使忽略他的身后声誉,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向自己提问三个问题。他创造了关于社会或者历史的新的理论知识吗?相当明显,没有;除了极右的辩护者之外,即使他的赞赏者也很少会这样声称。《1984》在1984年将会成为古董。他当时创作了第一流的创造性想象作品——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小说了吗?答案再一次显然是没有:他的小说涵盖范围是从一般到较差。像《让叶兰飘扬》这种作品的单薄得到了普遍承认。关于他所见证或者经验的事实,他提供了可信的记录——显著准确的证据吗?如今对于奥威尔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就的最常见的断言是,那是他的特长。这一理由无疑可以认为适用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对于西班牙内战的一种大致观点,无论其局限是什么,这是一篇非常杰出的报告文学。但是由于压抑和操纵的因素——你在你的书中指出了这些因素,这一

理由不可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适用于他的名望起初建立于其上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①，奥威尔反复诉诸恐吓和误导的手段把他的各种偏见强加给读者，仿佛它们即使令人感到不快，却是绝对的事实，这与舰队街^②新闻报道的手法并无不同，常常使他的现实报导无法信赖。然而，如果奥威尔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创性的思想，只有有限的创造性想象力，以及一种不可靠的叙述见闻的能力，那么他留下来的成就有什么呢？答案似乎是对“奥威尔”这一人物的创造，你在《奥威尔》这本书里非常充分地描述了这一创造过程。但是你有意回避了对这一人物和这一人物身上的伪装因素进行任何评价——这里不是指现实中的作家是一个不同的人，而是指，在坦白、直率的伪装下，其写作姿态超乎寻常地是支配性的。从短期看，对奥威尔的主要指控是政治性的——他蜕化到他自己狂热的社群沙文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中。但是从长期看，由于他欠缺文字审慎所造成的文化破坏可能是更为持久的。

当你在提出问题的時候，我想起了科贝特(Cobbett)——我经常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就语言而论，科贝特常常在对读者做同样的事情。然而也存在着区别，在科贝特的作品里存在着一种不变的、几乎终身滔滔不绝的私人记录，这在奥威尔的作品里并不存在——科贝特并不总是完全透露他是怎样达到位于观察者的位置的，但是与奥威尔相比，他更多地这样做了，并且对自己的偏见更加坦率。因为，传统的表现手法是塑造一个完全讲述事实的普通观察者，其要点在于，它消除了作者的社会处境，并消除了他对正在观察的社会处境的立场。在此意义上它完全是通行的新闻式表达，由纯粹的

① 威根(Wigan)，英格兰西北一区，位于利物浦东北，是煤矿区的工业城市。——译者注

② 舰队街，位于伦敦中部，英国许多报纸发行商所在地，借指英国伦敦新闻界。——译者注

客观社会研究模式所构成。奥威尔的策略总是试图这样写作,仿佛站在他所处的位置上,任何一个道德正直的人都一定会以那种方式看待事物。所以他给你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例子,我从这一例子里得到的印象是:因为西班牙不是英国或者缅甸,所以他更有能力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写成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事情,而不是写成“我们在场的人”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并且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这种变化。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里,在矿井下的旅程中简短地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在此之前则隐瞒了他如何开始下矿、他如何住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家里——然后他又否认了这些人曾经存在。我现在希望扩展这一讨论,因为对于这种支配性的形式——奥威尔的作品是这种形式的一个著名例子,我的思考曾经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我思考的不是奥威尔的书写,而是谁书写了奥威尔。我认为,如果你以那种方式提出问题,你就可以达到对于某种集体形式的更为真实的历史评价,而不是对奥威尔作为一个小说家、批评家或者政治新闻记者的评价。

与科贝特的比较略有缺陷,因为科贝特的语言具有某种繁茂和丰富的性质,远远不同于奥威尔的缺乏色彩——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表现范围更大。另一个要点在于,由于科贝特的背景,毫无疑问他与自己当时正在描述的乡村社会以及那个时代的大众运动具有某种联系,后者使他成为一个极其不同于奥威尔的人物。

然而,那将会开始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在书写奥威尔?什么在书写科贝特?那并不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世代形式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存在着某种一般性的形式,也存在着其内部实例的各种变异。我想要写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年代写作:布莱尔(Blair)、米切尔(Mitchell)与斯普里格(Sprigge)”,在其中讨论奥威尔、吉本(Grassic Gibbon)和考德威尔(Caudwell)。那将会是对这一情况的大

致勾勒。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研究那一整代人,特别包括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视野之中的并未做出奥威尔式举动的人——那些没有被1930年代的经验所压垮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最近才进入视野。然而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未改变方向的那一代英国人由于他们的矛盾经验而缄默了。爱德华·阿普沃德(Edward Upward)的三部曲是处理那种经验的一次尝试。尽管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比奥威尔还要更加彻底地退回到1920年代的审美化自我关注——它在其他方面却确实代表了一种更为可敬的政治路线。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期间,由意识与压力构成的什么样的深层结构当时在引起这些变化,在奥威尔的例子中,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一个孤立的成年个体,还导致了一种受到广泛模仿的文体。虽然那种形式是彻底错误的,其后的一代人却把它作为一种智慧、成就和成熟而接受。就奥威尔本人而言,一旦那种朴素的文体消失,向心性也就消失了,而这就是什么在书写奥威尔的问题。

如果那就是要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回答好像是相当清楚的。在冷战期间,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客观需要某种极其有力、明目张胆的反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首先是要在大众中流行的。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英国是一个特别有实力产生这些作品的候选对象,因为它在20世纪没有任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经历,与它在大陆的任何一个对应国家相比,本土的统治阶级较少受到国内突变的影响,其社会秩序是最传统、最稳定的。它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两个反共产主义文学的畅销作家——奥威尔和凯斯特勒(Koestler),这不太可能是一个意外。凯斯特勒的例子特别发人深省,因为他本人当然不是英国人。始终有必要牢记晚期奥威尔的巨大国际反响,例如,直到今天,《动物庄园》和《1984》作为学校系统里的必修文本,每年在西

德的销量都有数万册。这还没有提到通过各种流亡者广播网络把他的口号向东欧进行广播。

换句话说,如果你问奥威尔身上的什么东西可能使他发出了危机的召唤,可以说,你谈及的是由各种决定因素构成的某种完全个别性的状态。在这个地方,萨特努力对福楼拜做出的那种分析将会是一种相应的模式:他最初设法在福楼拜的早期家庭经验范围之内重建其个性构造,然后探究为何与第二帝国相关的社会应该已经赋予了《包法利夫人》以成功的信号,哪怕这种成功是悖谬的。在奥威尔的例子中,其作品似乎表明的是从一开始就看到的某种剧烈的倾向——并不特定地与第一个例子中的社会主义相关——其对象的阴暗面。当他后来就英国“左派”或者苏俄进行写作的时候,那将会带给他某种确定的真实。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当奥威尔在咒骂自己内心另一部分希望推进的事业的时候,他在其处境之中似乎一直是情绪无常的。他与社会主义极其紧张和暧昧的联系是这种张力最为明显但却不是唯一的例子。它先于对冷战寓言的政治需要而存在,奥威尔自己从来没有自愿地适应这种政治需要。

我认为,奥威尔晚期作品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它们必须写自一个前社会主义者之手,而且这个人必须分享了这代人的挫折:一个已经变成狂热资本主义者的前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任何人都可以证实的是,这些作品的写作先于冷战的开始——苏联在这个国家具有最高声望的时期,他写了《动物庄园》。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种反对的因素,使他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第一人。

就《1984》来说,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十足的个人情感的补充变得令人无法容忍。正如奥威尔所陈述的那样,人们总是互相背叛,将这陈述为一个普遍事实是深为令人不快的。如果人类像那样,民主社会主义的意义会是什么呢?不过,奥威尔作品的这一维度同样也是某种非常主要的形式的一部分,与中立的观察者相比,这种形式具有甚至

更深的根源。因为，对全部人性极端厌恶的这种模式——尤其集中在工人阶级形象的身上——毕竟要回溯到早期的艾略特，它是一种大概相继了两代人的模式，尚未耗尽自身。在奥威尔对他前往的那种工人阶级地区的选择中你可以看到这种模式，他故意忽略当时正在成功应对困难的家庭——尽管他在理论上承认它们的存在——以支持典型的贫穷意象：人们用小棍在排水沟里到处翻寻。他的想象力总是顺从地定位到那个地方，存在着某种有力的感受，我认为它在理论上非常有趣但却难以理解：某些文学表现手法实际上不仅支配了写作的方式，也支配了观察的方式——尽管有效支配的出现是在作品之中，而且在作品中被作为生动、合理、真实而接受的东西实际上是被作为规则确定了的。奥威尔的兰开夏郡永远都在下雨，原因不在于它经常下雨与否，而是因为必须这样做，以作为一个条件，构成令人信服的北方地区细节。

在某些例子里，那种表现手法可能会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例如，由无所不在的排斥构成的同样主题可以在早期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作品中发现。实际上，在特里·伊格尔顿的《流亡者与移民》中，对作为小说家的格林和奥威尔有一个卓越的比较性分析。但是即使最初的感受并无不同，有趣的是，恰好关于英国爱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这两个问题的意识形态结论有很大分歧。当然，格林的发展与某种詹森主义^①的妥协有点儿关系。

同样，与奥威尔相比，对于格林有更多可写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以格林在1950年以后的作品为例，你就将会讨论一种不同的作品。在西贡和海地，格林以对帝国处境产生很大影响的方式使用了那种表

^① 詹森主义(Jansenism)，詹森教派的信条强调宿命论、否认自由意志且认为人性本恶，被罗马天主教作为异端所谴责。——译者注

现手法,如果奥威尔在西贡或者海地出现,谁知道奥威尔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呢?我们完全不知道,推测它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文学界一个笨拙可怜的方面就是在假想中竞争,以成为奥威尔在下一代中的后继者。

贯穿其所有批判,你的这部书在对待奥威尔的语气上是非常克制和同情的。现在你的某些评论似乎更加尖锐,你已经改变了对奥威尔作品的观点吗?

我不得不说,如今我不能容忍它的许多内容了。如果我必须说出哪些作品造成了最大的伤害,那就是你称之为社群爱国主义的东西——那些从战争的开始就很可怕的东西,它把英国看做一个大家庭,其成员包括不适当的管理者和慢吞吞的大叔大婶,我们可以完全没有痛苦地摆脱他们。这种工党主义通常与德宾(Durbin)或者盖茨克尔(Gaitskell)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它的许多政治论点可以追溯到这些文章。这是比《动物庄园》更为严重的事实。虽然存在着很多缺点,《动物庄园》仍然指出了权力如何可能被失去和人民如何可能被误导:它是失败主义的,但是它对欺骗的进程做出了某些敏锐的观察。至于《1984》,它常常十分武断和不适当地把丑陋与仇恨投射到革命或者政治变革的困难之上,似乎开启了一个真正颓废的资产阶级写作时期,人类的整体状况在这种作品中被简化了。

现在我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写奥威尔了,部分原因在于我对他创造的这个人物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例如,他在美国刊物上对和平主义者或者支持革命的反战人士进行了可耻的抨击,指责那里的人们完全站在他自己三四年前的立场上,这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的充分理由。奥威尔所给予的一贯得体与诚实的印象伴随着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他在每一种情境中都不同于以往地出现,能够甩掉他的全部过去,再一次被视为坦率、没有偏见、完全在诉说真相的观察者。当他

对他不久前还分享其立场的社会主义同道者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对于这种人和这种作品的某种非常刻薄的评价的根据。这本书是最后的舞台，以完成由表示怀疑的尊重所构成的某种认识。我一定要说，我现在不可能读他的作品了：在所有方面使我难以接受的都是他做出的这些恶劣举动。

3. 俄国革命

你关于奥威尔的研究间接提到了俄国革命的问题。不过你也直接写过东方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在《现代悲剧》中。在那本书中你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反对任何一种把个别悲剧观念普遍化的非历史性做法,主张在悲剧特征上存在着时代的不同,新的悲剧类型趋向于在历史转变时期出现。与此同时,一个有力而又重要的政治主题贯穿了这本书,这一主题在本质上开启了十月革命的命运。因此,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悲剧》似乎是你批评著作中最具专业性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既是最具一般性又是最具政治性的,事实上它是以有关斯大林的戏剧结束的。接近文本的结尾,剧中人物之一宣称:“我们毁掉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戕害自我的心灵,这样它就不会背叛我们、牵连我们,从而使这一进程进行得更快,我们都变成了恐怖的科巴。”^①这番话似乎概括了在这本书许多其他重要段落中得到探究的一个主题,即这样的认识——在社会解放进程中,存在着某种对恐怖的普遍需要。在效果上,你直接把十月革命本身的代理人、目标与斯大林的恐怖、审判和集中营联系在一起了,后者事实上摧毁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的许多成就。斯大林主义并没有被你描述为苏联在1920年代历史危机的结果——当时苏联的发展存在着其他可能性,那本来可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相反,你的解释促使把俄国革命的最初动力与斯大林的专制结局关联在一起。你现在仍然觉得那种结合是有根据的吗?

不,我不这么觉得。这个戏剧与书中其他部分的联系困难在于它

^① MT, p. 273, (first edition only) ——原书注

的写作要早得多,是在1958年到1959年。由于它涉及同样的主题,我最后把它纳入到《现代悲剧》里,但是它写于一个不同的时期。不过那并未使主要的质疑得以豁免。我愿意相信,在一个难以置信地受到削弱的国家里,由于内战与国际干涉的规模,布尔什维克党很早就发现它自身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革命最初的社会基础在苦难和战斗当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它不得不主张革命的观念以反对当前的现实。我所做出的关联是错误的,因为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这些环境下的权力实践——包括与之相伴的武装力量和镇压——已经必须在性质上区别于1930年代对布尔什维克党本身造成了破坏的由多个阵营构成的政权。显然,那是一种极其不同的进展。我仍然认为存在着通过任意一条革命道路得到释放的某种悲剧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我想要拒绝在你提出的表述中的必然性观念:它是在这部戏剧中得到表达的看法之一,但是实际的结局完全不同——类似于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并从中学习之后,恢复了最初的革命动力。当然这与苏联的真实事件相距甚远,那里仍然在等待一个最终的结果。

存在着可能突然降临于某种革命进程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悲剧。智利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你所言。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悲剧,善良的人由于武装对抗而踌躇了,其原因是一系列的,从战术性的考虑,到不情愿面对那种斗争,到认为那是在反对智利社会的传统。其选择因而由于反革命的干涉而被悲剧性地歪曲了,接之而来的是如此野蛮的一个政权,由于没有准备好抵抗对工人阶级政府的暴力颠覆,以至于尝试进行一场革命所伴随的暴力程度最终相形见绌了。不过那是“左派”通常更为了解的那种例子——其复杂性类似于西班牙共和国遭受弗朗哥军队侵袭时的危机。在这两次战争之间,“左派”从头到尾面临一系列的情

况,某种民主进程遭到了武装力量的攻击,它不得不使用武力或者准备使用武力进行回应。当然,那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要跨越的诸多河流之一。但是与下一条河流相比,它还比较容易跨越,在下一条河流,极度的困难和革命运动抵达权力的方向导致了不是由右派而是由“左派”本身发动的极其严厉的措施。所有当代实例中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柬埔寨,假如我们接受柬埔寨人自己的解释,就是在没有美国粮食供应的条件下,为了给全体人口提供食物,他们不得不把运动转向城市,把人们推回到乡村,这无疑伴随着巨大的苦难,不过其信念是要么生产足够的食物以具有能力保持独立、要么再次陷入某种殖民地式的顺从。许多人退缩了,原因在于强制遣返到乡村的景象和用来执行遣返的非常严酷的纪律,尽管可以给出证据,这些是在受到以前历史很大影响的处境中实现革命夺权所造成的结果。革命的悲剧根本不是起义或者针对其敌人使用武力——尽管面对受到外部干涉所援助的严酷、残暴的敌人,它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也是一种悲剧经验,像智利的军人集团那样。真正的悲剧出现在那些可怕的时刻,革命的动力几乎丧失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以至于为了不被瓦解或者击败,革命运动不得不对其自身和相对无辜的人们施加极为严厉的纪律。在苏联 1920 年代的复杂政治中,那种强硬虽然自始至终在改变,却以不同方式受到苏维埃政党里每一个人的指责。那些对强硬路线——强硬但却有灵活性——主张不予考虑的人的确结束了对革命的信仰。从那时起,那已经成为不同类型社会中多数人思考俄国革命的主要障碍。

在这本书中,理解关于“悲剧与革命”论述的困难之一在于你在其中使用“恐怖”一词的含糊性。例如,你写道:“这种‘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带有解决与秩序的终极色彩,但在现实世界中,它的视角难免是悲剧性的。它产生于怜悯和恐怖:摆在它面前的是一种极端的无序状

况,其中一部分人被剥夺了人性,人性的观念因此而消失。它也产生于上述状况中真实的人的现实苦难。”^①你继续写道:“我们的所有经验告诉我们,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极其复杂的行动在可见的将来还会继续下去,这一持久斗争中的苦难还会继续令人恐怖。”^②当你在这里谈到怜悯和恐怖的时候,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斯大林,令人恐怖的是那些进行革命的人陷于其中的苦难和对于阶级敌人的普通人性的否认。然而,后来伴随着与斯大林相联系的意义,出现了某种删略。因为你断定:“我们仍然必须关注整个行动,把实际的解放视为与令我们惊骇的恐怖共同存在,它们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我的意思不是说人的解放抵消了恐怖,而是说它们有着相互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悲剧性的。”^③在这里,恐怖似乎所指的是产生于1930年代——叶若夫大恐怖时期^④——的体制化政治镇压制度。那与解放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对它自身的无情否定。一个社会主义读者无疑一定会反对这种混用吧?

我可以理解存在着两个层面。存在着某种层面上的苦难,它涉及任何一种突然颠覆一个旧社会和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最初斗争。还存在着另一种层面上的恐怖,它由革命纪律的执行所导致,因为纪律针

① MT, p. 77. ——原书注

此处参考丁尔苏的译文,《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p. 69。

② MT, p. 78. ——原书注

此处参考丁尔苏的译文,《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p. 70。

③ MT, p. 82. ——原书注

此处参考丁尔苏的译文,《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p. 73。

④ 叶若夫是前苏联大清洗时期俄罗斯秘密警察首脑,在他任职期间,大清洗活动达到了高峰,将近半数的政治人员和军事指挥人员因“不忠”或“叛逃”的名义被草草逮捕并处死。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叶若夫大恐怖时期”。——译者注

对的不仅有革命的敌人,还有主动或被动卷入革命的人以及在革命内部代表了一种不同倾向的人。在极端的纪律执行之下,解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某种恐怖可能会出现:它完全不同于武装团体行使专政以维持旧秩序的普通镇压。我会通过所有这些复杂因素说,这基本上是苏联在1920年代早期的情形。它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接受它并将其视为悲剧性的。如果你不把它视为悲剧性的,你就没有理解它的全部影响;如果你把它当做某种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你就会拒绝革命。但是那绝不意味着必定存在体制化的恐怖。

借用你形象的比喻,存在着一条永远不会被跨越的河流——不是指对极其严格的革命纪律的强迫接受,而是指在革命过程中对政治辩论的压制和对官方谎言的建立。你引证了最近在柬埔寨发生的强制遣返的例子。非常清楚,一旦美国停止供应,金边超过300万的战时人口不可能在城市得到食物供给。撤离可能是必要的,然而居民在枪口下被赶出城市,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向居民对此进行解释,处于某种否决一切自觉政治进程的情形。无论国际或者国内围攻的处境如何紧急,在革命阵营内部对自由政治讨论和自由交流的取消永远不应该得到原谅。它直接打击了当前紧急处境之后将来长期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在你对俄国革命的描述中,你难道不是倾向于忽视这一区别吗?

是的,我不会对此进行争论。在像俄国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做出这些区分。我当时不想说达到抵消解放冲动程度的冷酷在任何革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我看来,古巴革命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并且我不认为它将会由于中国与越南那些极度的苦难和强硬的政策而在这两个国家的革命中发生。中国和越南的经验更多地是在常态观点之内,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悲剧是一种不同的状态——经历一段相当时期的围攻,在这段时期坚持革命事业,敌人也

许被强迫处于某种非人的状况,尽管如此,关于解放冲动的优先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一方面,那种冲动可能会被舍弃和遗落,这不仅包括从来没有经历这种冲动的雇佣兵,还包括有过这种冲动然后在极度压力下已经将其遗落的那些人,他们的精神已经从根本上受到了侵蚀。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够支撑一场广泛的解放运动,否则这场运动就将会被环境、思想的困惑或者敌人的干涉、复辟所挫败。如果柬埔寨的撤离如同你所表明的那样,城市人口被驱使去做革命武装确信是必要的事情,但是却没有给予基本规定的确认以解释这样做的必要性理由,那么,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革命者承受的压力使他们走向这样一种程度,他们自己身上的解放冲动被消除了,完全变成一种抽象的革命意志,对于这种意志指向何处没有任何认识。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革命者要镇压其自身运动内部的不同倾向,甚至把部分革命者当做内部的敌人来镇压,这个时候,他们变成了在革命名义之下掌控的完全代理人,只不过当时在专横地驱使人们沿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是毕希纳(Buchner)在《丹东之死》中所写的那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你变成了革命的面具,而在面具的后面,革命本身却不复存在了。那是极端的情形,然而,存在着各种同等重要且更为普遍的情形,在解放的人道运动和某些必要的行动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非常难以解决的关系,这些必要的行动包括针对反革命和外部干涉的攻击性镇压与对革命的捍卫,以及在革命运动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维持纪律,同时又在革命内部保持纪律与民主之间的平衡。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发生。

仍然还有一个基本方面在你的说明中被完全遗漏了。斯大林主义在1920年代,特别是接近1930年代的时候已经崛起了,当时它不仅仅是俄国革命对于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的一种过激防御,一种由冷酷的纪律和制度化的怀疑所构成的体制。所有这些当然存在过,并且

可以在你现在还一直使用的那些主要属于道德范畴的措辞中得到说明。这些无疑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使它们脱离于对于在苏联发挥作用的历史力量的某种更为实际的社会学分析,就会存在着某种危险。在这个方面,托洛茨基对 1930 年代时已经得到巩固的苏联政府进行了批判,而你似乎对其批判的现实力量奇怪地缺乏反应。托洛茨基寻求展示的是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种是无情的逻辑——帝国主义包围与封锁的压力,经济的孤立与乡村在社会中的日益削弱——那促使革命在俄国内部采取极端集中的独裁制度方向;同时通过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社会斗争,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物质特权的阶层,这一阶层部分来自于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布尔什维克党。到了 1930 年代晚期和 1940 年代早期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与列宁时期的运动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它成为历史上一种新型政党的形式。托洛茨基总是将其社会角色描述为双重的和矛盾的。它是一个统治阶层,针对国外帝国主义敌人捍卫革命的主要成果——它绝不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层;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针对工人阶级和大多数人口,警惕地捍卫它自己的特权。第二种角色在你的分析中是缺席的:把斯大林的政治秩序解释为一座由物质特权构成的城堡。执行其恐怖功能的官员们不仅失去了通常的人性冲动,他们还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别墅里,安排得特别舒适,免于当时所有经济上的苦难。斯大林自己的生命道路是其代表。如今在任何一个欠发达社会里,即使没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程度相当的剥削,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苏联,也出现在中国,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远远超过那些不可避免程度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它们在秘密的遮掩下受到各个政权的制度性捍卫,如果必要的话会伴以暴力。托洛茨基思想的深邃洞见和伟大遗产是对新的政治秩序在其中得以建立的这种社会进程的一种理解。他不仅在遭受挫折的时候对于苏联在 1920 年代的发展有一个替代性的工业化政策和无疑更为民主的规划,在遭受挫折之后,他

还努力思考并理解在苏联展开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进程。

我愿意接受这一点。在悲剧观念范围内设计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讨论不可能触及这种说明。不过,把革命与其自身的利益视为一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的发展当然在其背后具有道德期限的性质,因为革命的冲动此后已经明显终止了。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极其不同的社会里,大众自治最大限度的普及在任何一次革命进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总是有这样的可能,在某种紧急状态下,存在着一种倾向去宣称命令的行使要求特定条件——合理化的解释是无限的,完全在最初阶段就可能会得到心甘情愿的承认。人们会为列宁清扫出一个房间,尽管在典型的情况下他从来没有要求过。很容易说:列宁同志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他指导着这么大范围的事务,因此必须为他提供与守门哨兵不同的条件。然而从这些保持指导与管理的直接实际需要出发,可能就不知不觉地生长出一种权力与特权的等级。如果西方社会主义者现在把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当做一个典范,他们就还没有学到它的悲剧性教训。因为没有人曾经想象到,在一连串事物结束的时候,他将会变成那个忘记了为谁革命的人、那个把革命与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感视为一体的人。即使1920年代最阴暗的观点也不可能已经构想到这一进程在1930年代的结局。因此,必须学到的一个教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保留,而是一个可以给予明确社会解释的非常实用的结论:革命领袖失去革命冲动的最终悲剧阶段截然不同于其革命冲动在苦难与混乱当中延续的早期阶段,避免最终悲剧的条件是,新的大众权力和革命自治形式应该不断产生。其他类型的悲剧性进程可能避免不了,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它们是某种不同的情况。

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必须回到新的大众权力形式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关于你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我们可否问一个特定的问题?在《乡村与城市》的结尾,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城镇与乡村的

思想提出了有力的指责。你在最后几页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对俄国革命随后路线的评注,那一路线缺少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同时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造成了阻碍。你写道:“托洛茨基说过,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城镇对乡村胜利的历史。此后他在俄国革命最初的关键几年里,接着恰恰为这样一种胜利草拟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作为战胜资本主义和保持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斯大林正是实施了那个计划,其规模和严酷程度使那一对农民的‘胜利’成为整个乡村社会历史中最为可怕的阶段之一。”^①这一段似乎概括了你对托洛茨基这个人物的大致印象。目前,我对此存在着许多有待表达的意见。首先,根据经验证明,那是不准确的。托洛茨基当然说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城镇对乡村胜利的历史,但是他也在许多作品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预示了城镇与乡村之间对抗与分裂的消除。说他鼓吹对俄国的乡村或者农民进行某种资本主义类型的大规模侵犯,那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赞成的是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以使城镇有能力为乡村供应机械化装备,使得提高农村生产力成为可能,从而容许为城镇与乡村更好地提供食物。没有任何关于强迫集体化和对富农进行斗争的计划能够在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中被找到。这些是斯大林的政策。你在此处不经意重复的是那些支持斯大林的现代解释版本之一,通过在极为无情地对抗斯大林的那些人当中分摊这些罪行的共同责任,这些解释寻求将斯大林的罪行相对化。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农业计划与斯大林是对立的,而且托洛茨基从未停止公开指责斯大林对农民进行斗争的野蛮和愚蠢,那削弱了俄国的农业,一直到如今。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历史人物的边缘争论。其理由在于,可以感受到,许多像你这个年龄的社会主义者在关于托洛茨基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代际隔阂:与其说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不

^① CC, pp. 302, 303. ——原书注

如说是一种压制、一种漠视。它似乎表明了不愿深入理解在任何意义上都作为一种鲜活传统的托洛茨基遗产。然而对于今天的年青一代来说——你可能从1960年代以来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况——托洛茨基在基本层面上所代表的是对俄国革命的某种解档。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通向十月革命的链接，那使它不仅仅归属于遥远的过去，因为托洛茨基事实上当然一直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直至去世，他一直在提出很多关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相应观点。对这些观点进行认真评价是使整个俄国革命问题——这不但包括如今正在苏联发生的情况，也包括它的未来——保持开放，并且又不唯我主义地脱离于西方革命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似乎是你们这一代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人觉得他们已经清算过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回头。对于你们的反应，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吗？

我愿意承认这是一种隔阂，因为我正好发现了你刚才一直在断言的那种经验，我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来直面这一问题。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好像托洛茨基被作为革命的敌人介绍给我们，从而我们发现难以在此后重新调整印象。更适当地说，对于随后一代人而言，这是不情愿探究并非当下的复杂情况。例如，我不具备足够的知识谈论左翼反对派和斯大林所提议的俄国农村运动之间的不同，在二者的措辞上似乎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在整个革命传统中，这些一直是难以理解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时期的革命传统由对农民始终怀有非常暧昧态度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虽然托洛茨基自己出身农村环境——他在他的自传中对这种环境进行了描述——他与农民的关系趋向于产生同类态度。无论如何，他的某些措词看来使人想到了这些态度。我承认，一个人必须超越这些并理解托洛茨基的特定计划是什么。但是一般而言我得说，由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我始终注意到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对农业生产者的根本轻视，具有

代表性地，他们在“农民”这个用词之下把实际上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混在了一起。考虑到英国农业劳动者从农村移出的整个经验，这种情况特别相应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然而，把工业等同于进步的误解伴随着一种客观存在的对粮食生产者的剥削关系，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施加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影响。

尽管如此，你避开对托洛茨基的追忆不可能仅仅归因于他关于农业问题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奇怪信号是这样一个事实，你在《文化与社会》里面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那一章根本没有提及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个最著名的文本——《文学与革命》。在1930年代，《细察》不得不非常认真地论述它；但是1950年代当你正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你却可以完全忽略它。那不可能是一种偶然。

那不是偶然的，我接受你关于代际障碍的描述。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不应该被看做仅仅涉及苏联在1920年代的路线斗争，你认为它与讨论当今西欧的社会主义策略无关吗？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经验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西方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对于我们来说，在过去的历史得到理解和学习之前，不可能获得有关我们未来的清晰方向。你已经断言，俄国革命的命运涉及理论与原则上的根本分歧，而非我们这代人所理解的一种复杂但却相对统一的经验，这些理论与原则到如今仍然可以被坚持和提出，它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规划以及解释东方发生的事情都有联系。我们随后的这代人已经比我们进行了更好的联系。

然而，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斗争，对我而言，它在“左派”全国大会上通过两个人得到了象征，这两个人相互指责彼此在1920年代的立场，为争夺麦克风而发生了肉搏。在当代

英国政治的平庸、挫折与俄国革命及其后继者的巨大锐气之间存在着某些对比,它可能导致对这些过去历史情形的长期模仿。这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内部重大分歧的现实延续,它重新经历了那种基本的争论。当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分辨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尽管对它们进行区分在分类上可能是困难的。当人们选择已经在别处发生过的革命进程的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异化可能会发生,当他们与那些革命进程产生共鸣的时候,与他们陷入自己单调处境的时候相比,那种革命进程更为充满活力。现在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因素、没有一种历史感,什么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另一方面,问题也不可能通过那种口号式的表达及其滥用而得到解决,俄国经验就是在那种滥用中变成了一种对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的转移。在大会上,针对这些围绕麦克风的争夺,一些人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说整个“左派”已经变成各种外国运动的附庸了。这是不正确的,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这代人并没有对那两种可供选择的传统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我会区分对过去的讨论和对过去的模仿。历史经验的重要价值在于来自它的有效理论和特定具体实践;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忠实的认同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认同正好以其产生的形式把真正重要的遗产排除在外了。

在随后的 1960 年代,你转向 20 世纪另一个重大的社会主义变革,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了相当大的同情。^① 关于“文化大革命”,特别吸引你的是什么?

看待文化大革命存在着许多必要的方面。在某个层面上,必须看到官方话语背后的现实复杂因素。在我看来,这些话语和某些实践背后的原则无疑与许多别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但它依然是充满生命力

^①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 p. 298. ——原书注

的；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后革命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也在于应该通过每个人在日常劳动中的定期参与而使劳动分工受到挑战。中国人并未完全将其投入实践以及某些人对其享有豁免权的事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从来没有像在“文革”中那样如此清楚有力地得到阐述。我认为，在不具备他们自己将要实施该种劳动并已经从该种劳动中产生的知识的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应该管理或者掌管任何形式的劳动。当我听到关于教授们被从他们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带走、送去帮助收割庄稼的令人同情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完全站在革命者的一边。如果人们真的病了，那就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普通人不应该参加体力劳动。除非支持这一原则，社会主义运动给予工人阶级的将是一场空。因为，考虑到工人阶级对国有化这样的解决方案的怀疑，唯有这一原则可以使工人阶级明白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控制他们的新形式。针对这样一种信念：拿铁铲的人始终是拿铁铲的——别人会指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以信赖的解放计划，但却不会拿起铁铲去实现它——这是赢得工人阶级意识内部这场重大斗争的唯一途径。

你这番话的精神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字面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它典型涉及的是一种在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取消劳动分工的唯意志论尝试。与此同时它也是在没有设立大众统治权现实形式的条件下克服劳动分工的一种尝试方式。因为不管是自由地接受还是受到胁迫，限制和减少劳动分工最重要的手段恰恰是真正的大众统治权，而不仅仅是地位上的技术性轮换。因而即使在某种长期的重要意义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也是所有社会分工中最为基础的，在如今的中国，与教授们应该被带去收割庄稼相比远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接触政治信息的平等权利。不过，完全的大众统治权已经表现了那种分工的某种明确缓和，因为每一个公民都被

允许从事包含在社会发展方向之中的一般性劳动。

当然,我对此表示同意,除了原则与实践之间的不同之外,也存在着现实可用的过渡形式问题。我也完全同意信息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狂热者接受关于这一点的建议。我冷酷地强调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书在什么样的商店里?一个人可以在哪里读到作为被谴责为反革命者的反对派的观点?这些是知识分子首先考虑到的事情,他们大为光火我一直提出这些问题。

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一个政治斗士考虑的问题。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并不思考这些问题。

总之,我不希望把这一强调局限于中国,这种情况在古巴也是明显的。取代思考——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怎样才能引进生产力计划和斯达汉诺夫竞争?^①——古巴革命者的行动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当你有了某种普通需要的时候,你通过普通的劳动来满足它。即使这样一种方针对于彻底摧毁劳动分工的根源毫无进展,但是它却极其重要地指出了革命应当前进的方向。

^① 斯达汉诺夫,1906~1977年,苏联工人,由于在增产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而受到表彰。——译者注

4. 通向变革的两条道路

有时会有这样的指责,无论《文化与社会》的认识价值如何,它在政治上是一部“工党主义”的著作——这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不是指对当前工党或其领导层的忠诚,而是指忠于某些被普遍接受的英国工人运动的观念。在这本书中存在着某些表达,似乎适用于这样的评注。例如,1866年在海德公园发生了对于第二次改革法案的示威,对于马修·阿诺德的反应,你在非常引人关注的论述中写道:“当然,他害怕全面崩溃会造成暴力与无政府状态,然而自起源于工业革命以来,关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它自觉、谨慎地避免普遍的暴力并坚定地相信有其他前进的方法。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征往往不受它更为浪漫的拥护者的欢迎,但是这些特征是一种真实的人类力量,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不是怯懦的产物,也不是麻木不仁的产物,而是道德力量信念的产物。我认为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对‘追求完美’的更大贡献。这是只看到工人阶级那个放大的粗野形象的马修·阿诺德所不能意识到的。”^①这里的措词——“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最显著的事实……自觉、谨慎地避免普遍的暴力……坚定地相信有其他前进的方法”——难道不是特别类似于传统上一直从工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听到的那种修辞吗?除了其他疑难之处之外,你的表述难道不是含有一种极大的简化吗?因为,对国内暴力的克制被你描述为一种有力的积极态度,但是它却一直典型地伴随着对帝国主义国外暴力的消极接受或者漠不关心。

^① CS, pp. 133~134. ——原书注

译文参考《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p. 173。

在我看来,关于阿诺德的评论在其背景中得到了适当的提出。1866年海德公园的小小骚乱完全是被政府的行动激起的——阿诺德把暴力的原因归于群众是一种典型的转移,必须加以反对。不过我认为,大体而言我过于受到自己最为了解的英国工人运动时期的影响,那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时期;而从1790年到1830年的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则相对不足,我当时对这段时期所知甚少,发现非常难以聚焦于此。读者必须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做出历史性的辨别。不过我承认,将我的评论扩展成一种20世纪的论点可能会被视为表明屈从于选票至上主义的惯例和特定的工党政府手段。我不认为我当时会已经走得那么远,但是我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解释如何能够被附加于它。问题在于,在我们这种政治社会里,骚乱与暴力一直通过阿诺德的方法被典型地投映到工人阶级运动之上,在抵制那种意识形态转移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陷入强调某种立宪主义的相反危险,那也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本质特征。

可是,你写道,“公正地说,工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所要求的”不正是“一场以适当的合法进程名义所进行的革命”吗?^①即使遵照你刚才提起的19世纪40年代,终究还存在着宪章运动中的暴力派,它的性质正好可以据此得以显示:如果统治阶级坚持拒绝承认它,它就拒绝认可适当的合法进程是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最终保证。对于你的疑问,这难道不是与事实完全相符的回答吗——是这样吗?

在历史上,暴力派是1790年到1830年传统的继承者,而道德力量派当时正在新的时期引领前进。当然,道德力量派的倾向是非常混杂的,但是它包括了那些坚定积极的克制性集体行动的从事者,并不局限于至少将他们排除在外了的立宪主义。其中包含的奉献与情感

^① CS, p. 133. ——原书注

后来被一种纯粹的盲从和因袭所吸收和折中了，最终导致了与自始至终一直利用武力的政府的合作。当代工党的意识形态再次将那段复杂的历史转变成了别的东西。克制的、非暴力的大众自治行动一直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策略，也是许多大众运动的传统策略，却被转变成了传统的立宪主义——“把问题交给你们的国会议员”，在这里，道德力量派远远不是想要把问题交给他们的国会议员。

“道德力量”这个词仍然留下了某种危险的暧昧性。《文化与社会》中后来的一节是个例证。你引用了事实上作为工党党章撰写者的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的一段表述，他在其中具有代表性地谈到“在过去 100 年间把欧洲社会带向社会主义的主要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民主的进步”。然后你谈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对这段话的反对，他说：“费边主义者极大低估了我们生活于其下的巨大组织的力量。除了用一种巨大的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付这一力量。”然而你依然能够称之为韦布对“稳定的进步所做出的冷静、令人钦佩的假设”^①。在韦布的表述中，引人注目之处无疑在于它那进化论者的自满吧？为何我们应该钦佩它呢？

我确信自己当时的看法不是很有条理，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难题。在某种意义上，相信在民主的扩张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要容易得多——对此存在着某些不可忽略的证据，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但是我认为，莫里斯对这一观念的反对是确实无误的——他明显是正确的。

你当时所说的话却相当不同。你写道：“莫里斯与韦布之间的争论、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争论如今依然盛行，没有任何一方最

^① CS, p. 184. ——原书注

终已被证实是正确的。”^①

是的——这似乎是我当时的立场。我对可能会从选举民主中形成什么类型的政府没有把握。我当时是在说我不知道。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相信，资本主义政府可以用演变的方式被终结，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逐渐被转换成一种社会主义秩序。正统的共产主义支持相反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将会始终受到资本主义政府的抵制，无论用什么样的力量，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在《文化与社会》中我实际上是在说，两种立场的力量我都看到了，但是在那时我不知道哪一种最终是正确的。你一定记得从1930年代起我就有一种非常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背景，它既来自在社会主义与勇敢的、建设性的和平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联系的威尔士，又来自在工人阶级家庭中非常普遍的那种精神特质——那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实施罢工的方式要非常有秩序。其正确的工人阶级依据是，假如你给予敌人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针对你采取暴力行动，你就是在削弱你自己的阵地，因此必须运用纪律消除所有转移主要行动目标的混乱。不过，我的立场仍然远远不是现在会被称作工党主义的那种，对于这一争论中的问题，工党主义毕竟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立场，甚至排除了对另一可选立场的考虑。我充分意识到另一可选的立场：长期的证据表明，狮子不会被说服与路人躺在一起；最终，必须面对狮子击败它——这里使用的对狮子的比喻源于托尼，对于他的道德乐观主义，我在这本书中给予了批评。^② 不过在英国政治传统甚至所有相似政治传统的内部，我不知道哪个论点最终是正确的。

关于这两条通向变革的道路，你大体上的犹疑持续了多长时间？

① CS, p. 184. ——原书注

② CS, p. 219. ——原书注

从你的文本来看,它似乎已经持续到迟至 1966 年,大致是你说你与工党最终决裂的时间。因为在出版于 1966 年的《传播》第二版的序言中,你相当激烈地反对“针对他人”的社会变革观念,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你表明自己的观点是“与他人一起变革”,并用“发展”这个词来表达这种变革。^① 与你以前写过的东西相比,那似乎更为强调致力于一致认同参与的演变主义——好像你当时完全同意托尼。然而在同一年里你也发表了主题为“悲剧与革命”的文章,直接采取了相反的观点。你在文章中宣称,“我们把革命解释为一种缓慢、和平、在一致认同基础上的发展,这种解释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种局部的经验和希望,在最糟的情况下则是一种持续的错误意识”^②,你明确地断定,革命的观点是“不可避免地悲剧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产生要“针对他人”——压抑这一事实就是“乌托邦主义或者革命浪漫主义”^③。调停那两种立场是不可能的。《现代悲剧》实际上写于第二版《传播》之前吧?如何解释这种观点上的摇摆?

《传播》前言应当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理解。当我对其进行写作的时候,在大型传播机构内部正在发动各种各样的运动,试图探索工人代表制,确立制作人管理制,以改变这些产业的结构。与在其他领域相比,渐变作为一个主张似乎要贴切得多。与此同时,我已经注意到“左派”在特定场合对初版《传播》的评论,其大意是,“关于传播,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摧毁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实际上我记得当我写出关于和他人一起改变的那句话的时候,在我面前就有那种争论的一个特定例子,可以说我当时是在对其做出回应。应该说,大体而言,与改良者相比,恰恰是构成真正革命“左派”战斗性的那些精神使得与他人合作时对它自己的损害更为严重。改良者则

① C, p. 13. ——原书注

② MT, p. 79. ——原书注

③ MT, p. 77. ——原书注

采纳了这样的观点：尽你所能在体制内部得到尽量多的东西，发展无论任何社会主义都需要的合作与妥协技巧。我在前言中试图要说的是，我相信有许多人在传播领域进行合作，原因在于发生在主要媒体里的危机已经被极为广泛地体验到了，所以把变革这些媒体的行动推迟到资本主义被摧毁之后就是一种偏离。因此，与任何别的地方相比，为何我在《传播》中更多地保持了托尼式的观念，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不过，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像 IPC^① 或者甚至 BBC^② 这样的组织，你最终不可能与其成员和平地合作。那个前言在第三版《传播》中被去掉了，但它并未完全悄无声息地消失：我写了一篇后记，解释对于 1960 年代的错误观念发生了什么情况。

对于从改良主义观点到革命观点的转变，我仍然认为，如果我在一个领域看到第一种道路似乎是可能的，我就会始终遵循它，一直到我最终确信它不仅是艰难、冗长、难以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在延宕着解决问题的机会。那才是适合革命政治的真正情形。如果论点仅仅是我们必须采取革命行动，因为这样更快，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周期之内解决问题，那么它不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有当我相信这种观点之外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对实质性的变革树立了更多障碍的时候，我才会说其他观点是错误的——不是因为更慢而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我一直在不断地想要抓住会妨碍我直面这一事实的所有可能立场，我认为那是一件非常严酷的事情，但它并未使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作品一开始就已经朝着那个立场的目标奔去，不加怀疑地接受了它。事实上，在不进行算计的情况下转到那种立场还是不费多大劲的；我认为，如果你始终对其进行算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如它们在局部是矛

① IPC：英国著名杂志出版集团。——译者注

② BBC：英国广播公司。——译者注

盾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你就不太可能有浪漫主义革命者面对历史变革现状的那种畏缩。无论如何,那确实意味着你的参与和献身是极其严肃的。那是在我在写作《现代悲剧》时趋向达到的大致立场。一旦你赞成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更快、更令人激动,而是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道路,那么在不失去对它的参与和献身的情况下,你可能甚至会体验到我这一代社会主义者所经历过的那种暂时挫折。

当然,革命观念在你早期的著作中已经呈现了——它正好提供了那个书名《长期革命》。不过当你写作那部作品的时候,显然并未达到你刚才说明的那个立场。我们可否问一下,现在你会如何描述有关《长期革命》的全面战略设想——你认为它的欠缺与收获是什么?特别是存在着这样的批评,说这本书受到潜在的文化主义的损害,在其词汇中仍然更多地根据创新发展的共同过程而非与之冲突对立的阶级斗争立场来构想社会变革。你对这一批评持何观点?

这本书尝试思考一个在实质层面上具有文化进步和民主实践的社会中的革命观念——换句话说,思考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民主,它不同于专制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观念,也不同于由更为绝对的物质剥夺和贫困形式所标志的社会中的革命观念。与一般接受的革命形象相联系的是这样的社会秩序,作为被压迫者的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在我看来,强调文化发展的各种进程及其在大众出版、教育体系和更为新颖的传播手段之中的所有矛盾,以及强调随之而来的所有复杂政治因素,是在一个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中反思革命观念的前提条件。如今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在这样做的时候陷入了一个或许不可避免的专业领域——写得更多的是新型的而不是以前的革命,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我当时仍然觉得,通常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经济秩序本质的解释和它们将如何变革的解释

是有效的。我把注意力如此多地集中于文化教育，部分原因在于我当时太相信那些解释了。

就阶级斗争问题而言，存在着一个我前面间接提到的不同之处，如今我非常希望我在那本书中已经做出了区分。阶级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固有的——也就是说，一种绝对的、难以克服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经济上的但却溢出到整个社会秩序之中。然而，必须对这种冲突和阶级斗争进行区分，后者涉及到自觉的持续努力以改变作为阶级冲突基础的社会关系。存在着一些非常令人满意的改革理论，它们包含了阶级冲突的事实，但却恰恰止步于对阶级斗争的考察。另一方面，革命理论常常不适当地将二者同化了，因为实际上存在着某些历史时期，通过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教育的变革，阶级冲突以某种并非典型导致阶级斗争的方式得到了调解。在这些时期，被压迫者的渴望被给予了少许承认，与此同时又受到了限制和阻挠。现在通过谈论收编过程，我可能会对其解释得更为清楚。这本书中最好的倾向是努力理解阶级斗争在文化和教育发展领域中的意义，这些领域当时通常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政治之外。我认为那种倾向通过随后的作品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了。但是在这本书中，对于资本主义民主中的一切普遍性革命变化进程，其新型文化实践形式与政治或者经济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解决。

政治变革实际上在《长期革命》中并未被忽略，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在你的规划结论中的有限程度。变革在政治环节的主要部分是致力于议会，你在那个地方写道：“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即使在最低限度感受到直接参与我们的管理事务也是非常困难的。”^①尽管是用稍微主观性的措词表达，这却似乎是对英国现存政治制度的一种

^① LR, pp. 336~337, ——原书注

非常激烈彻底的批判。然而为了减轻这种情形,你只是建议对议会每两年进行部分选举,定期普选,采取一种更为精确的选举制度。可是,存在着许多已经固定了普选制和比例代表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你甚至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目标明确加以说明,仿佛它在英国是一个过于打破习俗的要求。那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任何一种意义上与英国现状有质的不同吗?最后你一般性地呼吁了某种改进,其中你认为“英国民主的当前氛围看来好像日益形式化和非人化”^①——这个主题若干年后在《五一宣言》中又被延续了:“对议会的批评是为了不同于某种仪式的民主……同时,在上议院和下议院是类似的,这种过程在一种浓重的仪式氛围中继续着,而且它们不仅仅是独特的残存现象……这是明确的权力斡旋于其中的剧场秀;现实权力被模糊于其中的柔美黄昏。”^②对议会政治的仪式化程序所具有的迷惑功能进行批判,现在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里的含义似乎是,一种比较浓厚和真实的氛围会以某种方式产生一种令人满意的民主形式。你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这一批判一直伸展到资本主义工作关系、财产关系、学习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所有范围,在此之后,读者却伴随着一种得到改善的氛围得到了改进议会的建议。《五一宣言》甚至唤起了这样的期望,“如果下议院是关于重大国内问题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最终焦点,它就会很快恢复它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它偏爱属于一种不同的制度并认可其完全不同的规则和体例的时候,它将会继续穷匮其民主的现实”^③。在其他地方,《五一宣言》宣称:“我们可以设想并且乐于看到下议院严阵以待,反对有组织的私有权力或者既得利益,为大众事业对抗独裁的当局和秘密的决定。”^④伴随着它所夸张

① LR, p. 338. ——原书注

② MDM, p. 147. ——原书注

③ MDM, p. 149. ——原书注

④ MDM, p. 148. ——原书注

地唤起的 19 世纪或者甚至 17 世纪史诗般的过去,这种传统议会政治的观点在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无疑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以被如此简单、容易地转变成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手段,这在历史上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甚至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被提出。遍及《长期革命》与《五一宣言》中所有对民主的讨论,实际上都缺乏任何现实的阶级所指。民主被论述为某种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扩展或者压缩的东西,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民主的内容从一种社会秩序到另一种社会秩序经历了性质上的变化,除此之外,从古代的议会到中世纪的主要社会阶层、从资产阶级议会到无产阶级苏维埃,根本性的制度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这说明了什么?

关于政治建议在《长期革命》中的极度不足,你的评论是有根据的。与当时相比,这些建议作为现在的矫正手段似乎甚至更加不可能发生。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两个因素:一个原因是 1960 年代早期一种引人注目的欣快症,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政治变革可以非常迅速地在英国通过——这些政治变革的大量内容要么是残余的宪章派的要求,要么是比照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英国的性质进行调整;另一个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像大多数用英国观点思考的人一样,我如此接近于反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特性,以至于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它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享有的共同特征——那真正需要更多的关注。在全面走向思考随后 1960 年代欧洲政治的过程中,我更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五一宣言》中,这种认识——为了现代化的民主进程,议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恢复——依然存在,但它来自整个团体而非来自我个人。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事实上你所引用的句子是爱德华写的。对我而言,那种观点在 1966 年之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你一定记得我成长于其中、英国大多数“左派”在实践中所采取的那种信念:一个强大的、具有多数席位的工党政府有能力克服以前社会民主政治中议会制度的非常明显的局限。由于战后紧接着进行

重建的非正常形势,1945年的政府可能要打上折扣。但是在1966年,当工党政府在正常的和平时期环境中以绝大多数就职的时候,对我而言,随后发生的是一种决定性的经验:它结束了作为社会变革主要核心手段的议会观念。那届政府的记录与工党对其事务的管理没有任何关系,与选举的周期性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关系,与其相关的是党派机器的整体性质和资本主义政府的本质。我长期试图与两种潜在的倾向或者传统共存,或者至少暂缓评价哪一种将会证实是更为相关的或更起作用的,在几天之内,这种尝试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说我太草率了,然而这毕竟是高潮性的时刻,始终是理论的上限——因此它是对理论的一次真正考验。当你在15年的时间里一直思考某个决定的时候,最后你就可以在两天的时间里接受它而没有任何草率。

在《长期革命》里,我确实开始逐步提出代议制民主与我所说的共享制民主之间的区别。由于某些采用它的人,共享制民主这个措词有时具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并行历史,尽管如此,它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意义仍然是决定性的。我当时举出的例子不仅有工作场所的民主,还有生活场所的民主,它们作为自我管理的形式,处在与代表权观念相反的政治传统之中。不过,我当时的确没有展开对各种代表权观念的充分批判,现在在我看来,其共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在根本上是对民主不利的。我认为,代表权与大众权力之间的区别现在必须被非常尖锐地提出来。最近我在《关键词》中已经尝试这样做了,但是我仍然发现,当我对代议制民主进行批判的时候,即使面对的是相当激进的听众,他们也都做出了惊讶的反应。

迄今我们已经讨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结构。然而,在《长期革命》中存在着一个与其互补但却更为极端的欠缺,那就是对资产阶级国家强制性手段的认识。在《五一宣言》中,有几页是关于官僚制

度的,但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批判某种僵硬的管理体制、威权主义的程序模式以及与普通人的距离——换句更合适的话说,是完全可以政治频谱中发现的某种传统类型的主题。还有一两页谈到高级行政官员与其他资产阶级群体之间的密切社会关系,谈到他们在阻挠和削弱社会变革方案中的角色——“内阁、行政机构、司法部门、金融和商业领域中领袖人物之间密切的家庭关系和他们在中学、大学、俱乐部里的联系”^①。《宣言》提出了这一问题,“是否可以说,由于私人资本的利益,法官、警察部门长官、高级官员、大使、学院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头脑人物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列表上有一个明显的缺席:军官群体。在狂热地过分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机构的极“左派”一方,如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传统,一种幼稚的启示论——“在社会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军队”。另一方面,军队毋庸置疑是国家的主要强制团体,远远比国内警察更为重要,它在过去因为终止罢工的目的而再三受到调动,并于英国 1970 年代在北爱尔兰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日益显著的角色。在这些文本中完全从未提及军队,那不可能是一个偶然。如何解释这些文本对于资本的这一主要强制机器的沉默?

你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忽略,十分正确。实际上我认为,那在战争结束一直到 1960 年代晚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完全视而不见。你不得不称其为视而不见,因为,虽然军队 1970 年代在阿尔斯特^②受到了更多的直接关注,但是它在 1940 年代的港口码头是完全可以看见的。军队的存在没有任何问题,但那始终是在英国国内社会里。事实上,对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不仅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的视而不见,甚至还存在着与它的某种共谋,因为“左派”一方没

① MDM, p. 118. ——原书注

② 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一地区。——译者注

有在关于公共权力的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实际上任何可能的国家)组织的观念之间做出任何区别。因而,更多权力在战后显著地向日益集权化的政府转移,这部分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功能需要,部分程度上也是英国“左派”计划的实现。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当然,国家煤炭委员会不是军队,英国铁路公司也不是警察部门的政治保安处。但是,一代人居然相信可以把大众权力的职责移交给负责那些机构的政府,对于这种信任程度而言,在随后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合理地断定,那代人在这方面必定是极其缺乏判断力的。这与整个政府或者部分政府是否必须被摧毁或者如何将其实现的不同问题相距深远。当然,有些人按照政府的如实面貌来看待它,但是“左派”主流对于普遍的理解失误难辞其咎,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例如,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类似角色,英国警察一直得到一种不同的一流反应,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10年示威期间,它的形象有多少得到了改变,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力量作为不同于其社会角色的根本性质。目前当务之急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在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性权力的时候他该定位于何处。

在《文化与社会》结尾的地方,你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服务观念的工人阶级替代必须是团结观念,但是与此同时你反对团结一词的冲突性与好斗性含意,其依据在于,它暗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分隔,与共同体观念不完全一致。关于《长期革命》中更为富有战斗性的姿态,一个评论是这样的,在那里你第一次宣称革命是必要的,因为特权阶层将会抵制当下社会安排的任何一种改变。然而,对于这种抵制的聚合与组织,你在那个时期似乎仍然缺乏任何清晰的集中想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不仅仅是对于变化的一种散漫的顽固不化:某些机构在其内在机制中受到其功能的支配,那种功能恰恰是捍卫现存秩序并抵制任何对于它的本质性改变。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已经把国

家政府视为抵制革命的关键机构和资产阶级权力的核心地带。现在你是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接受还是认为它过于简单了？

我接受这一命题，尽管对这一命题的接受引起了许多问题，就像我以前的立场那样——因为最大的困难在于用实用的术语思考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可以被据以摧毁的方式。当然我也认为，与集中强制力的权威机构并列，即使在貌似极为温和的政府外围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压制的某种非常普遍的再现和撒播，通常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得以被中介。除非人们已经有了长期经验应付那些与他们非常密切的机构，我怀疑我们是否将会调动起对核心机构进行进攻的足够资源。不过我毫无疑问地接受你刚才大致描述的理论观点：这在最近 10 年中日益清晰，因为我自己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强制力以及右派求助于这种强制力的可观言论已经逐步显示出一种更为明显的势力。

这引起了与《五一宣言》中一个重要段落相关的问题，对于在革命与演变之间做出的任何一种选择，该段将其谴责为一种虚假的两难抉择、对既定范畴的一种不加思考的重复。它诠释道：“在这种社会里，这些不是、在一段时期内已经不是有用的社会主义策略了。西方的共产主义政党不再思考暴力夺取国家权力……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派不再考虑面向社会主义形式的某种必然的、渐进的变革；与此相反，他们将自身呈现为在现存社会制度之内进行统治的党派，他们愿意立即改善和修正这一制度，但是绝不会认真地替换它。”^①然后继续说：“在‘暴力’手段与‘议会’手段之间传统性反复对比的掩饰之下，关于社会主义策略的必要辩论已经被严重转移了……在英国，我们必须考虑工党的处境与条件，不是使用在‘革命’和‘演变’之间抉择的陈腐观点，

^① MDM, p. 152. ——原书注

而是使用在政治运动与选举机器之间抉择的现实观点。”^①革命与演变之间的对立在这里根据纯粹的实用主义和当下主义被轻蔑地拒绝了，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革命被简单地歪曲成“暴力夺取国家权力”——一个适合一切武装造反的解释——然后遭到了抛弃，其理由在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政党总之不再谈论它了。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的问题甚至没有得到提出。把革命与演变之间的抉择拒斥为“陈腐的”——工党右派把这种措词保留用于党章第四条——之后，现实的选项被呈现为工党或者一场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过当然，如果对你来说英国当时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工党机器之间进行直接选择，那绝不会使更多的与政治策略有关的根本性问题呈现为陈腐的。在这样一种框架之内，完全不可能预见或者甚至讨论几年之后在智利发生的事情。当智利自发的阶级斗争逐步升级的时候，与掌握权力的“左派”联盟的意愿相反，既不存在“朝向社会主义形式的某种必然的、渐进的变革”，也不存在任何“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尝试，以至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智利资本主义政府的本性突然残酷地被释放了出来。在智利，经典策略的选择被证明绝不是陈腐的——右派的反应是其必然性的证明。你如今会同意这一点吗？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写作《宣言》期间，在集体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恰恰围绕着这一点——这里，在理论分析结束的地方，你找到了伴随工党的所有政治策略，这些策略不是出现在工党的衰退状态，而是出现在它的复兴状态中。有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待革命与演进的显著差别，但是作为一个论点，它针对的是右派而非“左派”。因为在英国，这种区分通常被用于工党的右派，而且，重要的是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演进观点在如今的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渐进主义不可避免的意义，演进式的社会主义有时仍然被雄辩地唤起，

^① MDM, pp. 152, 155. ——原书注

但是它在英国政治中已经不再有任何积极的存在方式。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是批评右派使用这种区分的方式——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充分给出有必要对“左派”做出的这种区分。

确实有两个必须分析辨别的观念。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念,其暗示力量借自于有关自然进程的进化论,在英国,与这种演进式的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所有复杂观念和讨论很大程度上已经在工党中消失了。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的渐进主义观念,那毫无疑问并未在英国消失——远远没有消失。实际上,它在你自己的政治作品中似乎代表了一种基本的症结:它就存在于《长期革命》的题目之中。现在,你的“长期革命”在这本书中仍然是一个极为含糊的字眼。因为,一方面它表示了可以在想象的最为宽广的范围里一个既定社会中所有实践的转变,从它的决策机制一直延伸到他的运行过程,从它的文化生产一直延伸到它的家庭和个人关系模式。非常清楚,完成那种转变的社会主义方案必须被呈现为一个多元长期的方案;它不会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完成,甚至也不会几代人中完成。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可以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自身的转变相比,将会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在此意义上,针对肤浅的幻想——工人阶级只要获得权力,将生产资料国有化,随后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告诫,你对革命持续时间长度的强调具有一种有力的、有益的冲击。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一种极大的危险,可以用“渐进主义”这个词来表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许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它也绝不能被描述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为什么?因为这一全面转变的漫长持续时期本身可以被划分为完全不同的时期进度表,具有不同的快慢节奏。这些时期中的某个时期相对短暂,并且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将其描述为对国家权力的革命征服。当然,这不必然是短期的事情。十月革命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后

来的革命在时间上则较为延长,关键点在于别的地方。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通过一个完全非渐进的过程开始,因为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结构统一体的瓦解,以及在阶级鸿沟另一边与之匹敌的大众主权国家制度的出现,在一段时期的尖锐冲突和双重权力之后,后者形成一种崭新的、更为民主的国家类型,将原有的国家类型完全清除。就其本质而言,一个政治统一体被另一个政治统一体所取代是一个突然、密集的进程。革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它所坚持的主张显示出了它的特色:只有一场这种意义上的猛烈危机——危机以某种以前并不符合现实、以后同样也不符合现实的方式非常急剧地震撼了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提供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通路。在任何形式或模式上,那都是一种与渐进主义完全对立的观点。如今你对它的态度是什么?

你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两种进程之间的区别——有点像一个东欧读者在读了《长期革命》之后对我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有过自己的短期革命,现在我们开始了我们的长期革命。”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主要是全部社会转变的巨大时间长度,它通常被贬低了,然而它却应当内在于所有重大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如今我毫不怀疑短期的革命(套用东欧人的措词)同样也必须发生。我根本不会反对关于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传统观念,但是我愿意以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达这种革命:当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政治机构对于支配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丧失其权力的时候,革命就完成了——那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些再生产过程此后将不会延续,这样就澄清了理论上的立场。尽管我并不总是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用任何现实的措词来说,长期革命的成功条件都毫无疑问是一场短期革命,与其说我愿意根据所持续的时间来分辨这种革命,毋宁说我更愿意根据政府对于现有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再生产能力的丧失。那毕竟正确地强调了贯穿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强调中心地带正在发生的情况;体

制可能依然在产生并遭到拒绝,其可能性与你可以阻止体制的产生差不多,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分散的过程。

如今,长期革命观念所具有的意义在短期革命上的唯一呈现就是:在统治阶级自身分裂的时候,或者面临它不再能够以任何一种可以接纳的或者常见的方式所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调动各种资源,摸索达到经典传统目的的途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相当可观的准备过程,准备过程本身一定不能局限于确保革命形势中权力转移的直接必要行动。对到达那种局面的预备阶段进行讨论并不是某种形式的渐进主义。它是一个提醒,当政府正在以某些更为明显的方式瓦解的时候,需要的不只是一些草率的临时准备的步骤。我强调了认识与大众力量相关的方法和步骤的显著重要性,我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放弃对它的强调,这在当时本来是可能作为改良主义或者渐进主义而遭到拒绝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它不断增强的对综合性劳动分工和复杂科技的依赖,意味着与一般在革命传统中考虑的相比,有更多的东西必须要学。在1926年大罢工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在这样一段期间,处境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等级已经不复存在——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工程学操作中,在判定什么是应急运输、允许什么样的供应通过、暂停什么样的供应、在他们自己当中形成什么样的职权程序的过程中,人民如何学会了新的大众管理方法。

类似的组织技能对于占领或者警戒一座工厂是必要的,不过,那种纪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就出现在那里的。例如,最近在格林威克非常惹人注目的是,在大街上经常有比警察更多的示威者。两者之间最为重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已经深入学会了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的方式;另一个,常常因为他们出发时是作为和平的示威抗议者而且并未预期有激战,大抵像一群个人或者小规模群体那样行动。当然,在其他社会团体中,某些“左派”群体已经通过学习街头斗争的方法对来自警察的暴力镇压做出回应。总体而言,我认可这种事实,它在由大众

的能量、智谋和才能突然释放所构成的载入历史的革命中得到了证实。不过我同样注意到——因为这是阅读中较少令人愉悦的部分——未能预先谋划或者实施某些步骤的程度已经极大地使手头已经具备足够条件的人民遭到了削弱。毕竟，自从经典理论得到阐明之后，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一直是那种普通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形式：它不是导致一种新型大众力量的出现，而是导致国家本身强化成一种甚至更为压制性的形式——法西斯主义。所以，当革命预备阶段的问题尚未得到真正重视的时候，我对于谈论短期革命总是感到不安。我已经发现，从传统继承的多数表述并不怎么瞄准这一复杂的准备和学习过程。与此一致，一个革命处境的至少半数特征将会仍然使你感到惊讶——那将具有这样一种危机的性质。不过我认为，在一个宽广的范围里，对于大众组织和大众管理技能的学习将会使阻止现有社会关系有效复制的前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更为现实的可能。

与此同时，在一场革命危机本身当中，针对部署好的现代军队力量、进攻国家要塞的简单观念是错误的军事思想，任何一种低估当代军队武装力量的策略，一旦被操纵成一些固定形式的对抗，都是完全不能使我信服的。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一支现代军队可以做到什么：即使在我们曾经在英国看到的最为野蛮的国内镇压行动中，军队也一直是在用一根手指战斗，而不是用双手上阵，甚至在越南，某些极端的武器也被阻止使用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军队具有在进入城市的战车中作战的优势，一旦一支军队分散对抗并不集中于某个单一目标的敌人，其可怕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实际上，当一个军事机构不得不接管多种民事职责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现自己非常无力，然而，当它防御自己选择的一个地点或者在一个经过选择的地区而不是所有地区取代民用手段的时候，它却是极其强大的。现在，在针对军队的任何一种斗争中，我都享有这样的观点：对于把一些士兵争取到革命一方的目标，任何人都一定不要放置过多的砝码——总是存在着

不可能被争取的军队。如果你体验过军队的纪律和它所灌输的那种意识——在你的部队之外,世界的其他部分不再存在——你可能就会对此没有丝毫怀疑。此外,在任何一种革命局势中,都会有大量的自愿者以某种联合的阶级行动,而不是抽象的政府行动加入武装力量。有关 1926 年大罢工的历史不仅是一场宏伟的大众动员的历史,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征募民兵以对其进行反击的历史。有必要非常认真地考虑他们出身的区域和阶级。不过同样正确的是,一场革命危机的性质是通过整个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运动体现的,在这些运动中,关于是否由政府采取暴力的问题处于权衡之中,一部分与现实中士兵的正义感有关、与他们受到的训练有关,一部分与现有统治阶级的政治判断有关。因而,大众的力量必须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把武力选项作为一个不利的条件。当出现一场消防员罢工的时候,对受到派遣去扑灭一场大火的军队进行观念灌输是相当容易的。当士兵们进入码头卸载货物的时候,观念灌输已经比较成问题了,因为他们如今正在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介入,不是要拯救生命,而是要夺走别人的工作。举例来说,如果军队的派遣是针对于工厂的控制,或者甚至是针对任意一次重要的大众反抗,对于纪律的压力甚至会变得更为显著。有些条件对于军事指挥执行其命令的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这包括任意一次国内行动在性质上的可见性以及对于作为敌人被指认给士兵们的武装力量、士兵们自主理解其性质的可能性。存在着某些具有现实获胜机遇的情形,对严酷和镇压的诉诸可能会受到置疑,在这些情形下具有获得胜利的现实机遇。

这样的行动是其图谋的一部分,要使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不可能。当然,传播系统对于其成败通常是极其重要的。在大罢工期间,英国劳工联合代表大会(TUC)在印刷品方面的确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措施,那在斗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这些很快就被政府忽视了,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出了一份官方公报,与此同时另一方则正在

制作地方罢工公告。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这场工会运动并未谈到广播——但是在这场罢工的政治命运中，广播在战略上却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如今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与一切命令和信息的传播有密切关联的技术人员数量已经增长了，同时经济系统的整个运行已经逐渐依赖某些关键的工人群体。对这一点的认识，右派比“左派”要好得多。换句话说，虽然普遍接受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构想出了与国家权力的强力对抗——大体上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如今在其细节上已经如此改变，以至于当我听到对于传统表述的纯粹重复并注意到对于那种对抗的准备还没有得到认真思考的时候，我感到了不安。如果一个人最终——对我而言，最终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 15 年到 20 年的踌躇之后——判定革命途径是唯一的道路，那么一个人实际上确实必须以非常崭新的方式思考如何为它做好准备。我同样认为，许多准备可以而且应该与各种形式的学识结合在一起，这些学识在明显的短期局势中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被人们共享，人们在学习这些学识的过程中可能并未享有这些学识，然而却预见到追求社会主义的斗争必将到达那一地步。

在任意一场革命之后，你会如何设想大众权力的模式？就定义而言，社会主义包含了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集中的集体规划，这包括国内的规划，也包括国际性的规划。但是，劳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人委员会却体现了对于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其最终术语表达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的完全消亡。你对这两个原则之间的连接方式有何见解？

我认为，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场革命的成功将会源于大众权力从许多战略地区的喷发，大众权力从这些地区浮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协同过程。在大罢工期间，与预料中英国劳工联合大会正在表现出的软弱相比，地方委员会与大众组织自然产生的足智多谋和

创造能力是非凡的。当统治阶级步履踉跄的时候,这样的委员会或者参议会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形式。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权力中心的协同或者合作,如果一个新的社会要在任何发达的水平上得以维持,这种协同或者合作终究是必要的。在那一刻,人们通常依然提出旧式政治领导阶层的方案。大部分有待完成的工作正好有关那种基于假设的领导阶层与大众自治中心的关系。劳工代表大会、罢工委员会、自治参议会和工人合作社在地方层次上都呈现出许多组织上的困难。但是一旦你已经建立了这些组织,现实的问题就在于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组织规模,那对于地方努力的成功将是决定性的。完全可以想象,被资本主义民主渗透的人们将会复制出协商会议、议员或者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权力很快会再次被产生出来。考虑到协作的绝对必要,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领域,不存在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的解决方案是熟知的:委任和罢免统治权的程序加上信息的流动。在这种社会里,信息的流动是可能的,某个人不必行走 300 里的旅程回来在会议上汇报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现存的技术允许更多人听到并亲身参与会议。但是与新的中央大众权力机构和地方大众权力机构交织在一起的政治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在《长期革命》时期,你似乎把民主设想为一个没有任何特定阶级限制的持续进程。当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让路的时候,议会民主将会被扩展,而非被改变。自《关键词》以后,你在代议制原则和大众权力原则之间已经做出了明显的区分。^①你刚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提及实际上承认了某些类型的民主机构——例如代议制这样的体系——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换句话说,正如现今主张的那样,并非所有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民主都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成绩。议会民主同样是

^① K, pp. 83~86. ——原书注

一种资产阶级的自我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社会主义的出现将会改变民主进程的这些结构，产生出一种在类型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代议制制度的主权国家形式。就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来说，如今你会怎样描述那种变化的性质？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根本不同非常清楚地出现在这两个词的历史记录当中。资产阶级民主已经逐渐意味着历经不同历史时期和选举制度而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进程，以及对于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一种重要手段的进行言论和结社的公民自由。右翼作家如今把这些进程作为民主的要素与占据工厂对立起来，后者据说是非民主的。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肯定是大众权力的直接行使，它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意义，这也是民主在历史上最古老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在非常早的社会主义斗争时期，甚至前社会主义斗争时期谈论民主是适当的，正如以一个未来即将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来谈论民主那样。关键重点必须落在大众权力的直接行使上，而不是落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统治国家的内在管理上，或者落在那些不是民主政治只不过是民主附带程序的普遍手段上。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传统对立如今对“左派”是极有损害的。“左派”的全部未来就在于针对这种对立进行说明；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而且非常显然是更为民主的。这是一场必须取得胜利的斗争，由于两种奇怪地相互强化的经验而处于危险之中，这两种经验是：接近本国费边主义风格的官僚制度经验，以及在更为全面性的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经验——它在数以百万计的头脑中支持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完全错误的对立。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非常详细地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更加民主，这将涉及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工人运动范围之内其他类型民主进程失败情况的清楚了解。

从制度上详细讨论政治与社会的变化是多数人倾向于回避的，有

意思的是,尽管你具有这样做的天赋,尽管你非同寻常地乐意讨论一种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具体可能形式,但是与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对比,你却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同样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挑战。如今存在着三个实质性的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在结构上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而你迄今主要只详述了其中之一。这三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涉及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障碍的消除。第一个障碍是代表们和被代表者之间的障碍,这是你在《长期革命》和《五一宣言》中的批判焦点,你称之为对于单打球场的选择权,每5年才投票决定一次。^①自巴黎公社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古典主义地强调了,只有通过授权制而非代议制,以及选举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对授权的撤销,才可能保证社会主要立法机构与大众意愿没有任何真正的隔离。考虑到它们之间永恒的分裂危险,关于可撤销授权的方案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障碍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障碍,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维持系统和决策系统之间的分裂。通过对剥夺者进行剥夺并建立真正地对于生产资料的集体主权,社会主义在工作场所开创了民主。民主的那种巨大扩展改造着生产者日复一日的的生活,也是你在《长期革命》结尾处陈述的目标之一。工厂委员会一直是在生产过程中对合作生产者进行这种集体管理的常规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你倾向于忽视的第三个障碍,那就是资本主义政府内部立法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分裂。制定法律的当选议会与执行它们的职业官僚机构的二元性质是现有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其特征,它在所有地方都产生了一个单独的群体,由专职管理者——脱离全体公民的专门政府官员构成。与此形成对比,社会主义民主将会不断地趋向于统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互相分离的立法和执行职能,这样就导致那些政策决策者自己越

^① LR, p. 336. ——原书注

来越多地执行它们。总而言之，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是要压制独立制定规则并执行规则的政府，同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在日益减小。在你作品中的任何一处地方，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三个结构评判标准都没有近乎如此清晰地得到提出，那似乎与某种习惯有关，在那种习惯下，资本主义政府的执行和强制结构往往脱出了你的视阈。

俄国的苏维埃经验是非常短暂和不完美的——因为与选举制度相关的阶级划分（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与工人相比，农民被给予了少得多的选票）、缺少秘密投票以及其他局限性而被打上了折扣——尽管如此，它现在仍然代表了唯一的历史试验，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所有这三条原则以非常原始的方式开始发挥作用。在你的作品中对于俄国革命的处理通常倾向于暗示，虽然我们应该理解并尊重它，在最终的分析中，它与身处发达西方的我们仍然是非常遥远的。然而那一暗示只有一半符合事实。相当正确的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期待在西欧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出现所有那些在俄国相继发生的损害结果，在此意义上，它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如果说在我们远为发达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值得我们仿效的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这种体验——相反，回溯到 60 年前的社会中，某些类型的制度得到了预示，即使在今天，它们在设想和实践上仍然超越了我们西方通常的政治讨论范围。

我想，你正在询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充分考虑了 1917 年表现出的那种富有想象力的飞跃。对此的唯一回答是，我已经经历了所有与十月革命相关的吸引和剧变，当这些经验沉淀下来，我的视线也穿越了它们以及对它们的习惯性赞美的时候，我依然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两三个伟大的时刻之一。就是这么简单。因而我不会反对你刚才陈述的那些普遍性原则。我认为，由于新的界定是难以完成的，与你刚才提出的第三个想法相比，战胜代议制民主并用直接民主取代它以及通过消灭私有资本把民主延伸到工作场所要较为容易——当然，我

愿意承认,在我自己的作品中,第三种想法作为一个主题还没有充分显现。立法与行政的统一是一个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模式。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它对预防形成个别管理阶层都明显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这种模式的一个版本——通过公开会议实施管理的观念,在1960年代晚期学生运动的小范围内经常得到检验,它常常取消由长官和执行委员会构成的结构,通过开放的会议处理一切事务。那很快出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可以取消行政与管理职能的分离,但却不能取消行政与管理职能本身。其解决方向可能在于职务的轮换以及这样一个伴随规则:如果没有曾经处于某个职务并且又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直接卷入其中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管理任何进程。中国人在其最佳状态时正确地强调了某些以上原则。即便如此,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命令和分配相关的问题仍将是难以解决的。例如,对资源的管理将不得不包括决定不生产某些东西,因为你需要生产某些其他东西。因而,正在生产那些东西并觉得他们自己的生计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很可能将会以局部意义上典型的社会民主反应做出反对,对于一种更为广阔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一个复杂社会的必要管理相关的所有问题将会反复遭遇那种紧张局面。如今我所能说的是,虽然主要问题是政治性的,事实上我们将会受益于一种性质崭新的传播技术,它使一种真正持续、开放、可以依赖的决策和管理过程成为可能。

政治策略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者当中处于争论的前沿。但是,一个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探究。你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总是例外——例如在《传播》中,你在某些细节上陈述了一个组织文化生产的社会主义方针,它首先适用于广播。如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你提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复杂社会”,然后提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正视的更为复杂

的社会”^①。这种表达措辞提出了一种非常深思熟虑和极其重要的强调。当你强调“真正社会主义”的“复杂性”的时候，你在脑海中想的是什么？它们对于198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意义是什么？

是的，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我希望这成为思考重点的一个明显改变。我认为，我们如今严重地被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遗产所限制，有时丧失了政治上的能力。这些模式要么使某种社会秩序简单化了，要么纯粹在为某种社会秩序文过饰非。当然，许多社会主义者已经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视为一个复杂的过程；针对其敌人不断变化的艰难斗争，在来自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生存压力下进行社会主义建构的复杂问题，或者毛泽东所坚持的为了某种崭新、普遍的社会主义觉悟，针对许多不同类型矛盾或者残余矛盾的极为长期的斗争。我承认这些与过渡有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先前在理论上不相信它，20世纪已经绝对在实践上教育了我们。

然而，如今我所关注的是这些过渡导向的社会秩序的性质，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对于它的重大思考是绝对必要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巴霍称之为“事实上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或许尤其如此。我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已经接受的这些模式相对简单并且甚至粗略。因为对于一种有关未来的明确说明，任何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定会小心谨慎的。不过，最为重要的原因处于更深层面。社会主义观念最初产生于其中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悲惨、贫困和混乱造成了关于替代世界的处方几乎太简单了。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过程。但是如今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我们在大量事例中已经处于一种新的形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可以

^① ML, p. 211. ——原书注

导向的某种社会主义秩序,我们已经明显必须形成(我本想说是重建,但那只是在结构上精确)一些具有深度和连贯性的明确观念。即便处于不同的环境,东欧国家中存在着类似的需要,在那些国家里,当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被统治阶层挪用的时候,反对某种压迫制度的斗争存在着偏离社会主义或者在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严重危险——巴霍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在民族解放斗争的高级阶段,这种需要再次存在于不同的环境中。

当然,我现在可能会更加迅速地承认这种需要,然后就止步于此。不过,即使那样,有时也显得期待过多了。被普遍接受的模式的力量,甚至那些深为人知的名字似乎都在某些人的脑海中阻止了思考。因此,你可以说服斗士们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将会解决这种问题、解决那种问题、解决所有其他的问题,与此同时,在那些你会期待与之并肩或者至少倾听其意见的人当中,相当重要的大多数由于他们确认只不过是口号的东西——这种确认有时完全符合事实——而完全转变了方向。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即使那些对社会主义口号怀疑的人——不是现有的统治阶级及其拥护者,而是所有那些潜在属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未来也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紧迫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着手描述某种新型社会主义秩序的理论沉思。在若干年里,我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并且希望很多其他人将会参与其中。

这种尝试涉及何种考虑?你可以给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吗?你所指的“被普遍接受的模式”的主要缺陷是什么?你认为它们现在应该得到怎样的修正?

请允许我从看似纯粹消极之处开始,积极的方面是根据它们得出的。首先我认为毫无疑问,在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合理化和管制性的成分在它们被接受期间已经变成了残留物。它们毕竟主要是

在混乱的资本主义积累和竞争时期形成的,先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后者如今正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干预而得到支持。调节、管理、国家的支持与干预,如今这些都是合理化了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特征,这种秩序实际上永远在努力争取新的控制和新的控制手段。这些发展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的进展或者混合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获悉其中的一些就足以使你悲叹了。与其巨大的公私科层体系相伴,现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调节、组织和标准化的压迫甚至被许多人看成社会主义的恐怖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谁可以指责他们呢?这个时候,他们听到半数的社会主义者正在谈论更多同样的事情,而且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正好以一种极端甚至病态的形式呈现出这些特征。

与此同时,存在着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模式:单一化。极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社会主义乌托邦描绘出朴素的、实质上未加组织的社会:充分的、不受约束的幸福,通过支配性的普遍道德动力而得到管理。谁不曾有过那种梦想?它通常被明确地视为斗争之后的某种休憩:资本主义日间的喧嚣和压力之后的一个愉快、舒适的夜晚。或者再一次改变比喻(这种倾向在他们当中是不断产生的),它是早晨——社会主义黎明——令人愉悦的空气;面对甚至可以不必在一天中完成的工作,新鲜而又令人精力充沛。确实,没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压力可能就会太重而难以承受。然而,我相当确信我知道谁将会在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做批判工作,那绝不会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人民。无论如何,早晨和夜晚都有更好的事情尝试去做。

现在,这种单一化思想的当下价值在于,它在某些关键之处触及对我们的唯物论经济学进行现实评估。不仅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极度愚蠢,还有构成其基础的更为严重的帝国主义掠夺罪行——如今正在进行的对于土地和资源的毫无夸张的劫掠,已经把许多人导向需求的单一化。当然,在这方面存在着某些戏耍的成分,但

是同样也存在着某些严肃的思考。然而,许多这种思想建立的基础是各种共同体观念和自给自足观念之间过于表面性的关联。在任何一种现实的意义上,它们之间的联系现在只不过偶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却趋向于停留在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想的记忆里。与此同时,它也抓住了一些观念,自治、自我管理、在我们使用物质环境中的维护与平衡、创造性劳动以及共同生活等等,对于任何一种崭新、现实而又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秩序来说,那是真正必要的成分。对于那些在其当下水平上太过简单的观念,社会主义者现在的任务是要彻底思考其复杂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其进行本质上的彻底思考。

首先要说的是,任何一种有关未来社会秩序的观念都必须得到非常精确的定位,通常的一般观念不会这样。这是社会主义强调的唯物主义部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者特定的地区,我们必须从物质上存在或者可以利用的东西着手。我们必须学会用社会实用性的方式而非资本主义方式看待资源,在此意义上,这是非常积极的,同样它也是非常消极的,因为当我们期待保持任意一种通常的自给自足观念的时候,只有在很少几种情形下才有可能。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有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然而它的某些变体实际上已经被铭刻在大地上:煤在哪里或者鱼在哪里;在哪里可以利用阳光或者在哪里土地适于耕种;铁矿、铝矿或者铀矿在哪里。这些极为单一化的观念尽其所能取消了很多因素,现在,这种冲动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例如,正如威尔士民族党的菲尔·威廉姆斯(Phil Williams)在威尔士主张的那样,投资于塞文河和卡德根海湾的潮能将意味着在电力上的自给自足,那可能要好于永久依赖受到远方铀供应压力的核能设施以及不可避免与之相伴的全球化与集中化控制形式。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可以接受的高水平供应方面,那种物质的选择都是可能存在的,为了物质和政治上的利益,当然应该做出这种选择。然而,在与非常重要的、

用这样的方案无法解决的物质问题所关联的范围里,种种复杂的情况渗入其中。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都面对一个物质不均衡的确定事实。伴随着极大的破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它自己的不均衡发展形式,但是社会主义必须从真实的不均衡事实出发,毫无疑问,朝着公平关系的方向成功应对这些事实的那些制度和模式将会非常复杂。在占有、管理和处置这些不均衡分配但却相互依存的物质资源方面,帝国主义模式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至少都已经抓住了这些问题。一个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形式不仅将不得不应对像这些问题一样复杂的难题,它还将不得不更为复杂,因为就定义而言,它不会利用其他那些模式现在依赖的关于占有和支配的不成熟机制。

如果我们考虑当代社会主义思想中增加我们自营企业的极其重要的倾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点。我们应该发展这种倾向,它显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核心要素。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蓄水池,如今在对官僚和等级机构的愤恨中被封锁了,它可以被用来进行这种努力。不过从实践和研究中已经显而易见,自我经营管理的形式必然是既复杂又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捷径,像某些人1960年代所想的那样,仅仅凭借永远的公开会议,内在的准备、记录、说明和连贯程序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简单的。然而自我经营管理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内在的或者局部的程序,因为在经济上存在着与其他群体必要的相互关系,它受到我已经提到的所有那些不均衡问题的影响,也受到现实进程显示的有效范围的巨大变化的影响。同样在许多不同层面上存在着一个必要的政治关系范围。我认为,我们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在社会定位上的大体模糊:在某个时期它就是世界,或者可能是一个大陆;现在它可能是半个大陆,或者是从前的民族国家之一,或者是由这些民族国家构成的一个新的联盟,或者是某些正在脱离出来的民族或地区。任何民主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开始不仅仅是通过承认问题解决方案的显著多样性——对于这一

与地点、程度和领域相关的问题，人民将会自己决定解决方案；它同样将不得不承认那些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均衡的事实和紧张的局势——这些紧张局势无疑常常由争夺和冲突引起，自治原则不仅并不加以解决，甚至可能予以强化——相互影响的问题。对于解决自治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适当制度和模式，其复杂性几乎不需要强调。无论你们是迷人海滨上的旅馆集体，与荒凉地区的矿业集体处于直接或者间接的谈判之中——将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全都是不同的——或者你们是一个面对来自其他地区人口流动问题（有些流动是铤而走险的，有些流动是剥削性的）的具有吸引力的自治地区，你们很快就将充分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外部层面，你们需要复杂的谈判与决定程序，就像内部程序的必要复杂性那样。

如今我们应该接受，实际上应该欢迎这种复杂性，因为我们可以指出，对于我们打算建构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的、非剥削性的秩序，它是我们最好的保证。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让怀疑者放心，虽然这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将它作为现在和未来的一种解放方式，在单一化模式或者中央管理模式无能为力的时候解放我们的现实能量。这种复杂性是一种激励性的挑战——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对其进行利用的政治形式，其手段正在变得日益有用。

因而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在直接参与的基础上管理我们的许多内部事务，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技术节省时间来这样做，出于无数其他的打算，我们依然应该需要代表——我们可以暂时继续称之为代表。或许我们最为需要的政治观念就是领会这一原则：不仅任何社会主义代表只是作为代理人，要服从授权、责任和罢免，而且可以说，在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代表不是通用的。这样一个人不会是针对凑在一起的一大堆用途的代表或者代理人——相反的情况现在几乎到处都是。他、她、我们、他们——不是相同的人，而是必然不同的人——将会进行这一特定的接触、展开那一特定的调查、制作一场谈

判或者一份协议的大纲。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会略胜一筹,但是,与所讨论问题的密切相关性这一原则必须占上风:在一切真正的意义上代表我们自己讲话,而非代表“我的人”或者甚至“我们年轻人”讲话。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代议制或者代表制将会是非常多样的,因此比任何一种现有的议会模式或者代表大会模式还要复杂,后者构成了某些单一的通用角色。我非常抱有希望地期待新的传播系统能使这样一种崭新的多样性行得通。首先,几乎所有不同的争论、表决和谈判在它们发生的时候都可能被看到或者听到。因此,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可能不仅会有干预介入其中(显然要受到问题范围的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原则到处都适用),而且可能会有快速有效的参考出现在决定之前或者支持事实上将要做出的决定。新的电子传播技术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支持这种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且至关紧要的是,它支持全部可以得到的信息以及对于信息的记录和回忆。因而,这些奔向单一化观念、以前在设想中只适合非常小的共同体的民主类型可以变得完全正常地适用于较大的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通过共同体实现,这些共同体依据所讨论和决定的问题的性质,由于物质不均衡的事实和相互间必然多样性的政治关系,实际上将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大小和构成。某些社会主义者已经习惯于把机器和媒体视为操纵性的那种观念,很少思考过把现代传播看做通向新型社会组织的手段,所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启蒙先驱的模式或者单一化的地方共同体。正如普遍的情况,他们在界定的社会关系中被黏附在固定通用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观念上,在某些基本的意义上我们被坚持“属于”它们。他们应该去看看新的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承担得起允许它被挪用,他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如今可以相当现实地变得多么不可思议地活跃、复杂和机动。

你刚才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可以说是它的基

本资源和以前存在的对于这些资源的分配——和它的“最高层”：决策系统。但是整个中间范围的社会活动怎么样呢？例如对于劳动和消费的组织。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大概这些活动同样从属于一般的复杂性法则吧？

我只不过提出了少许这样的问题。关于劳动和伴有更多多样性可能的劳动生活，还会存在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复杂性；在不同时期的教育、训练和不同时期的生产之间，还会存在完全不同类型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和顾虑中还会存在更为显著的多样性，因此即使存在任何单一或者统一的解决方案，也会非常少。相反，将会存在某种对于复杂手段的需要，以处理大量多种多样的情况和问题。这些手段必须包括社会主义乌托邦中常常缺少的民主法律体系，同样必须包括决定权利和责任问题的体系，因为如果这些不被保证，如果这些看上去是不公平的，任何共同体都可能被瓦解。我希望举出的一个例子涉及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条例现有的、完全异化的混乱，这些条例在现实中不够复杂和灵敏，不足以公正应付各种问题和情况的现实多样性。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包括关于权利与责任的一般性原则，然而在现实社会关系的内部，复杂性将会自另一端产生，依据定义它是高尚的，同时它也应该必须是系统化的。为了支持某些抱有希望的对于义务的自由主义消解而试图回避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的问题毕竟是与一般自由相关的社会性。

自我经营管理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不仅仅是经营管理在现有所有权形式或者稍微修正的所有权形式内部的一个程序上的变化。当它只是程序上的变化的时候，它在任何地方都不接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关于什么构成所有权的整个问题必须得到改变。在某些情形中的劳动个人，在大多数情形中的劳动群体和劳动集体，他们不会用某些炼金术或者资本主义形式与其他较早形式更为实际的残余来继承、占有或者接收那份他们正在加工的一般性资料和生产资料。建议与核实、承担

责任、对建议和分派进行定期审议,这些程序是一般社会主义自我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里,不会有任何固定的所有权转移,有的只是稳定、公开、可以信赖的对于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评估、协商和分配。

这是一个挑战,但它是一个有意树立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对于现实生产、目前的组织、还有可能出现的组织的错综复杂的多样化经验相啮合。因为,虽然我们仍然不得不以许多直接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情况通常更多地由于他们的选择而非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当前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中找到关于各种问题的解释和各种解决方案的模式,那可能预示了可以实现的特定未来形式。从这些细节出发,社会主义未来的某种活力可能会再次开始流淌。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参与提出草案、展示什么是必要的,数以百千万计的人将会参与把不同的解决方案投入到实践的初期阶段之中,而且许多细节不可避免但却可以理解地超出我们最为大胆的预测。现在是把我们的精力转向那个方向的时候了。如果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放任不管,它只可能会摧毁我们。我们更多地希望处于这种处境,而非处于一个混乱的崩溃处境、一个被强加的秩序或者一个纯粹名义上的替代选项。这种挑战因此朝向一种必然的复杂性。由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一直在简单性和复杂性之间受到牵引,现在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两种方式的吸引力。但是关于经验和历史的每一次争论如今都使我做出清楚的决定——我希望这将是一个总体性的决定。只有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身处何处,同样,只有以非常复杂的方式、通过自信地走向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始社会主义的建构,它将解放并汲取我们如今受到威胁的真正力量。

参 考 书 目

本书引用的雷蒙德·威廉斯著作出自以下版本,附带缩写形式(最初出版日期在括号中):

- Reading and Criticism* (1950) (RC) Frederick Muller, 1966
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 (1952) (DIE) Peregrine Books,
1964
*Preface to Film** (1954) (PF) Film Drama, 1954
Drama in Performance (1954) (DP) Frederick Muller, 1954
Culture and Society (1958) (CS) Pelican Books, 1976
Border Country (1960) (BC) Chatto and Windus, 1960
The Long Revolution (1961) (LR) Pelican Books, 1975
Communications (1962) (C) Pelican Books, 1973
Second Generation (1964) (SG) Chatto and Windus, 1964
Modern Tragedy (1966) (MT) Chatto and Windus, 1966
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 (1968) (DIB) Chatto and Windus,
1971
May Day Manifesto[†] (1968) (MDM) Penguin Books, 1968
Orwell (1971) (O) Fontana, 1975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1971) (ENDL)
Chatto and Windus, 1971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CC) Chatto and Windus,
1973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1974) (TTCF)
Fontana, 1974

Keywords (1976) (K) Fontana, 1976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 (ML) OUP, 1977

The Volunteers (1978) (V) Eyre Methuen, 1978

The Fight for Manod (1979) (FM) Chatto and Windus, 1979

带 * 号者为: 与 Michael Orrom 合著。

带 † 号者为: 编著。

注: 《传播》中的引文出自第二版修订版。

在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怎样赞美雷蒙德·威廉斯的贡献都不过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把文化视为人类“所思所言的精华”，宣称只有少数人才享有文化，他们强调了文化本身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以精神贵族自居，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威廉斯则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彰显文化的物质性和日常性，从而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用文化来诠释大众的日常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威廉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预设了当代文化研究的疆域，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从事文化研究，威廉斯是必须加以了解的一个人物，本书是《新左派评论》三位编辑对威廉斯的学术访谈，内容涉及威廉斯个人生活和学术发展的几乎全部主要历程，对于理解威廉斯的学术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新
左
派

ISBN 978-7-5649-0222-3



9 787564 902223 >

定价：54.00 元